叛逆的巴爾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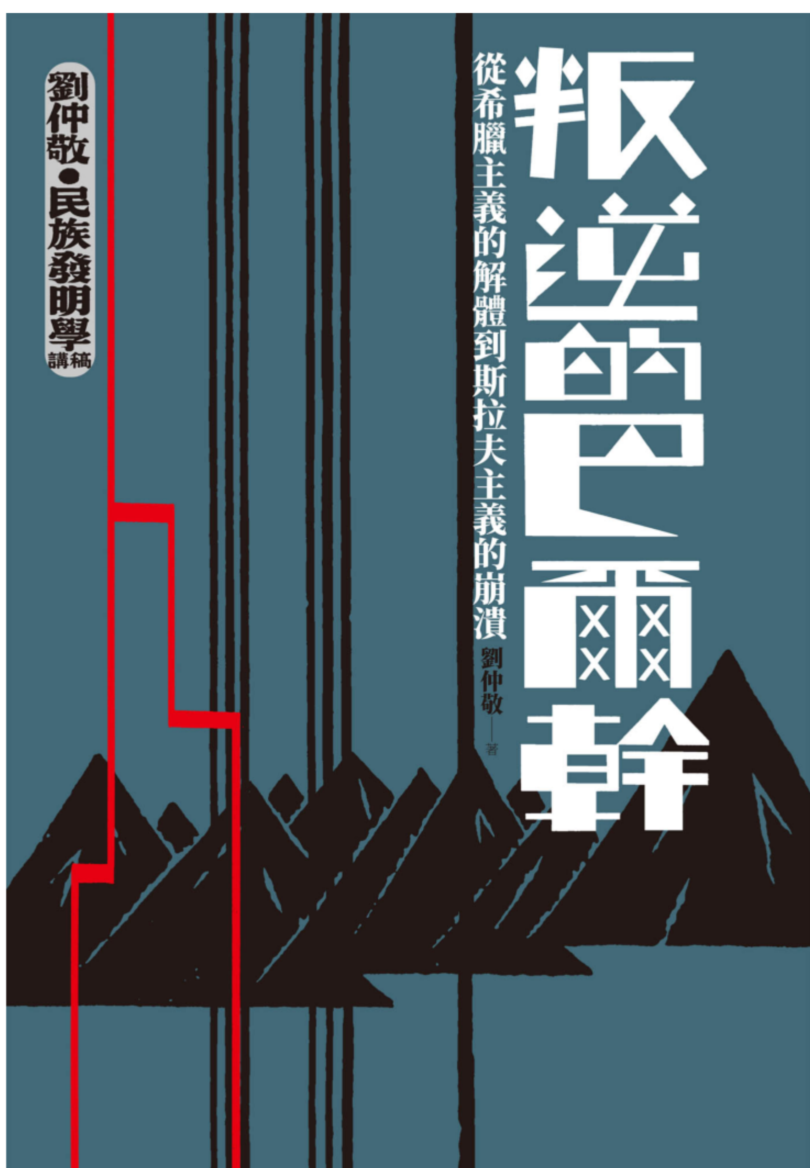
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

劉仲敬——著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叛逆的巴爾幹
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
劉仲敬——著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



巴爾幹政治形勢圖

巴爾幹半島位於歐亞交界處，其地理範圍涵蓋了從亞得里亞海至黑海之間的土地，在十九世紀以前全境皆為奧斯曼帝國領土。巴爾幹從十九世紀初的希臘獨立戰爭到二十世紀末的南斯拉夫內戰，歷經了二百多年的民族發明過程，最終形成十二個獨立的民族國家。

编辑说明

本书是在明镜新闻网「刘仲敬思想」系列节目的基础上汇编整理而成，内容保留刘仲敬本人演说的白话特色，并为他引述的各种比喻或典故添加注解，以及附上相关插图解说和制作重要大事记年表。

下列为本书各讲次的原始节目名称及播出时间：

一、《希腊：薛定谔的奥斯曼主义》/第10期/2017年10月19日
二、《罗马尼亚：希腊主义的叛逆子孙》/第11期/2017年10月26日
三、《保加利亚：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第12期/2017年11月2日
四、《马其顿：一个希腊，两种表述》/第13期/2017年11月9日
五、《塞尔维亚：五族共和的残山剩水》/第14期/2017年11月16日
六、《波斯尼亚：从三族共和到五族共和》/第15期/2017年11月23日
七、《黑山：欧洲黑龙会的孤儿》/第16期/2017年12月7日
八、《阿尔巴尼亚民族：突厥联邦主义的无奈发明》/第17期/2017年12月14日
九、《克罗地亚：反革命的民族发明》/第18期/2017年12月21日
十、《斯洛文尼亚：赫尔德的龙牙武士》/第19期/2017年12月28日
附录、《中印冲突的歷史背景》/第1期/2017年8月8日

希腊

「薛丁格」的奥斯曼主义



希腊
Hellenic Republic
Ελληνική Δημοκρατία
独立时间：1821年3月25日
首都：雅典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薛丁格」的奥斯曼主义。「薛丁格的猫」（Schrödinger's cat）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量子力学上的一个假定：在观察者观察到猫之前，无从判断猫是死是活，实际上，牠是死的状态、活的状态和无数可能状态的一个叠加，但观察者观察到猫之后，这种量子不确定性就正式坍缩为死的状态或者活的状态。

民族发明有很多模式，但归纳后只有三种：一种是「帝国模式」，也就是奥斯曼主义的假民族国家模式；一种是「文化民族主义模式」，像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小民族主义模式」，这是大多数国家最终走上的道路。希腊代表了一个很特殊的状态，它实际上是奥斯曼主义模式在失败以后像「薛丁格的猫」一样坍缩成为的小民族主义模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改名字。

希腊主义的过去式和现在式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最初希腊主义这个词发明的时候，它指的是一种奥斯曼主义在希腊的对应物，我们可以更

加准确地称之为拜占庭主义[1]；而今天的希腊共和国採取的是小民族主义，尽管它也叫希腊主义，但实际上是跟波兰民族主义没有什么两样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大，相当于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由「十八省」[2]建立的那个中华民国和现在台湾的小中华民国之间的差异一样。

要理解希腊民族发明的歷史，我们得先回顾希腊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歷史背景。近代以前的希腊和全世界所有地方—尤其是东亚、西亚和欧洲一样，没有所谓的「民族」，只有统治者和臣民。然而希腊也有它自己的特殊之处：它之前有两个帝国，一个是拜占庭帝国，一个是奥斯曼帝国。两个帝国的疆土及人口都是重叠的[3]。奥斯曼帝国于一四五三年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继承了西起多瑙河、东至托鲁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这一块核心疆土。这块核心疆土在奥斯曼主义或拜占庭主义的意义上，相当于东亚歷史构建中的「大明国十八省」。我们要清楚无论是拜占庭帝国的各省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各省，无论是大明国的十八省还是大清国的十八省，都只有臣民而没有所谓「民族」的。但是明清易代以及拜占庭、奥斯曼的易代仍然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冲击。对于朝鲜和日本来说，就是所谓的「华夷变态」[4]；对于希腊东正教徒来说，这就是异教徒和穆斯林入主中原。君士坦丁十一世犹如崇祯皇帝一样，「天子守国门，国君死社稷」留下的传说并没有完全消失[5]。但是东正教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还是乖乖地当了顺民，接受奥斯曼帝国各省总督的统治。只不过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当中，依据「米勒特制度」[6]或称「教团制」，就被发明成为一个比穆斯林低下的等级了。



覆灭于切什梅海湾的奥斯曼舰队　由日耳曼画家哈克特（Jacob Hackert）创作于1771年的绘画作品，描绘第五次希腊土耳其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切什梅海战」，奥斯曼帝国海军在此役全军覆没。

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原则是，依据宗教归属来确定臣民的政治身分。如果你是穆斯林，无论你是波士尼亚的穆斯林还是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都是属于穆斯林这个米勒特；如果你是东正教徒，无论你是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人，都是属于东正教徒这个米勒特；犹太人当然也有犹太教的米勒特，以此类推。臣民若属于某一个宗教的米勒特，例如是东正教的米勒特，圣经就是你的法典；穆斯林的米勒特，古兰经就是你的法典；犹太人的米勒特，旧约就是你的法典。相同的，伊斯兰的教法学家是穆斯林的长官，东正教的大主教是东正教的长官，犹太人的拉比（Rabbi）则是犹太人的长官。鞑靼皇帝或者奥斯曼皇帝如果要钱的话，就去找那些主教、拉比、教法学家要，要不到钱，可以把你们吊起来打。如果你们自己的教民犯上作乱，那么苏丹也是找米特勒的教长负责。若教长管不住臣民，就是教长的错。某个米特勒的臣民造反，就把教长杀头或者绞死。这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原则。在这个统治原则之下，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徒臣民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仍然是属于顺民状态的。顺民跟近代的「民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没有产生建立或者建构民族的想法。但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崙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开始染指整个近东，这样就把新的思想输入到近东地区，此时无论是穆斯林还是东正教徒，都开始考虑自己的未

来，开始觉得原有的统治形式也许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也不是最正确的统治形式。

列强的刺激各有不同，而俄国对于希腊的影响特别重要。俄国对近代希腊的作用，涉及到一个同文同种的问题，就有点像明治维新后的近代日本，对中华民国的作用一样。我们都知道，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拜占庭皇帝的子女逃到了莫斯科，跟莫斯科大公结婚[7]。莫斯科大公原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土大公，娶了这位拜占庭公主以后就自称是「沙皇」（Tsar）了。「沙皇」源于罗马时期的拉丁语称号「凯撒」（Caesar），「凯撒」本来是「奥古斯都」[8]的副手，是罗马帝国的副皇帝，但在中古的教会斯拉夫语中一般被用来翻译拜占庭皇帝的头衔。换句话说，莫斯科大公娶了拜占庭公主以后，就是第二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因此莫斯科升格为第三罗马。沙皇以后就不再是莫斯科的大公，而是全俄罗斯的沙皇了，他的地位陡然上升了一级。所以莫斯科的法统既然源于拜占庭帝国，它对东正教世界怀有特殊的关切，这是很自然的。这就像是日本人觉得东亚同文同种，日本作为东亚最先进的国家，凡是孔子和孟子的子孙，日本人都要插一手，这是同一个道理。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微，俄国人在凯萨琳女皇的统帅之下开始染指中东。她派出去的奥尔洛夫兄弟的舰队在俄土战争中，不仅在希腊海岸上打败了奥斯曼的舰队，而且登陆以后号召希腊东正教徒起来復辟拜占庭帝国[9]。这种做法也是跟日本人完全一致的。奥尔洛夫兄弟在歷史上起的作用相当于伊藤博文[10]，第五次俄土战争对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徒的意义，便类似于甲午战争对东亚的意义：「日本军队在旅顺口登陆以后到处散发传单，号召大明国的子民们武装起来，抵抗万恶的鞑靼人，并且告诉他们：『日本军队跟大明国是一家，大明国的孤臣孽子都是在日本避难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把你们从鞑靼人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使你们重新恢復大明的衣冠。』」这个宣传当时起了多大作用，不好说。奥尔洛夫兄弟在今天的希腊境内作战的时候，也从事类似的宣传。

这次战争有很多后果，除了领土方面的调整以外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俄国沙皇从此获得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所有东正教臣民的保护权[11]。这个权利如果放到东亚，就等于说是日本天皇获得了十八省孔孟信徒的保护权一样。有了这个保护权以后，鞑靼皇帝或者穆斯林皇帝的权

力自然就会岌岌可危了。试想，假如湖北巡抚或者江苏巡抚辖下有任何一个孔教徒在本地的衙门被满洲人或者蒙古人欺负了，都可以跑到东京去，向日本天皇和内阁哭诉，请求日本军队为他主持公道，那么鞑靼皇帝还怎么样能够在湖北或者江苏实行有效统治呢？奥斯曼帝国被俄罗斯帝国打败以后就沦落到这种处境。自然，原先是顺民的希腊东正教徒就开始产生了新的思想。这些思想中间就有一个流派觉得，我们东正教徒为什么要受穆斯林的统治呢？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命运託付给俄罗斯的沙皇？他跟我们同样都是东正教徒。

接下来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崙战争。拿破崙在跟奥地利瓜分威尼斯共和国的时候分到了爱奥尼亚群岛，俄国人又在岛民的帮助下赶走了法国人，在爱奥尼亚群岛上建立了七岛共和国（塞普丁修拉共和国）[12]。这也是法国革命军经常做的事情，例如它在瑞士建立赫尔维蒂共和国，在义大利建立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在荷兰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13]。法国革命军所到之处，就把法国的政治制度向外推广，即使在中东也不例外。法国人宣称，法兰西才是中东所有基督教徒的保护者，要按照启蒙主义的原则，把他们从伊斯兰教徒中世纪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七岛共和国存在的时间很短，不久就因为法俄签订和约并移交给法国军队了，后来又落到了英国人手里面，但是七岛共和国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第一次获得地区自治权。他们第二次获得自治权是在黎巴嫩，这一次是拿破崙三世利用奥斯曼帝国境内天主教徒保护人的身分干涉黎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总督之间的纠纷，强迫穆斯林总督不得再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欺压基督教徒，要求君士坦丁堡[14]的苏丹给予他们自治权。这样建立起来的黎巴嫩山自治省就是近代黎巴嫩的起源[15]。这两次行动的模式是大同小异的，第一次建立起来的七岛共和国是近代希腊的起源，第二次建立起来的黎巴嫩山自治省则是近代黎巴嫩的起源。

希腊东正教徒就在法国和俄国输入的两种思想之下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考虑民族构建的问题了。以前的东正教徒没有民族概念，只有宗教分歧的概念。拜占庭帝国行将灭亡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是，既然我们自己维持不住了，大明国维持不住了，我们是干脆投降了鞑靼皇帝，还是向日本天皇求援呢？希腊东正教徒考虑的就是，到底是向穆斯林的苏丹投降呢，还是向西方的法兰克人或者北方的俄罗斯人投降呢？现在，他们考虑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的问题了，可能的选项有：到底是全世界的东正教徒都纳入沙皇俄国的统治之

下，等沙皇俄国有朝一日出兵收復了君士坦丁堡、復兴了第三罗马的伟业以后，我们跟着沙皇走呢？还是效仿法兰西共和国的模式，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呢？如果要效仿法兰西共和国的模式，这个新的希腊民族国家应该是有多大？什么人才是希腊人，什么人不是希腊人？于是类似于梁启超和汪精卫在东京展开的那些争论，就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东正教徒当中迅速展开了。

对于他们来说，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是相同的。许多地方的民族发明，例如韩国或波兰，它们在歷史上缺乏一个巨大帝国的光荣遗产，但也没有帝国的重大负担，它们的民族是比较好发明的，只要本地的王公把他的祖先发明成本地民族的始祖就足够了，或者把本地以前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领袖发明成本地民族的领袖就行了。但是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这些人面临着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他们是大清国的臣民，大清国则是征服了大明国才得到的江山，更早以前还有孔子、孟子和「三皇五帝」等各种传说。这样一来，在一方面可以说，他们发明民族的材料太丰富了，简直是多到让波兰或捷克等这些小国无法想像；但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的负担太重了，波兰或捷克只要发明出一个小国就行了，但是他们要发明希腊民族，就面临一个问题：你这个希腊民族跟《荷马史诗》[16]的希腊是什么关系？跟伯里克里斯和苏格拉底的希腊又是什么关系[17]？跟类似于大明国的拜占庭帝国是什么关系？跟类似于大清国的奥斯曼帝国又是什么关系？自然，在十九世纪初期，大多数希腊民族发明家都无法抗拒诱惑，觉得这么多伟大的先人和这么多伟大的帝国，如果不把他们发明成我们的祖先，那就太不够意思了。

当然这些事情真要严格说来的话，也是说不过去的。例如《荷马史诗》和「三皇五帝」一样都是传说，是否存在是无法确定的。孔子和孟子虽然是歷史上存在的伟大人物，苏格拉底和伯里克里斯也存在于文明的辉煌时代，但是孔子和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人和华夏人的后裔到哪儿去了呢？他们早已经被消灭了，早已在汉魏帝国垮台的永嘉之乱[18]和罗马帝国垮台的蛮族入侵[19]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一次大规模的蛮族入侵以后，还有过三、四次蛮族入侵[20]，所以形成近代希腊和近代东亚的人口结构的真正的时间，不会超过六百年。对于东亚而言，元末明初时才重新形成稳定的人口结构；对于希腊而言，从拜占庭帝国末期到奥斯曼帝国初期形成的人口结构才是稳定的，在这之前，不仅是传说，还存在非常矛盾的现象，比如说，近代的阿提卡人[21]和近代的山东人如

果要说自己是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后代，再查查家谱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呢，他们的祖先都是内亚来的游牧民。这些游牧民在入侵中原以后消灭了原先当地的孔子、孟子时代留下来的居民，或者是，这些居民在张献忠式的内战[22]中相互屠杀而自取灭亡，游牧民便接管这片无人的空地。结果，他们非但不是孔子、孟子时代的华夏人后代，反而是华夏人鄙夷的塞外蛮夷子孙。近代的希腊人其实也不是伯里克里斯和苏格拉底的后代，而是当时希腊人鄙视的蛮夷子孙。所以若要按照帝国的原则、按照「奥斯曼主义」的原则来发明民族的话，势必得面对这些问题。

这一步还好，你一定要把实际上只有六百年的歷史发明成五千年也没关系，这只是嘴上说说，并不涉及现实政治，只是一个增加凝聚力的问题；但另一个更严重的就是疆域问题。大明国和大清国的疆域都是有基本盘和殖民地的，十八省是它的基本盘，同时也有许多有点像属地又有点像殖民地的藩属国。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基本盘是从多瑙河到安纳托利亚的托鲁斯山脉，在国势强盛的时候还拥有叙利亚、埃及、突尼斯、克里米亚、高加索这些殖民地或附庸国，在国势衰落的时候这些地方便以独立、半独立或者各种方式丧失了。如果要发明一个「希腊民族」的话，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基本盘统统发明成为希腊的一部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尽管歷史上曾有过大明国和拜占庭帝国，但是目前你们毕竟还是大清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属民，而不是过去那些已经灭亡的政权属民，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按照奥斯曼帝国的方式发明民族的话，就会一下子发明出两个民族。这种情况在清末也出现过：梁启超主张发明中华民族[23]，意思就是说，大清国的臣民是一家，发明成为一个民族，但是你们满洲人要承认，你们也是黄帝的子孙，你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肃亲王[24]和满洲的改革派主张发明一个大清民族，这个大清民族的组成跟梁启超的中华民族一模一样，他们也同样主张大清的满洲人和十八省的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但是应该吸纳到大清之下。如果你们不用大清而一定要用中华的话，你们就是反贼，你们就是流亡的民运人士，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成心想要瓦解我们大清的阴谋家。

所以按照奥斯曼主义的方式发明民族，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两种同样是奥斯曼主义的发明模式：一种是苏丹自己提倡的奥斯曼主义，也就是说，希腊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从此以后是一家，过去歷史上的仇怨都不计较了，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了，但是以后我们大家都是奥斯曼人；而希

腊人对这种做法很不高兴，因为这样一来，皇帝和贵族必定都是穆斯林了，因此他们的意见是，希腊人和穆斯林可以一家亲、拜占庭和奥斯曼的江山也可以是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要由我们希腊东正教徒当家作主，我们要发明一个希腊民族，并建立一个希腊民国[25]，这种想法当时称之为「希腊主义」，在希腊独立后又称为「伟大理想」[26]。希腊主义的主要发明者就是里加斯．费拉伊奥斯[27]，他的出身和歷史定位，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称之为奥斯曼帝国的「梁启超」。费拉伊奥斯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出生于今天的希腊境内，就血统而言不是纯正的希腊人，而且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也不是在今天的希腊境内度过的。在希腊独立以前，费拉伊奥斯便制定了第一部希腊民国宪法，企图建立一个大的希腊共和国。

另一位希腊主义的民族发明家是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28]，他出生在安纳托利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腹地。我们要知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宗教结构（因为当时还谈不上什么民族结构），在安纳托利亚大体上是穆斯林占七成、东正教徒占三成；在巴尔干半岛上则是东正教徒占七成、穆斯林占三成，任何一个地区的宗教结构都不是单一的，如同有些中华民族的发明家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结构。如此一来，若要按照西方原则发明民族的话，无论边界怎么划，总会在边界之内制造出非常复杂的族群结构。科莱斯作为一个安纳托利亚的东正教徒，他发明出来的希腊民族或者希腊主义缔造了今天巴尔干半岛的这个小希腊；而另一位生在今天巴尔干半岛的小希腊境内的塞萨洛尼基[29]人，他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30]，他在巴尔干半岛上发明出了近代的小土耳其民族。这个小土耳其建立在科莱斯的老家安纳托利亚，而不是建立在凯末尔的老家塞萨洛尼基；凯末尔的老家塞萨洛尼基，在双方都发明了民族以后，却被划在了希腊境内。

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希腊民族发明家发明希腊民族的结果，导致了他们全家老小、七大姑八大姨都像是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或者像是苏联的黑五类那样被扫地出门，从自己的老家安纳托利亚被赶到了对岸的巴尔干半岛；而巴尔干半岛的塞萨洛尼基的土耳其民族发明家，或者不如说是希腊境内穆斯林出身的土耳其民族发明家，在对岸安纳托利亚发明土耳其民族的结果就是，把他留在塞萨洛尼基境内的七大姑八大姨、三亲六戚都被希腊人扫地出门，扫到了对岸的安纳托利亚。当时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希腊民族或者土耳其民族的一分子，而只会觉

得自己是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臣民或者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臣民。但这样一发明的结果就是导致双方都要被扫地出门，因为你必须建立一个认同边界和国界线基本一致的政治体系。这就是民族发明的一个奇妙结果。

民族发明最容易从抽象理论演化成政治现实的地方不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而是在与希腊东正教徒有密切文化联繫、但是又不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俄罗斯帝国。在希腊民族发明的整个过程当中，俄罗斯帝国对奥斯曼帝国扮演的角色，类似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大清国扮演的角色。大多数希腊民族发明家转化为革命家后，都是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而且他们有很多人都是俄罗斯裔的希腊东正教徒。希腊东正教徒中有很多是经商的，所以他们的聚居地遍及整个东地中海沿岸和黑海沿岸。而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歷史上的前身都在内陆，所以它们在民族发明时，引起的意象就是无边无际的白桦树林、广袤无垠的中央俄罗斯大平原或者乌克兰黑土地。这里面没有海洋，因为它们的发源地实际上是内陆，它们的内陆性格十分明显。尽管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海洋，但那是歷史政治演变的结果。今天的乌克兰面临黑海的那些地方，在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那个时代，主要的居民其实是希腊人和犹太人，他们比较善于经商，居住在海岸，后来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把他们作为阶级敌人给全盘清洗了。苏联有一位浪漫小说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亚歷山大．格林，他有两部着名的小说，一个叫《红帆》，一个叫《踏浪女人》，这两部小说描写的童话式的海岸，其实就是少年时代的格林所见过的敖得萨（Odessa）。那时的敖得萨还是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城市，经过布尔什维克清洗以后，就变成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城市了。

希腊民族发明的主要核心就在圣彼得堡和敖得萨这两个地方，他们在这两个地方组织了一个叫「友谊社」[31]的团体，我们可以合理地把它称之为希腊的「同盟会」。友谊社这个团体在希腊独立革命当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同盟会之于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同盟会或者希腊友谊社有一半的人是日本人或者俄罗斯人，只有另一半才是大清国人或者奥斯曼人。同盟会的核心人物是内田良平[32]，没有他，孙文和黄兴是干不出什么大事。友谊社则有一位外援，比内田良平的地位还要更高一点，就是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33]，他当时的身分是俄罗斯帝国的外交大臣。如果孙文的老朋友内田良平在辛亥革命时也能当上日

本帝国的外交大臣，那么孙文就不会败给袁世凯了。友谊社在俄罗斯帝国吸纳了很多高官显爵，然后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也吸纳了许多东正教徒的菁英。

他们设计的希腊民国计画，我们从地图上一看就知道，包括了今天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些国家。在当时，这些地区还没有把自己发明成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塞尔维亚」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保加利亚」是一个歷史名词，指的是歷史上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罗马尼亚」的情况则更为特殊。「罗马尼亚」这个词，在奥斯曼帝国的词汇表中指的是鲁米利亚行省（Rumelia Eyalet）[34]，此行省以今天土耳其的东色雷斯（Eastern Thrace）和今天希腊的西色雷斯（Western Thrace）为中心、包括了大部分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北部。而今天的罗马尼亚[35]领土，在过去属于摩尔达维亚公国[36]和瓦拉几亚公国[37]，它们都是土耳其帝国的藩属国。

为什么这些国家后来在民族发明时，把自己发明成为罗马尼亚民族和保加利亚民族，这是后来的事情，此时离希腊民族的发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希腊主义思想在十九世纪初开始蔓延，开始吸引奥斯曼帝国境内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地区的东正教菁英时，就像是辛亥年间，湖南人和四川人曾经支持过「炎黄子孙」和「汉族民族发明」一样，这些菁英认为自己跟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人都是希腊民族的一分子，并在一八二〇年前后参加了友谊社，参加了希腊的「辛亥革命」。也就是说，今天的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祖先，他们都曾经认为自己是希腊人，就像是台湾的「马英九」[38]，至今还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和汉族的一分子。

谈到希腊的「辛亥革命」歷史，先不提那些具体的人名、地名和时间，这样太复杂了，我们可以把故事简化一下，把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发生前十年间，东京的同盟会的各派革命家在大清帝国境内闹革命的经歷写下来，然后复制黏贴一下，把里面的人名、地名和时间替换一下，马上就是希腊革命的故事了。故事是这样的：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某位革命家，从敖得萨总督━相当于孙文从台湾总督那里得到一批军火或资助[39]，然后就从台湾登陆到某某地方发动起义。相同的，希腊的革命家带着敖得萨总督的钱，渡过了多瑙河，在奥斯曼帝国的某个地方发动了一次起义，然后被帝国镇压。下一次，友谊社的另外一个革命家，又从

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地方，渡过了多瑙河或者渡过了爱琴海，在某某地方登陆后，发动了一次新的起义。最初十年，这些起义是零零星星的，每一次都被奥斯曼帝国镇压，但是到了一八二一年前后，革命军的起义就越来越势不可挡，而是像各地协同发动的武昌起义，三路并进，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幽默一点，直接了当地把这三路称之为希腊主义的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其实这三个人在巴尔干各国的歷史叙事上有非常矛盾的地位：他们既是希腊的民族英雄，又是罗马尼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

先看塞尔维亚这一路。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有一路是由相当于同盟会的友谊社的成员卡拉乔尔杰[40]率领的。这一拨人马从俄罗斯出发，潜入今天的塞尔维亚境内发动起义。今天的希腊歷史把他称之为「希腊辛亥革命」的民族英雄，过去南斯拉夫的歷史把他称之为建立南斯拉夫的民族英雄，目前塞尔维亚的歷史又把他称之为建立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讲的话，在一八二一年前后这段时间内，「塞尔维亚」是地理名词，「南斯拉夫」还没有发明出来。卡拉乔尔杰本人是像大多数希腊东正教徒一样，以为东正教徒就是希腊人，希腊人就是东正教徒，如同孔孟的信徒就是汉人，汉人就是孔孟的信徒。十八省的臣民当然都是汉人，无论我是湖南人还是广东人。

第二位革命军的英雄是米哈伊尔．苏特佐斯[41]。按照今天的歷史，他既是希腊的民族英雄，又是苏联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又是今天摩尔达瓦共和国的民族英雄（因为他的老家就在今天的摩尔达瓦）。摩尔达瓦地区按照永远没有实行的希腊民国宪法，按照希腊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希腊革命家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后，应该作为希腊民国的一个行省的，但是这个理想永远没有能够实现。摩尔达瓦几经波折，先是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再成为了苏联的一部分，今天又变成了独立的摩尔达瓦共和国，于是苏特佐斯这位同盟会会员、「希腊辛亥革命」的英雄，同时变成了四个国家的民族英雄。

第三位民族英雄是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42]。按照当时的说法，他是奥斯曼帝国藩属国—瓦拉几亚公国的臣民。按照今天的歷史叙事，他是希腊的民族英雄及罗马尼亚的民族英雄，但之所以没有成为瓦拉几亚的民族英雄，是因为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匈牙利的一部分都属于今天的罗马尼亚；至于它们为什么会被发明成罗马尼亚则请见本书第二讲。要知道，奥斯曼的「罗马尼亚行省」虽然包括了保加利亚

和希腊，但是从来没有包括过今天的罗马尼亚，事实上，罗马尼亚的民族发明，跟保加利亚的民族发明一样，本身就是要对抗希腊民族发明的，不过这件事情在当时还没有发生。

希腊民族革命军三路挺进，「辛亥革命」就这样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全面爆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有能力镇压任何一路单独的革命军，但是多路同时出兵，四面着火，他就无法镇压了。尤其是他先前派出去镇压希腊人的大将──约阿尼纳总督阿里帕夏[43]，他在希腊近代史上扮演的角色，差不多是东亚辛亥革命中的「袁世凯」，觉得苏丹势单力孤，可以敲诈一下，于是连他也宣告独立。结果苏丹除了君士坦丁堡以外，在巴尔干半岛孤立无援了。这些各路革命军，从理论上讲，当时都自认是希腊人，革命的前途在这一刻似乎很有希望。

但是在这个时候，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44]并不是大清国的隆裕皇太后那样的孤儿寡妇，而是一个很有魄力和能力的人，他没有灰心，採取了果断的行动，他首先逮捕并绞死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东正教大主教格里高利五世（Gregory V），震慑叛乱的希腊臣民。因为叛乱的希腊人都是东正教徒，归东正教大主教管理，他们叛乱就是大主教没有尽到责任；然后苏丹向英国人贷款被拒，于是他就把城里面数十个非常有钱的希腊和犹太商人抄了家，弄出一大笔钱来；最后苏丹向奥斯曼藩属地埃及借兵，埃及总督及民族发明家穆罕默德．阿里[45]刚刚模仿拿破崙，从法国引进了很多军事顾问，编练出了一支在中东数一数二的新军。这样，苏丹有了钱，有了军队，便重新集结大军，任命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为埃及土耳其联军的统帅，重新杀回巴尔干半岛，讨伐各路希腊革命军。

当时的希腊革命军，长期得不到武器供应，论战斗力跟民兵和土匪差不了多少，在埃及土耳其正规军的打击之下，很快就溃不成军。不过，前面提到的，扮演「袁世凯」角色的阿里帕夏，此时恰好占据了巴尔干半岛最核心、相当于大清国的河南、山东的四战之地，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联军，无论是北上或西进，甚或是南进镇压伯罗奔尼萨半岛上的革命军，都得经过阿里帕夏的辖区，如果不消灭他，埃及土耳其联军是没有路走的。所以阿里帕夏首先遭到联军攻击，最后不得不在一八二二年死于非命。

按照土耳其军队一般镇压叛乱的手法来说的话，军队如果发不起军饷或者钱不够多的话，在镇压叛乱以后就要趁势烧杀抢掠一阵子，然后

把受害者的妻子儿女卖为奴隶，到君士坦丁堡的市场上去出卖，为自己捞一笔钱。但是当时已经是十九世纪，西方的自由主义舆论开始兴起，土耳其军队的暴行，包括烧毁迈索隆吉翁城的暴行[46]，在希俄斯岛屠杀妇女儿童的暴行[47]，在西方广为传播，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反应。西方舆论开始咆哮起来了，发出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那种关于自由、人权如何如何的愤怒吼声，觉得西方列强不应该跟这样一个野蛮的奥斯曼帝国发生关系，而且有必要制裁它。

制裁行动起初由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民间人士发起，他们在英国组织了伦敦亲希腊委员会（London Philhellenic Committee），首先把各界捐款运到希腊去，支持希腊的各路革命军，最后这些民间人士也组织起一批志愿军，亲自前往希腊参战了，就像是内田良平带着日本的军火和贷款跑到上海去支持宋教仁一样。英国上议院议员拜伦就带着军火和大炮，跑到伯罗奔尼萨半岛去支援希腊革命军，最后死在那里[48]。拜伦写下的《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也成为了希腊立国的一个重要灵感。拜伦在英国虽然只是一个议员和财主，好像算不了什么，但是仅仅他的私人财产，在希腊这样穷困的国家，恐怕比希腊临时政府自己的全部财产还要多，所以他的支持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更别说还有一位照现在的话说是「希腊裔」的俄罗斯帝国臣民卡波季斯第亚斯，正担任俄罗斯帝国的外交部长。

如此一来奥斯曼苏丹的镇压先胜后败，他本来已经将希腊各路革命军镇压得差不多、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列强开始干涉了，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要求奥斯曼苏丹不应虐待他的基督教臣民。如果你非要这么打下去的话，照现在的话说，列强就要组织国际维和部队强行进驻，强迫交战各方停火，以便维持人道主义和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干预，奥斯曼苏丹和军队的军官们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差一点就要打赢了；而希腊的各路革命军领袖则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们眼看就要打输了，再多打两年的话，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都要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市场上作为奴隶卖出了。所以英法俄列强的舰队开到纳瓦里诺湾[49]的时候，埃及和土耳其联军带着一种悻悻然的态度，而希腊各路革命军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一样。

接下来的发展就像是引起美西战争的缅因号事件[50]一样，可能永远是千古之谜了。英法俄的舰队是派来维持和平的，它像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一样，理论上讲不应偏袒任何一方。土耳其的苏丹、埃及的总督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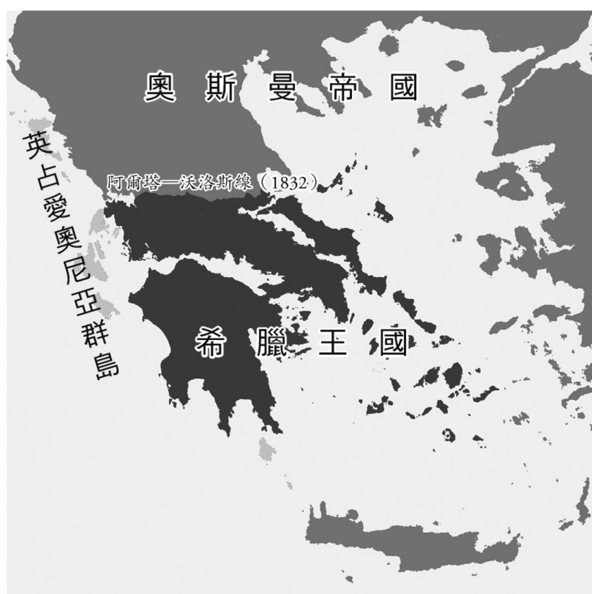
希腊的各路革命军领袖也给各自的部队发了命令说：「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攻击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次神秘事件：埃及军队的一位将领突然向英法俄的舰队开炮，击伤了一艘船只，于是舰队立刻还击，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把埃及和土耳其的联合舰队全部打沉在海底了。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苏丹就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完蛋了，经此一役，他在整个地中海的主力舰队就此覆灭了。

但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制造出来的，恐怕已是无解之谜了。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可以肯定不是罪魁祸首，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事情。但是确实不能够排除前线的某一位将领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干涉的气，觉得我们堂堂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凭什么要由你们欧洲国家来干涉，很可能一时想不开，就突如其来地搞了一点报復和破坏活动。也可能是希腊革命军当中的某一路，生怕英法俄联军和土耳其军队没有发生冲突，结果对他们不利，于是故意唆使出这样的事件。具体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恐怕是永远搞不清楚了，但是对歷史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这样一来，英法俄列强在伦敦先后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决定奥斯曼苏丹应该撤出「阿尔塔–沃洛斯线」（Arta–Volos line）以南的所有军队，然后各方相继签订了《伦敦协定》和《君士坦丁堡条约》[51]，这就是希腊王国的起源。本来奥斯曼苏丹已经把巴尔干半岛上各路希腊革命军镇压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伯罗奔尼萨半岛上的一点点残兵败将。这样一来，它不仅要撤出伯罗奔尼萨半岛，而且还要撤出阿提卡地区和希腊的许多岛屿，把已经夺取的很多地方重新交出来。然后，这些地方在列强的保护之下成立了希腊王国。列强达成君子协定，为了保持欧洲列强之间的平衡不发生改变，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都保证，不让英国王室、法国王室和俄国王室的成员出任希腊王国的国王。于是他们一致同意，让一个软弱的巴伐利亚王国派出它自己的王子，最后选定巴伐利亚的鄂图王子[52]去当这个希腊王国的国王。

希腊王国像今天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一样，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而是英法俄列强的保护国。英国签署条约，负责保证希腊的安全，如果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越过阿尔塔–沃洛斯线南下，英国的军队就要攻打奥斯曼帝国。这个条约是希腊安全的主要保证，但是希腊因此在外交上也受制于英法俄列强，尤其是受制于皇家海军。列强不允许希腊做的事情，希腊是不能做的。虽然当时没有联合国，不存在像今天的台湾加入联合国，或者说希腊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但是希腊是没有资格跟

奥斯曼帝国平起平坐的。奥斯曼帝国可以跟英法俄一起参加国际会议，但是希腊没有资格参加国际会议。尽管希腊并不从属于奥斯曼帝国，但是奥斯曼帝国在国际上是跟英国平起平坐的主权国家，而希腊从法理上讲只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君士坦丁堡条约》和《伦敦协定》的重要意义，就相当于是今天的《旧金山和约》和《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重要意义一样[53]。只要大英帝国的霸权仍然在地中海存在的话，奥斯曼苏丹是不敢打希腊的。



1832年《君士坦丁堡条约》签订后的南巴尔干形势图　1832年的《君士坦丁堡条约》正式结束希腊独立战争，奥斯曼帝国与新成立的希腊王国以「阿尔塔–沃洛斯线」（Arta–Volos line）作为两国国界。

奥斯曼苏丹虽然不敢打希腊，但是土耳其境内的东正教徒，以及小小的希腊王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希腊主义理想，没有忘记在短暂的「辛亥革命」期间，从来没有实施的希腊民国宪法和希腊民国临时约法，是要将整个巴尔干半岛、乃至于安纳托利亚的东正教徒都包括在希腊民国的范围之内的。因此尽管政权是列强保护的，不容许他们造次，不容许他们随便反攻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个小小的希腊王国，就像国民党的台湾一样，没有忘记他们的「伟大理想」。按照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这段期间的希腊中学教科书内容及希腊的舆论，他们心目中的希腊民族不是今天这个小小的希腊，而是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一个大希腊，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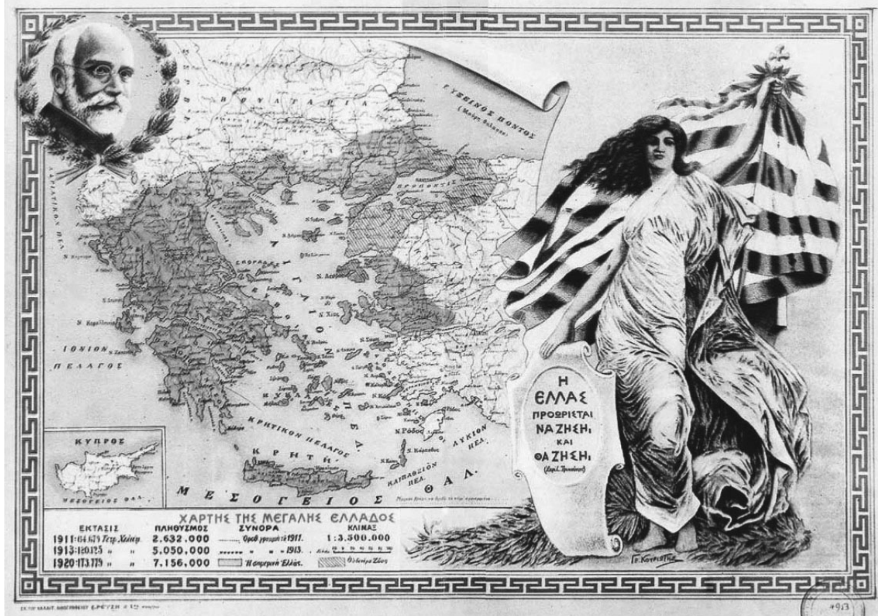
有这些人都是我们希腊人的同胞。瓦拉几亚公国的人、伊士麦[54]的人和君士坦丁堡的人来到希腊，都是我们的同胞，正如北平、南京和武汉的人跑到台北一样，他们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同胞。尽管国王陛下在列强的压力之下不敢在外交场合公开这么承认，但是民间的报纸和主要政党都是这么说的。

希腊王国实行议会制度后的第一任首相亚歷山大．马夫罗科扎托斯[55]，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他是罗马尼亚人。现在的希腊中学生看到这样的故事就觉得大脑不断地打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希腊人的首相要由罗马尼亚人担任？二十二世纪的台湾中学生如果读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台湾歷史也会感到很奇怪：我们堂堂的台湾的总统为什么要让一个名叫「马英九」的湖南人来担任？我们台湾的舆论领袖为什么要由一个叫做「龙应台」的湖南人来担任？但是一八四〇年左右的希腊王国就是这样的，政府里当首相的是今天的罗马尼亚人，在民间当舆论领袖的也是今天的罗马尼亚人。但是我们要注意，我刚才用「罗马尼亚」这个词其实是个误会，当时「罗马尼亚」这个词根本不存在，当时只有一个地理名词「瓦拉几亚」。

按照希腊人对「伟大理想」的看法，「伟大理想」这个词如果翻译到现在的中文世界的语境的话，那就跟国民党所谓的「反攻大陆」是差不多的。它的意义就是要打回君士坦丁堡去，君士坦丁堡自古以来就属于希腊，君士坦丁十一世「天子守国门、国君死社稷」，是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驱除鞑虏、恢復中华」的事业虽然还没有进行到最后一步，但最后一步我们还是要打回君士坦丁堡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照我们现在中文世界的话说，朝廷是卖国的，是帝国主义的傀儡，不敢承认希腊主义的概念，但是议会选出的首相和民间的舆论领袖，就像今天台湾的「马英九」和「龙应台」一样坚决地说：「瓦拉几亚人、君士坦丁堡人跟雅典人没有什么区别，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我们希腊民国的一部分。希腊王国尽管现在是一个希腊半岛上的王国，但它早晚有一天会恢復成为歷史上的拜占庭和所有希腊人的国家的。现在的希腊国王在列强的压力下只说自己是『希腊国王』，而不说自己是『全体希腊人的国王』[56]，这就是丧权辱国，我们早晚要推翻他。」于是接下来，在一八六〇年左右，在政府内部的「马英九」和民间的知识分子「龙应台」的有力支持下，小小的希腊王国发生了自己的「五四运动」[57]。「五四运动」的结果就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巴伐利亚

国王被赶走了，希腊的革命青年占领了雅典。革命青年和革命军官占领了雅典以后，决定迎接丹麦的威廉亲王为国王，这就是希腊王国格吕克斯堡王朝的乔治一世[58]。

乔治一世继位后，他的头衔就不再是「希腊国王」，而是如「马英九」和「龙应台」所希望的「全体希腊人的国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像是中华民国和「台湾国」的差异一样大。「台湾国」就是美国《台湾关系法》中的「台湾治理当局」（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它的领土只限于台澎金马；中华民国就是自宋教仁以来，直到一九四六年为止，歷次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那个「伟大的中华民国」，它的领土从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59]，一直到联合国成员国蒙古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到台湾，一直到日本控制的尖阁诸岛，都是「宪法爱国主义」[60]规定的中华民国领土。希腊主义的领土也是根据同样的方式规定的。所以国王如果说「我是希腊国王」，那就等于是李登辉说：「中华民国在台湾，我的领土只限于列强划给我的巴尔干半岛南端这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如果我像乔治一世国王说：「我是全体希腊人的国王」那就不得了了，我的国土跟古代的拜占庭帝国疆域一样大，跟「辛亥革命时期」的希腊民国或中华民国是一样大的，席捲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的西部。不用说，任何一个列强都容忍不了如此巨大的野心。这样一来的话，就把希腊王国投入了一场永远不会胜利的「反攻大陆」事业当中，格吕克斯堡王朝的统治最终就是因此而中断的。



1920年代的「伟大理想」宣传图　理想的大希腊疆域包括巴尔干半岛南部、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地区、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及赛普勒斯岛。此图左上方人像为当时大力推动「伟大理想」的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

希腊王国的格吕克斯堡王朝之所以能够对自己的反攻大业抱有如此伟大的信心，当然不是因为小小的希腊这一点点人口或者资源。如果真的算人口或者资源的话，那么结论大概是这样的：台湾有两千多万人，海外华人有四千多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十几亿人口，中华民国如果要实现「宪法爱国主义」的话，那它就要依靠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然后再通过「侨务委员会」[61]去统战海外的四千多万人，然后再把这十几亿人也争取过来，实现伟大的「反攻大陆」大业。希腊主义的情况是这样的：希腊王国的人口最初只有七十万左右，到十九世纪中叶也只不过一百多万，奥斯曼帝国境内可以算得上是东正教徒、可以发明成为希腊民族一员的人口大概是一千多万，再加上海外和全世界的希腊侨胞，这些希腊侨胞的总人口大概也有几百万，于是一百多万的希腊国的希腊人要统战全世界大概几百万左右的希腊侨民，然后再要发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大概一千多万的东正教徒起来革命，建立一个跟拜占庭帝国一样大的希腊民国。这就是「所有希腊人的国王」和希腊人所谓的「伟大理想」所包含的民族发明学的实质内涵。

他们为什么认为这种民族发明学是很容易成功的呢？这个逻辑跟蒋介石的逻辑是差不多的。蒋介石认为：「奥斯曼苏丹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的暴政不符合歷史潮流。他现在虽然有十几亿人口，但是这十

几亿人口都离心离德，专制独裁早晚有一天会结束。独裁结束了以后，湖南人黄兴曾经是我们的同胞，湖南人「龙应台」现在是我们的同胞，未来湖南人的子孙为什么不能是我们的同胞呢？大明国过去存在过，拜占庭帝国过去存在过，孙文和黄兴的中华民国过去存在过，那么等到共产主义者像泡沫一样破灭以后，这些人难道不会自动地回归到我们伟大的復兴基地这一边，建立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吗？」

同样的道理，希腊王国的「马英九」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倒行逆施的奥斯曼帝国专制统治早晚会自动垮台。然后在垮台以后，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人口，无论你在塞尔维亚、瓦拉几亚、伊士麦还是君士坦丁堡，最终都会像歷史上的苏特佐斯和卡拉乔尔杰一样回归到希腊来。未来的希腊又将恢復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辉煌状态，从多瑙河到爱琴海，从爱琴海到托鲁斯山脉，将会跟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平起平坐。我们现在的希腊虽然只有台湾那么一点点大，但是过去和未来的希腊都像俄罗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广阔。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目光短浅，只盯着目前这个小小的台湾，忘记了大明国的十八省江山最终将会属于我们呢？」当然这个逻辑听起来也是很合理的，只是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确实是像预言的那样会垮台；第二就是，在奥斯曼帝国专制统治垮台的过程当中，沦陷区的几千万人民是真心向着希腊民国，真的愿意跟你做一家人。事实上，这两个前提都不是自然发生的。

歷史发展到了一八六〇年后很快就发生了波折。第一个波折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万恶的鞑靼皇帝并不像是希腊主义者设想的，就是不思进取的、纯粹亚细亚的蛮夷，他们也会「改革开放」[62]，他们也会「闷声发大财」。他们变法后也会跟列强打交道，而且他们也会给英法俄这些强国一些优惠待遇。这些优惠待遇也是有现成的台词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它的人口有几千万。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之大，相当于整个欧洲。如果英国人支持奥斯曼帝国解体，使奥斯曼帝国变成一系列小国了，那么英国就要失去一个统一市场。相反，奥斯曼帝国如果掌握在亲英政权的手里面，能够在奥斯曼『李鸿章』的领导之下实行改革开放，对英国商品开放市场，那无疑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奥斯曼帝国从此摆脱了革命党的威胁，而大英帝国得到了一个比欧洲市场还要大的市场，大英帝国的商人都可以发财了。难道这样巨大的利益还不足以抵抗拜伦勋爵之流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叫嚣吗？」

于是大英帝国内部自然就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比肯斯菲尔德勋爵（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为代表的保守党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一个软弱的奥斯曼帝国可以阻止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南下，它符合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巨大市场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有重大的利益。至于什么人权民主那些价值，跟国家利益相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另一派是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领导的自由党，他用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民运人士那一套台词说：「人权和自由才是普世价值。无论你是保加利亚的穆斯林还是阿富汗的山民，在全能上帝的眼中跟英格兰的贵族是同样有价值的。你们不要这样势利，更不要忘记，古老的希腊，孔子和孟子的希腊，是全世界文明的源头，我们大家都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学生。今天的希腊虽然已经沦落到这副惨状，但是他们的祖先曾经是很伟大的。正如有些人说的那样，我虽然鄙视现在的中国人，但是我还是很佩服孔子时代的中国人的。就算是他们现在的子孙如此不肖，你看在孔子和孟子的面子上难道不能援助他们一下吗？如果是为了奥斯曼帝国给的那些卑鄙的、跟奴隶贸易没有区别的经济上的好处和政治上的好处，就抛弃了自由、民主、人权和基督教的基本原则，那么你还配做一个基督教徒吗？你还是高贵的英国人吗？」诸如此类。当然这样的台词可以一直写下去，一写就是几百万字。

总之自由党和保守党是轮流执政的，一会儿是格莱斯顿的人权外交上台，那他就不管土耳其市场是多么重要，奥斯曼苏丹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盟友，坚持制裁土耳其，要求土耳其交出保加利亚，；一会儿是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上台，他就认为英格兰在海外的最大敌人是俄罗斯沙皇，软弱的奥斯曼苏丹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我们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为了市场和国家安全的目的，可以让保加利亚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统统见鬼去，先支持一下奥斯曼苏丹，阻止俄罗斯沙皇得到君士坦丁堡，这才是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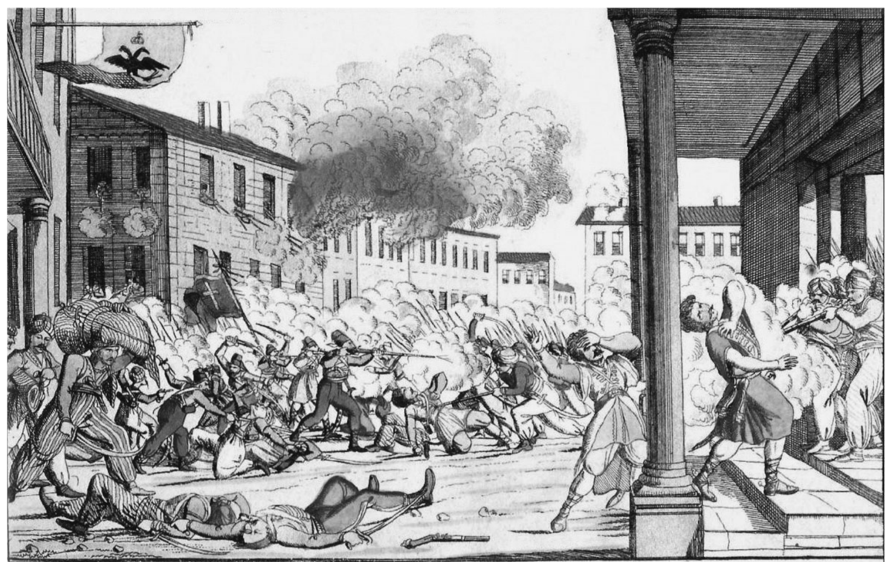
可以说只要是奥斯曼苏丹愿意改革，第一是在政治上讲要跟着英国人走，第二是在经济上要给英国人开放市场，那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倖存下去的机会还是蛮大的。但是它在青年土耳其党[63]的领导之下富国强兵到一定程度以后，它认为自己积攒的钱已经足够多了，训练出来的「北洋舰队」已经足够强大了，现在它已经不需要英国人了，可以向俄国收復失地，收復中亚那些被侵占的领土，而且还可以

向英国收復失地，收復被英国人侵占的赛普勒斯岛[64]，奥斯曼帝国走上「星辰大海」[65]之路，同时向英国人和俄国人挑战，这样一来就不再存在以前它依靠英国人的保护对抗俄国人的局面。走上这条道路以后，奥斯曼帝国才终于走向灭亡。如果它不搞「星辰大海」的话，把市场开放给英国，那么英国的两党当中，虽然「人权党」那一方面总要跟它过不去，但是「现实利益党」这方面是很愿意维持奥斯曼帝国存在的。

但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励精图治、推动改革开放的那一段时间里，对希腊的希腊主义者来说就不是好日子了。按照他们原先的预言，奥斯曼帝国将会在专制腐败当中垮台，然后他们自然就会「反攻大陆」了。但是眼看着奥斯曼帝国如此励精图治，而且跟希腊的主要保护人大英帝国勾结在一起。英国人和土耳其人的关系一旦搞好了，希腊人反攻君士坦丁堡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要知道，在「中华民国人」或希腊人的眼中，台北或雅典都是微不足道的城市。希腊人的第一大城市是君士坦丁堡，第二大城市是伊士麦，第三大城市才是希腊王国的首都雅典。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北平」和南京对它是非常重要的，台北只是一个地方性城市。雅典的「龙应台」和「马英九」对小小的希腊王国的感受也是这样的。他们看到英国人跟奥斯曼帝国勾结在一起了，真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然而却又拿他们没有办法。

第二个问题则更加致命。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这些希腊东正教徒，在万恶的鞑靼皇帝或者「共产主义者」统治下的这些大明国十八省居民，他们经过了几代人的统治之后，会不会还像在「辛亥革命」时那样愿意支持「汉族」或者「中华民族」的发明呢？事实证明他们不愿意。这倒不是说他们很顺从奥斯曼帝国，他们在一八三二年希腊王国建立以后仍然在持续革命。结果就是，今天的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从奥斯曼帝国当中解放出来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们并不认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府。道理很简单：谁给我们援助、支持我们反对奥斯曼苏丹，谁才是我的亲人。小小的希腊王国根本支持不起「反攻大陆」的伟大事业，他们的支持都是嘴巴上的。革命是需要钱的，是需要枪炮的，钱和枪炮从哪来？多半要从俄罗斯沙皇那里来。保加利亚的革命家带着俄罗斯的卢布和军队建立了今天的保加利亚，瓦拉几亚的革命家建立了今天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革命家建立了今天的塞尔维亚，他们建立了国家后，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感想：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如果要感恩图报的话，我们酬谢俄罗斯沙皇和英国军队，他

们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这就罢了，我们为什么要酬谢你们希腊人呢？你们希腊人躲在「台湾海峡」的背后，既不出一毛钱给我们，也不出一个兵，然后我们还要迎立你们的国王做我们的国王，这是不是不公平？我们的革命领袖为什么不能自己当国王呢？



1821年出版的德语传单　此图描绘希腊独立战争初期的布加勒斯特起义中革命军与土耳其军队激战的场景，并透过印刷传播流传至欧洲各地。

你想一想在蒙古帝国灭了南宋以后，南宋的遗民志士也是企图復辟大宋的。当年刘福通、韩林儿和朱元璋起兵反元復宋的时候，他们打出了两条口号：一条就是「重开大宋之天」，改元龙凤并自称大宋皇帝；第二条就是借精兵于日本，希望日本的幕府出兵来援助他们。但是天下打定了以后，请问这个天下是姓朱还是姓赵？朱元璋在南京坐上了皇帝宝座以后，他就觉得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大宋皇帝算老几？我打天下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大宋皇帝跑出来给我帮忙啊？你当年不给我帮忙，现在做皇帝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把皇帝的位子让给你？于是他就自己建立了一个大明国。大明国被满洲人灭亡的时候，郑成功发兵北伐，到了长江口，他着红衣祭天，着黑衣祭地，着白衣祭明太祖朱元璋，说出了一段台词：「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虽然后来郑成功打了败仗，但如果他像朱元璋一样「驱除鞑虏、恢復中华」成功了，那么他郑成功在南京城建立的这个政权，

他还肯还给朱家天子吗？我们如果稍有政治常识就可以看出，他必然另外建立一个「郑朝」，自己成为「郑家天子」。朱家天子算老几，天下不是你打下来的，你给我滚一边去。我虽然在起兵时打着反清復明的旗号，但当我胜利以后，必然要建立新政权的。

巴尔干半岛的这些革命家也是这样的：「我们革命胜利以后为什么还要迎立你们希腊人的那个没有立一点功劳的国王呢？我们难道不能到德意志去、到俄罗斯去迎立一些王子吗？这些王子可以把德意志和俄罗斯的支援带给我们。」当然他们实际上就这么做了。这么做的结果，自然会使希腊的希腊主义者很不高兴。于是他们就大骂起来：「你们背叛了孙文先生的革命伟业，背叛了辛亥年的临时宪法。希腊民国宪法写得明明白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是希腊民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是布加勒斯特的革命者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你难道能够想像武昌人发明一个『荆楚利亚民族』，然后建立一个『荆楚利亚王国』，并宣示『荆楚利亚王国』不是我们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一部分吗？武昌起义革命的先烈如果知道你们这么干的话，会从坟墓里面翻身，骂你们这些不肖子孙的。」

但是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一八二一年的「布加勒斯特起义」是「希腊辛亥革命」的第一枪[66]，换句话说，今天在雅典的这个希腊民国是由布加勒斯特的革命家建立起来的。但是同样这一批布加勒斯特革命家的子孙，等到一八五九年再次革命成功、建立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联合大公国的时候，他们的脑筋就灵活了。他们觉得，凭什么要把王位让给你们那些躲在雅典，置身事外的亲王？难道我们自己没有亲王吗？我们没有也可以到其他地方去请呀，于是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罗马尼亚王国。这个王国为什么叫罗马尼亚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瓦拉几亚人民—我们「湖北人民」当中还有很多人抱着烟涂的想法，认为我们湖北曾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我们瓦拉几亚曾经是希腊民国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仍然是希腊人。不是的，现在我们要把民族重新发明一下，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叫罗马尼亚人。

为什么叫罗马尼亚人呢？因为古罗马皇帝图拉真曾经打进过多瑙河以北的土地，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叫做「达基亚」（Dacia）的罗马行省，然后早在蛮族入侵之前，古罗马人觉得这块土地最没有价值，便迅速地放弃了。在罗马尼亚漫长的歷史中，古罗马人统治达基亚行省的这段歷史是最短暂的。近代的罗马尼亚起源于奥斯曼帝国藩属瓦拉几亚公

国，无论从人种上、政治上、法统上、歷史上和任何方面，都跟古罗马皇帝图拉真建立的达基亚行省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发明家在一八五九年面不改色地决定，今后我们不再是希腊人，而是罗马尼亚人。雅典的「龙应台」和「马英九」听到这个消息的感受，就跟今天台北的国民党人如果听到武昌的革命家决定「我们要建立一个『荆楚利亚民国』，把自己发明成『荆楚利亚民国政府』，从此永远不再认中华民国」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军队不够强大，革命不是他们打响的，也不是他们打赢的，而且罗马尼亚这拨革命家还有列强做后盾，所以他们最后只有干瞪眼，没有办法。

保加利亚的情况也是这样。保加利亚革命成功，除了本地的革命家以外，主要依靠俄国军队的支持，他们也很害怕希腊的国民党人仅凭「嘴炮」就把他们的地盘拿去，于是他们就另外发明一套保加利亚的神话。保加利亚民族是怎么产生的呢？「辛亥革命」时的保加利亚也是希腊的一部分，就像辛亥革命时，黄兴和宋教仁的湖南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一八七八年的柏林会议时，保加利亚就已经发明出了另外一个「保加利亚民族」，祖先是保加尔人。保加尔人住在哪里？住在伏尔加河沿岸。他们跟匈奴人、柔然人和中亚各游牧民族是一家。在歷史上，这支保加尔人曾经带着他们的骑兵，像突厥人、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围攻北京城一样，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城下，围攻过拜占庭皇帝，从拜占庭皇帝那里捞了很大一拨子女玉帛才走。但是近代的保加利亚的核心居民跟希腊东正教徒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因此他们七成是希腊东正教徒，三成是穆斯林，他们的祖父在一八二一年希腊的辛亥革命中曾说「我们是希腊革命军的首领，跟布加勒斯特起义的希腊革命军、跟伯罗奔尼萨半岛的希腊革命军是一家人」；但是现在他们改主意了，他们搞了第二次民族发明，他们把自己发明成保加利亚人。

至于为什么要发明成保加利亚人也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这就跟芬兰人要把自己的语言发明成为「芬兰–乌戈尔语族」（Finno–Ugric languages）是一样的，目的就是要跟瑞典人和俄国人划清界限。你们不都是欧洲人吗，那我们就要说自己是亚洲人。保加利亚人也是这样的：「你们不是说我们是希腊人吗，对不起，我们要告诉你们，我们自古以来就不是希腊人。我们不但不是希腊人，我们连欧洲人都不是，我们是中亚人。这下你们这些希腊『国民党人』还有什么话？你们希腊『国民

党人』不是最讨厌那些中亚蛮夷吗？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喊着『驱除鞑虏、恢復中华』，跟那些中亚蛮夷不共戴天吗？很好，我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希腊人，我们跟你们不是同胞。我们『湖南人』可不是『汉族』，我们是『苗族蛮子』，看你还认不认我们是一家，还争不争我们的土地。」保加利亚人就根据这样的逻辑进行二次发明，把自己从希腊人、希腊东正教徒、希腊主义者发明成为保加利亚的爱国者。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的希腊王国就充满了类似于「国民党黄復兴党部」[67]的疯狂和挫败情绪。他们看到，歷史出了毛病，世界正往他们预见不到的方向运转。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不但没有因为专制和腐败迅速垮台，反而变得越来越富强了。原先极度歧视土耳其人、很想分裂奥斯曼帝国的西方列强，在英国人的带领之下，居然还跟「改革开放」的奥斯曼帝国当局做起买卖来了。另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这些十八省居民，原先被认为是自己的同胞、最亲爱的「三民主义者」和「炎黄子孙」的这些人，居然发明起民族来了。他们居然说自己是「巴蜀利亚人」，说自己是「荆楚利亚人」，说自己是「湖湘尼亚人」，他们居然不承认自己是「汉人」了，这样还能得了吗？再过二十年，我们的事业岂不是要整个落空了？但是他们的倒楣事情还不过是刚刚开始。如果刚才这两件倒楣的事情只是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而不是希腊王国或「台湾」境内，这还有点可以安慰的话，那么第三件事情━最不可忍受的事情发生了：希腊王国境内出现了一位新的知识分子，他叫亚歷山大．帕利斯[68]，他建议进行第二次文字改革，用通俗希腊语取代白话希腊语。[69]

我们要注意，希腊语其实有三种：第一种希腊语就是古典希腊语，就是荷马史诗、柏拉图的希腊语。这个古典希腊语虽然还有人能认识，但是认识它的人大部分都在西方国家，希腊本土已经没几个人看得懂了。这就好像是谁还认识孔子时代的汉语呢？大部分都在日本，孔子老家的那些人已经没有几个认识孔子时代的汉语了。第二种希腊语就是以古典希腊语为原料，发明的白话希腊语。这是前面提到的科莱斯━他相当于希腊的「胡适」，尽可能地为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各地区希腊人都能使用而发明的标准语，不像文言文那么难懂，但也是一种书面文字，并且跟各地的方言发音都不相同。科莱斯之所以要把希腊语发明成这样，是因为他考虑到，将来独立建国的「希腊民国」是从多瑙河到托鲁斯山脉的一个巨大、硕大无比的「大希腊」，也就是说他发明的白话

希腊语必须让布加勒斯特人、君士坦丁堡人、伊士麦人、贝尔格勒人、雅典人和赛普勒斯人都能看懂。但是众所周知，布加勒斯特、君士坦丁堡、伊士麦、贝尔格勒（Belgrade）、雅典和赛普勒斯各地的方言不一样，他们彼此之间谁都听不懂谁。所以他制造出来的这种白话希腊语跟原来的文言文一样，是「哑巴语言」，是只有文字没有发音的。如果讲发音的话，各地的发音仍然互相听不懂。

我们敬爱的帕利斯，他是十九世纪末期的希腊人，类似于「陈水扁时代」出生的一个新台湾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上的中华民国是怎么回事，他只认识台南乡下的阿公阿婆。然后他就感到，中华民国的国文课本上给我们讲的这种文字，跟台南阿公阿婆说的方言土语不一样，对他们来说真是太不方便了，而阿公阿婆毕竟占了台湾多数人口，我们不能仅仅服务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我们也要让台湾人民有自己的乡土文学。于是帕利斯就在希腊王国内部搞了一个通俗希腊语，这是今天的绝大部分希腊人都能使用的语言，也就是把阿公阿婆的方言土语用拼音的方式翻译出来、写下来，在英美传教士的帮助之下把圣经之类的重要文献翻译出来，然后让阿公阿婆受到教育。这种文字既好懂也好认，所以迅速地流传开来。尽管在一八六〇年的时候只有最没有教养、最没有文化的人才讲通俗希腊语，但是在一九六〇年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希腊人，也就是今天的希腊共和国的居民，都已经讲通俗希腊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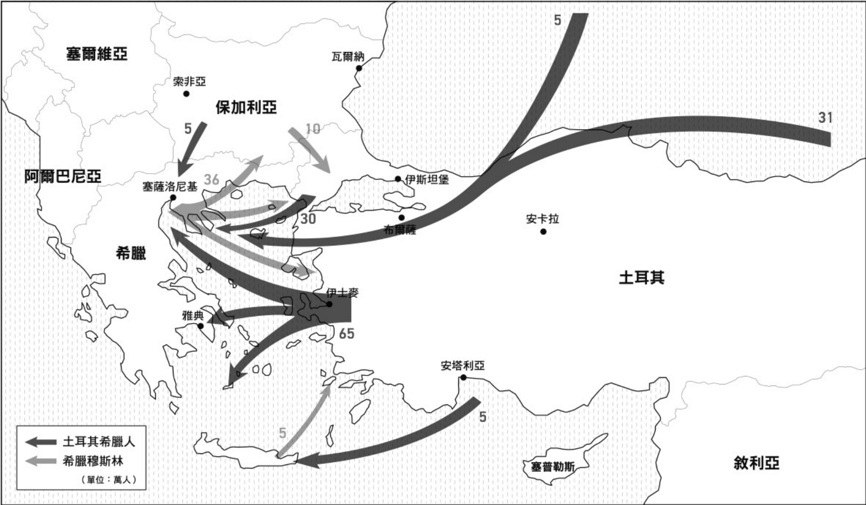
但是通俗希腊语刚刚产生的时候，立刻就遭到了希腊的「马英九」和「龙应台」的愤怒谴责。他说：「你这样太目光短浅了。这样做，你虽然方便了台湾的阿公阿婆，但你要想想，等我们中华民国反攻大陆以后，湖北人怎么办，四川人怎么办，浙江人怎么办？你搞出来的这种台语也只有台南的阿公阿婆才能够听得懂。到了成都，成都人怎么跟你交流？到了武汉，武汉人怎么跟你交流？到了南京，南京人怎么跟你交流？你这么样搞，名义上是把新文化运动进行到底，但是实际上是要断送我们反攻大陆的希望，断送我们反攻君士坦丁堡的希望。」然后双方就举行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各种论战。双方之间对阵了几十年，但是最后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政治形势。因为希腊人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始终未能光復君士坦丁堡，等到希腊第二共和国建立以后，享有的领土仍然是列强划给他们的巴尔干半岛南端的一小块土地，当地使用的方言就是「台湾方言」，也就是通俗希腊语，所以最后的结果依然是方言胜利了。

最后在奥斯曼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面临解体的最后关头，希腊王国格吕克斯堡王朝的「马英九」和「龙应台」看出，这次将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我们再打不回君士坦丁堡和伊士麦，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奥斯曼苏丹垮台、奥斯曼帝国各地陷入大洪水状态的时候，不正是解放各地的希腊人民的大好时刻吗？于是这一次出兵就在康斯坦丁国王[70]的领导下进行。康斯坦丁国王之所以叫康斯坦丁国王，理由也是很「希腊主义」的，就跟台湾过去的新党领袖赵少康取名「少康」的理由是一样的。我们都读过《罗马帝国衰亡史》，知道拜占庭帝国灭亡的时候，最后一位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十一世，他死于乱军之中，于是就自动变成了「皇汉青年」[71]的崇拜对象。于是「所有希腊人的国王」乔治一世在希腊主义者的教育之下，便把自己的儿子和将来的王位继承人取名叫做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和「君士坦丁」是一个词，只是翻译方法不同），而且还叫「康斯坦丁十二世」。

这就很妙了，「康斯坦丁十二世」这个称号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72]的希腊版本。在列强的眼中，在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眼中，希腊王国只有一个康斯坦丁一世，因为希腊王国是十九世纪才开始的，希腊王国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国王叫做鄂图，希腊王国格吕克斯堡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叫做乔治，乔治的儿子叫做康斯坦丁，他既然是第一个名叫康斯坦丁的希腊国王，那他当然应该是康斯坦丁一世。但是希腊人自己却坚持要把这位国王叫做「康斯坦丁十二世」，为什么呢？在他们心目中，你把他叫「康斯坦丁一世」，就等于说他只有统治小小的希腊王国的权利；但是既然他是「所有希腊人的国王」，也就是拜占庭皇帝继承人，所以他的法统、君统来自于殉国的「崇祯皇帝」，也就是君士坦丁十一世，所以他是拜占庭帝国的康斯坦丁十二世，而不是希腊王国的康斯坦丁一世。这个区别很重要。比如，如果你说今年是西元二〇二〇年，那你就错了、太政治不正确了；你应该说今年是中华民国一〇九年，从辛亥革命算起，这样你才能把台湾的中华民国跟孙文和黄兴的中华民国接上线。也就是根据这个理由，所以「康斯坦丁一世」必须变成「康斯坦丁十二世」；因为「少康復国」[73]，所以「赵少康」的名字中就必须有「少康」二字。

从「康斯坦丁十二世」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看出，他是在希腊人称为「伟大理想」的教育之下长大的，希腊人的「伟大理想」翻译成中华民国的术语就叫「反攻大陆」。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在反攻大陆的影响薰

陶下长大的「黄復兴」青年，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他称为希腊的「洪秀柱」。这位希腊的「洪秀柱」看到了奥斯曼帝国垮台的绝佳时机，觉得这是我们「光復大陆」的最后时机，于是以希腊倾国之力，在安纳托利亚登陆，跟土耳其的民族发明家、出生在希腊王国境内的塞萨洛尼基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打了一场硬仗，结果被凯末尔打得大败，丢盔卸甲地逃回雅典。最后双方在一九二三年交换人口，希腊王国境内的穆斯林全部搬到土耳其去，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东正教徒全部搬到希腊王国[74]。也就是说，伊士麦和安纳托利亚的那些本来是康斯坦丁十二世国王企图解放的「中华民国遗民」，这一下是彻底背井离乡了。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那就等于说将「台湾的国粉」（认同中华民国者）集体搬到大陆去，在大陆建立一个「中华民国」，而大陆的闽南语居民则集体搬到台湾去，在台湾建立一个台语国家。于是双方就各安其所了，所有讲普通话的人在中国大陆建国，所有讲台语或者闽南话的人在台湾建国。康斯坦丁十二世以后的希腊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古典希腊语和白话希腊语都失败了，「伟大理想」或者「反攻大陆」也失败了，只剩下通俗希腊语。



希腊与土耳其人口交换图　一九二三年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基于《洛桑条约》，交换国内的希腊人与穆斯林人口，造成将近二百万的难民。难民只得携带随身财物，其原有的各种财产如（如土地、房屋、汽车）则由各国政府清点价值后再支付相等的款项。

但问题还没解决，从土耳其远征回国的残兵败将，以及从安纳托利亚被迫背井离乡的难民，对康斯坦丁国王是极度的痛恨。他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一定要坚持反攻大陆的话，我们现在不至于落到这种下场，

所以我们连王国都不要了，于是他们发动革命，建立了希腊第二共和国[75]。希腊王国的中断和希腊第二共和国的成立是希腊民族发明的关键点，因为希腊第二共和国是希腊歷史上第一个放弃希腊主义的希腊国家。希腊第二共和国不再像以前的希腊王国那样要跟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争夺领土，它承认列强划定的小小希腊是它的法定领土。第二共和甚至连赛普勒斯都不争了，愿意满足于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希腊和土耳其和解时相互划定的小希腊边界和小土耳其边界，正式从奥斯曼主义的民族发明模式回到西欧常规的小民族主义发明模式，就等于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由「中华民国」正式改名为「台湾民国」一样。

以后的希腊歷史，便是已经稳定共同体边界的希腊民族歷史，虽然涉及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涉及到希腊在冷战前的站队问题，但是不再涉及希腊民族发明的问题。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在「辛亥革命」的希腊民族发明以后，二次发明产生出来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三次发明产生出来的阿尔巴尼亚，这些新民族从此走上了跟「希腊民族」各不相同的道路。二次发明的情况前面已经提过了，三次发明的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在塞尔维亚的二次发明的基础上，由奥地利人和义大利人搞的第三次发明，跟「希腊民族」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我建议读者，如果你想搞清楚「汉族」发明、「炎黄子孙」发明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将来可能遭遇的各种命运，想要瞭解在第一次民族发明以后会不会必然产生第二次民族发明、第三次民族发明，民族发明和国际体系演变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你有一个现成的参考，就是希腊主义的民族发明。

希腊主义的民族发明非常经典地呈现了一个像「大明国」和孔孟后裔这样的古老文明帝国，企图把自己古老的光荣和近代被鞑靼人征服的耻辱结合起来，以帝国模式发明民族，最终失败后以「薛丁格的猫」的方式坍缩回小民族主义的路径上，是怎样一个演变模式。你只要瞭解了「希腊民族」，就不会瞭解不了「汉族」。有些人认为「中华民族」是发明出来的而「汉族」不是发明出来的，其实恰好相反，这两者基本上是同时发明出来的，虽然略有时间差。「中华民族」是梁启超和肃亲王大概在一九〇一至〇五年这段时间发明的，而「汉族」大概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时间发明出来的。「汉族」发明的过程及内容都跟「希腊民国」和希腊主义的发明方式非常相似，而希腊主义的命运跟国民党的那

一套大中华民国和民国法统的构建方式也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到希腊就会明白，这些东西远远不像你想像得那么独特，事实上在太阳底下是没有新鲜事的。

希腊
民族发明大事记

西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
希腊古典时期是「伟大理想」的歷史根源

西元前5世纪至4世纪的古代希腊世界被称为希腊古典时期，是19世纪希腊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大希腊主义「伟大理想」的歷史根源。

330-1821年
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

西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定都君士坦丁堡，开启拜占庭帝国统治巴尔干地区的时代，并推动希腊语和东正教成为主流文化。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就此瓦解。奥斯曼帝国採用「米特勒制度」统治巴尔干半岛，允许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希腊人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治。

1768至**1774**年
第五次俄土战争

俄国的海军舰队在希腊沿海击败奥斯曼舰队，第五次俄土战争以俄国胜利告终，沙皇取得希腊东正教民的保护权。

1800/3/21
七岛共和国建立

巴尔干半岛西部沿海的爱奥尼亚群岛中的七个主要岛屿，在1800至1807年间建立了一个希腊人自治国家，这是奥斯曼帝

国境内的东正教徒第一次获得自治权，是近代希腊的起源。

1814/9/14

希腊友谊社的建立

希腊民族发明家在俄国境内的敖得萨成立希腊友谊社。友谊社类似东亚的同盟会，主张「大希腊主义」，积极推动希腊民族发明运动。

1821/3/6

希腊独立战争爆发

希腊友谊社在多瑙河两公国策划起义，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当时还没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起兵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揭开希腊独立战争的序幕。

1833/2/6

希腊王国的建立

希腊独立战争后，英法俄三国在均势原则下达成协议，建立希腊王国，指派巴伐利亚王国的王子奥托一世担任希腊国王。此时的希腊王国不是完整的主权国家，而是列强的保护国。

1844/1

科莱斯发表「大希腊主义」演讲

希腊民族发明家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主张大希腊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包括当时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基督徒的「大希腊国」。

1897/4/18

第一次希土战争爆发

第一次希腊土耳其战争的爆发，源自于希腊试图夺取克里特岛，结果是希腊战败，「伟大理想」扩张计画受挫。

1901/9/9

通俗希腊语版本的《新约圣经》出版

希腊语言学家亚歷山大．帕利斯发起第二次希腊语言改革运动，以通俗希腊语翻译的《新约圣经〉取代科莱斯的白话希腊语。白话希腊语类似胡适在五四运动推动的白话文，而通俗希腊语则是类似台语文的地方语言。

1912至1913年

两次巴尔干战争

包括希腊在内的巴尔干诸国组成联盟，在1912至1913年的战争中击败奥斯曼帝国。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地区被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及希腊瓜分，塞萨洛尼基被併入希腊，这是「伟大理想」的一次胜利。然而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就马其顿的统治权产生分歧，导致1913年6月爆发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巴尔干同盟瓦解。

1913/3/18

康斯坦丁一世继位为希腊国王

乔治一世在塞萨洛尼基被刺杀，他的长子康斯坦丁一世继位为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代表了希腊民族主义的核心—东正教的神权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故希腊人希望他能实现大希腊主义的「伟大理想」，称他「君士坦丁十二世」，即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继承者。

1919至1924年

第二次希腊土耳其战争的影响

康斯坦丁一世对奥斯曼帝国发动第二次希土战争，但以战败告终。1923年希腊与土耳其交换各自的东正教、穆斯林人口，造成大量的难民潮和屠杀事件，导致康斯坦丁一世在1924年被迫退位。

1924/3/25

希腊共和国建立

希腊人通过公投取消君主制度，并建立希腊第二共和国。新生的共和国放弃「伟大理想」的扩张计画，承认欧洲列强划定的「小希腊」为法定领土。「希腊民族」的共同体边界得以确立，以后的希腊歷史与政治发展不再涉及民族发明的问题。

---

1. 本书提及的「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斯拉夫主义」或「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希腊主义」（Greek nationalism）及「拜占庭主义」，为本书主要论述脉络，故不另行解释，请参阅各讲内容。↩
2. 大清国对辖下汉人地区的通行称谓，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共计十八个行省。清末革命党人最初想建立的民国，是在「驱除鞑虏、恢復中华」的口号下由十八省的汉地构成的。↩
3. 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即「东罗马帝国」，是西元五世纪崩溃后的罗马帝国在其东部领土的残留部分。设都于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东方教会（西元十一世纪后形成东正教），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歷代君主仍以正统罗马皇帝自称。西元七世纪后，在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塞尔柱人、西欧人和奥斯曼人的相继打击下，领土和人口不断削减，后期仅能控制君士坦丁堡周边和爱琴海及其沿岸一带，一四五三年被奥斯曼帝国灭亡。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繁体中文一般译为「鄂图曼帝国」，「鄂图曼」一词源于英语Ottoman，但本书为配合作者「奥斯曼主义」的语境，故採用源于土耳其语Osmanlı的「奥斯曼」翻译。↩
4. 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8）在长崎港设立「唐通事」，负责搜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商船携带的情报，称「唐船风说书」。后幕府官员林春胜、林信笃父子将一六四四年至一七二四年间的二千三百余件有关东亚大陆形势的「唐船风说书」陆续编辑成《华夷变态》一书，为研究明清易代史的重要资料。该书命名缘由，据林春胜在序言中称：「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故后世又将内亚征服者取代「中华正统」帝国后，对东亚各国形成的文化震撼和重新自我定位过程称为「华夷变态」。↩
5. 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 1405–1453），拜占庭末代皇帝，于一四五三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时战死；《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该语在近年常被中国皇汉分子与「天子守国门」结合，用以称颂明国最后一代皇帝崇祯在李自成攻陷北京时自杀于煤山的事蹟，如同近代希腊人怀念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歷史情感。↩
6. 米勒特（Millet）制度创始于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他在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允许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或氏族在服从奥斯曼帝国并承担捐税的基础上，保有自身的

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并维持原有的语言文字及习惯法，充分享有自治权。

7. 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帕列奥罗格（Sophia Palaiologina）流亡罗马，在教皇保罗二世安排下，于一四七二年底与莫斯科大公伊万三世结婚，其孙即伊凡四世，自称沙皇。
8. 奥古斯都（Augustus），古罗马荣誉头衔，意为「神圣」、「尊贵」，带有宗教意涵，此称号自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屋大维（63–14 BC）採用后，成为歷代罗马皇帝的固定头衔。
9. 「俄土战争」为十七至十九世纪期间，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为争夺黑海出海口及沿岸土地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共发生十次，本段提及的五次俄土战争（1768–1774）发生于凯萨琳二世统治时期，她是俄罗斯史上在位时期最长的女皇，对外积极扩张领土。这次战争的俄军指挥官为奥尔洛夫兄弟（Grigory Grigoryevich Orlov & Alexei Grigoryevich Orlov）。他们于一七七〇年二月率领俄国远征舰队到达伯罗奔尼萨半岛南端，支持当地的希腊革命者夺取了一些奥斯曼要塞，但迅速遭到奥斯曼当局镇压。这次事件被视为希腊独立战争的起源之一。
10.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策划日本对大清国的甲午战争，战后签订《马关条约》（1895），将台湾和澎湖纳入日本版图。
11. 一七七四年七月，俄土战争结束后两国签署《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奥斯曼帝国将北高加索和第聂伯河口的部分土地割让给俄国，放弃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允许俄国船只在黑海海峡自由通行。此外也允许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一所东正教教堂。俄国由此获得了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的保护权。
12. 一七九七年五月，威尼斯遭到拿破崙率领的法军占领，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其领地被法国和奥地利瓜分，其中科孚岛（Corfu）和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归法国。法国在岛上徵收重税，打击东正教会和贵族势力，引起居民不满。一七九八年，俄奥联军夺回爱奥尼亚群岛。在俄国支持下，有七座岛屿成立名义上附庸于奥斯曼的「塞普丁修拉（意为七岛）共和国」，实行联邦体制，先后颁布三部宪法。但一八〇七年，法国再次兼併该共和国。
13. 法国革命军在瑞士邦联成立赫尔维蒂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 1798–1803）；在义大利建立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Cisalpine Republic, 1797–1802），此乃是义大利王国的前身；在荷兰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 1795–1806），巴达维亚为古代日耳曼人的部落名称。
14.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建立于西元三三〇年，位于欧洲与亚洲交会点的歷史古城，其名称源于古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十世纪以后，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开始以「伊斯坦堡」（İstanbul）称唿该城，此二种不同语言的名称于一四五三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后，都可见于官方的文献纪录。新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于一九三〇由凯末发布命令，规定「伊斯坦堡」为该城的官方及外交名称，不过东正教会至今依然使用「君士坦丁堡」的名称。本书方便叙述起见，一律使用「君士坦丁堡」称唿该城。
15. 一八六〇年，黎巴嫩山地区的基督教徒和德鲁兹教徒（Druze）之间爆发大规模种族冲突。为消弭冲突，英、法、俄等列强与奥斯曼帝国组成国际调查委员会，建议在该地区建立新的自治体制。一八六一年，黎巴嫩山地区脱离大马士革行省，成立黎巴嫩山自治省（Mount Lebanon Mutasarrifate），由当地各教派分享权力，省督由天主教徒专任。
16. 古希腊由盲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口传史诗《伊利亚德》与《奥德赛》的统称，分别以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和奥德修斯归乡航行为主题。一般认为其内容混合了希腊文明早期各

时代的片断，由不同时代的众多创作加工者合力完成。

17. 伯里克里斯（495–429BC），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其执政时期被视为古雅典城邦的黄金时代。他在希波战争后，对内打击雅典贵族势力，对外加强控制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最后于伯罗奔尼萨战争（431–404 BC）初期感染瘟疫去世。苏格拉底（469–399BC），古雅典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依靠柏拉图等弟子的纪录传世。晚年遭到雅典公民大会指控藐视宗教、腐化青年、反对民主制度而被处以死刑。
18. 指三世纪末以后被统称为「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的各种内亚征服者集团在黄河流域造成的大规模战乱，起自于晋怀帝永嘉五年（311），西晋首都洛阳被匈奴人攻占，故以此命名。永嘉之乱开启了五胡十六国时代（304–439），秦汉以来的中国居民大部分被灭绝，中国地区被「五胡」人口替代，残余的中国居民则迁入吴越地区。
19. 指四至七世纪之间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游牧民族迁徙运动。西方歷史称为「民族大迁徙时期」（Migration Period）；从古代罗马和希腊人的角度而言，这一连串迁徙活动也被称为蛮族入侵（Barbarian Invasions），起自于三七八年西哥德人在阿德里安堡战役（Battle of Adrianople）中击败罗马军队、并入侵巴尔干。而二百余年后，新兴的古代斯拉夫人部落于六至七世纪之间，也陆续迁徙至巴尔干地区定居。
20. 十二世纪以后，阿尔巴尼亚人入侵伊庇鲁斯地区（今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西北部），建立一系列封建政权。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后，西欧领主在希腊本部陆续建立雅典公国、亚该亚公国等封建政权。十五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又为希腊地区带来其他亚洲族群。现代希腊人与早期斯拉夫人和这些族裔的血缘联繫，更强于与古典希腊人的血缘联繫；「希腊人」一词不再专指古典异教希腊人，而转化为巴尔干等地以希腊文作为上层菁英语言的各族群的自我身分认同。
21. 阿提卡（Attica），巴尔干地区名，指科林斯地峡以东伸入爱琴海的三角形半岛，雅典为该区域的中心城市。近代的阿提卡人实际上是斯拉夫人的后裔，而非古代希腊人的后裔。
22. 作者术语，意指陷入长期战乱、秩序全面崩溃，并爆发大规模人道灾难的社会状态，该术语来自明代末年的张献忠政权在四川地区的大屠杀。
23. 一九〇一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中国民族」；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首次以「中华民族」指代汉族，而后又在《歷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提出了「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24. 即善耆（1866–1922），爱新觉罗氏，镶白旗人。清末新政中曾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职，主持警政等各项改革。在汪兆铭谋刺载沣案（1910）中促成清廷对汪等革命党人从轻治罪。曾言：「《民报》所鼓吹之三民主义，余以为过狭，世界一家，何分五族？君〔汪兆铭〕等何不扩充范围，而言大同主义。」辛亥革命期间组织宗社党，极力维护清室，反对袁世凯与独立各省议和。中华民国成立后与日本合作，两次组织满蒙独立运动未果。其女为川岛芳子。
25. 「希腊民国」（Hellenic Republic）是比照「中华民国」的翻译方式，意在突出希腊革命史与民国史的相似性，本书中亦经常称希腊独立战争为「希腊辛亥革命」，称希腊反抗势力为「希腊民军」或「希腊革命军」。
26. 「伟大理想」（Megali Idea），意指恢復拜占庭帝国旧疆、还都君士坦丁堡、建立横跨「两洲五海」（两洲即欧洲和亚洲，五海即爱奥尼亚海、爱琴海、玛律马拉海、黑海和利比亚海）的大希腊国家的理想。其领土主张随形势发展屡有变动，但均包括色雷斯和

马其顿以南的巴尔干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和赛普勒斯、安纳托利亚西部等地。该意识形态在一九二〇年代之前一直是希腊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

27. 里加斯．费拉伊奥斯（Rigas Feraios, 1757–1798），希腊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出生于希腊的阿罗蒙人（Aromanian）家庭—阿罗蒙人在歷史和语言文化上与今天的罗马尼亚人存在密切联繫。他在参加第六次俄土战争（1787–1792）期间接触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致力于推动希腊独立运动，在维也纳担任希腊文报纸编辑，及撰写各种文学作品和小册子，包括《鲁米利、安纳托利亚、爱琴海诸岛、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新政治宪法》，号召建立一个从喀尔巴阡山到地中海的大希腊共和制国家。他于一七九八年被奥地利引渡给奥斯曼当局，并遭到处决，死前留下遗言：「我播下了丰富种子，在不久的未来，将由我的祖国收穫那光荣的果实。」

28. 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3），希腊启蒙运动和现代希腊文学的奠基人。生于希俄斯岛商人家庭，成年后长期居住在欧洲，一生致力于希腊启蒙运动及希腊独立，并将大量古典希腊语经典（如《希波战史》、《伊利亚德》）译为现代希腊语，出版十七卷的《希腊文学文库》。

29. 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 or Salonika），位于爱琴海北岸的港口城市，从西元前二世纪罗马统治时期开始，便一直是马其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现为希腊的第二大城。

30.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 1881–1938），其名号「阿塔图克」意为「土耳其人之父」，他在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导「凯末尔革命」，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担任首任总统、总理及国民议会议长，奠定了土耳其的现代化及世俗化的国家体制基础。

31. 友谊社（Filiki Eteria），希腊祕密革命团体，一八一四年九月于俄罗斯的傲得萨成立，旨在让希腊人摆脱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获得民族独立。主要成员多为来自伊斯坦布尔和俄罗斯的法纳尔希腊人（Phanariot Greeks），亦包括来自希腊本土和巴尔干各地反对奥斯曼统治的革命者和地方实力派人物，在希腊独立战争的发动中起了关键作用。

32. 内田良平（1873–1937），日本泛亚主义活动家，黑龙会骨干。曾参与日韩合併（1910）的策划，与清国、菲律宾、印度等地的民族主义人士均有联繫。是孙文同盟会的创始人和主要成员，直接参与了一九〇〇年惠州起义。

33. 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Ioannis Kapodistrias, 1776–1831），出生于爱奥尼亚群岛上的科孚岛，俄罗斯帝国的希腊籍外交家，之后领导希腊独立战争，并成为希腊第一共和国的总统，一八三一年被刺杀身亡。

34. 这里的「罗马尼亚」对应的单词是「鲁米利亚」（Rumelia）。鲁米利亚行省（Rumelia Eyalet, 1365–1867）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歷史当中，它被认为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行省。「Romania」（罗马尼亚）与「Rumelia」（鲁米尼亚）来自于相同的词源，基本含义都是「罗马人居住的地方」。若按照歷史原有的说法，「鲁米尼亚行省」应该变成「罗马尼亚民族国家」才对，但是它却变成了保加利亚民族国家。这个案例说明了在民族发明的过程中，有时候会产生歷史名词错位现象。

35. 这里的「罗马尼亚」（Romania）指的是一八七七年成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后文若提及「今天的罗马尼亚」，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36. 摩尔达维亚（Moldavia）公国，一三四六年建立的瓦拉几人（Vlach）政权，控制范围大致为喀尔巴阡山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地区。一四九八年成为奥斯曼帝国藩属。一七一一年后丧失自治地位，其大公由奥斯曼当局指派法纳尔希腊人担任。一八六二年与瓦拉

几亚成立联合公国，即后来罗马尼亚国家的前身。

37. 瓦拉几亚（Wallachia）公国，一三三〇年建立的瓦拉几人政权，与摩尔达维亚公国并称「多瑙河两公国」。控制范围大致为多瑙河下游北岸的平原地区。一四一七年成为奥斯曼帝国藩属。一七一六年后丧失自治地位，统治者由奥斯曼当局指派法纳尔希腊人担任。一八六二年与摩尔达维亚成立联合公国。
38. 作者使用马英九、龙应台、洪秀柱、赵少康等台湾知名人士作为书中比喻，不代表出版社立场。
39. 孙文在一九〇〇年惠州起义时，曾与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约定，由革命党在广东、福建制造混乱，便利日本从台湾出兵占领厦门，并向革命党提供补给。后因日本政府反对，计画未能成功。
40. 卡拉乔尔杰（Karađorđe, 1768–1817），出身牧民，一七八七年前往奥地利参加军队，对土耳其人作战屡立功勋。一八〇四年被推为起义领袖，攻下了包括贝尔格勒在内的领土。一八〇八年塞尔维亚国务委员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宣布卡拉乔尔杰为最高世袭领袖。一八一三年土耳其人捲土重来，他战败逃亡，一八一七年回国活动时遇害。
41. 米哈伊尔．苏特佐斯（Michael Soutzos, hospodar of Moldavia, 1784–1864），摩尔达维亚的法纳尔希腊人贵族、友谊社成员。起义失败后逃往西欧。希腊独立后被国王鄂图一世任命为希腊驻欧洲大使并活跃于法国巴黎社交圈。
42. 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 1780–1821），早年为隶属俄国的罗马尼亚军官。一八二一年与友谊社结盟后，在奥尔泰尼亚发动起义，从瓦拉几亚迅速扩展到蒙特尼亚，并波及摩尔达瓦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些地区，占领布加勒斯特。起义受挫后被部下杀害。
43. 约阿尼纳总督阿里帕夏（Ali Pasha of Ioannina, 1740–1822），阿尔巴尼亚盗匪出身的军阀。一七八八年被奥斯曼苏丹任命为统治约阿尼纳地区（在今希腊西北部）的帕夏，后逐渐将势力扩充至伊庇鲁斯全境、马其顿和希腊中部。因与友谊社勾结而遭到苏丹猜忌，遂于一八二〇年反叛苏丹，但失败而战死。大仲马的着名小说《基督山伯爵》里，基督山伯爵从君士坦丁堡奴隶市场救回来的海黛的父亲，就是这位阿里帕夏。
44. 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 1785–1839），奥斯曼帝国第三十任苏丹，在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后，废除数百年的「土耳其新军」制度，开始建设现代化的陆军以因应希腊革命危机。晚年致力于推动帝国的现代化，制定「坦志麦特」改革计画，但在改革实施之前便于一八三九年病逝。
45.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of Egypt, 1769–1849），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阿里王朝的创立者，创办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埃及第一批近代工业，扩建陆军，创建海军，使埃及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成为地中海东部强国，被视为现代埃及的奠基人。一般认为他是阿尔巴尼亚人。
46. 迈索隆吉翁（Missolonghi），是独立战争中希腊西部起义军的主要基地。自一八二五年四月起，奥斯曼和埃及联军第三次围攻迈索隆吉翁。次年四月奥斯曼军进入城市大肆杀掠，并纵火焚烧了该城。该事件激起了西欧舆论对希腊独立事业的强烈同情，最终促成了英、法、俄军事介入的决定。战后，为纪念守城军民的重大牺牲，该城被希腊政府授予「圣城」称号。
47. 希俄斯岛（Chios）位于爱琴海东部，居民多为希腊人，以经商和航海着称。一八二二年三月，奥斯曼海军到达该岛，屠杀了岛上十二万人口中的约五万人，并将大量倖存者卖为奴隶。事件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德拉克洛瓦的油画名作《希俄斯岛的屠杀》即描

绘此事。

48. 拜伦勋爵（Lord Byron, 1788–1824），英国贵族出身，其作品被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一八二三年拜伦前往巴尔干半岛参加希腊独立战争，隔年病亡。

49. 位于伯罗奔尼萨半岛西南部，为奥斯曼海军的主要行动基地之一。因奥斯曼及埃及舰队于一八二七年九月抵达纳瓦里诺湾（Navarino Bay），英、法、俄联合舰队于次月封锁海湾入口，确保奥斯曼和希腊双方保持停火状态。

50. 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五日夜，美国在古巴（时为西班牙殖民地）访问的装甲巡洋舰缅因号（USS Maine）因弹药库爆炸，在哈瓦那港沉没，二百六十一名船员丧生。美国舆论界普遍认为西班牙方面以水雷炸沉缅因号，这构成美西战争爆发的重要催化剂。关于爆炸发生的具体原因迄今尚无法得出一致意见。

51. 一八二八年后，列强为处理希腊独立问题，先后产生了四个伦敦协定（London Protocol, 1828, 1829, 1830, 1832）。按照这些协定，希腊应获得完全独立；希腊与奥斯曼的陆上边界应确立在希腊中部的阿尔塔–沃洛斯线；希腊应建立君主政体，迎立巴伐利亚的鄂图亲王为希腊国王。

52. 鄂图一世（Otto I of Greece, 1832–1862），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次子，希腊维特尔斯巴赫王朝（House of Wittelsbach）首任国王。在任前期因坚持君主专制，招致国内各政党派系不满，此后因天主教信仰、无子嗣、内外政策失当等原因，最终于一八六二年被推翻，并在流亡中病逝。

53. 《旧金山和约》，同盟国与日本于一九五一年在旧金山签订的和平条约，以解决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政治地位。和约中声明日本放弃台湾岛之主权并交由联合国託管，造成日后台湾法律归属的主权争议问题。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国在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止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由美国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也同时生效，用以规范美国与中华民国（台湾）之间的非官方外交关系。

54. 伊士麦（izmir），安纳托利亚西部古城、重要港口，希腊人口传统上占多数。一九二二年，凯末尔的土耳其军队占领该城，焚毁了该城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居住区，并驱逐了绝大部分希腊居民。

55. 亚歷山大．马夫罗科扎托斯（Alexandros Mavrokordatos, 1791–1865），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人显贵家庭。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后回到希腊参加起义，为亲英派代表人物。战后于国王鄂图一世政府中数次出任首相。马夫罗科扎托斯家族为法纳尔希腊人世家，家族成员多次担任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亲王。

56. 希腊王国的国王中，只有第一位国王鄂图一世的头衔是「希腊国王」（King of Greece），后面的国王头衔均为「全体希腊人的国王」（King of the Hellenes）。

57. 即希腊一八六二年革命（Revolution of 23 October 1862），鄂图一世即位后，在制定宪法、巴伐利亚顾问团等问题上与希腊国内各派系发生矛盾，在对外关系上又连遭挫败，引发国内不满。一八六二年十月十八日，鄂图一世前往伯罗奔尼萨半岛访问期间，首都爆发革命，革命者在二十三日于雅典召开大会，宣布废黜鄂图一世、着手选举新君主。由于无法取得列强支持平乱，鄂图一世被迫乘坐英国军舰流亡国外。

58. 乔治一世（George I of Greece, 1845–1913），希腊格吕克斯堡王朝首任国王，在任期间以政治手腕对内缓和派系斗争、对外不断扩张领土。在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中获得了直至马其顿地区的大片领土，一九一三年在塞萨洛尼基遭到刺杀，凶手动机不明。乔治一世来自日耳曼的奥尔登堡家族（House of Oldenburg），该家族成员曾多次担任丹麦、挪威、冰岛等地的统治者。

59. 图瓦共和国（Tuva Republic），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位于中西伯利亚地区南部，东南边境与蒙古国接壤。一九二一年在苏联策动下宣布独立，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一九四四年併入苏联，称「图瓦自治州」，一九九一年又更名为「图瓦共和国」。一九九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签订《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事实上承认了俄罗斯对该地区的主权，但中华民国政府迄今未予承认。
60. 二战后，联邦德国知识分子为替代已被纳粹污名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这个利基于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价值的概念。该意识形态最初由雅斯佩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及其学生史腾贝尔格（Dolf Sternberger, 1907–1989）提出，而以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 1929–）为理论的集大成者。这一话语对欧盟的建立具有极大影响，也是中文知识界所谓「普世价值」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作者在此处特意提及「宪法爱国主义」在中华民国语境下具有的领土扩张内涵，显示调侃意味。
61. 侨务委员会为中华民国政府主管侨民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于戒严时期负有发展并动员海外侨民组织、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任务。
62. 即「坦志麦特」（Tanzimat, 1839–1876），在希腊独立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于一八三九年启动的政治改革，力求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并提倡奥斯曼主义以维持帝国领土完整。
63. 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奥斯曼帝国于二十世纪初期的立宪运动人士，他们的基本主张为推翻苏丹的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并推行奥斯曼主义，于一九〇八年发动革命推翻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后，组成「联合进步委员会」推动议会政治及经济、军事改革。
64. 一八七八年，英国在斡旋俄土战争的柏林会议上以防范俄国入侵奥斯曼为名，向奥斯曼帝国租借了赛普勒斯岛。一九一四年，奥斯曼帝国于一战爆发后加入德奥一方的同盟国，英国便正式吞併该岛。
65.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最早出自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科幻小说《银河英雄传说》。目前中文网路上所谓的「星辰大海」则出自二〇一一年后在网上流传的《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漫画，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伟大復兴」、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愿景，与「大国崛起」、「虽远必诛」、「厉害了我的国」等中国近年来的纳粹化宣传用语基本同义。
66. 在希腊境内，一八二一年独立战争的公认起点是三月二十五日；但在瓦拉几亚，弗拉迪米雷斯库在布加勒斯特（今日罗马尼亚的首都）起事的时间是一月十八日。
67. 黄復兴党部，成立于一九五六年七月，正式名称为「国军退除役人员党部」，寓意「炎黄子孙，復兴中华」。是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设立的非地区特别党部，主要成员为退役官兵及其眷属。由于黄復兴成员占国民党党员比率高与高投票率，有左右党内选举及初选的影响力。
68. 亚歷山大．帕利斯（Alexandros Pallis, 1851–1935）希腊教育家、语言改革家，致力于推广使用通俗希腊语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其以通俗希腊语翻译的《新约圣经》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在雅典报纸上发表时引发街头抗议，导致八人死亡，只得改在英国出版。
69. 通俗希腊语（Demotic Greek），与教育领域通用的古典希腊语和公务领域通用的纯正希腊语均有很大差异。一八八〇年代后，帕利斯等通俗希腊语提倡者推动了通俗语的文艺繁荣。一九一七年，为推动对新征服的马其顿地区居民的同化，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 1864–1936）推行语言改革，从小学教育中去除古典希腊语，

将通俗语作为五年级之前的专用教育用语，从而决定性地加强了通俗语的地位。一九七六年立法最终将标准化的通俗语确立为唯一教育用语。

70. 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 of Greece, 1868–1922），在位后期发动第二次希土战争遭到挫败，致使他被罢黜下台，不久于西西里岛的流放地逝世。
71. 「皇汉」是中文网路流行用语，主要指汉种族优越论者，广义上也包括单纯的汉文化优越论者、儒家文明优越论者等。共同点是不满于「汉人」当前在国内和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认为需要通过「本土文化」或「国学」的復兴，对内强化「汉人」的主体民族地位，对外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72.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国民党于一九九五年提出、针对中华民国（台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非官方政治性论述，又称为「九二共识」。该论述主张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都同意「一个中国」，但是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双方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
73. 上古传说中，夏代王子「少康」在励精图治后，击败仇敌「寒浞」，重新取回政权成为第六任夏代统治者。此「少康復国」传说常被失去政权的统治者或统治阶层作为激励自身的典故。
74. 希腊土耳其人口互换（Population exchange between Greece and Turkey, 1923），希腊土耳其战争（1919–1922）结束之后，战争失利的希腊与土耳其于一九二三年签署《洛桑条约》，约定两国互相交换位于对方国土的希腊人及穆斯林居民人口，总数约一百五十万的安纳托利亚希腊人及五十万希腊穆斯林，共计二百万人受到影响并成为政治性难民。
75. 康斯坦丁一世在其统治后期已经不受韦尼泽洛斯派和协约国（英、法）列强的欢迎，最终于一九一七年六月被迫退位离国。但他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回国復位，并持续进行希腊土耳其战争，引起国内的广泛不满。由于希腊遭到挫败，国内舆论认为康斯坦丁一世须对此负责，并引发军队兵变，康斯坦丁一世被迫再度流亡国外。一九二三年底，韦尼泽洛斯第四次出任希腊首相，举行全民公投废弃君主制，希腊第二共和国建立。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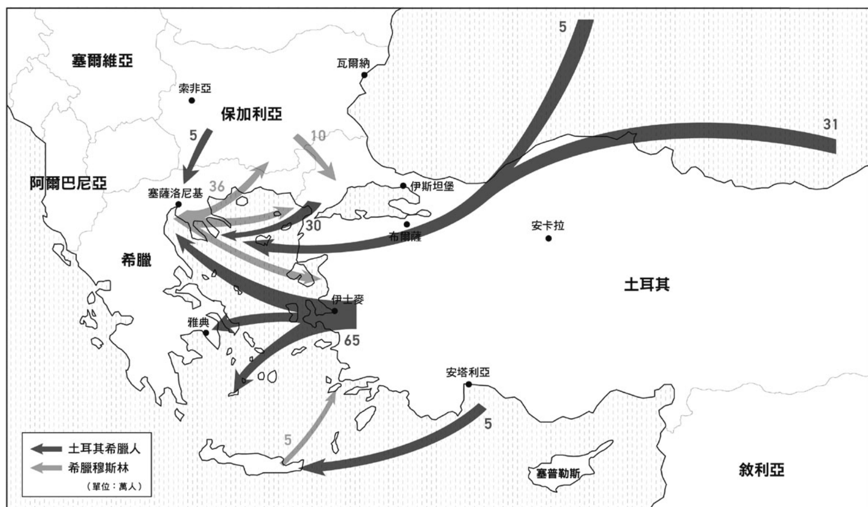
罗马尼亚

希腊主义的叛逆子孙



罗马尼亚
Romania
România
独立时间：1878年5月9日
首都：布加勒斯特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罗马尼亚：希腊主义的叛逆子孙」。罗马尼亚歷史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民族发明十分特殊。罗马尼亚的整个近代史和民族发明的歷史和希腊民族发明的歷史，以及奥斯曼主义解体的歷史紧密纠缠、难解难分。而且整个过程的演化机制跟远东的大清帝国解散和辛亥革命以后的汉族主义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歷史惊人的相似，可以说体现出无论东西、帝国解体的歷史当中都会存在的某些共同规律，对我们将来的民族构建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先强调一点，今天的罗马尼亚其实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关系都非常小。今天的罗马尼亚，尽管它是一个十九世纪中期才发明出来的名词，但我们要讲罗马尼亚，就要先看看它的居民和政治体系的构成是怎么来的。



罗马帝国末期的蛮族大迁徙图　罗马帝国晚期（4至6世纪）发生的民族大迁徙，又称为蛮族入侵，一般认为开始于4世纪来自内亚的匈人入侵欧洲，最终结束于6世纪，此事件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及古欧洲人种分布的改变。

今天罗马尼亚境内的这些居民，大体上跟今天希腊境内居民的基本盘相似。他们并不是在苏格拉底和君士坦丁的时代[1]形成的，而是当罗马帝国在五世纪解体以后，在蛮族入侵的巨浪中形成的。伯里克里斯时代的希腊人，经过古罗马征服和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除了在沿海的某些岛屿和半岛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残留。整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居民主体，都是罗马解体以后入侵巴尔干的第一拨蛮族──就是我们熟悉的、跟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关系非常密切的斯拉夫蛮族的后裔[2]。无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还是希腊，无论他们在歷史发明中把自己说成是希腊人的后代还是拉丁人的后代，但是从血缘上讲，他们主要是这拨斯拉夫人的后代。

在拜占庭帝国把蛮族占领的巴尔干领土次第重新收復以后，又爆发了几次新的入侵。新来的蛮族包括保加尔人、佩切涅格人[3]、库曼人[4]诸如此类，名目繁多。他们大体上来讲都是从今天的中亚地区越过伏尔加河和乌克兰大草原，然后翻过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入侵巴尔干半岛的。但是这些后来的蛮族的入侵跟最早的斯拉夫人的入侵不一样，他们是有波动的，他们没有能够深入到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在最南端的今天的希腊共和国境内，大部分居民是第一波入侵的斯拉夫人的后代。而在半岛北端，比较靠近喀尔巴阡山各山口的今天的罗马尼亚境内，库曼人、佩切涅格人、保加尔人或者其他内亚蛮族的血统就要比半岛南端的希腊更多一些。但是总体上来讲，他们在血缘上主要是斯拉夫人，是

斯拉夫人以不同程度掺杂了内亚血统的产物。越往北走，掺杂的内亚血统就越多。

但是从文化上讲，他们全都是希腊东正教徒。他们的文化来自于教会，他们在整个中世纪使用的语言，就是产生俄罗斯西里尔字母[5]和最古老的俄文的那一种源于希腊语的教会斯拉夫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母体。在以宗教而非其他方式区隔共同体的中世纪，他们的身分很明确：他们都是东正教徒。在拜占庭帝国后期和奥斯曼帝国，「东正教徒」和「希腊人」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正如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和「奥斯曼人」是可以互换的概念一样。在拜占庭帝国后期和奥斯曼帝国初期，大概距今六百年的时间内，包括今天的罗马尼亚在内的巴尔干半岛的人口才基本稳定。当时他们还没有想到自己跟古代的罗马人或希腊人有什么关系，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看成是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总主教属下的希腊东正教徒。

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今天的罗马尼亚所在的多瑙河地区两大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地位，相当于是大清国境内，由少数中央直辖的郡县和大量的土司组成的「湖南」。今天的罗马尼亚跟当时的罗马尼亚行省（请见第一讲关于鲁米利亚的叙述）不一样，它们是如同大清国「湖南」的偏远地方。你可以理解成，大清国位于首都北京的中央政府首都统治安徽和河南的平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些完全汉化的平原地带上，都是编户齐民的顺民，不存在土司；但是在遍布山地和复杂种族的「湖南」地方，郡县制无法彻底实施，因此除了长沙、湘潭等重要城镇周围实施郡县制以外，「湖南」的大多数地方实际上是由土司统治的。所以我刚才讲到的真正的罗马尼亚行省，是一个实行郡县制、中央直接管辖的地方，因为它大部分是肥沃可耕的平原，居住的也是对中央政府没有反抗能力的顺民，在这里徵税、任官都很容易；但是在更靠北方，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两个公国，散居着许多歷次入侵的蛮族后代，地方又比较贫瘠，收税也不大好收，因此周围分布着大量的土司。

这些土司按照东正教徒、伊斯兰教徒或者是欧洲的观念来看都是相当野蛮的，所以中世纪才会产生所谓的吸血鬼伯爵德古拉[6]的传说。这位仁兄当然不是真正的吸血鬼，只是一个以残忍闻名的土司。他那个「伯爵」的爵号（Voivode）[7]，跟欧洲封建体制中的伯爵其实不是一个词，但是近代的小说家都是西欧人，为了使西欧的读者容易理解，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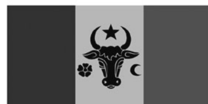
把巴尔干更加野蛮的土司发明成为类似西欧的公爵和伯爵，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吸血鬼伯爵之类的传说。这些传说当然没有歷史真实性，但是这种传说之所以能够产生本身也就证明，在比较文明的西欧人看来，这些地方的土司头目是多么的野蛮。比如说对于汉字世界的读者来说，倪匡的「卫斯理系列」小说为什么会把一些传奇故事━什么下毒、下蛊、各种巫术之类的故事都放在苗疆，让卫斯理和白素之类的探险家不断到苗疆去寻找这些神祕的遗迹呢？那就是因为，在香港人或者在自以为更加文明的广东人或者上海人的眼中，苗疆、湘西这些地方就是既神祕又野蛮的地方。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的地位，就相当于包含着大量苗疆和土司领地的湖南在大清国当中的地位。

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帝国也很像是大清国征服大明国，继承了大明的十八省后，把大明摇摇欲坠的中央集权体制恢復起来，而且更加强化了。奥斯曼帝国也是这样的，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后，迅速地占领了过去曾经臣服于拜占庭帝国的所有领土，特别是拜占庭的核心领土，相当于本部十八省的巴尔干半岛，在这些地方，原来拜占庭已经衰颓的中央集权体制被奥斯曼重新整顿起来。在边境，原本拜占庭帝国有心无力、没有办法实施统治的很多土司领地，在异族的韃靼皇帝的统治之下反而可以进行整顿并「改土归流」[8]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些地方也就是这样的。在拜占庭时代，它们是由相当野蛮、但是基本上保持独立的土司来管辖的；在奥斯曼时代，帝国的圣君贤相、中央集权主义者，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君士坦丁堡的「雍正皇帝」和「鄂尔泰」，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最终把这些土司领地先是加以征服，然后一一削除。征服和削除的过程不完全是和平的，有很多情况下也需要有类似于君士坦丁堡的「张广泗」这样的八旗将领和绿营将领出来出力，打了败仗的土司首领往往会被拖到君士坦丁堡来满门抄斩，这个过程也是充满了血腥的。我们可以跳过这一段令人不愉快的歷史。总之，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开边和改土归流，奥斯曼帝国大体上制服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地方的土司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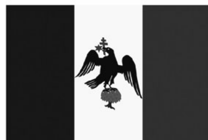
奥斯曼帝国取代拜占庭的方式跟大清国取代大明国的方式的相似性也体现在另一方面。大清国并不是彻底消灭大明国原有的士大夫，只是让他们在满洲的统治之下充当二等公民，而且还是可以做官、甚至做到大官。只是最高一级的官职，在督抚、中央这一级，十八省的汉官要比关外八旗子弟低一等，做官要更难一些。但是八旗子弟和十八省汉官的

区别并不是民族区别，而是等级区别。例如，只要是在入关以前投靠满洲的大明国臣民，哪怕血统上讲纯粹是江苏人或者广东人，他们也会被列为八旗子弟，照样跟出身蒙古和满洲的八旗子弟同样享有特权；相反，本来是蒙古或者满洲的蛮族将领被大明收编当了总兵、然后随着十八省被征服的这些本身是内亚血统的人，也会跟江苏或者广东的士大夫一样变成二等公民。但是二等公民的权利还是相当多的，士大夫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大多数发财的商人也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差不多也是这样，奥斯曼人当然是第一等，东正教希腊人组成的米勒特是第二等，但是后者当中也出了很多商人和行政官。奥斯曼帝国跟满洲八旗或者说鞑子皇帝的作法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宗教，他们如果不肯改信伊斯兰教、加入「土耳其新军」[9]（相当于是加入八旗子弟的行列），而是要坚持东正教希腊人的信仰，那么他们是无权掌握武器、无权当兵的。不能当兵、不能打仗，那么他们在帝国的等级当中就只能屈居于二等公民了。

在这些居于二等公民的东正教徒希腊人当中，包含着各种在当时看来只是地域性和风俗性区别的族群，包括今天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诸如此类的。只要是整个黎凡特中东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属于拜占庭和奥斯曼两帝国辖下的希腊东正教徒，无论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人认为他们是不是同一种人，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同一种人。就像是大清帝国境内，只要是大明国旧疆域十八省里面出来的儒家门徒，无论你血统上是怎么样的，他都会把你叫做汉人——但不是「汉族」，汉人只是一个政治等级而不是「民族」。同样，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东正教徒这个米勒特也不是民族，而是一个「政治等级」。尽管十九世纪以后有些奥斯曼主义的发明家企图把这几个米勒特发明成几个不同的民族，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在奥斯曼帝国初期，这种情况还是不存在的。



Kingdom of Moldavia
Regatul Moldovei
摩爾達維亞公國



Kingdom of Wallachia
Regatul Țării Românești
瓦拉幾亞公國



多瑙河两公国区域图　位于多瑙河下游流域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分别在1417年和1498年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国。直到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在奥地利帝国的支持下于1859年组成联合公国，由罗马尼亚民族发明家亚歷山大．库札担任统治者。

奥斯曼帝国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境内完成改土归流大业的最后一步，就是把政权从土司转移到流官手中，这些流官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他们聚集在君士坦丁堡城的法纳尔区（Fener），因此也被很多人称之为法纳尔人（Phanariots）。他们既是今天希腊民族的鼻祖，也是今天罗马尼亚民族的鼻祖。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了拜占庭帝国以后不愿意改变信仰做伊斯兰教徒，就像是明国的臣民在大清国征服了大明国以后不愿意做鞑子那样，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做生意发财。经过几百年的经营，他们在做生意这方面、在读书这方面甚至是超过了征服他们的满洲八旗或者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因此奥斯曼帝国认为，在他们中间选拔行政官或者商业方面的官吏是合理的。在组成今天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已经居住了很多希腊语居民、基本上已经适合郡县化的时候，就不用再让当地土司去当官了，可以由流官来代替土司。

于是在奥斯曼帝国中期，组成今天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就交到了法纳尔希腊人的士大夫阶级手里面[10]。当然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是做很多不同类型的官的，包括外交官、贸易方面的官员、各地的督抚之类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在今天的罗马尼亚当官的那些法纳尔人，统治了今天的罗马尼亚一百多年（但是当时还没有「罗马尼亚」这个词）。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之所以

会变成今天的罗马尼亚，跟他们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当时这些做总督、巡抚的法纳尔人，正如大清国末期在云南、湖南担任巡抚的汉官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大清帝国下的汉人，这些法纳尔人也认为自己是奥斯曼帝国下的希腊人。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因为当时还没有罗马尼亚民族，而作为行政区划的「罗马尼亚行省」实际上并不包括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两个公国。

他们认为自己是希腊人，因此在忠于帝国、替帝国收税、管理行政事务之外，他们也还继续发扬自身的文化。按照现在的话说，他们就是相当于大清国境内的曾国藩这一类的人物。他们一方面对满洲皇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各式各样的书院，翻印或翻刻王船山、顾亭林之类的大明国遗民的书籍好復兴大明文化。大清国朝廷认为，只要他们在政治上忠于大清国、能够完成大清国交给他们的任务，在文化上搞一些学校教育、搞一些出版事业、復兴大明文化，这对大清国是没有损害的。统治改土归流的多瑙河两公国的法纳尔希腊人总督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一方面为奥斯曼帝国办事，一方面振兴东正教希腊语的教育。经过了他们一百多年的经营，今天组成罗马尼亚的两个核心──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的上层和中层人物，接受过中高级教育的人，一般都会说希腊语，一般都是以希腊语为主要教育语言的。正如大清帝国末期的湖南巡抚治下的大多数书院，他们虽然到朝廷上跟满洲人和蒙古人打交道的时候需要说一点满语，但是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学校教育这方面，仍然是用汉字，特别是要復兴王夫之这些大明国时代的湖南先贤的文化。法纳尔希腊人就用这种方式，为未来的希腊民国和希腊语教育做好了准备。

当然在曾国藩之后必然会产生章太炎。首先振兴希腊语教育的是对奥斯曼帝国忠心耿耿、没有贰心的为鞑子皇帝效力的希腊大臣、希腊巡抚、希腊总督，但是在他们的培养之下，讲汉语或者是讲希腊语的这些学生就自然而然会发现，在奥斯曼帝国的朝廷之上，他们是二等公民。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跟愿意改信伊斯兰教的鞑靼人或者其他人（哪怕这些人原先跟他们是同胞，但是改信了伊斯兰教以后就被划入八旗子弟了）相比，他们是没有平等待遇可言的。而他们又觉得，我们希腊文化和东正教信仰其实是比你们的内亚文化和伊斯兰信仰更加高等的东西，我们在文化上比你们先进，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却被你们压在脚下，心里面自然产生了不平衡的感觉。于是就产生了希腊的新文化运动。希腊

的新文化运动是类似于辛亥革命的希腊革命的真正起源。这就要涉及到希腊主义本身的演变。而这个演变的过程，东方的「汉族主义」和西方的希腊主义是一模一样的。

希腊主义开始演变的时候，主要体现为包括法纳尔人的督抚在内的所有东正教希腊人兴办的教育。这些教育当然不限于如瓦拉几亚等比较偏僻的地方，不仅包括今天的罗马尼亚，还包括今天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土耳其的大部分地方。希腊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文化上的差别，而不是种族上的差别。同样是拜占庭和奥斯曼的臣民，你如果改信了伊斯兰教、加入了「八旗」或者禁卫军，哪怕你原来是拜占庭的东正教臣民，你也可以变成奥斯曼人和穆斯林；反过来，如果你皈依了东正教，哪怕你原来是内亚人，你也会被归入东正教希腊人的范围。所以无论是西部的、今天的罗马尼亚和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还是东部的、今天的土耳其所在的安纳托利亚半岛，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东正教徒和穆斯林都是交错居住的。虽然西部的东正教徒多一点，东部的东正教徒少一点，西部的突厥人和穆斯林少一点，东部的突厥人和穆斯林多一点，但是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杂居、突厥人和希腊人杂居的。所以担任督抚和奥斯曼帝国大臣的法纳尔希腊人也是遍布着奥斯曼帝国各地，无论是在巴尔干各地还是在安纳托利亚各地，到处都有法纳尔希腊人的大臣，到处都有他们兴办的学校。自然，各地的这样的学校里面都会产生希腊新文化运动的苗子。由于各种歷史的特殊原因，包括在瓦拉几亚公国境内任职的法纳尔人大臣特别励精图治，以及该地在地理上比较接近于奥地利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接受的西欧先进影响比较多，总之是在兴办新学的过程当中，瓦拉几亚暂时领先于奥斯曼帝国的各部分，包括领先于安纳托利亚和今天的希腊。

这个时期出现的两位主要的希腊新文化运动活动家，都跟瓦拉几亚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有密切联繫。一位是「希腊启蒙运动」中着名的哲学家埃欧斯波．摩埃西欧达卡斯[11]。另一位是为希腊制定了第一部「民国宪法」的里加斯．费拉伊奥斯，他从血统上讲其实比较接近瓦拉几亚人，而且主要的教育经歷和政治活动也是在今天的罗马尼亚境内展开的。里加斯所写的那些小册子经常提到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它们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歷史地位相当于陈天华[12]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勐回头》和《警世钟》。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就是组成现代罗马尼亚、被

发明成现代罗马尼亚的拜占庭的土司领地和奥斯曼帝国的行省，由法纳尔希腊人的督抚统治的这两个行省。里加斯本人的政治理想当然不是要把瓦拉几亚建立成为「瓦拉几亚民国」或者「罗马尼亚民国」，而是要把瓦拉几亚建立成为「希腊民国的瓦拉几亚大都督府」。希腊民国的疆域要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安纳托利亚，也包括君士坦丁堡，他们要「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因此他们计画的「希腊民国」首都并不是雅典，也不是布加勒斯特，而是君士坦丁堡。布加勒斯特在他们看来只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而已，建一个都督府就足够了，根本不会考虑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的问题。当然革命很快就由理论进入行动。

当时的希腊新文化运动者总结出来的白话希腊语和古典希腊语的差别，大体上就相当于胡适的白话文和孔子的文言文的差别。白话希腊语跟苏格拉底、伯里克里斯的古典希腊语的关系，也就是白话文跟文言文的关系。白话文表面上看是像西欧各国的国语运动那样，要用老百姓、阿公阿婆的通俗语言来取代只有高级教士、高级士大夫才能懂的书面文言文，但是实际上它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就在于，希腊主义像汉族的发明一样，它不肯完全捨弃奥斯曼主义或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帝国遗产，它只是想把帝国缩小一波，还是要把比如说湖南、广东这些口语方言各不相同的地方发明成为同一个「大希腊民族」，因此它就不能走西欧路线。按照西欧路线，各地的方言分别发明成国语，那就变成瓦拉几亚人发明瓦拉几亚语，希腊人发明希腊语，君士坦丁堡人发明君士坦丁堡语，那么他们辛辛苦苦革命、从八旗子弟和鞑靼皇帝手中夺回来的这个江山自然就恢復不了大明国的十八省，实现不了他们为崇祯皇帝报仇、建立大国的理想了。

新发明出来的白话希腊语企图让「十八省」的居民都能够同时使用，结果却仍然是一种书面语言，只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才能看懂，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阿公阿婆仍然是听不懂的。布加勒斯特的阿公阿婆和雅典的阿公阿婆彼此之间讲的方言是没有办法沟通的，特别是布加勒斯特人的蛮族成分比雅典人多，而雅典人当中各种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的成分又要比布加勒斯特人多。但是通过科莱斯和里加斯这些人发明出来的共同的白话希腊语，他们就可以在书面这个层次上沟通了。口头上沟通不了，这是梁启超和胡适也同样解决不了的问题。无论如何，事情就只能这么办了。他们拿着白话希腊语作为自己的文化武器，拿着「希腊

民国宪法」作为自己的政治武器，在一八二一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希腊辛亥革命」。

「希腊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在瓦拉几亚的布加勒斯特（也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的首都，当时只是相当于是武昌和长沙这样一个省会的布加勒斯特）打响的，布加勒斯特起义建立了「希腊民国」。希腊民国的革命英雄很多都是瓦拉几亚人和摩尔达维亚人，而不是今天的希腊人。当然这些人在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发明罗马尼亚民族，所以也是理直气壮地、像黄兴和宋教仁那样认为我们也是「中国人」的。希腊独立战争的各路将领中，有一路是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的罗马尼亚、当时的瓦拉几亚的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和亚歷山大．伊普斯兰提斯[13]，还有一路是今天被发明成罗马尼亚、在当时只是摩尔达维亚的米哈伊尔．苏特佐斯。

希腊各路民军在巴尔干各地起事，但是打得最艰苦、贡献也最大的还是布加勒斯特的瓦拉几亚民军。瓦拉几亚民军不仅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沾染了一部分土司的遗产，比较彪悍善战，不像是今天保加利亚、当时罗马尼亚行省腹地中长期习惯郡县地带的农民那样软弱、不能打，另一方面，他们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于奥斯曼帝国的几个边疆要塞，容易接受来自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援助，所以他们最先发难，同南下镇压的清军（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就是北上镇压革命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作战，打得最努力。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是最先牺牲的一批。

而且各路起兵的民军也正如辛亥革命起兵的民军一样，他们内部也是不和的。大都督是人人都想做的，而谁该做大都督、谁的功劳最大也是一个扯不清的事情。陈其美和李燮和为了争上海都督，差点要打起来。陈其美和陶成章为了争都督的职位，结果陈其美派蒋介石去刺杀了陶成章[14]。瓦拉几亚民军的情况也是这样，两位重要的革命领袖—弗拉迪米雷斯库和伊普斯兰提斯不和，最后弗拉迪米雷斯库被伊普斯兰提斯手下的人给刺杀了。当然这是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家的看法。这件事情像民国初年的宋教仁遇刺案一样，也是希腊歷史和罗马尼亚歷史上的千古疑案，至今没有一个确定的解答。

按照希腊中学教科书上的意见来说的话，他们两人是情同手足的革命兄弟，根本谈不上谁刺杀谁的问题。如果有人刺杀了他们，那肯定是奥斯曼帝国派来的奸贼或者是极少数领不到军饷、自私自利、混进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干的。罗马尼亚方面的中学教科书呢，则把弗拉迪米

雷斯库看成罗马尼亚独立战争的主要英雄，把弗拉迪米雷斯库的遇刺看成是希腊人迫害罗马尼亚人的第一个例子（尽管这两个人当时都还自以为是希腊人而不是罗马尼亚人），变成罗马尼亚脱离希腊另外发明民族的第一个依据，就像现在的乌克兰人说俄罗斯人如何如何出卖他们，因此我们乌克兰人要发明民族并寻求独立一样。

比较实证主义的歷史学家则认为，他们两个人首先是有争权夺利方面的斗争，意见不合，然后在兵变当中，弗拉迪米雷斯库被叛军杀害。这次兵变虽然不一定是伊普斯兰提斯本人直接下令或者直接指使的，但他是兵变的主要受益者这没问题。兵变以后，他变成了瓦拉几亚大都督的唯一候选人，可以统一整个北方地区，变成一方大军阀了。在还有另一位革命领袖的情况下，他这个位子做得并不是十分稳当。但是仅仅是这样，这只是一个根据动机的合理怀疑，并不能说事情一定是他干的，因为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他为了争权夺利而指使别人干的，也有可能确确实实是出于偶然事件，因为军饷或其他方面的关系，叛军是自己想要杀人的，杀了人以后自然而然的为了害怕被追究责任，或者是害怕跟奥斯曼帝国打起来，然后他们自己就跑来归附现在仅存的另一位名将，尽管这位名将并不是指使者，但是事情发生以后他确实是当地唯一能收拾残局的人和唯一能保护他们的人。这两种可能性，照现有的证据来看也是说不清楚的。

无论如何，各方在非常类似于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混战的那种状态中间打了一段时间，民军和民军之间也自相残杀，民军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之间也不断打仗。打到一定程度以后，奥斯曼帝国还是从希腊革命初期的混乱中渐渐重整旗鼓，重新占了上风，在一八二一年攻陷了布加勒斯特，一年后砍下了约阿尼纳总督阿里的头。瓦拉几亚残余的民军在伊普斯兰提斯的带领之下越过喀尔巴阡山，逃到了奥地利。然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席捲巴尔干，长驱南下，与从海路北上的埃及军队一起深入伯罗奔尼萨半岛。现在，残存的希腊民军和希腊民国似乎已经是奄奄一息，眼看就要完蛋了，但是列强这时却干预了。

列强干预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舆论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镇压革命的当时，自然也免不了像内亚人和亚洲人常见的那样要烧杀抢掠一番，但是时代不同了：在中世纪的时候东方人烧杀抢掠不算个事，而且也没有什么新闻记者来报导；但是现在已经是十九世纪，新闻记者来了，相应的报导传遍了整个欧洲，舆论大哗，什么《希俄斯岛的屠杀》

这样的油画都产生出来了。这些油画在当时的地位就相当于是现在伊斯兰国砍头的录影一样，在网路上一流传，全世界都知道伊斯兰国在砍头了。如果是在中世纪，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十九世纪没有网际网路，但是当时的诗歌、报纸和绘画也就发挥了今天网路类似的作用。于是就有人跳出来组织「亲希腊委员会」，由画家画出了《希俄斯岛的屠杀》这样的名画来震动欧洲人的良心。

像雪莱[15]这样的亲希腊主义者，他的话很能代表当时欧洲的浪漫主义舆论或者说是开明人士的舆论。凡是熟悉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读者都非常清楚，基本上所有英国、法国、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家都写过关于希腊革命的诗歌和文学，他们的调子都差不多的。以雪莱为代表，他们是这么说的：「希腊是我们欧洲的祖先。我们的文化来自于希腊人，雅典城邦开创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希腊的艺术家教会了我们怎样做雕塑和绘画。我们之所以跟野蛮人有所不同，无非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希腊人的遗教。然而，今天的希腊人在伊斯兰教徒和暴君的蹂躏下呻吟，而我们这些欧洲人却视若无睹，好像我们没有得到过古希腊人的恩惠一样，这是多么可耻。」最后一句就像是余杰在「九一一事件」爆发时期说的台词：「今天晚上我们都是美国人」[16]，雪莱的台词是，今天我们都是希腊人。然后拜伦写了一首诗，「雅典牵着我的心和灵魂」（出自《雅典的少女》）。维克多．雨果一八二九年出版的《东方集》也大多是类似的内容。总而言之，大家现在不去援助希腊，就是没有良知。

于是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拜伦勋爵这样的人带着钱财和军火，赤膊上阵，去援助眼看就要垮台的希腊残余民军；另一方面，英法等国的国内进步舆论向本国国会施加压力，要求本国的议员出来管一管。拜伦就曾经说过，如果还有人能够拯救欧洲，那就是自由派的领袖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但保守派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Viscount Castlereagh）准备互不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政让他们自己去管，我们英国人刚刚打完拿破崙战争，应该休养生息，好好做生意，闷声大发财，没有必要再劳师伤财去管那些不急之务。但是国际舆论还是发挥了作用。

卡斯尔雷死于一八二二年后，坎宁当上了外交大臣，英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再加上相当于「同盟会」的希腊友谊社的一位外援在当时恰好又是俄罗斯帝国的外交大臣，于是英法俄几个大国讨论一下，觉得为

了人道主义起见，必须派出维和部队，强制双方停火。然后接下来的故事，我已经在上一讲提过，英法俄列强派出舰队强制维和，土耳其和埃及舰队拒绝接受，便发生了一八二七年的纳瓦里诺湾事件，结果埃及和土耳其的联合舰队被列强歼灭，希腊人得救了。根据列强签订的《君士坦丁堡条约》和《伦敦协定》，在英法俄列强保护之下成立了独立的小希腊国，但是这个希腊国不包括今天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些地方已经被土耳其重新占领了，也被列强承认为既成事实。

这个干涉是列强在巴尔干半岛南部（也就是今天的希腊境内）的联合干涉，但是正如我们在东亚也经常看到的，俄国人总是另外有一手。大家都知道，在大清国末年庚子之乱、义和团起兵的时候，八国联军入京来保护传教士、外国侨民和外国使馆的时候，也包括俄国。然后在恢復了北京的秩序和安全以后，大家共同讨论善后事宜，俄国也参加了。但是俄国还派出了另一支全由俄国人组成的军队，从瑷珲一路打到山海关，把整个满洲都占领了。俄国人的立场是，八国联军与北京的善后问题，由各国共同解决；但满洲完全是俄国人自己的事情，英国、法国、日本、美国都不能干涉它的事情，满洲全归俄国。

俄国人在列强联合干涉希腊这件事情上的做法也是一样的。欧洲列强的联军从海路开进纳瓦里诺湾，拯救了危在旦夕的「希腊民国」，这件事情是欧洲列强全都有分，俄国人也有分；但是与此同时，俄国人另外派了一支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完全占领了[17]，就像它在一九〇〇年顺便把满洲占领了一样。俄国的外交政策是：希腊的事情，俄国和西欧列强一人一分，大家分蛋糕；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事情，对不起，俄国全部包办，完全属于俄国，其他人统统靠边站。尽管俄国外交官在列强会议的时候也同意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交还给奥斯曼苏丹，但这次交还只是表面上的。从法律上讲，这两个公国已经回归到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但是俄国已经在这两个公国通过所谓「组织法」[18]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体制，又通过雅西[19]和布加勒斯特的领事馆间接控制着两公国的内政，最后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波及这一地区的时候又干脆重新出兵占领了两公国。总之，俄国人的势力用熟悉东亚近代歷史的人都能够想出来的各种手段，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赖着不走，一口气赖了将近三十年，一直赖到一八五〇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为止。

在这三十年当中，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当时还不存在罗

马尼亚）法律上的统治者是奥斯曼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是俄国驻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占领军。这件事不仅使奥斯曼苏丹不高兴，因为他自然就像满洲皇帝想要收回满洲一样，想把这些地方收回来；这件事也让希腊人不高兴，希腊人本着希腊主义的原则，也是想在将来的下一轮革命当中把整个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重新拿回去的；同时也使所有的欧洲列强都不高兴，觉得俄国人简直是帝国主义背信弃义，大家说好了一人一分的，到希腊去就行了，谁知道你另外插一手，把这两公国占去了，而且还是独占的，不给我们分。但是无可奈何，俄国人就这么蛮横。而英法等西欧列强虽然对俄国不高兴，但是还没有不高兴到愿意为此对俄国开战的地步。于是这两公国就落到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

奥斯曼帝国于一八二一年镇压两公国境内的「希腊辛亥革命」后，认为一切都是自己先前安插的统治代理人——法纳尔希腊人背信弃义、背叛苏丹所致，所以不仅封闭了雅西的希腊语学院，而且从此不再任命法纳尔人担任这两公国的督抚，督抚的位子再次落到了本地贵族手里。俄罗斯占领两公国后，就像日本人在满洲和台湾一样，急于推行俄式新政，同样看当地残存的希腊语菁英不顺眼。于是在希腊民国境内就出现了龙应台女士的着名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所描述的情况。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菁英在俄国军队、奥斯曼帝国军队以及「黄俄傀儡军」[21]的一路追杀之下，流着眼泪告别故土，踏上了驶向台北的最后一班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踏上了驶向雅典的最后一班船。当然他们起兵的时候跟雅典、伯罗奔尼萨半岛的革命军领袖一样，是要建立「大希腊民国」的。他们当然认为，台湾也是我们的家，台湾和湖南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湖南人在中华民国当总统还是在台湾当大都督，这两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事情。

好不容易流亡到雅典的革命军，当然要论功行赏。革命军当中的湖南人既然和台湾人同样有分，那么湖南人自然也就要当官。于是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对于今天的希腊中小学生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希腊实行议会制以后的首相马夫罗科扎托斯居然是罗马尼亚人。马夫罗科扎托斯家族中既有今天希腊中学课本的希腊民族英雄，也出了很多今天的罗马尼亚中学课本的罗马尼亚民族英雄，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罗马尼亚的菁英阶级和希腊的菁英阶级都认为他们将会建立一个讲白话希腊语的「大希腊民国」，而溃退到雅典的「希腊民国」跟「中华民国在台湾」一样都是过渡时期，「反攻大陆」及反攻君士坦丁堡是早晚的事

情。

接下来的希腊首相是与瓦拉几亚有密切关系的爱奥尼斯．科莱蒂斯[22]。科莱蒂斯在希腊宪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希腊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真正创始人——说白了，他创立的就是政党分赃制。根据英国人的要求，希腊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因此就要召开国会，召开国会自然就要举行政党政治，但是当时的希腊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政权实质上是垄断在参加「希腊辛亥革命」的那些流亡到雅典的革命军将士手里面的。这些革命军将士大多数是「大希腊民国」北部的人，照台湾的说法就是，他们属于「中华民国沦陷区」而不是属于「中华民国自由区」。中华民国自由区的人，因为在当初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军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在封官的时候占的位置也比较少。但是如果举行选举，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八六四年的希腊民国宪法[23]明文规定，希腊民国的公民包括全世界的使用白话希腊语的希腊人。也就是说，除了希腊王国境内、中华民国自由区、台澎金马地区的希腊人以外，还包括奥斯曼帝国——也就是中华民国大陆地区、沦陷区或黄俄统治地区的十八省的希腊人，以及包括广大侨胞，也就是居住在伦敦、圣彼得堡、敖得萨和全世界的所有希腊侨民。

这种做法使英国人、俄国人和欧洲列强都不大高兴，因为这是引发战争的根源。英国签订的《伦敦协定》像《旧金山和约》和《台北和约》一样明文规定，皇家海军只负责保卫「阿尔塔—沃洛斯线」以南的希腊领土，就相当于是只保卫金门岛以东的中华民国领土。所谓的「中华民国沦陷区」是中华民国单方面的说法，大英帝国不曾买单，大英帝国不会保护国民党反攻君士坦丁堡或者反攻布加勒斯特，不会保护你反攻南京或者反攻武昌。你如果自己不去反攻，只打嘴炮，无论在自己的小学教科书上怎么说，大英帝国也不来管你，但是你自己要清楚，你如果自己去打的话，责任是由你自己负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后来一八九七年希腊「反攻大陆」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一部分，先跳回来。

既然要举行选举，实际上沦陷区的十八省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占领下的占希腊人口大多数的希腊人，出于现实政治的理由，他们根本没有参加投票的可能性，也只有占中华民国合法选举人极少数的台湾岛居民才能选出中华民国的「万年国代」[24]，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第一年、第二年还好，流亡来的湖南人当当总统和总理、当当希腊的首相

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万年国代的情况一样，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必然会上升。在本省人看来，你这些讲瓦拉几亚方言的人跟难民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我们雅典人或者斯巴达人给你们提供了一个地方，你们才没有被奥斯曼人和俄罗斯人杀绝，结果你们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觉得你是上等人，你讲的国语比我们讲得标准，你倒是霸占了所有重要官职，好像我们是你们的殖民地一样。我们推翻奥斯曼帝国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不做殖民地吗？结果奥斯曼帝国走了，来了你们这拨外省人，你们跟奥斯曼帝国有什么区别？你们不是殖民者谁是殖民者？

这样一来又紧跟着引起了争夺教育权的斗争。当然流亡到雅典的外省人是很希望把全世界希腊人都通用的白话希腊语作为小小的希腊王国的标准语言的，但是小小的希腊王国的新一代改革家——像帕利斯这种人就觉得，台语、闽南语才是我们雅典和斯巴达的阿公阿婆习惯的语言。你们讲的那些国语，让湖南人「马英九」、「龙应台」讲起来很合适，我们的阿公阿婆听不懂。我们既听不懂土耳其人的突厥语，也听不懂你们所谓的白话希腊语。你们白话希腊语一点都不白话，我们另外根据自己的方言土语再发明一种「通俗希腊语」（Demotic Greek）怎么样？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

搞到最后通俗希腊语的支持者终于在国会中占了多数。最终在二十世纪初，他们把本省的「闽南语」，也就是今天的通俗希腊语，改成了中小学的通用语言。这事放在台湾，就像是台湾的中小学废除文言文和国语、把台语作为中小学的标准语言一样。这样一来，就把寄居在台湾的外省人——像「马英九」和「龙应台」这种人判了政治上的死刑，他们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在政治上有任何出路了。于是他们在自己在政治上完蛋以前的最后机会发动了一八九七年的「北伐战争」，也就是第一次希腊土耳其战争[25]。

按照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伦敦协定》是英国人偏袒希腊人，歧视土耳其人。它等于是规定，奥斯曼帝国如果越过「阿尔塔–沃洛斯线」进攻雅典的话，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会干涉；但是如果希腊人「北伐」打到君士坦丁堡去，法案却没有说过英国人会保卫奥斯曼帝国。也就是说，英国人其实是不公正的，它保卫希腊，但是不负责保卫奥斯曼帝国。但是在台湾——也就是在雅典的「国粉」当中却滋生了这样一种舆论：「我们反攻大陆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美国的甘迺迪总统一天

到晚对我们管头管脚，本来奥斯曼帝国在一九六〇年发生大饥荒、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并摇摇欲坠的时候，我们蒋公眼看就要反攻大陆成功的时候，偏偏甘迺迪总统跳出来说，你力量不足，没有资格反攻，等一等吧，结果把大好机会都耽误了[26]。我们如果能够摆脱美国人的约束、摆脱《台湾关系法》的保护、我们自己去北伐的话，在广大的水深火热之下的希腊同胞揭竿而起的配合之下，我们北伐一定会成功的。」

最后英国人被他们骂烦了，觉得这些人简直是忘恩负义，你们能够活到现在，全靠皇家海军保护你们，结果你们还说我们是帝国主义，说我们坏了你们的好事，很好，我们让你们去打。这就相当于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参议院实行的那种「放蒋出笼」的政策。按照《光荣与梦想》[27]的说法，「放蒋出笼」的结果就是，他们很快发现，蒋介石没有牙齿。蒋介石在笼子里面的时候，在笼子的保护之下，共产党不敢打他；「放蒋出笼」以后刚刚打了几仗，结果是蒋介石不但没有能够反攻大陆，反而把浙东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也丢给了共产党。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蒋介石重新回到笼子里面，由美国海军保护。一八九七年战争的结果也是这样的，希腊人刚刚跑出笼子去「北伐中原」、反攻君士坦丁堡，战争才刚刚打了四个星期就一败涂地，奥斯曼帝国不但夺回了被希腊人夺去的所有领土，而且还越过「阿尔塔–沃洛斯线」，向希腊内地长驱直入。

这一次希腊人顾不得面子，只有无可奈何地再一次向大英帝国求救。大英帝国呢，按照「理想主义」的看法，为了自由民主，为了人权，为了基督徒的公义，为了反对亚细亚的野蛮人，诸如此类；按照「现实主义」的看法，为了势力均衡，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占上风，使奥斯曼帝国的偌大疆土永远不会统一在一个政权手里，以便对英国人造成威胁。无论是理想主义的理由还是出于现实主义的理由，一八九七年英国首相索尔斯伯利勋爵（Marquess of Salisbury）派出了「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那是一九九七年的柯林顿总统，我是说索尔斯伯利勋爵派出了海军到地中海并要求双方停火。奥斯曼苏丹听到炮响以后，想起俄罗斯帝国对它有重大的威胁，只有大英帝国能够保护它免遭俄罗斯帝国的侵略，于是就及时地从希腊召回了他的部队。

希腊人经过了一八九七年的危机，他们的「伟大理想」或者说「反攻大陆」遭到了第一次沉重打击。最重要的是，随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运输船逃到雅典的那些瓦拉几亚流亡者已经是七老八十，凋零得

快要差不多了。新一代的人，他们的孙子已经跟本省人基本上融合了，他们也不再会说科莱斯和里加斯的白话希腊语，而是只会说闽南语或者本省话──也就是通俗希腊语了，他们在议会选举中会投票支持「柯文哲」或者是本土派政党，对反攻君士坦丁堡逐渐失去了兴趣，更不用说反攻布加勒斯特了。新一代的瓦拉几亚菁英，是在俄罗斯的占领之下重新培养起来的。

在俄罗斯占领期间，在一九四九年没有跟着「龙应台」和「马英九」逃到台湾的那些菁英也像是湖南人反抗毛泽东那样，不知天高地厚地发动了几场起义，但是俄罗斯帝国比奥斯曼帝国更加强大，辛亥革命中反抗大清能够成功的那些技术，反抗毛泽东和黄俄就不能成功了。所以这一批少不更事的少年革命家不但没有能够重演布加勒斯特起义的光荣战绩，还被俄罗斯帝国镇压得大败，最后不得不逃到巴黎和维也纳去避难。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个公国在俄罗斯的军事统治之下万马齐喑，「谁也不敢放屁」[28]。瓦拉几亚人和摩尔达维亚人本土的新一代，完全没有能力像推翻奥斯曼帝国一样推翻俄罗斯，但是国际形势的演变却迫使俄罗斯人不得不撤出这些地方。

我们刚才提到过，俄罗斯占领这两个公国，使得欧洲列强都觉得很不高兴，但是还没有不高兴到直接去打它的地步。但是等到克里米亚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克里米亚问题引起英法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近在咫尺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也就扮演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那种位置。日本人本来跟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是很不高兴俄罗斯独占满洲的，但是让它单独去打，它是不敢的；但是等到英国人也对俄国人十分不满的时候，它得到英日同盟撑腰的时候，它就敢打了，于是发生了旅顺口战役和满洲战役。奥地利人的态度也是这个样子的，让奥地利人单独去打俄国人，它是不敢打的，尽管它非常不满意；但是等到英国人和法国人赤膊上阵、在克里米亚跟俄国人打起来的时候，俄国人势单力孤，奥地利皇帝料定俄国人不敢在克里米亚和巴尔干同时开辟两个战场，所以在英法军队驶向黑海的同时向俄罗斯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俄罗斯帝国要嘛撤出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要嘛奥地利帝国加入英法联盟，向俄罗斯帝国宣战。俄罗斯沙皇审时度势，觉得不能开辟两面战场，两害相权取其轻，就集中力量跟英法开战，跟奥地利帝国维持和睦关系，把他的军队撤出了这多瑙河两公国。

俄罗斯的撤出使多瑙河两公国出现了政治真空地带，奥地利帝国便

派出了少量维和部队进驻这些地区，但是并不向这两个公国提出领土要求。奥斯曼帝国虽然提出了领土要求，但是它正处于克里米亚战争中焦头烂额的时候，也不可能发兵来控制这两个公国，因此这两个公国出现了真空状态。以前被镇压下去的革命家，现在终于又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这时他们早已看到，南方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如此的不争气，完全依靠皇家海军的保护。他们觉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搞革命，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听这些过气老朽的话，还不如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于是他们在第二代革命家—罗马尼亚民族发明家库扎大公[29]的领导之下，提出了一个「罗马尼亚」概念。发明「罗马尼亚」概念的直接目的是：第一，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可以在「罗马尼亚」这个新名词之下名正言顺地统一起来；第二，「罗马尼亚」的意思就是，希腊人可以说再见了，我们是古罗马人的后代，也是跟你们平起平坐的西方文明的正宗传人。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九九六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不适用于武昌起义的老家湖北省，湖北人要另外建立一个「荆楚利亚」。布加勒斯特的这批新革命家通过「罗马尼亚」这个词，就把自己变成了古罗马人的后代，而非古希腊人的后代。

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他们原先把自己变成希腊人的后代，也就是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后缀」（suffix），什么「科达斯」（－ａｓ）之类的，看上去很像希腊人的名字，那就足够了。现在再把自己的名字重新拉丁化，变成什么「德乌斯」（－ｕｓ）之类的，前面四分之三的内容完全相同，后面四分之一的内容由希腊语后缀变成拉丁语后缀，然后他们就变成了拉丁人的后代。然后他们重新发明了一套歷史：「这两个公国不是法纳尔希腊人和希腊新文化运动的希腊人创造出来的新民族，而是古罗马图拉真皇帝建立起来的达基亚行省及古罗马移民的后代」。

从歷史发明学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的歷史发明是完全真实的。比如说美国，你要说美国是清教徒的后代，那么义大利人肯定要说我们是天主教徒，爱尔兰人就会说我们是天主教徒，黑人就会说我们是被奴隶贩子贩卖来的，印第安人会说我们是原住民，你们新教徒的「五月花号神话」其实是不适用于我们的。美国尚且如此，剩下的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的罗马尼亚居民组成成分，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现在不必重复，当然是极其复杂的，各方面都有。罗马的达基亚人当然也有，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说，罗马的达基亚遗民从数量上来讲比斯拉夫人要少得多，也比内亚的保加尔人、佩切涅格人和各个蛮族要少得多。发明罗马尼亚的这批发明家从血缘上讲不是别人，他们就是一八二一年「希腊辛亥革命」这批革命家的子孙后代，他们的父辈在学校里面学的也是跟雅典人一样的国语。但是他们既然决定为了在国际关系上给自己争取地位、而把自己发明成为拉丁人的后代，他们也就决定顺便把国语也改一下。当然这样做就要依靠国语发明家和歷史学家了，例如他们的国语发明家奥古斯都．洛里昂[30]和国史发明家亚歷山德鲁．迪米特里耶．克塞诺波尔[31]。我们知道这些名字的意义不大，只要知道，前者把原有的希腊化的瓦拉几亚语加以拉丁化、变成了现在的罗马尼亚语，后者出版了罗马尼亚歷史上第一部罗马尼亚史，这就够了。这倒不是说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以前没有歷史学家，不是的。以前的歷史学家写了这样一些书——摩尔达维亚史、瓦拉几亚史和奥斯曼帝国史，唯独没有罗马尼亚史，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罗马尼亚」。

这就好像是说大明国和大清国以及中华民国的湖南歷史学家写过什么歷史呢？写过明史，写过清史，写过中华民国史，写过湖南史，唯独没有写过「湖湘尼亚民国史」，因为「湖湘尼亚民国史」在当时还没有创造出来。是在「马英九」们在台湾已经彻底失势、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不可能反攻大陆以后，湖南省境内的下一代革命家、辛亥革命的子孙觉得，把自己发明成为「汉族」、发明成为「马英九」和「龙应台」的同胞已经没有好处和意义了，还不如独立作战，自己发明出一个「湖湘尼亚民族」，建立一个「湖湘尼亚国」，然后把自己的「湖湘尼亚语」说成是源自于东南亚的语言或者是雅利安人的语言，而是跟台湾的国语和台语都毫无关系的新语言，这时候他们才会想到，我不再写什么湖南史，不再写什么明史，不再写什么清史，不再写什么中华民国史，而要写一部罗马尼亚史和「湖湘尼亚史」。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建立起了自称的「罗马尼亚联合大公国」[32]，但是列强仍然只承认这个公国是「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联合大公国」。他们自己要求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但是奥斯曼帝国坚决反对他们具有独立国家的身分。奥斯曼帝国尽管已经没有力量渡过多瑙河打到布加勒斯特去，但是在外交上，它的外交官在国际会议上还是要发言的，所以它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始终强调，无论布加勒斯特选出了什么样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都只是奥斯曼帝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地方领导人，根

本不存在什么「一个奥斯曼帝国、一个罗马尼亚」或者「罗马尼亚独立」诸如此类的异端邪说。任何人否认「一个奥斯曼帝国」或者是承认「一边一国」，都会与奥斯曼帝国发生严重的外交纠纷。列强觉得为此惹是生非很不值得，于是他们采取了现在对台湾的做法：一方面，事实承认自称的「罗马尼亚联合大公国」和被称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联合大公国」独立，但是不派大使，只派代表处；同时，在外交场合只承认奥斯曼帝国，不承认罗马尼亚独立。

这种类似于一九二一年外蒙古的事实独立的状态又维持了十几年，一直等到下一次的一八七八年，第十次俄土战争导致俄国干涉下的保加利亚独立，在德国和英国的组织之下，德国的俾斯麦和英国的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在柏林主持国际会议，安排了奥斯曼帝国的新一轮解体。直到这时，早已经事实独立了十几年的「罗马尼亚联合大公国」或「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联合大公国」才正式获得欧洲列强的承认。这次正式的独立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而已。对于列强来说，只是把他们派驻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代表处改成派驻罗马尼亚的公使馆而已。也就是说，「罗马尼亚」这个名词在外交场合正式取代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两个使用几百年的词。但是直到今天，「罗马尼亚」仍然是一个新词，使用的时间也不过一百多年。

一八七八年以后，无论如何，尽管罗马尼亚在匈牙利边界方面、在俄罗斯边界方面、在保加利亚边界方面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自身的民族发明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罗马尼亚内部，那些非常混杂的居民要想通过义务教育的方法接受新的拉丁化的罗马尼亚语，忘掉他们的祖先曾经很费心力学过的斯拉夫语或希腊语，还需要有几代人的时间，但是从此以后，我们所知道的现代的「罗马尼亚民族」和现代的罗马尼亚国家就此站稳了脚跟。至于「大希腊主义」彻底崩溃，还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希腊的「赵少康」或者康斯坦丁十二世国王以全力出兵安纳托利亚、彻底惨败以后，希腊才终于放弃「伟大理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些国家才从相当于「中华民族」的奥斯曼主义和相当于「汉族」的希腊主义的双重威胁之下彻底解放出来。

罗马尼亚

民族发明大事记

106至**271**年

古罗马的「达基亚行省」与现代罗马尼亚

罗马帝国的「达基亚行省」，起源于西元106年古罗马皇帝图拉真征服多瑙河以北的土地并设置行省，直到271年取消为止。「达基亚行省」与现代的「罗马尼亚民族」没有直接关系，却是罗马尼亚民族发明的主要材料。

15至**18**世纪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

位于多瑙河下游流域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分别在1417年和1498年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国，接受「改土归流」的统治政策。两公国在18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直属国，不再由当地贵族统治，改由奥斯曼苏丹委派希腊人进行统治。

1765年

摩埃西欧达卡斯担任「雅西王子学院」院长

希腊民族发明家埃欧斯波．摩埃西欧达卡斯担任位于摩尔达维亚公国的「雅西王子学院」院长，并在1780年出版「希腊民族发明运动」的代表性作品《卫道书》。此时的希腊民族发明的地理空间上包括今日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1821/3/6

希腊独立战争爆发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

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是希腊民族发明运动在巴尔干北部的主要根据地，也是希腊独立革命的爆发地点。日后罗马尼亚发明家的父辈人物多数都是希腊民族发明家。

1829年

俄罗斯占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

希腊独立战争后期，俄国派兵占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在当地进行殖民统治，直到18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在欧洲列强压力下才撤军并结束统治。

1859/1/24
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组成联合公国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在奥地利帝国的支持下组成联合公国，由罗马尼亚民族发明家亚歷山大．库札担任统治者。联合公国在法理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藩属，但已拥有自治的权利。

1862/1/22
罗马尼亚联合公国的诞生

库札大公将瓦拉几亚及摩尔达维亚联合公国改名为「罗马尼亚联合公国」，正式在政治上宣称罗马尼亚人是「古罗马人」的后代。

1871年
洛里昂出版《罗马尼亚语词典》

罗马尼亚民族发明家奥古斯都．洛里昂出版歷史上第一部《罗马尼亚语词典》，该书主张「罗马尼亚语」的「纯洁化」，即系统去除瓦拉几亚方言中的非拉丁成分（主要是斯拉夫语），使其尽可能地接近古罗马人所使用的「拉丁语」。

1888年
克塞诺波尔出版《图拉真占领达契亚时的罗马尼亚史》

罗马尼亚歷史学家亚歷山德鲁．克塞诺波尔出版六卷本《图拉真占领达基亚时的罗马尼亚史》，该书主张「罗马尼亚人起源于古罗马人」的歷史理论。在罗马尼亚民族发明家的推

广之下，该书成为今日罗马尼亚歷史的正统学说。

1877/5/9

第十次俄土战争与罗马尼亚联合公国独立

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于1877年4月，罗马尼亚联合公国获得俄国支持，于5月9日宣布独立，并在战后的柏林会议获得列强承认其合法地位。「罗马尼亚民族」的共同体边界至此得以确立，以后的罗马尼亚歷史与政治发展不再涉及民族发明的问题。

---

1. 君士坦丁的时代，指的是由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 272–337）于三二四年时建立的拜占庭帝国的统治时代。君士坦丁一世以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新都，并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扶持基督教势力，其临终前也受洗入教。
2. 关于罗马尼亚人早期起源的理论主要有两种。罗马尼亚官方支持的理论认为，瓦拉几人是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罗马–达基亚人的后代；另一种理论认为，瓦拉几人是早期斯拉夫人和其他游牧民的后代。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罗马尼亚传统书面语一直是斯拉夫语和希腊语，本地的瓦拉几方言也一直以西里尔字母而非拉丁字母拼写。
3. 佩切涅格人，突厥游牧部族，传说起源于中亚塔什干一带的乌古斯（Oghuz）突厥人。八世纪中期突厥汗国崩溃后，他们开始西迁，九世纪后进入黑海北岸草原和喀尔巴阡山以东、以南一带，与拜占庭帝国、基辅罗斯、保加利亚等国经常发生冲突。十一世纪后势力转衰，逐渐被周边各国和后起游牧部族吸收。
4. 库曼人，突厥游牧部族，又称「波洛伏齐人」（Polovtsians）。可能起源于高加索以东地区，十一至十二世纪活动于黑海北岸草原，并与钦察人（Kipchaks）建立同盟，联合控制中亚与东欧之间的商路，与北方的罗斯各公国经常发生冲突。十一世纪后期，一部分库曼人进入喀尔巴阡山以东和以南地区，征服当地的佩切涅格人，并以此为基地攻掠拜占庭帝国。蒙古人于十三世纪前期入侵黑海北岸地区后，库曼–钦察联盟瓦解，库曼人被迫散入东欧、东南欧各国，以佣兵身分谋生。
5. 西里尔字母（Cyrillic script）是通行于部分斯拉夫语族的字母书写系统。七世纪时，圣西里尔与圣梅特迪乌斯两兄弟（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将基督教传入斯拉夫地区，为了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参考希腊文字发明了「西里尔字母」。
6. 即瓦拉几亚王公「穿刺者弗拉德」（Vlad the Impaler，1428–1476），他经常将俘虏集体处以木桩穿刺刑，故被称为「穿刺者」；另一绰号「德古拉」（Dracula，意为「小龙」）则来源于其父曾加入德意志的圣龙骑士团。德古拉的残酷形象在他生前已流传于欧洲，在十九世纪被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借用为其恐怖小说《德古拉》（1897）的主人公，从此成为西方吸血鬼通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7. 中世纪流行于中东欧的贵族头衔，意为「统帅」或「督军」，被认为与西欧的公爵（Duke）或斯拉夫语的大公（Knyaz）居于相同等级。今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

（Vojvodina）自治省名称即来源于此。

8. 明清两代将西南地区的土司制改为流官制的政策，后文提到的鄂尔泰与张广泗，皆是大清国执行该政策的主要官员。
9. 土耳其新军（Janissaries），奥斯曼苏丹的禁卫部队，也是伊斯兰世界第一支现代常备军。初建于穆拉德一世在位时期（Murad I, 1362–1389），帝国从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基督教臣民中强徵男童，并强制其归化为穆斯林，以补充军队成员。十七世纪末高峰时曾接近七万人，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主力。于十七世纪后逐渐丧失战斗力，以操纵政府和发动宫廷政变为主业，最终在十九世纪初希腊革命爆发后，被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废除。
10. 由于两公国的亲王图谋与俄国、奥地利联合反对奥斯曼，遂于一七一一年和一七一六年先后被奥斯曼苏丹废黜。此后，两公国亲王不再由本地贵族担任，而改由苏丹委派法纳尔希腊人担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的经济和文化领域逐渐由法纳尔希腊人所支配。
11. 埃欧斯波．摩埃西欧达卡斯（Iosipos Moisiodax, 1725–1800），现代希腊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生于今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Dobrudja）地区。早年在塞萨洛尼基、伊士麦、帕多瓦等地接受希腊语教育和西欧教育，一七六五和一七七六年曾两度出任摩尔达维亚的雅西亲王学院（Princely Academy of Iaşi）院长。代表作《卫道书》（The Apology）推崇牛顿、伽利略、笛卡尔、洛克等人的理性主义研究方法，主张以数学手段改革传统哲学思维。
12. 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华兴会创始人之一，一九〇三年在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撰《猛回头》、《警世钟》两部小册子，宣扬排满民族主义，后因留日学生内部分歧激烈，对革命前途悲观并投海自尽。
13. 亚歷山大．伊普斯兰提斯（Alexander Ypsilantis, 1792–1828），希腊军阀、民族主义活动家。出身于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人显贵家庭。早年服役于俄罗斯帝国陆军、官至中将，并参与过拿破崙战争。一八二〇年成为友谊社领导人，策划在瓦拉几亚、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君士坦丁堡和希腊本土同时发动起义。因计画洩露，于一八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提前率起义军从俄国进入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但因得不到俄国支持，于当年六月即被奥斯曼军镇压。伊普斯兰提斯逃往奥地利，一八二八年病逝于维也纳。
14.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同盟会会员、孙文的亲信陈其美和光復会会员、陶成章亲信李燮和联合上海商团势力在上海发动起义。上海光復后，在推举沪军都督的海防厅会议上，陈的亲信王钟声、刘福标、蒋介石等在会场中拔枪威胁，使与会者最终推陈为都督，原上海民军临时总司令李燮和则只被委任为都督府参谋。一九一二年，陈其美命令蒋介石刺杀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与李同为光復会系统的陶成章。
15. 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 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后期着名的诗人，具有激进的民主思想，积极参与爱尔兰反抗英国统治运动，亦是着名的亲希腊主义者。
16. 在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的隔天，包遵信、刘晓波、余杰等中国民运人士发表致布希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信中以「今夜，我们是美国人」表达同情和声援之意。
17. 纳瓦里诺海战后，奥斯曼当局为报復俄国，禁止俄船出入达达尼尔海峡，导致俄土战争于一八二八年四月爆发。俄军在巴尔干和高加索战线推进迅速，于一八二九年先后攻占多瑙河两公国，同年俄土签订《阿德里安堡和约》，奥斯曼向俄国割让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地区大片土地，确认塞尔维亚和多瑙河两公国的自治地位。
18. 俄军自一八二八年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后，于一八三一至三二年在两公国分别通过一部

「组织法」。规定两公国的亲王由贵族、教士和商人组成的特别全体大会选举产生，任期终身；每个公国设一个由六名大臣组成的委员会处理行政事务；立法部门称为「国民大会」。一八三四年，按照俄土《圣彼得堡条约》规定，俄军撤出两公国，两公国名义上恢復奥斯曼宗主权下的自治，但仍受俄国间接控制。

19. 雅西（Jassy），罗马尼亚东部城市，一八五九年之前为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设有「雅西王子学院」。
20.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台湾作家龙应台于二〇〇九年发表的作品，从文学角度叙述一九四九年前后，国共内战（中国称解放战争）倖存者的回忆与歷史。
21. 作者术语，「黄俄」指中国共产党，即黄皮肤的俄国人。「黄俄傀儡军」比喻罗马尼亚境内俄罗斯支持的本土势力。换成东亚的语境，则是指把国民党驱逐到台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2. 爱奥尼斯．科莱蒂斯（Ioannis Kolettis, 1773–1847），希腊军阀、政治家。出身于伊庇鲁斯地区的阿罗蒙人（瓦拉几人）家庭。早年供职于约阿尼纳总督阿里帕夏麾下，一八二一年革命爆发后去往希腊中部参加革命，为亲法派领袖。希腊独立后，两度出任希腊首相，任内提出「伟大理想」。
23. 一八六二年政变后，希腊人迎立丹麦王室的乔治一世为新国王，并推行君主立宪制。一八六四年颁布宪法（Greek Constitution of 1864），新宪法增加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立宪君主权力受到规范与限制，议会实行一院制，实行直接选举和普选。
24. 万年国会，是指中华民国一九四七年在中国大陆所选出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第一届立法委员、第一届监察委员等中央政府民意代表，后被官方称为「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败退来台后，停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故此届中央民意代表长期未曾改选，不断自我延任，任期共四十多年，直到李登辉执政后，才分别全面改选国民大会及立法院。
25. 第一次希腊土耳其战争（Greco-Turkish War, 1897），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因争夺克里特岛而爆发战争，希腊失败。经列强调停，双方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希腊割让部分领土并支付四百万里拉赔款；列强组成国际财政委员会，对希腊的赔款偿还事宜进行管理；奥斯曼帝国同意克里特岛自治，该岛后于一九〇八年宣布与希腊合併。
26.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在第一次国情咨文中宣布「放蒋出笼」（unleashing Chiang）政策，此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逐步加强，最终签订条约，美国公开承担防卫台湾的义务。一九六一至六三年，美国总统甘迺迪改变前政府的「放蒋出笼」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要求，并收缩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
27. 《光荣与梦想：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社会实录》，美国着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全书对从大萧条到水门事件的四十年间的美国社会做了详尽的描述，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
28. 出自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29. 多瑙河联合公国大公库扎（Alexandru Ioan Cuza, 1820–1873），出身摩尔达维亚贵族。在拿破崙三世主持的解决两公国问题的一八五八年巴黎会议上，列强确认两公国有权实现联合，随后库札被选举为联合公国大公。他在执政期间进行各项改革，加速罗马尼亚的近代化，但也因此引发地主及中产阶级的不满，一八六六年被迫退位后流亡海外。
30. 奥古斯都．洛里昂（August Treboniu Laurian, 1810–1881），罗马尼亚歷史学家、语言学家。出身于奥地利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天主教神职人员家庭，曾参与一八四八年革

命。他是「拉丁学派」（该学派主要起源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主要代表人物，认为罗马尼亚人是纯粹的罗马人，其歷史自罗马帝国至今未有中断。洛里昂以西元前七五三年罗马建城作为罗马尼亚史的起点；同时他还编纂史上第一部《罗马尼亚语词典》，提倡「罗马尼亚语」的「纯洁化」，即系统去除瓦拉几方言中的非拉丁成分（主要是斯拉夫语），尽可能地使其接近拉丁语。↩

31. 亚歷山德鲁．迪米特里耶．克塞诺波尔（Alexandru Dimitrie Xenopol, 1847–1920），罗马尼亚歷史学家，生于雅西（其父为英裔归化东正教徒）。一八八三年起任雅西大学教授，主要着作是六卷本《图拉真占领达契亚时的罗马尼亚史》，力主罗马尼亚人起源于罗马人的理论，后经其门徒阐扬，成为罗马尼亚的正统歷史学说。↩
32. 多瑙河两公国实现联合后，遭到奥地利和奥斯曼的反对。但库札大公依靠法国皇帝拿破崙三世的支持，于一八六二年二月五日，两公国政府正式合併，对外改称「罗马尼亚联合大公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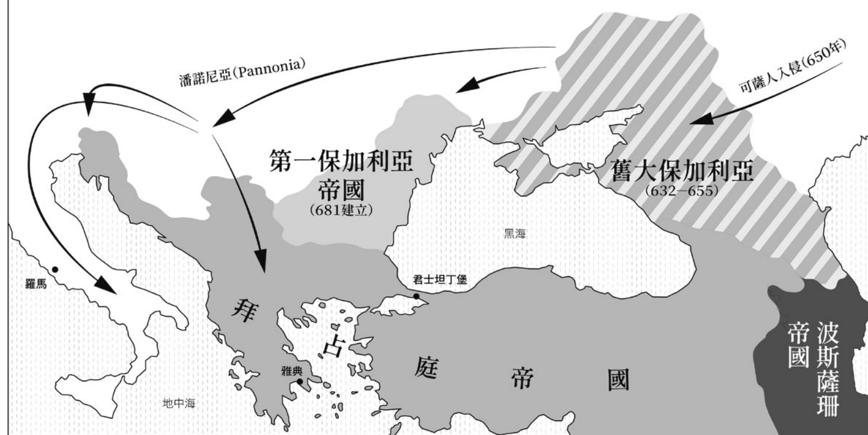
保加利亚

「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保加利亚
Republic of Bulgaria
Република България
独立时间：1908年10月5日
首都：索菲亚

我们今天讲保加利亚的民族发明。保加利亚民族发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像罗马尼亚，把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定义的希腊人发明成为一个跟希腊和奥斯曼都毫无关系的新民族，而且这个发明还追溯到希腊人的传统敌人和最痛恨的内亚蛮族身上去了。这就好像是大清国治下的十八省、大清国意义下的汉人臣民，在发明民族的时候不把自己发明成为大清国臣民或者奥斯曼人，也不把自己发明成为「汉族」或者十八省人，而是要把自己发明成为「鲜卑人」或者「沙陀人」[1]。这是民族发明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



中世纪早期的保加尔人迁徙图　来自内亚的保加尔人于中世纪早期开始进入欧洲，其中一支定居于多瑙河下游两岸地区，先后建立第一和第二保加利亚帝国，核心统治区约相当于今天的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地区。

我们先要提一下「保加利亚」这个词的来源。首先，「保加利亚」这个词源于「保加尔人」[2]，但是保加尔人跟今天保加利亚的居民和产生保加利亚民族的这些居民的关系是非常微小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歷史上的沙陀人和鲜卑人跟今天的山西人的那种关系。歷史上的拜占庭帝国很像是东亚的大明国，在国势衰弱的情况下，经常受到来自内亚的各支蛮夷的入侵。这些蛮夷包括后来推翻了大明国的满洲人，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包括突厥人的一些近亲，阿瓦尔人[3]、保加尔人等等。从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角度来看，你们全都是突厥人和蛮族。从东方、从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进来的那一拨是东虏，是奥斯曼人、卡拉曼人[4]和塞尔柱人，他们是突厥人的不同分支；从西方进来的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从巴尔干那个方向入侵的，也是突厥人的另一些分支，他们的首领最初也是叫做可汗的。对于拜占庭或者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来讲的话，东虏和西虏没什么区别，都是蛮族。

相当于大明皇帝的拜占庭皇帝对付这些东虏和西虏的办法也不外乎是以下这几种。国势强盛的时候，就像永乐皇帝和巴西尔二世皇帝那样带兵出征，渡过绝漠，深入各路突厥人的大本营去打他们，俘虏一万五千人，把他们的眼睛戳瞎，诸如此类，尽可能地杀一批；在自己国势衰弱的时候或者皇帝不能打的时候，那就像是大明国的正统皇帝（明英宗朱祈镇）或者尼基弗鲁斯皇帝[5]一样，率兵绝漠，本来是想要打垮这些游牧民族，结果自己反而被游牧民族俘虏，甚至脑袋都被砍下，头盖骨

做成游牧民族喝酒的酒杯，遭到很惨的下场。一般的情况下，大明皇帝是不敢出塞作战的，是守在北京城里，等着东虏和西虏从东面南下或者从西面南下，把北京城包围起来，然后凭着城墙固守，守到一定时间以后，用子女玉帛去收买这些蛮族，让他们拿着金钱和美女赶紧滚蛋，等他们滚蛋了以后，自己再继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那种生活。而国内的希腊知识分子当然是痛心疾首，像「陆游」和「辛弃疾」那些人一样，一面痛骂蛮族的可恶，一面痛骂自己不争气。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打不赢的。出兵绝漠、像巴西尔皇帝那样打胜仗的人是极少数，甚至像正统皇帝和尼基弗鲁斯皇帝那样能够率兵出关打仗的人也是少数。六成以上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就像大明皇帝那样，是採取缩头乌龟政策、採取子女玉帛政策去对付东虏或者西虏的。

当然比较积极一点的人就会想到，我们可以「以夷治夷」，唆使东虏来反对西虏，或者唆使西虏来反对东虏，这样我们大明就处在有利的位置上了。所以大明国在万历年以前，西虏（也就是蒙古人）是北京城主要的威胁，大明就经常把女真人武装起来，让他们去反对蒙古人；万历年间以后，女真人把自己发明成为满洲人以后，东虏的威胁超过了西虏，于是袁崇焕之流在崇祯皇帝的领导之下就每年花三十多万饷银去收买蒙古人，把蒙古人武装起来去反对满洲人[6]。总之这就是「以夷制夷」。在拥有高度文明但是已经没落的帝国看来，自己既然已经不能打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以夷制夷」。当然满洲人入关——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就是东方的奥斯曼突厥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以后，西方的保加尔人就完全没戏了。满洲人不仅征服了十八省，而且也征服了蒙古，把大明国的全部江山都给接管了。在君士坦丁堡也是这样的，东虏奥斯曼人不仅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而且征服了整个巴尔干，把大明国过去的版图和过去侵略大明国、使拜占庭皇帝无法应付的这些蛮族也都统统给征服了。

从血统上来讲，巴尔干半岛的居民在拜占庭皇帝统治时期一次又一次遭到各种蛮族的入侵，入侵的蛮族当然不是全都走了或者全都死了，有一部分血统也是留下来了，但是无论在哪个地方，蛮族的血统都不是最多的，最多的血统还是斯拉夫—希腊人的血统。同时，保加尔蛮族跟入侵帝国的所有蛮族一样，它的分布也是不平均的，在多瑙河外的地区留下来的蛮族遗民比较多，在南方马其顿留下来的蛮族遗民就比较少，

中间的部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也就是说，如果真要从血统来讲的话，古代保加尔人的血统主要是留在今天的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境内的，留在今天的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境内的反而是比较少。结果，十九世纪民族发明家的操作结果就造成了一种非常滑稽的现象：今天的保加利亚人把古代的保加尔突厥人发明成为自己的祖先，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境内都属于罗马尼亚（鲁米利亚）行省；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这个词给自己命名，但是实际上，歷史上的保加尔人的血统主要是留在罗马尼亚的。结果等于是中古时代的「保加利亚」主要变成了现在的罗马尼亚，而中古时代的「罗马尼亚」主要变成了现在的保加利亚。

当然等到大清国──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韃子皇帝渐渐衰弱的时候，十八省的东正教希腊人开始起了贰心、开始企图「驱除韃虏、恢復中华」的时候，今天的罗马尼亚、今天的保加利亚和今天的希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们都在希腊东正教的教育家和新文化运动者的活动之下学同一种白话文，参加了同一场「辛亥革命」。在这场一八二一年的「希腊辛亥革命」当中，我在关于第一、二讲也曾经讲过，今天希腊人的祖先、今天罗马尼亚人的祖先和今天保加利亚人的祖先全都站在了希腊民国一边，参加了希腊民国的革命军。今天保加利亚人的祖先，在哈吉．米哈尔和哈吉．赫里斯托这些军官的领导之下投靠了希腊革命军，包括瓦拉几亚大都督亚歷山大．伊普斯兰提斯。他就是我在罗马尼亚那一讲中讲过的，当时他自以为自己是希腊人，他以为自己是希腊革命军的大都督，并不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独立军」的大都督。投靠他的今天的保加利亚人的祖先，哈吉．米哈尔和赫里斯托这些人，都是他麾下的军官，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希腊革命军的民军都督麾下的人马，并不觉得自己是另一个国家、发动的是另一场革命。

但是无论如何，正像我在上一讲提到的，自称是希腊革命军的一个分支的伊普斯兰提斯被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打垮了，不得不逃走。归附他的这拨人，同样是讲希腊语的这拨未来的、还没有发明的保加利亚的革命先驱者，也被奥斯曼人赶得四散。然后列强进行干预，我不必重复这部分的内容。干预的结果是，南方的小希腊在英法俄列强的保护之下脱离了奥斯曼帝国，北方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被沙皇俄国的军队占领了，中间的、组成今天保加利亚的「罗马尼亚行省」又回到了奥斯曼苏丹的统治之下。但是奥斯曼苏丹在列强的压

力之下宣布「维新变法」，照我们的话说就是实行「满汉平等」，用奥斯曼主义取代「八旗主义」。「八旗主义」的意思就是，只有满蒙八旗才能够做大官，你们这些被征服的大明国的臣民、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只能做臣民或者做小官。奥斯曼主义的意思就跟梁启超提倡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以后大清国的臣民不分满汉，都是同一个「中华民族」了，以后无论你是十八省的被征服者还是关外的八旗征服者，以后都可以平等做官了。

奥斯曼帝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在列强的压力之下、在本国的改革家的推动之下推动奥斯曼主义，也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歷史上的旧帐我们就不算了，过去无论你是突厥的征服者还是希腊的被征服者，无论你是满人还是汉人（突厥人和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意义也就非常精确地相当于满人和汉人在明清两代帝国当中的意义），无论过去是谁亏欠了谁，我们从此以后都向前看，今后我们都是奥斯曼帝国平等的公民了。这样一来西方列强也会感到满意，说我们有「改革开放」的诚意。同时，你们这些希腊人也不要继续闹革命了。你们以前闹革命是因为在我们奥斯曼帝国当中只有穆斯林才能够做「帕夏」、做大官；现在呢，我们实行奥斯曼主义以后，你们无论是希腊人、阿拉伯人还是什么人，任何人都可以做「帕夏」、做大官了。然后我们把奥斯曼的苏丹改成立宪君主制，像康有为和梁启超设想的那样，一切权力都交给「帕夏」和大臣，将国体改成「虚君共和」。那样的话，你们希腊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你们辛辛苦苦革命是为了什么呢？革命不就是为了自己当家作主吗？现在你们留在帝国境内，你们一样能当首相，那你何苦还要独立呢？这就是奥斯曼帝国推行奥斯曼主义的基本动机。

推行奥斯曼主义的一个副作用是，包括奥斯曼帝国的「罗马尼亚行省」（也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在内的所有地方，苏丹以后就要让东正教希腊人来做官了。从鞑子皇帝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你们应该满意了。但是对于罗马尼亚行省革命失败以后留下来的这些人来说，他们就看到目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本国的菁英阶级，过去都是在希腊新文化运动当中讲白话希腊语、后来参加革命的这批人，一下就分成了三拨。一拨人跟着瓦拉几亚人跑到希腊去了。这些瓦拉几亚人虽然按照我们现在的定义来讲是罗马尼亚人，但是当时的瓦拉几亚人也是自以为自己是希腊人的。这就好像是，一九一二年和一九四九年的湖南人也以为自己跟一九四九年的台湾人一样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跑

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去做官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我上次提到过的希腊首相科莱蒂斯，他在近代希腊史上的意义就相当于是台湾的「马英九」，他是希腊的「伟大理想」或者「反攻大陆」的发明者。他的理论就是，雅典不是我们希腊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才是我们希腊的首都，我们在雅典只是为反攻大陆做准备而已，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在小小的希腊搞建设，而是在为未来的反攻大陆做准备。当然这拨湖南人在反攻大陆的过程中还有极大的用处，所以我首先就要把官爵留给他们。

科莱蒂斯是近代希腊政党分赃制的主要发明者。按照今天台湾的说法就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就是「台湾黑金政治」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受益者。黑金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裙带关系，一方面在英国人的压力之下，我们必须在名义上至少要实行民主、实行议会政治，不是国会选出的政府，英国人不会承认，英国人不保护我们，我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但是实际上，尽管我们已经混到台北来了，但是我们要把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都垄断在湖南人手里面，让台湾本地人、让台南的阿公阿婆得不到政权。这个办法当然就是，名义上要实行议会政治和选举，实际上就要用「分赃政治」、「恩荫政治」的方法，把大部分职务通过地下的黑箱操作和腐败运作保留在逃亡台湾的湖南难民手中，对于希腊来说就是保留在流亡到希腊的瓦拉几亚难民手里面。这一套，今天的台湾人无疑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希腊民国」的歷史上是原封不动地上演过一遍的。当然跑去台湾的不仅仅是瓦拉几亚人，还有「罗马尼亚行省人」──也就是当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今天的保加利亚人。正如跑到台湾去的不仅仅是湖南的「马英九」，自然还有一拨广东人、江苏人、浙江人，这些人都跟着湖南人「马英九」到台湾搞黑金政治去了。保加利亚的菁英当中有一部分就是这样，跟着跑到台湾去的湖南人一起跑到了希腊，到雅典去搞黑金政治去了。

第二拨保加利亚的菁英，随着进占今天的罗马尼亚（当时的瓦拉几亚）的俄国军队，跑到俄国军队那里去寻求庇护了。他们希望，俄国人毕竟是东正教徒，希望俄国人有朝一日替他们报仇雪恨。然后这些人当中又有一批人进一步搞他们的院外游说活动，索性就跑到俄罗斯去了。请注意，当时的希腊人包括奥斯曼帝国的所有希腊人的臣民，也就是今天的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全都包括在内的。他们就跑到敖得萨或者圣彼得堡去筹款或者是去游说沙皇去了。这一拨

人的地位就很像是清末的梁启超和今天纽约和华盛顿的民运人士。他们认为，他们无论是湖南人还是广东人，只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在国内争取民主的事业混不下去了以后，他们就跑到华盛顿来，一方面要游说纽约的华侨给他们捐钱，好把他们的革命事业继续推动下去，一方面又想到华盛顿去游说美国的政治家，希望美国的政治家支持他们。这些人跑到俄国人的瓦拉几亚占领区和俄罗斯帝国本身去，就是去干梁启超时代和今天的民运人士干的这些事情。

第三拨菁英是罗马尼亚行省的菁英中最差劲的，因为比较有能耐的人都跑路了。有资本跑路的人就是比较有能耐的人，正如在「一九四九大江大海」的时候，能跑路的人就是比较有钱、比较有知识、比较有能耐的，没啥本事的人就只有留下来、无可奈何地迎接共产党了。一八二八年跑路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的，比较有本事的人去了俄国或者希腊，比较没本事或者比较穷的、阶级地位相对比较低的人就无可奈何地留在罗马尼亚行省内部继续做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但他们还是可以对奥斯曼帝国本身的改革开放抱有一定的指望，希望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自己的体制能够逐渐改良，使他们在不必脱离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下多多少少能够获得更好的地位。

对于「罗马尼亚行省」的居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够彪悍善战。这个问题是属于民风问题。我在第二讲曾经提到过，罗马尼亚有很多地方是土司领地，奥斯曼帝国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才把他们改土归流，所以他们的民风彪悍善战。这就是为什么在希腊民国的独立战争当中，今天的罗马尼亚人（当时的瓦拉几亚人）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的缘故。你只要想一想黄兴、何键之流的湖南人在辛亥革命和国共战争中发挥了多少作用，就可以看出来了。湖南人是湘西土司的后代，蛮族的作风还在，彪悍善战的作风还在；但是比如说换到成都或者苏州，那就不行了，当地是比较肥沃的平原地带，民风懦弱，不大善战，就算是当了军官的话，也是比较小的军官。当时的罗马尼亚行省（今天的保加利亚）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当地是巴尔干半岛上肥沃的平原地区，在农业时代比起其他贫困的山区是更加富饶的，但是在工业时代，因为受落后的农业经济拖累，反而变成了最穷的地带。而且无论如何，平原人平时不习武、不好战，无论你是站在哪一方，都很难当上高级军官。

一般来说无论是在瓦拉几亚、在希腊还是在俄罗斯，他们即使是在流亡者的团体当中也都占不到优势地位。无论在奥斯曼帝国变法维新之

前还是以后，他们在奥斯曼政治体制当中占到的地位都是非常边缘的。这跟他们比较密集的人口和沉重的赋税相比很不相称。这样一来，海内外的罗马尼亚行省菁英（也就是现在的保加利亚菁英）不得不开始在一八三〇年以后陆续反思：我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压迫我们，甚至希腊人也压迫我们？这个说法就相当于是山西人开始反思：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山西人为什么仍然是最穷的？为什么广东人得到的好处我们都得不到？满洲帝国已经推翻，鞑子皇帝已经变法了，说是大家都是「汉族」，我们山西人也是「汉族」，河南人也是「汉族」，广东人也是「汉族」，为什么我们山西人还是要这么吃亏？这样一来我们就要重新考虑，我们做「汉族」是不是非常有利的，我们遭受歧视是不是因为我们根本上就不是「汉族」的缘故。

这时，下一波民族发明就开始应运而生了。大体上讲，流亡到台湾的那一批罗马尼亚行省人（也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人）跟着流亡到台湾的瓦拉几亚人一起，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就渐渐被同化成为希腊人了。这主要是因为希腊人在英国人的保护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国家的规模的缘故。他们至少有了形式上的议会政治，使他们的政治归属感得到了保证。但是留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和跑到沙皇俄国控制区的那拨人，在他们所处的处境当中，就像是今天留在南京的汉人和跑到纽约的汉人一样，他们痛切地感到，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仍然是异乡人，仍然不是国家的主人。如果是跑到台湾去的话，可能过几代以后他们就会觉得他们自己已经是台湾的一部分，是李登辉所谓的「新台湾人」[7]，跟台湾本土人差别不大，可以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保加利亚的民族发明是在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尼亚行省的希腊东正教徒当中产生的。

第一个保加利亚的民族发明家是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乌克兰的学者尤里．维涅林[8]，他编纂了歷史上第一部保加利亚史。保加利亚史当然是歷史发明学的产物。歷史上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一八四〇年左右，当时生活在今天的保加利亚的居民对歷史上的保加尔人的看法，就跟明清两代的十八省的汉人对沙陀人、鲜卑人和其他蛮族的看法一样，觉得你们跟土耳其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希腊东正教徒今天虽然软弱、被你们征服了，但是我们还是文明人，你们都是蛮子。无论你们是东虏还是西虏，你们都是我们的敌人和蛮子。你们动不动就要入关烧杀抢掠一阵子，我们是拿你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恨你们的。维涅林的发

明是歷史上第一次把中古的保加利亚和近代的罗马尼亚行省的希腊东正教徒联繫起来的学说。这个学说如果放到远东就会变成这样：有一位研究山西文化的日本人写了一本书说，今天的山西人跟明国的汉人、清国的汉人和中华民国的汉人都不一样，他们是歷史上的沙陀帝国的李克用、石敬瑭的后代，他们建立了晋国，跟由大宋和大明产生出来的汉人不是一家，你们不要欺骗他们。你们过去歧视和压迫他们，现在仍然歧视和压迫他们。他们现在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不仅仅是由于满洲皇帝的缘故，而且也是因为你们十八省的汉人是在欺骗和压迫他们。他们不和你们汉人是一家，他们是来自伊朗的雅利安人后代，因为沙陀人是歷史上的白种人。你们奥斯曼突厥人是东虏、是野蛮落后的蛮族，你们十八省的汉人是腐败没落的东亚人，而他们山西人是晋国人，是歷史上的雅利安伊朗人，跟欧洲的雅利安人是同种，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创造者。所以他们只要摆脱了你们，就可以创造出嶄新的文明。

维涅林那部书的要点也就是这个样子。未来的保加利亚人——今天的罗马尼亚人跟你们其他的希腊东正教徒不一样，他们是保加尔蛮族的后代。保加尔蛮族跟建立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蛮族是一家，跟你们腐败的东方蛮族——像奥斯曼人、卡拉曼人、罗姆人、塞尔柱人完全不一样。你们那些东方的蛮族简直就跟黄种人没有什么区别，给欧洲带来的除了野蛮、破坏和倒退以外没有别的；但是他们这些跟俄罗斯人、跟瑞典人、跟乌克兰人一家的西方的蛮族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给腐败的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带来了新的生命。正如着名的西方中心论者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一切自由都来自于西方的蛮族」[9]，他们是西方的蛮族的一支，跟你们希腊东正教徒、拜占庭帝国的东方顺民后裔不是同一家，跟奥斯曼所代表的东方蛮族也不是同一家。东方的蛮族是歷史上的破坏者，十分万恶不赦，东方的顺民是歷史上的腐蚀者，同样也十分万恶不赦。他们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没有认清自己真实的歷史地位。他们跟俄国人、德国人和西方的蛮族才是一家的，保加尔人也是西方的蛮族，跟日耳曼人和建立俄罗斯的那些瑞典人是同一家的。这样一来，他们只要恢復本来的歷史地位，马上就可以进入西方大家庭，实现脱亚入欧的伟大梦想。

当然这一套学说从考证的角度来讲是很成问题的。歷史上的保加尔人跟阿瓦尔人亲缘关系非常近。按照当时的流行观点，阿瓦尔人就是在东方史籍中曾经把北魏打得很惨的那一拨柔然人。柔然人和沙陀人从血

统和肤色上来讲都是白种人，但是从语言和文化上来讲，他们毫无疑问和奥斯曼人一样都是来自中亚的。而且，建立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人虽然是突厥人，但他们其实也不是黄种人，也是白种人。如果真要按照种族主义的方式来搞的话，你真的很难说西虏保加利亚人和东虏奥斯曼人有什么区别。但是民族发明这玩意儿跟考据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有一滴水就可以吹出一个肥皂泡来，只要「罗马尼亚行省」居民当中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保加尔蛮族的血液，而歷史上的保加尔蛮族跟欧洲的雅利安人有那么一丁丁点的共同血统，哪怕它百分之九十的血统都跟东方的突厥人是一样的，只要有百分之十的血统跟西方的蛮族是一样的，你就拦不住歷史发明家一定要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跟俄罗斯人是一家，跟西方的蛮族是一家，跟你们拜占庭人、跟你们希腊人不是一家」。无论如何，他就这么重新发明了保加利亚的民族史。

但是这套民族史只是民族发明的第一步，还需要有人替他把这一套新发明的、当时还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保加利亚民族史」加以推广。这下就需要一批负责推广保加利亚发明的二级民族发明家。或者准确地说，他们是教育家。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博兹维利[10]。博兹维利本人也是讲着希腊语长大的，但是他觉得新产生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非常好。他是留在奥斯曼帝国辖区内的那一拨保加利亚人的新一代菁英，很希望替他自己的家乡找出一条出路来。他看到乌克兰人维涅林发明的这一套新的保加利亚歷史，就觉得很好，很有必要拿来推广。但是跑到保加利亚去推广的结果是，大多数罗马尼亚行省的居民、他企图发明成为保加利亚人的希腊东正教徒都认为他是神经病。他折腾了一阵子以后就拍拍脑袋，想出一个办法：我们奥斯曼帝国不是现在已经「变法维新」了吗，现在我可以到君士坦丁堡去，向苏丹、向鞑子皇帝请愿。鞑子皇帝不是下诏说「以后满汉平等，汉人已经获得自治权」了吗，既然汉人可以获得自治权，我们「晋人」难道不能获得自治权吗？我们「晋人」不是汉人，鞑子皇帝已经允许汉人自治了，我们也可以去要求允许「晋人」自治。

于是他就一路跑到君士坦丁堡去，向苏丹陛下、向鞑子皇帝上了一封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就是：「我们保加利亚人自古以来不是希腊人。苏丹陛下已经允许希腊人自治了，请你根据允许希腊人自治的同样方式，允许我们保加利亚人自治。」苏丹看到这分请愿书以后就拍了一下脑袋，搜索了一下脑袋，做了一下调查研究，想想「保加利亚人」到

底是些什么人？然后就想起来了，在我们的祖先征服大明国的时候，同时还有一批蒙古人也入了关，想跟我们争夺大明江山，我们的祖先把这批蒙古人给杀得一塌糊涂，这批蒙古人的名字好像就叫保加利亚人。但是我真没想到，十八省的汉人当中还有一些人宁愿做蒙古人的后代、做沙陀人的后代，而不愿意做满洲人或者做汉人。这事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很新鲜的，而且这纯粹是给我添麻烦。

我们奥斯曼帝国在西方人面前始终是处在被误解、被压迫的状态，我们过去的「八旗制度」其实也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西方人往往诽谤我们，说我们「一党专政」非常黑暗，非常落后，是纯粹压迫性的，但其实不是这样呀。你想想看，英国保守党如果竞选胜利了，它会不会让自由党加入内阁呢？显然不会呀，只有保守党人才能当大臣。但是这并不能说是保守党压迫了英国人，因为任何英国人只要你愿意加入保守党，你就可以加入保守党，加入了保守党以后，那么在胜利的保守党内阁当中你就可以做大臣了。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加入保守党，非要加入自由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能说是保守党压迫了你、英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吧。

虽然我们鞑子皇帝是穆斯林鞑子征服了大明国的产物，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们压迫了那些东正教臣民呀。我们穆斯林鞑子也就相当于是英国的保守党，我们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呀。任何希腊东正教徒，只要他愿意改信伊斯兰教，他都可以变成我们穆斯林，我们穆斯林是天下一家的，变成我们穆斯林以后，也就可以变成我们「八旗」的一员，变成我们的帕夏和大臣。我们帕夏虽然都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如果查血缘的话，有很多都是原来的希腊东正教徒、甚至是西方的义大利人和匈牙利人改信伊斯兰教过来的。只要你改信伊斯兰教，照样可以在我们奥斯曼帝国的「八旗」当中做大臣。所以我们的伊斯兰教统治、我们的「八旗」统治也是一个开放统治，跟你们的保守党没啥区别。但是你们那些吃饱了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西方人就喜欢折腾我们东方人，一定要说我们的「八旗制度」是一个压迫性的专制制度，我们没有办法，好吧，我们就听你们的话，变法变法！从此以后满汉一家，你现在连改信伊斯兰教都没有必要了，你现在就是一直当希腊东正教徒，你也照样可以做帕夏和大臣，我是说话算话的。

现在你们本来是应该完全满意的，结果说着说着又跑出来一个「晋人」。你一个希腊东正教徒，本来现在你不用改信伊斯兰教就可以做大

臣了，你根本就不用这么折腾，但是你偏要折腾一下，说你不是「汉人」，你是「晋族人」，是沙陀人的后代，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你做汉人就已经可以做大臣了，我没有压迫你呀，并不是说你要发明一个「晋族」以后才能做大臣，这不纯粹是给我添乱吗？但是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要让英国人和法国人看到，我们是自由民主的，我不会迫害你们。你们山西人愿意做「汉族」还是愿意做沙陀族还是愿意做「晋族」，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跟我们满人没有关系。我请英国人来给我们做见证，我没有迫害你们。无论你们「汉人」也好，「晋人」也好，「齐人」也好，「蜀人」也好，我都没有迫害你们。你说你自己是「汉人」，你就做汉人好了；你说你自己是「晋人」，你就做晋人好了。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让你们的其他人同意。只要所有汉人都愿意承认你们是晋人，那我是没有意见的，这关我们鞑子什么事情？我们满洲人才不在乎你们山西人是晋人还是汉人呢。只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想知道，你们这拨目前自称为「晋人」的山西人到底有多少？

然后山西民族的发明家就这样回答说：「今天我们山西有几百万人口，自称为『晋族』的人大概有五百多人，其中有一半人正在东京和纽约流亡，有一半人正在太原和大同办教育。我们希望再过三十年就把『晋语』普及，取代汉语，使全体山西人都相信我们是『晋语』的后代而不是『汉语』的后代。」苏丹听了就回答说：「好吧，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你就去普及你的『晋族』去吧。我们没有迫害你，但是如果汉人迫害了你，那也不关我的事情。」[11]于是我们的「晋族发明家」——也就是保加利亚发明家就带着他的同道，跑回到当时的罗马尼亚行省（今天的保加利亚）境内去开始大办学校，普及他们新发明的保加利亚语。其实保加利亚语主要就是一种带一点突厥化的斯拉夫方言，跟罗马尼亚语和希腊语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按照十九世纪希腊主义者的标准来看，其实也就是不同的方言。但是无论如何，他说这是一种语言，那就是一种语言了。他纠集了几百个发明家，就开始到保加利亚、到乌克兰、到各处去办新兴的保加利亚语学校，在新兴的保加利亚语学校当中推广他们新编的、刚刚发明出来的保加利亚歷史。

由于当时希腊东正教范围的学校有很多是教会办的，有一部分是像「蔡元培」这样的开明知识分子办的，是世俗的学校，有一部分是希腊东正教办的学校，所以民族发明家的战争就在这两部分展开。一方面，一拨民族发明家在办新的世俗学校，这些世俗学校直接就用的是保加利

亚语，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就是第一代保加利亚人；另一方面，还有一拨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们就到东正教希腊人的教会开办的学校里面去做老师，在这些学校里面，利用别人的学校宣传自己的主义，企图把他自己的学生教成未来的保加利亚人。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地就跟原来把持教育系统的东正教希腊主义者产生了冲突。所以保加利亚的中学课本一般都把这个时期的希腊主义者——把持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语学校的希腊东正教教会领袖和教育领袖，当成是奥斯曼苏丹的帮凶和保加利亚民族发明的天敌。

实际上这批人起的作用也就像是今天的国民党人一样。他们的理由是，你们山西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是「汉族」，你们的爸爸曾经跟我们并肩战斗过，怎么到了你们儿子一辈就异想天开发明出一个「晋族」的概念来跟我们作对呢？我们目前被满人打倒了，但这是暂时的，反攻大陆的工作还在继续准备之中。沦陷区方面，我们虽然没有掌握政权，但是我们掌握了教育权。我们虽然不能够夺取政权，但是我们还可以办学校，继续推广「辛亥革命」的理念。只要广大的学生都学汉语、讲汉语，鞑子皇帝是非常孤立的，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把他赶出去的，把君士坦丁堡、索菲亚（Sofia）、特尔诺沃（Tarnovo）[12]和所有地方都收復。你们山西人非要说自己不是汉人而是晋人，非要说自己是保加利亚人而不是希腊人，这简直是当了满人的帮凶，为我们的復国大业添乱，所以我一定要说你们是奥斯曼帝国的帮凶。但是实际上，这三者是三种不同的力量——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主义者、奥斯曼帝国境内和希腊境内的希腊主义者、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共产党、今天的「国粉」、今天的「诸夏」民族发明家[13]之间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并没有运用希腊主义者来压迫未来的保加利亚人，而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几百年内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一向是「满汉分野」的，一向是只知道有奥斯曼的穆斯林和希腊的东正教徒，所以希腊这方面比较古老的学校一般都是教会办的，出于歷史遗传方面的原因，他们一直是用希腊语（无论是过去的教会希腊语还是现在的白话希腊语）来教育他们的子弟的。而你们的保加利亚语，你们是在这一代人刚刚发明出来的，发明时间还不满二十年，所以就必须以进攻的方式去掌握这些学校。过不了多久，双方之间就自然要闹起来了。保加利亚派教师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子弟自称自己是保加利亚人，不能再接受讲希腊语的学校校

长和教会主教的统治。他们要求，我们自己投票选举，选出自己的主教和校长。然后双方的官司就打到君士坦丁堡的苏丹那里去，一连打了几十年。

在最初几十年之间保加利亚这一方面始终是打输的。歷史上讲，这些学校和教会一直是希腊人主办的。而且，就算是今天自称为保加利亚人的这一批民族发明家，铁证如山，他们自己的父亲和祖父也是自称为希腊人的。所以要想从希腊人手里面把学校抢过来，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最后他们做到的事情不是把希腊人的学校和教会抢过来，而是把希腊人的学校和教会都分裂了。愿意支持保加利亚的这批人分裂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学校，自称保加利亚的这一批东正教徒把教会分裂了，自己拉了一拨人出去，建立了保加利亚教会[14]；原来自称是希腊人的这一拨人继续搞他们的希腊学校和希腊教会。等于是当时的罗马尼亚行省（今天的保加利亚）境内，整个居民都分裂成为两拨，一拨想要把自己发明成为保加利亚人，另一拨想要继续把自己发明成为希腊人。

这种情况你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台湾和今天的香港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过去有一拨台湾人想要把自己发明成为「台湾民族」，一拨人想要把自己发明成为「中华民族」。今天则有一拨香港人想要把自己发明成为「香港民族」，一拨人想要把自己发明成为「中华民族」。从一九八〇年代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台湾的情况已经基本明朗化了：想要自认为是中国人的这一拨人的人数直线下降，下降到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地步；以「台湾人」自居的这拨人从百分之三十几的起点一路上升，现在变成绝大多数人都自认为是台湾人。保加利亚境内的民族发明也是按照类似的方法展开的。一八四〇年前后，双方的分裂刚刚开始；到了一八七〇年左右，双方的优劣已经很明显了，「保加利亚民族派」在人口方面、在教育方面、在文化宣传方面都占了上风。

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方面，保加利亚方面的作家学习德国浪漫派，在民谣收集方面占了上风。通过民谣收集，吸收民间的土语，用源头活水的方式活化保加利亚的语言，使他们在语言发明方面明显占了上风。希腊主义者就像是今天台湾和香港的国语支持者一样，尽管他们已经进行了一次文学改良，用胡适之的白话希腊语来取代过去的古典希腊语和教会斯拉夫语，但是白话希腊语仍然背着很沉重的书面文字的包袱。最大的问题就是，白话希腊语必须让君士坦丁堡人、伊士麦人、布加勒斯特人、特尔诺沃人和雅典人全都能够看懂，这样一来，它就没有

办法充分吸收各地的方言。能够让所有方言的使用者都能看懂的文字，必然就是一种哑巴语言。而新一代的通俗希腊语的发明家、新保加利亚语言的发明家、新罗马尼亚语言的发明家、新塞尔维亚语的发明家和新克罗埃西亚语的发明家都占了一个便宜：他们可以完全把苏格拉底和君士坦丁大帝的歷史包袱抛掉，就从源头活水、就从我们现在的人使用的方言、从台南的阿公阿婆的方言发明成为通俗希腊语，把白话希腊语踢到一边去。特尔诺沃的阿公阿婆发明的方言就是新保加利亚语，也把古典希腊语、教会希腊语和白话希腊语扔到一边了。塞尔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当然也是如法炮制。

今天的山西人如果用自己的山西方言来发明新的语言的话，也可以把大明国使用的文言文和胡适之使用的白话文统统踢到一边去，把自己的山西方言发明成为新的「晋语」。如果他们按照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的同样方式去建立自己的「山西晋语学校」、跟讲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汉语学校竞争的话，它也可以占到一个重大便宜，这个便宜就是，他们讲的是阿公阿婆的活语言。而无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是只能看不能说的哑巴语言，不是你在卡拉OK的时候、在打牌的时候、在夫妻闺房里面使用的日常语言。日常语言的生命力是要靠不断产生的、地下不断地涌出新的泉水来补充它，通过民谣、民谣、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补充它。

结果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在一八六〇年和一八七〇年之间，保加利亚语的新文化运动在文学创作这一方面明显胜过了白话希腊语，当然更胜过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使用、像拉丁语一样快要死去的教会斯拉夫语和古典希腊语。教育方面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政治方面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会发生黄之锋的「反国教运动」[15]，而台湾会围绕着中学课本、文言文的存废、文言文的比例问题、台语教育的问题、各种方言教育的问题不断产生争议的缘故。你用什么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就等于是发明了什么民族。保加利亚语言发明家和保加利亚歷史发明家在学校教育这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预示了「罗马尼亚行省」的未来将会属于他们，但是最后的临门一脚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你们只能争教育权，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奥斯曼苏丹就要镇压你们。在海外，情况比较好。侨居海外的希腊社区，一八二一年时还完全以为自己是希腊人，但是到了一八四〇年以后就已经分裂了。比如说，敖得萨的希腊人在一八二一年的时候都认为自己是希腊人；到一八四〇年的时候，就有一拨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希腊

人，另一拨人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第三拨人认为自己是塞尔维亚人，第四拨人认为自己是保加利亚人，然后他们各自组织自己的海外军团，分别搞自己的復国大业。希腊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尽管他们满口都是苏格拉底、伯里克里斯和君士坦丁，但是他们必须两线作战，一面要反对奥斯曼帝国，一面又要跟自己社区内部的塞尔维亚发明家、罗马尼亚发明家和保加利亚发明家斗来斗去，而他们所能够依靠的支持只有一个小小的希腊。所以「独派」比「统派」占便宜，「统派」必须维持现状，而「独派」呢，只要他们自己独立、拉一拨人分裂出来建立独立的社区就行了。

到了一八四〇年代，敖得萨、瓦拉几亚这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流亡社区，这些流亡社区的父辈都还自以为是希腊人，甚至是「希腊辛亥革命」的主要参加者和革命功臣，但是他们的儿子一辈就已经认为自己是保加利亚人，在海外建立了保加利亚社区，并从保加利亚社区当中开始筹办保加利亚军团。这就是民族发明的第二步。民族发明的第一步是发明民族歷史和民族语言，第二步是建立海外社区。这个过程对于保加利亚人来说，在一八四〇年和一八五〇年之间基本完成。然后海外社区进入海外军团的准备阶段，保加利亚的革命家格奥尔基[16]登上歷史舞台。他本人出身于一个希腊语教育的家庭，舅舅是一八二一年以后「希腊辛亥革命」时期的着名人物奥尔基．马马尔切夫。我们不必讲详细内容，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以保加利亚人的海外社区（其实这些人也是希腊海外社区的第二代）为基础，建立了保加利亚的海外军团，然后带领这些海外军团打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每隔几年，他就要像歷史上的黄兴一样发动起义，他屡战屡败，但是还能屡败屡战。

每一次战败的结果都要牺牲几百名保加利亚的海外军团，但是好处就是，土耳其人在追杀他们的过程中间又要进行一场烧杀抢掠，然后西欧的报纸就要大肆报导一番：「土耳其人背信弃义，说好了要『维新变法』的，说好了要『满汉一家』的，现在看来你们又开始在屠杀东正教徒了。」同时最要命的就是，在这些报导当中，「保加利亚」这个词一再出现。可以说，一八二一年以前，土耳其人也在烧杀抢掠，但是这时候欧洲人的报导是这样写的：「万恶的穆斯林屠杀了我们的基督教兄弟，难道我们能够坐视不管吗？」一八二一年的时候，土耳其人一模一样地烧杀抢掠，这时西方的报导就是这样的：「万恶的土耳其人在屠杀我们的希腊兄弟，希腊人是欧洲文明的始祖，我们难道能坐视不管

吗？」到了一八四〇年以后，报导就变成这样了：「土耳其人在屠杀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难道没有人权吗？」其实土耳其人屠杀的是同一批人，只不过这批人的爷爷自称为东正教徒，这批人的爸爸自称为希腊人，这批人自己就自称为保加利亚人了。

但是西方的新闻记者哪里管得了这么多？他就直接了当地说「保加利亚人遭受迫害了，保加利亚人遭受迫害了」。这些新闻报导传到西方，就会产生像格莱斯顿这样的软心肠派和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这样的硬头脑派。硬头脑派就会说，「我们只管国家利益，不管什么人权民主之类的，只要奥斯曼苏丹跟我们好好做生意，帮助我们抵抗俄国人，我们才不管奥斯曼苏丹杀多少人呢。」软心肠派就要跳出来说，「无论保加利亚人还是阿富汗人，他们都是人呀，是人就要有人权，你还是基督徒吗？还算得上是自由民主的英国的堂堂大臣吗？你怎么能够坐视不管？」然后两派交替执政，最后的结果是列强又干预了。

虽然土耳其人每一次都打赢，但是他们在西方的舆论面前却日益被动，被西方舆论描写成为卑鄙的暴君，而保加利亚人则被描绘成为受害者。受害者不要紧，关键是受害者的身分由「希腊人」变成了「保加利亚人」，这实际上就是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已经成功了一半。就好像是，今天的西方报导动不动就要报导「伊拉克人杀了库尔德人」或者是「西班牙人镇压加泰隆尼亚人」，这样其实就是伊拉克人和西班牙人输了。

西班牙主义者和希腊主义者的逻辑就是，没有什么加泰隆尼亚人（Catalans），加泰隆尼亚人和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s）都是西班牙人，库尔德人和什叶派、逊尼派都是伊拉克人。西方舆论只要承认世界上有一种保加利亚人，而保加利亚人跟奥斯曼人和希腊人都不一样，其实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就已经赢了。他们只是还没有赢得统治权而已，但是已经赢得了民族得到承认的权利，至少是西方人已经承认了。

希腊主义者必须苦口婆心地去说服西方人：「你们说错了，这些人都是『台独分子』呀，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呀，你们怎么能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台湾民族』呢？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他们到处说什么『香港民族』，那都是胡说八道的。你要记住，香港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的一部分呀，香港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呀，香港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呀。」这样很累的好不好？西方人的报刊上不会说「共产党镇压了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香港人民的自由民主斗争」，这个多累、多别扭呀。它连「共产党」三个字都省去了，

它直接了当地说「中国人镇压香港人」。于是西方读者一看后发现「噢！原来中国人和香港人打起来了，中国人和香港人不是一家的」。于是「香港人」、「香港民族」的概念就在西方人的大脑里面扎下了根。

尽管希腊主义者苦口婆心地说保加利亚人根本就是我们希腊人，但是西方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印象：保加利亚人既不是你们奥斯曼人，也不是你们希腊人，否则为什么奥斯曼人镇压保加利亚人的时候你们希腊人从来没有出过兵呢？如果保加利亚人真是希腊人的话，那么你们希腊人怎么不帮助保加利亚人打奥斯曼人呢？如果保加利亚人真是奥斯曼人的话，那么你们奥斯曼人怎么会杀保加利亚人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说香港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那么共产党杀汉族的时候，你们台湾的国粉为什么不出兵去帮助你们的同胞呢？这说明你们不是一族的。如果你们共产党说「中华民族是一家，香港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报纸上总是说「中国人在镇压香港人了，中国人在镇压香港人了」？如果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的话，中国怎么会自己镇压自己人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听说过美国人镇压维吉尼亚人？这不可能吧，维吉尼亚人不就是美国人吗？所以美国人不会镇压维吉尼亚人，也不会镇压德克萨斯人。如果你说美国人和墨西哥人闹起来了，你自然会理解说美国人和墨西哥人不是一国的。如果你听说中国人和香港人发生冲突的话，你自然也会觉得香港人和中国人不是一国的。根据同样的逻辑，西方人就渐渐开始以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奥斯曼人都不是一国的。

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造成了不可逆的效果：虽然拉科夫斯基自己在率领海外军团打回奥斯曼境内的过程中间牺牲了，但是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却站稳了脚跟。海外军团的下一代，瓦西尔．列夫斯基[17]和赫里斯托．佩特科夫[18]随着他的脚步，率领海外军团再打回保加利亚，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这次就有很大的不同了。第一代保加利亚海外军团的领袖还是像拉科夫斯基这样，只会讲希腊语，保加利亚语都讲不俐落的；第二代保加利亚海外军团的领袖，像列夫斯基和佩特科夫这种人，就是从小讲保加利亚语、受保加利亚歷史薰陶长大的人了，对于他来说，希腊人就是完全的外国人。这就好像说是，「马英九」一代的台湾领导人、中华民国的总统，无论他是什么血统出身的，他至少是会讲国语的、会讲普通话的；但是再过二、三十年，新上台的台湾总统可能就

会是只会讲台语，不会讲国语，也不会讲「湘语」、「晋语」或者任何其他语言，歷史上的「希腊民国」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如果说「我父亲是希腊民国开国元勋」这一点对第一代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还有点影响的话，那么「我爷爷是希腊民国开国元勋」这一点对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

事情走到这一步，尽管保加利亚建国八字还没有一撇，它完全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但是实际上，未来的保加利亚民族和保加利亚民族国家已经处在必然诞生的状态，只等着下一次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而奥斯曼帝国出于我们都知道的原因，它那个地跨欧亚非的结构，那种复杂的语言文化结构，就使它会不断地遇到新一代的解体危机。就算你错过了这一次解体，不要紧，还会有下一次。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因为他们发明得比较晚，所以他们比我上次讲到的罗马尼亚民族发明家的机会要稍微差一点，他们错过了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次建国的机会。但是再过二十年，又有一八七八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俄土战争的逻辑和理由那是另外一回事。总之这次战争的结果又让奥斯曼帝国面临新一轮的解体，而这一次解体使得保加利亚人的海外军团得到了机会。列强再次干涉俄土战争，规定奥斯曼帝国必须允许今天的保加利亚（过去的罗马尼亚行省）自治。

在这个自治的过程当中，「保加利亚」这个词第一次在国际法意义上存在了。列强签署条约，强迫奥斯曼苏丹承认，保加利亚自治区必须由信奉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人自我治理。尽管这个保加利亚自治区在国际法意义上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奥斯曼帝国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保加利亚特区，但是保加利亚特区必须实行保加利亚人治保加利亚人，实行港人治港。仅仅是「保加利亚人治保加利亚」这个措辞写进了一八七八年柏林会议的国际条约，保加利亚的国际身分就算是得到确认了。以前没有「保加利亚」的，只有罗马尼亚行省。中古时代的保加尔人跟柔然人一样，它不是一个国际法上的实体。

今天你可以说，香港人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交涉实力，是因为《中英联合声明》[19]规定了港人治港的原则，所以香港在国际法意义上是一个半主权的实体。它虽然不是主权国家，但是它有了一定的国际法的身分。但是沙陀人就没有国际法的身分。尽管沙陀人在今天的后代可能比香港人要多得多，说不定沙陀人在山西的后代比今天香港的几百万居民数目要多得多，但是因为国际条约上不曾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沙

陀自治区，在沙陀人的地区实行沙陀人自治」，那么沙陀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就不能跟香港人相比。一八七八年的保加利亚人就处在沙陀人这种状态，尽管沙陀人的后代可以发明「晋民族」，说「晋族」跟「汉族」不是一家，而且能够使山西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只讲「晋语」不讲「汉语」，但是它在国际法上仍然是不存在的；一八七八年以后，它在国际法上存在了，它是一国两制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特区。

特区建立以后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统治机构了。虽然这个统治机构在名义上还是属于奥斯曼苏丹，但是它已经有了自己的宪法和议会，以后你就可以组织政党了，保加利亚于是就产生了自己的民族自由党和其他的党派。这些党派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万恶的港独党派」，他们视《中英联合声明》如废纸。尽管《中英联合声明》和《柏林条约》明确规定如同香港的保加利亚只能自治不能独立，但是他们在土耳其的保加利亚特区的议会选举中间肆无忌惮地提出了保加利亚独立的口号。最终，他们占据了保加利亚地方议会的多数，通过政变的手段驱逐了土耳其人愿意承认的特区首脑亚歷山大一世[20]，迎立了斐迪南一世[21]。最后，保加利亚的王室在跟俄国和西方国家串通以后宣布自称「沙皇」而不称大公，这就是民族发明的最后一步。

民族发明的第一步，建立国语和国史；第二步，建立海外社区；第三步，建立海外军团打回国内；第四步，在事实独立几十年以后，在国际方面的交涉、当带路党、拉盟友这方面基本上都已经有了把握以后，把事实独立变成正式独立。



保加利亚沙皇西美昂一世　此图创作于1923年，为捷克画家慕夏（Alfons Mucha）晚年的《斯拉夫史诗》（Slav Epic）系列组图的其中一幅，画面中央的主角为古代保加利亚人的国王西美昂一世，他被后世如慕夏般的斯拉夫民族发明家想像为「大斯拉夫民族」的祖先。

国际承认的保加利亚大公现在自称为保加利亚的沙皇，跟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圣彼得堡的皇帝平起平坐，这就是公开宣战了。因为大公（knayz）按爵位来说你只是一个公爵，比起苏丹和沙皇都要低，所以你可以做苏丹的臣民，只是一个自治区而已；但是沙皇就是最高级别，跟皇帝是一个级别。大公可以做皇帝的自治区的首脑，但是沙皇是不可能做苏丹的臣民的。所以保加利亚人一旦自称沙皇以后，奥斯曼苏丹就连面子都搁不住了。这就相当于是台湾人只要还自称为「中华民国」，那么名义上它还可以暂时地维持和平，但它如果哪一天把自己改成「台湾民国」了，那么战争就要爆发。香港人只要自己自称是「香港特区的立法会」和「香港特区的特首」的话，那么他们无论内部怎么搞，名义上跟北京的面子还能够维持过去；假如有朝一日香港立法会通过一个决定说，我们香港的首脑以后不再叫做「特首」，而叫「香港共和国总统」，那么香港必然就跟北京进入战争状态了。保加利亚人就是这个情况。

就这样保加利亚的民族发明走上最后一步。保加利亚大公在一九〇

八年发布宣言，声称奥斯曼帝国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保加利亚大公今后不再是大公，而是独立的保加利亚王国的「沙皇」。由于事实独立而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保加利亚自治区不仅内部准备做得很充分，而且外交工作也做得比较好，争取到了列强和巴尔干其他国家的一致支持，这一步达到了对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最有利的结果：奥斯曼土耳其不仅没敢实际开战，也没敢提出任何节外生枝的条件，乖乖承认了保加利亚的独立。当然这不是故事的结局，保加利亚的生存和法律地位虽然得到了保障，但是为了争夺领土，还要跟奥斯曼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打仗，但这就跟民族发明没有任何关系了。

从民族发明的意义上来讲，保加利亚的民族发明家经过以上这四部曲的民族发明，最终如愿以偿，把一个十九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的民族发明出来了，而且还是按照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方式发明出来的。

可以说，在一八二一年左右，他们的祖先是把保加尔人和突厥人都看作是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的；但是等到一九一二年，他们的孙辈就自己把自己看成是内亚突厥人的后代了，反过来把他们祖先所认同的拜占庭帝国看成是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了。一八二一年的特尔诺沃的小学生学到的课本就是，保加尔人和突厥人如何侵略我们希腊人，义愤填膺；到了一九一二年，中学课本就变成了拜占庭皇帝如何穷凶极恶地屠杀我们保加尔人，同样的义愤填膺。其实这两部歷史课本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读这两部歷史课本的人是同一家人的祖父和孙子，他们两人都感到义愤填膺，但是义愤填膺的对象却恰好相反。这就叫做「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22]。假如在未来的二十二世纪，今天的山西省通过发明「晋族」最后建立了「晋兰民国」，那么「晋兰民国」的小学生就会把中国侵略者痛恨入骨，正如同今天的山西小学生会把日本侵略者和满洲侵略者痛恨入骨一样。这并不代表他们在血统上发生了任何变化，只是民族发明学为他们制造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结果，证明在民族发明学的领域里面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你想到却做不到的事情。

保加利亚
民族发明大事记

7至14世纪

第一和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统治时期

在西元7世纪晚期，源于黑海北方的游牧民族「保加尔人」曾分别建立「第一保加利亚帝国」（681-1018）和「第二保加利亚帝国」（1186-1396），核心领土为今日的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区域。保加尔人的人种和文化不同于现代的「保加利亚民族」，却成为日后保加利亚民族发明的主要材料。

1365年

奥斯曼帝国建立鲁米利亚行省

奥斯曼帝国于1365年位在巴尔干东部平原区域上建立的「鲁米利亚行省」，其管辖区包括大部分今天的保加利亚核心领土。

1829年

维涅林出版《保加利亚史》

保加利亚民俗学者尤里．维涅林致力于鲁米利亚地区的民俗和语言研究，并出版歷史上首部《保加利亚史》，是「保加利亚民族」概念的最早起源。维涅林的发明是歷史上第一次把中古的保加利亚和近代的鲁马尼亚行省的希腊东正教徒联繫起来的学说。

1845年

博兹维利请愿设置保加利亚东正教会

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东正教神学家博兹维利向奥斯曼苏丹请愿，请求在希腊东正教会之外设置独立的保加利亚东正教主教区，并由「保加利亚人」担任教区领袖。博兹维利的请愿直到1870年才取得奥斯曼苏丹许可，并由博兹维利的弟子伊拉利昂•马卡里奥波里斯担任保加利亚东正教区领袖。

1869年

列夫斯基建立「内部革命委员会」

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瓦西尔．列夫斯基建立「内部革命委员会」，多次在保加利亚地区的从事武装起义活动，此组织后于1872年併入「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

1876/4
波特夫与保加利亚四月起义

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赫里斯托．波特夫主导下的「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保加利亚地区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遭到奥斯曼帝国强力镇压，波特夫阵亡。奥斯曼帝国的镇压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及列强的干涉，直接导致了1878年保加利亚公国的建立。

1878/7/13
保加利亚公国和东鲁米利亚自治区的建立

俄土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允许原属于鲁米利亚行省的保加利亚区域自治，并成立「保加利亚公国」。「保加利亚公国」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奥斯曼帝国「一国两制」之下的「保加利亚特区」。残余的鲁米利亚行省区域则另行建立「东鲁米利亚自治省」，仍受到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管辖。

1886/3/24
东鲁米利亚自治区併入保加利亚公国

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索菲亚．斯托扬诺夫领导的「保加利亚秘密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东鲁米利亚自治省发动政变，迫使奥斯曼帝国同意保加利亚公国併吞东鲁米利亚自治省。

1908/10/5
保加利亚王国成立并实质独立

在欧洲列强支持下，保加利亚大公亚歷山大一世将保加利亚公国升格为王国，并重新使用「保加利亚沙皇」称号，以此象徵保加利亚的实质独立，且获得奥斯曼帝国承认。「保加

利亚民族发明」共同体边界至此得以确立，以后的保加利亚歷史与政治发展不再涉及民族发明的问题。

1. 沙陀人，突厥游牧部族，七世纪中期以后在政治上依附大唐帝国，在北庭都护府所在的庭州（今乌鲁木齐周边地区）北部一带活动。八〇八年，沙陀迁往唐国境内，被安置在河东镇北部（今山西中北部），长期充当唐国雇佣兵，首领赐姓李。自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开始，沙陀人以河东为基地，先后建立起五代中的三个王朝（后唐、后晋、后汉）。后逐渐与源出河北三镇的内亚–东北亚雇佣兵势力融合，构成后周和北宋的核心统治集团。
2. 保加尔人（Bulgars）原本在黑海北岸，于六六八年由阿斯巴鲁赫（Asparukh）率领南下，定居于多瑙河下游两岸地区，先后建立第一和第二保加利亚帝国（Bulgarian Empire，681–1018；1186–1396），核心统治区约相当于今保加利亚和马其顿领土。
3. 阿瓦尔人（Avars），突厥语游牧部族。于六世纪后期进入多瑙河下游区域，在以喀尔巴阡盆地为核心的中、东欧草原地区建立了阿瓦尔汗国，多次攻掠南日耳曼、义大利、巴尔干等地区。八世纪末被法兰克王国击败后，逐渐同化于当地的斯拉夫族群。十八世纪的法国汉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认为，阿瓦尔人起源于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国，被突厥人击败后西逃的部分柔然人即阿瓦尔人。
4. 卡拉曼人（Karamanids）起源于亚塞拜然，在十三世纪中期随蒙古人进入安纳托利亚，并建立「卡拉曼公国」。该公国于一四八七年被奥斯曼苏丹废除建制，人口被分散至亚塞拜然、保加利亚、马其顿和希腊北部等地。
5. 尼基弗鲁斯皇帝（Nikephoros I, 750–811），出身阿拉伯人的迦珊尼德（Ghassanids）部落，原为伊琳娜女皇（Irene of Athens, 752–803）的财政总管，在拜占庭贵族支持下篡位。他先后与法兰克王国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开战，八一一年率军进攻保加尔人克鲁姆（Krum）可汗，洗劫其首都，但撤军时遇伏被杀，据传头骨被克鲁姆制成酒杯。
6. 明国末年袁崇焕主持辽东军事，认为「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西虏」（《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二），故大力收买喀喇沁蒙古和察哈尔蒙古人对抗满洲，一年花费「抚赏银」多至三十四万两。
7. 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在二〇〇五年发表的〈新台湾人的意涵〉中提出：「我们反对刻板地以来台先后作为判别台湾人的标准，而以认同这块土地，维护台湾优先，认同民主价值，来定义『新时代台湾人』。」
8. 尤里．维涅林（Yuriy Venelin, 1802–1839），俄国斯拉夫语言文学家，出身于匈牙利鲁塞尼亚地区蒂巴瓦村（Tibava，今属斯洛伐克）的胡楚尔人（Hutsul）族群，早年前往俄国求学并定居于此。终生致力于奥斯曼帝国鲁米利亚地区的民俗和语言研究，是「保加利亚」概念的主要发明者，今天的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和其他主要城市，均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9. 出自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的《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
10. 博兹维利（Neofit Bozveli, 1785–1848），东正教神学家、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一八二九年希腊战争结束后，他利用原有的东正教会系统在鲁米利亚地区推广希腊语教育和

希腊主义。在受到塞尔维亚主义思想启发后，博兹维利于一八三五年开始积极鼓吹保加利亚主义及「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的独立。一八四四年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向奥斯曼当局递交请愿书，要求由「保加利亚人」担任鲁米利亚各教区主教，并在君士坦丁堡设置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代表，遭到苏丹拒绝。↩

11. 在博兹维利死后，克里米亚战争末期，奥斯曼苏丹在英法压力下，于一八五六年二月十八日颁布《帝国改革诏书》，允许奥斯曼臣民不分宗教，在教育、官员选任和司法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
12. 索菲亚，古名塞尔迪卡（Serdica），一八七九年后成为保加利亚首都；特尔诺沃（Tarnovo），保加利亚北部城市，保加利亚独立后成为首都直到一八七九年，一九六五年后改名为大特尔诺沃（Veliko Tarnovo）。↩
13. 即在刘仲敬的理念和学说的影响下，致力于「诸夏」与「诸亚」各民族（例如巴蜀利亚民族、晋民族、坎通尼亚民族等）歷史文化建构的新一代青年学者。↩
14. 奥斯曼《帝国改革诏书》颁布后，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主持的中小学校，与希腊语教育系统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鲁米利亚各地持续发生驱逐希腊主教的运动。一八六〇年，博兹维利的弟子、保加利亚教会自治运动领导人伊拉利昂．马卡里奥波里斯（Ilarion Makariopolski, 1812–1875）在復活节守夜礼布道中未提及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名字，被视为保加利亚东正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的革命性行动。在俄国压力下，奥斯曼苏丹于一八七〇年正式承认保加利亚主教区的独立。↩
15. 反国教运动，由香港民间团体「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发动的社会运动，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二〇一二年九月开始推行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也反对教师对学生「是否爱国」进行评估，并以如街站、联署、游行、集会、绝食等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法案，引起香港社会强烈迴响。↩
16. 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马马尔切夫（Georgi Stoykov Mamarchev, 1786–1846），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和歷史语言学家。他精通希腊语、奥斯曼语和欧洲多种语言，致力于保加利亚民俗学、语言学研究，推广保加利亚语文的教育和文学创作。曾多次发起武装起义，于一八六七年病故。↩
17. 瓦西尔．列夫斯基（Vasil Levski, 1837–1873），生于卡尔洛沃城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一八六二年在贝尔格勒参加塞尔维亚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因作战英勇，被称为「列夫斯基」（意即雄狮）。一八六七年他参加保加利亚第一军团，并计划于次年在巴尔干山脉中部地区武装起义，被捕，不久获释。之后奔走全国各地宣传革命，并成立祕密组织「保加利亚使徒团」。一八七三年遭奥斯曼帝国处决。↩
18. 赫里斯托．佩特科夫（Hristo Botyov Petkov），生于卡洛费尔，其父为保加利亚民族文化运动的知名人物。他早年在傲得萨接受教育，一八六七年后加入民族主义组织。他在一八七五年当选为「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BCRC）主席，当年九月在旧扎戈拉（Stara Zagora）发动起义，未获成功。一八七六年四月，佩特科夫于「四月起义」中阵亡。↩
19. 《中英联合声明》是中英就香港问题于一九八五年共同发表的一份声明，声明列出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五十年不变」。二〇二〇年六月，英国驻中国大使馆针对中国官方媒体称「《中英联合声明》是歷史文件，不具备现实意义」作出回应：「这份中英两国之间的协议明确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权，除外交和防御等事项，其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五十年不变（直到二〇四七年）。」↩
20. 亚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of Battenberg, 1857–1893），早年曾在普鲁士及俄罗斯军队服役，一八七九年四月被欧洲列强任命为刚独立的保加利亚公国的首任大公。他在统

治期间试图推翻君主立宪制度，建立君主独裁政府，并採取反俄亲英的外交政策。一八八六年，他遭到亲俄派的保加利亚军官以武力罢黜，宣告退位并流亡海外，一八九三年于奥地利逝世。

21.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of Bulgaria, 1861–1948）出身萨克森地区的贵族，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间保加利亚的统治者。他最初採用大公头衔，一九〇八年正式宣布保加利亚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升级为王国，他恢復古代保加利亚王国的「沙皇」称号。一战后被迫退位流亡。古代保加利亚人的国王西美昂一世于九一三年击败拜占庭帝国后，开始使用「沙皇」（Tsar）的称号。西美昂一世之后的保加利亚统治者皆沿用沙皇称号，直到一三九六年古代保加利亚王国被奥斯曼帝国併吞为止。
22. 出自晚唐诗人司空图的《河湟有感》，全文为：「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本诗描写吐番趁唐内乱之际攻占河湟（位于今天青海的河湟谷地），致使该地的「汉人」逐渐转变为「胡人」的过程，来抒发诗人自身沉痛的心情。

四

马其顿

一个希腊，两种表述



北马其顿
Republic of North Macedonia
Република Северна Македонија
独立时间：1991年9月8日
首都：斯科普耶

我们今天讲马其顿。马其顿是第二次民族发明导致第三次民族发明的绝佳案例。我们前几讲讲希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时候曾经提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民族发明是希腊民族发明后的第二次民族发明，而马其顿的民族发明则是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后的第三次民族发明。最初的发明导致第二次发明，第二次发明再导致第三次发明，就像是树干分叉一样，它们都从同一个树根长出来的。没有同一个树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分叉，保加利亚这个分叉上面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马其顿。所以马其顿的歷史发明学，前面四分之三的部分跟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歷史发明学是一样的。

第一个阶段是斯拉夫东正教徒在拜占庭帝国内形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这种顺民结构。在政治上，满足于拜占庭皇帝的专制统治；在文化上，在放弃政治权利的前提下，满足于世界上最古老的、他们自认为最正宗的基督教信仰和希腊文化。因此用比较学术的方式称呼他们，就是斯拉夫—希腊东正教徒，尽管其中也混杂了以后几百年时间从内亚进来的各种各样的蛮族的血统。拜占庭皇帝统治他们，同时应付东虏和西虏

的打击。

第二阶段在东虏和西虏相互竞争以后，东虏最后打败了西虏。东方来的蛮族，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接管了拜占庭皇帝的全部土地，包括今天的马其顿在内的土地。然后，原有的斯拉夫—希腊东正教徒在奥斯曼鞑子的统治之下，变成了类似大清国汉人的那种地位：在政治上仍然是顺民，但是比起过去的大明朝和拜占庭帝国来说更低了一级，变成了二级顺民，穆斯林的地位都要比他们高。

第三个阶段的时间点进入近代，西欧的各种新思想开始进入封闭落后的奥斯曼帝国。这时奥斯曼帝国境内，原先像大清国的汉人臣民服从鞑子皇帝那样，安分守己当顺民的广大希腊东正教徒开始接受西欧的新思想，开始仔细考虑，我们为什么会落到现在这种处境，我们有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展开了希腊的新文化运动，导致了白话希腊语的发展，最后在政治上引发了一八二一年的「希腊辛亥革命」。在这个阶段，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东正教徒都以为自己是希腊人，包括今天的马其顿、保加利亚和希腊，他们都像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人、湖北人和广东人都以为自己是汉人、要反抗满人的统治一样，反抗拜占庭的统治。

这是巴尔干半岛近代所有民族发明共同的史前史。然后接下来，歷史就分叉了。这时，「马其顿」纯粹是一个半地理半文化的名词，甚至连行政区名词都不是。在前面提过的，包括了今天的保加利亚核心部分的鲁米利亚行省，至少它是一个行政名词，作为行政区划，有一套正规的建制、有一条边界的，就像今天的陕西省那样；而「马其顿」这个词就像是「秦」一样，它可以指这一块地方，也可以指另一块地方，虽有那么一点模模煳煳的歷史上秦国的古老记忆，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秦」的边界到底是在哪里，哪里是「秦」，哪里不是「秦」。有的时候你可以把陕西省简化为「秦」，但是这个简化显然是不精确的。因为陕北延安一带的晋语区，跟山西省的文化关系更加密切，陕南汉中则跟四川省的文化关系更加密切，所以有的时候「秦」可以作为陕西省的代称，有的时候「秦」又只能指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一带。有的时候「秦」又可以不限于陕西省境内，而且还可以包括甘肃省东部、陇山一带—这在古代是秦国的疆域，虽然现在不属陕西省境内，但在文化上，比起划在陕西省境内的陕北和陕南，反而跟更接近于关中平原一带。

「马其顿」这个概念在十九世纪也是这个样子的。古老的亚歷山大

大帝和菲利普二世的马其顿王国早已灭亡[1]，像孔子的鲁国一样，它的人种在歷史上的多次蛮族入侵后已经替换了许多次。所以到了十九世纪，虽然有些人也用「马其顿」这个词，但是「马其顿」这个词跟「伊庇鲁斯」和「伊利里亚」一样，它所指的范围是模煳而不明确的，就像是清朝人说「吴越」、「三秦」或者「楚」一样，不好说是什么地方：南京是不是「吴越」？蒙古帝国时期的南京是吴语区，但是朱元璋折腾以后又不是吴语区了[2]。大清国时代的苏州人说自己是吴越人是理所当然的，但南京人是不是吴越人就很难说。湖南人有的时候说自己是楚人，湖北人有的时候也说自己是楚人。甘肃人有的时候说自己是秦人，陕西人有的时候也说自己是秦人，而汉中人则经常说自己不是秦人而是蜀人。「马其顿」、「伊庇鲁斯」和「伊利里亚」这些古典时代的名词在十九世纪的意义就是这样。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要发明马其顿民族。

马其顿地区在十九世纪中叶时，实际上就陷入了我在第三讲中提过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和希腊民族发明家之间的斗争。在「希腊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希腊的民族发明家虽然在政治上只剩下了一个小希腊，但是在文化上仍然垄断了原先拜占庭帝国境内所有希腊东正教的文化教育，包括今天的保加利亚和马其顿。这些地方的学校和教会是由希腊民族发明家垄断的，他们继续用希腊语教育这些地方的儿童，想把他们教育成为下一代的希腊爱国者，等将来时间更加成熟以后，实现大希腊的民族事业。这时从俄罗斯又来了一拨海外社区来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他们试图把原本父亲一代还认为自己是希腊人的这些人重新发明，让他们想像自己是中古时期另一支突厥人—保加尔人的后代，把他们发明成为保加利亚人。然后这些民族发明家在奥斯曼苏丹面前为了争取保加利亚教会的自治、争取保加利亚人独立办学的权利，不断地引起各种各样的社会风潮。这时，他们的活动中心就在今天的马其顿境内，但「马其顿」还是一个连明确的边界都没有的地理名词。当时的马其顿境内也就是希腊主义发明家和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这两种人在竞争，而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在今天的保加利亚境内的势力还没有在马其顿境内的势力强。当然这些地方在当时的法律上讲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文化上讲都是斯拉夫的希腊东正教徒。

保加利亚主义的民族发明家推动保加利亚化的主要工具就是学校和报纸。一方面要用他们新发明的保加利亚语和歷史来教育下一代的新学童，另一方面又要办报纸推动自己的事业。这时，他们最重要的一份报

纸就是佩特科．斯拉菲可夫的《马其顿报》[3]。我们不要误会，以为《马其顿报》就是马其顿民族主义的报纸。虽然现在的马其顿歷史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时的《马其顿报》属于保加利亚主义的主要阵营，极力鼓吹包括马其顿在内的「大保加利亚」，而要发明一个新的保加利亚民族，既脱离奥斯曼人的范畴，又脱离希腊人的范畴。也就是说，现代的马其顿民族发明家已经收编了过去十九世纪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歷史，当作马其顿民族歷史的一部分。这话的意思相当于，上海办了一份叫做《申报》[4]的报纸，「申」就是上海的意思，本来是一个地名。它的宗旨就是，上海人要说服自己，既不是相当于奥斯曼主义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也不是相当于希腊主义的汉族的一分子，而是包括上海在内的「吴越民族」的一分子。它的名字叫《申报》，但不是说它认为「吴越民族」只包括上海，而是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在内的。《马其顿报》的意思也是如此，它要脱离奥斯曼主义和希腊主义，发扬保加利亚主义，宣扬马其顿和东、西保加利亚都是大保加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在第三讲提过，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保加利亚新文化运动、保加利亚教会独立运动、保加利亚民族发明推动了几十年，最终在一八七〇年，奥斯曼苏丹做出让步，允许保加利亚主教区脱离希腊东正教系统独立。当然这对土耳其人来说也是惠而不费，它原本就已经允许希腊东正教徒自治了，现在希腊东正教徒起了内讧，一部分说我要做希腊人，另一部分说我要做保加利亚人，反正你们都不要做奥斯曼人，这关我什么事，我就顺水推舟吧。你们已经闹了几十年了，与其持续在同一个机构、同一座学校里面闹来闹去，让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办法好好上课，那索性你们自己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愿意当希腊人的，你们继续去办你们的希腊教会和学校；愿意当保加利亚人的，你们就去办你们的保加利亚教会和学校。于是大家就一分为二，保加利亚人与希腊人的教会和学校分道扬镳。这时马其顿又是保加利亚教会和保加利亚学校最集中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它要在以后的保加利亚革命当中扮演格外突出的角色。

我在第三讲谈保加利亚时曾经提到瓦西尔．列夫斯基，他是继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之后，保加利亚独立革命的第二波民族发明家。第一波的拉科夫斯基是受希腊语教育长大的，等于还是半个希腊人；第二波的列夫斯基受到了新发明的保加利亚语言文化更深的影响，成为比较「纯粹」的保加利亚人了。他为了推动革命，一方面要以俄国和其他巴

尔干国家为基地，建立海外社区和海外组织。它的基层组织就像是在外国的同盟会和友谊社，但是既然他的目的是要在奥斯曼境内建立未来的保加利亚，那他必然要派人在奥斯曼境内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这个基层组织就叫做「内部革命委员会」。「内部革命委员会」是常见的、比较通俗的翻译，实际上它的意思是「国内革命委员会」。既然有「国内革命委员会」，当然就会有「国外革命委员会」[5]。「国内」和「国外」的意思，就相当于是同盟会的东京总部和国内分部。同盟会的总部是在东京，是因为鞑子皇帝害得它在十八省混不下去，不得不避难，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才把总部设在国外的，但它想要建立的中华民族或炎黄子孙的十八省是在国内。所以才区分了国外和国内组织。「国内革命委员会」或者「内部革命委员会」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保加利亚革命组织的全部，我们是保加利亚革命组织的国内分支，我们的总部还在敖得萨、布加勒斯特或者贝尔格勒。总而言之，革命委员会以这种方式推动了保加利亚境内接二连三的革命。

在一八七七年第十次俄土战争前夕，保加利亚反对土耳其的革命进入最后关头的时候，革命委员会把他们企图建立的这个未来的保加利亚国划为四大革命区，分别派不同的组织进去，各区区别差不多就像是中部同盟会和广东同盟会[6]。革命委员会中的第四分支或者叫做第四革命分区，主要涵盖的范围就是今天保加利亚的西南部和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全土，由格奥尔基．本科夫斯基负责指挥。如果换到远东，类似的歷史就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派遣胡汉民去广州建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并任命他为主席。西南政务委员会负责管辖滇军、粤军、桂军之类的，跟南京、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可以起到一个分庭抗礼的作用。然后又派了李宗仁到武汉去搞武汉政治分会，派阎锡山到太原去搞太原政治分会，诸如此类。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来讲，这是准备革命以后各路革命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保加利亚。然而，这四个革命分区的实力并不对等。马其顿所在的第四革命区，实际上是四大革命分区中实力最雄厚、革命准备做得最好的，也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经过多年宣传后扎根最深的。他们的作战最为勇勐，给了土耳其人最大的打击。当然这时候还没有马其顿语言或文字这种东西，只有保加利亚语言文字，况且保加利亚语言及文字还是刚刚才发明的，时间还不到一代人。

在保加利亚革命军和土耳其人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俄国人插手了。土耳其人一如既往的，在自己占了上风的时候就屠杀革命者，引起了欧洲

舆论的反弹。但是列强不会仅仅因为舆论上的谴责，就会采取相对应的政治行动。这时，俄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可以把俄罗斯的势力扩大到黑海及达达尼尔海峡，直到君士坦丁堡，于是就爆发了俄土战争，战争结果是《圣斯特凡诺条约》[7]，战败的土耳其把君士坦丁堡城门以外的大部分土地都割让给了俄罗斯准备建立的大保加利亚。但这时德国、英国和其他列强都觉得，这样的大保加利亚会变成俄罗斯的一个傀儡国，对于国际秩序的平衡来说非常不利。于是他们进行了干涉，结果就产生了一八七八年的柏林会议。

一八七八年的柏林会议结果遏制了俄罗斯的野心，大保加利亚被一分为三，分成三个不同的地区：马其顿地区重新交还给奥斯曼帝国，以免奥斯曼帝国彻底垮台以后沙皇俄国完全控制东地中海的局势；北方，建立保加利亚公国，由德意志巴腾堡家族的亲王亚历山大一世担任奥斯曼帝国一国两制的保加利亚特区大公；东南部的东鲁米利亚[8]，就是鲁米利亚行省残余的部分，也交给保加利亚人，但是总督还是由土耳其人任命。



保加利亚公国与东鲁米利亚行省　奥斯曼帝国于1878年允许原属于鲁米利亚行省的保加利亚区域自治，并成立「保加利亚公国」，残余的鲁米利亚行省区域则另行建立「东鲁米利亚自治省」，仍受到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管辖。

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看到他们试图建立的大保加利亚被列强一分为三，而且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独立，当然是非常失望的。马其顿地区完

全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保加利亚公国和东鲁米利亚自治区是奥斯曼帝国一国两制之下的两个自治区，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香港和澳门。它们实际上的权力虽然已经落入保加利亚人之手了，也获得了自由选举议会的权利和制定地区性基本法的权利，但是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来说，它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藩属，不享有完整的国家主权。它们特区的首长见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必须承认苏丹才是国家元首。但是既然保加利亚的革命军的胜利，实际上是依靠俄罗斯帝国的干涉才得以实现的，他们没有能力单枪匹马战胜奥斯曼帝国，而俄罗斯帝国在外交会议上又争不过德、英列强，所以他们也只能够暂时接受现实。

保加利亚公国——由巴腾堡家族的亚历山大一世担任特首的保加利亚自治区，经过几次选举以后，就完全控制在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之手了。保加利亚爱国者或者民族主义者的下一步计画是，通过他们在保加利亚北部的保加利亚公国控制的这个事实上的政权，如何在不明显撕毁《柏林条约》的情况下，把东鲁米利亚和马其顿重新夺回来。第一步比较容易下手的当然是东鲁米利亚，东鲁米利亚至少是一个自治区，而马其顿连自治区都不是。政府和议会必须对国家的正式法律和国际条约负责，当然不适合做这种事情，但是私下里帮忙还是可以的，正如孙文在发动辛亥革命的时候经常从日本驻台湾的总督那里得到援助。



瓜分马其顿　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参战各方将「大马其顿地区」划分为三部分：皮林马其顿属于保加利亚，爱琴海马其顿属于希腊，塞尔维亚获得的瓦达马其顿，即为今天北马其顿的前身。

从法律上讲日本人是承认大清帝国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相当频繁地）会根据大清政府的要求，把大清帝国的分裂主义分子孙文驱逐出境；但在私底下也持续提供孙文各种各样的接济，在孙文发动革命的时候给经费给军火。从理论上讲，孙文和他的同盟会是从黑龙会[9]拿到资助的。如果大清政府试图抗议的话，从法律上讲，不是日本政府在支持孙文，而是日本的民间团体黑龙会在支持孙文的同盟会，民间对民间。日本作为一个有宪法的国家，政府不能够强迫人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政府需要尊重国际条约，承认大清国对广东或者江苏的管辖权，不能容许孙文以日本为基地、搞颠覆江苏或者策划广东独立的反叛活动；但是日本的民间人士，没有担任政府官职的黑龙会人士，拿着钱和军火去接济孙文，那么日本人是无权管束他们的。就用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方式，日本朝野人士最终借助孙文之手推翻了大清帝国。

保加利亚人颠覆东鲁米利亚的方式也是与此类似的。从表面上讲，保加利亚公国的国会、特首和政府恪守对宗主国奥斯曼帝国的义务，不能採取任何反对宗主国的措施，但是在民间方面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既然保加利亚公国已经是一个有宪法、有民主、有自由的地方，民间人士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政府是不能都管的。如果民间人士策划了什么针对东鲁米利亚的行动的话，那么保加利亚公国至多根据国际上对待政治犯的通例，把这些不友好的人驱逐出境，也就算是对得起奥斯曼苏丹了。但是实际上，保加利亚公国的朝野，无论是王室还是各党派，暗中都是同情这些企图分离东鲁米利亚的人。分离出来后，必然要跟北部的保加利亚合併，在大保加利亚的事业上走出很大的一步。

于是我们都熟悉的「内部革命委员会」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復活了，称为「保加利亚祕密中央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就是曾经参加过第四革命分区的索菲亚．斯托扬诺夫[10]。革命委员会在东鲁米利亚策划暴动，就像是孙文在广东策划暴动一样，奥斯曼苏丹拿他是没有办法的。他打了败仗以后就撤到保加利亚境内去，然后奥斯曼苏丹提出抗议，保加利亚特区政府只能够把他驱逐出境。所谓驱逐出境，只是到海外其他什么地方打一个圈又回来，又能策划下一次暴动。最重要的就是，奥斯曼帝国限于柏林会议达成的协定，它不能够直接干涉保加利亚公国和东鲁米利亚自治区的内政，不然就是撕毁条约，就要面临失去英国保护、直接跟俄国发生冲突的前景。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就等于是一只手被捆在了背后。

可以看出在大多数东鲁米利亚人口已经被保加利亚主义者的教育机器俘获的情况下，东鲁米利亚早晚会併入保加利亚，尽管柏林会议规定这两个区应该分离，但在革命委员会策动的一次革命或是政变以后，东鲁米利亚便宣布回归祖国。东鲁米利亚和保加利亚公国的合併，就是现代保加利亚的鼻祖。但是这个合併了的公国暂时仍然是保加利亚公国，它还没有勇气正式宣布独立、跟土耳其人分庭抗礼，至少在与列强和巴尔干的其他诸国达成协议以前，它是不敢这么做的。

两公国合併以后，大保加利亚主义者的信心更加强大。他们认为，革命委员会既然用这种方式合併了东鲁米利亚，那么再收回马其顿也不成问题。此时的革命委员会进入了第三代，第一代革命委员会是从希腊主义者分裂出来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就是列夫斯基那一批人；第二代革命委员会是斯托扬诺夫那一批人，他们在柏林会议以后完成了夺取东鲁米利亚的任务；第三代革命委员会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真正的「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的起源了，这个革命委员会比起最初的「内部革命委员会」，加了一连串地名，全名叫做「马其顿和阿德里安堡内部革命委员会」。[11]

按照「大保加利亚主义」的构想，现在只有马其顿和阿德里安堡这些地方还没有光復，还处在异族的奴役之下，等把它们收復以后，保加利亚人的革命事业就算是大功告成了。第三代革命委员会就是这样成立的。它的主要颠覆或者革命范围就要变成，以保加利亚为中心，去打进土耳其人仍然继续控制的马其顿和阿德里安堡。这些地方的人口结构其实像是一九九〇年代的波士尼亚，是有大量的穆斯林的。别的不说，当时的马其顿包括塞萨洛尼基这个重要城市，土耳其的民族发明家凯末尔全家都是塞萨洛尼基人。近代的大部分土耳其民族发明家来自于当时所谓的马其顿境内，而不是来自于今天土耳其所在的安纳托利亚境内。所以土耳其的民族发明其实也是在马其顿地区发明后，再传播到安纳托利亚去，而土耳其发明家在马其顿的根据地反而被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铲平了。

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的达梅．格鲁耶夫[12]这一批人在马其顿和阿德里安堡搞了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的经歷很像是一八七八年《柏林条约》以前，以俄罗斯和罗马尼亚为基地的上一代革命委员会在保加利亚搞革命的经歷。他们不断地引起冲突，跟土耳其人打仗，但是每一次都打败了，引起新的镇压。但是这一次，欧洲舆论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关

键就是在于，马其顿和阿德里安堡这些地方像今天的波士尼亚一样，本来就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所以要求他们併入保加利亚就不像是以前希腊、瓦拉几亚和保加利亚自身闹独立的时候那样名正言顺。这就有点像是今天波士尼亚的那种情况，你很难说谁是理直气壮地争取独立和自由的，谁只是在想搞种族清洗和冲突、想为自己的文化族群争到更大的利益。土耳其的马其顿方面军[13]本身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立宪派的主要支持者，每一次君士坦丁堡发生保守派政变的时候，都是马其顿方面军去镇压的，青年土耳其党、大奥斯曼主义者和未来的小土耳其主义者都产生于马其顿方面军，所以马其顿对于土耳其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从列强的角度来看，尽管内部革命委员会和马其顿穆斯林冲突得很激烈，但是很难说哪一方更正义一些。这就像是，尽管波士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冲突激烈，但是双方好像都可以算成是原住民，不能说波士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是外来侵略者，也不能说波士尼亚的穆斯林是外来侵略者，非要把其中一方赶出去。

所以过去在一八二一年曾经用得很顺利的那种方法，现在就用得不太顺利了。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工作也不很顺利，列强不肯干预，他们自己又打不赢，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母国保加利亚。这时内部革命委员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保加利亚人，认为马其顿是保加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依靠保加利亚母国而母国力量不足的话，主要就要靠外交了。这时的保加利亚虽然已经合併东鲁米利亚，但在法律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它可以通过外交方式来寻找潜在的盟友，一方面可以联络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而这样就要牺牲马其顿本身的利益。本来大保加利亚人是想吞併整个马其顿，但是单打独斗打不赢，得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希腊都拉进来的话，就必须分蛋糕了。于是他们就祕密签订了「瓜分马其顿」的协议[14]，准备把马其顿北部分给塞尔维亚。这样分蛋糕的结果是，这些国家就可以联合起来对抗奥斯曼帝国了。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一爆发，原先的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了保加利亚的一支方面军。他们的政治工作主要就是要使马其顿回归保加利亚母国。现在保加利亚已经参战，他们当然就理所当然地作为保加利亚军队的一部分了。但是战争结果并没有让他们完全满意，尤其没有让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满意。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马其顿遭到了瓜分，希腊和塞尔维亚分配到一部分，而保加利亚获取了最大的一部分，但这已

经不能让内部革命委员会满意了，因为他们本来是想把马其顿全部併入保加利亚的，但是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接下来，巴尔干各国由于土地分配不均（胜利者之间总是这样的，在获胜以前还能够维持团结，胜利以后就要产生分配冲突，让大家都不满意），保加利亚人嫌自己分得少而攻击塞尔维亚和希腊，结果变成了众矢之的，大家联合起来进攻保加利亚[15]。

结果又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就是巴尔干其他各国反过来联合奥斯曼帝国进攻保加利亚，结果把马其顿的大部分和阿德里安堡都从保加利亚的手里夺了出去。阿德里安堡被恩维尔帕夏[16]拿回去，回归了奥斯曼；而马其顿被一分为三：马其顿的西北部，包括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称为瓦达马其顿（Vardar Macedonia），变成了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塞尔维亚人把它发明成为「南塞尔维亚」[17]；马其顿的南部，包括塞萨洛尼基，称为「爱琴马其顿」（Aegean Macedonia），归了希腊，希腊人把他们发明成为自古以来是希腊人的一部分；过去那个马其顿只有东北部大概百分之十五左右归了保加利亚，称为「皮林马其顿」（Pirin Macedonia）。当然塞尔维亚和希腊就要用我们都熟悉的那一套国语教育—塞尔维亚语和希腊语的教育去同化他们的居民。同时希腊人还有一步，就是将日后从安纳托利亚撤回来的希腊东正教徒尽可能地安排在「爱琴马其顿」的土地上。

我们前面讲过马其顿是保加利亚民族发明最成功的地区，很多积极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其实是马其顿人，但是它的大部分土地却被划分在保加利亚之外。这种现象在现代史上其实是相当常见的。国民党的支持者主要在哪儿呢？在檀香山和马来亚（Melaya），在广东也不少，但是在山西和河南基本就没有。但是檀香山和马来亚却是在国民党有效管辖区之外的。国民党依靠马来亚和檀香山这批人的支持打回国内，推翻了满清和袁世凯，但是它的主要支持者却被划在了它自己的边界之外。保加利亚在一九一三年的巴尔干战争以后就处在这种状态。

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对战争结果是极其不满意的，因为它的损失最大，然而它想要得到的土地却被划到了保加利亚境外。革命委员会的支持者主要在保加利亚境外，结果它在保加利亚以后的议会斗争中间也占不到上风。而保加利亚沙皇和国会的主要党派都不敢或者是不肯违反列强同意的国际条约，把保加利亚拖进新的战争当中。他们预见到，在这场新的战争中间，保加利亚仍然会处在极其不利的状态。然后过不了

多久，内部革命委员会攻击的对象就由过去的奥斯曼帝国，转向为保加利亚的沙皇和主流政党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五四学生火烧赵家楼[18]的口号了：「我们革命了这么多年，牺牲了如此之多，却落到这种下场，都是因为沙皇、内阁和国会不争气的缘故。外争国权，首先要内惩国贼。如果不是因为保加利亚国内有卖国贼当政的话，我们马其顿早就获得解放了。」当然这是发洩情绪的话。实际情况就是，保加利亚的国家力量没有达到这一步，外交形势也对它不利。所以保加利亚不是不想要吞併马其顿，而是它实际上没有这个力量。但是从内部革命委员会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都该怪保加利亚的政府不争气。

在内部压力以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保加利亚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加入同盟阵营。主要理由是，塞尔维亚和希腊加入协约国阵营，只有德国胜利了，保加利亚才能够夺回在马其顿失去的土地。但是结果德国输掉了，保加利亚不得不重新签署条约。协约国规定，它必须回到一九一二年的旧边境[19]。这就意味着，保加利亚将会永久失去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期割让给希腊和塞尔维亚的马其顿领土。经过了这次失败，保加利亚的大部分政治家完全放弃了收復失地的想法，尤其是执政的农民党[20]。他们觉得已经吃过两次亏了，以后可以不必「星辰大海」了，现在的保加利亚是小了一点，但是比起以前被土耳其人统治和压迫的情况还是好了不少，以后的事情咱们就这么算了吧，从此之后保境安民就好。但是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是不肯罢休的，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收復马其顿，如果保加利亚政府放弃了收復马其顿的企图，它自己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而且革命委员会跟一般的议会政党不一样，它本来就是像同盟会一样是搞武装斗争起家的，现在它的斗争对象，或者说暗杀活动的主要对象就转向它眼中的卖国政府—保加利亚执政的农民党政府当中。

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的暗杀活动给它带来了很大的坏名声。他们刺杀了当时刚因政变下台的保加利亚首相亚歷山大．斯塔博利斯基，而且在杀了他以后，还没有忘记像伊斯兰国一样，连尸体都不放过，把这个死去的前首相的右手砍了下来。理由是，斯塔博利斯基的罪恶右手签署了一九二三年的尼什条约[21]，企图镇压我们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当然这只被砍下来的右手在国际社会一展示，也就坐实了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跟当时共产党没什么区别的恐怖分子名声。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意义就相当于，在一九七〇年代，义大利的赤军旅在从事恐怖活动最激

烈的时候，绑架并杀害了义大利的总理莫罗[22]。你想想，如果是一般的地主或资本家被人绑架撕票，那也罢了，还可说是治安不好，但是连一国总理都到了自身难保的地步，那是不是国将不国呢？

这时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已经成立共产国际，向东欧所有国家都派遣了特工，也包括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策划者、延安的太上皇、柏林国会纵火案的主角—着名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23]。季米特洛夫在苏联的指挥之下在保加利亚搞革命，当然首先要选择可以合作的对象，用共产党的术语说就是统一战线。他自然而然地发现，保加利亚大多数政党已经适应议会政治了，不愿意通过选举以外的方法夺取政权，只有两个组织有点希望，就是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及其支系「马其顿联邦组织」[24]。他们的基础都在马其顿，而不在保加利亚境内。在保加利亚境内，他们要么就是承认失败算了，要么就要使用武力。凡是使用武力的政党，都是共产党所喜欢的，因为共产党也是那种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的政党。因此共产党很自然地就觉得，在夺取政权之前，任何愿意使用暴力反对议会政治的势力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就像是今日共产党透过统战利用国民党那样。于是在一九二四年，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马其顿联邦组织和保加利亚共产党拟定了统一战线宣言[25]，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保加利亚版的《孙文越飞宣言》[26]。虽然这次合作很快就破裂了，但共产党还是成功地把内部革命委员会的左派给统战、挖走了。

在一九三四年的军事政变[27]后，保加利亚新政府终于不再容忍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及保加利亚共产党，进行了严厉镇压。在被镇压的情况下，内部革命委员会比共产党更加倒楣。共产党每次被镇压以后，就迅速撤到苏联去了。季米特洛夫本人就跑回莫斯科去，不再指挥保加利亚的革命，但继续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大员到处活动，指挥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共产国际的革命家是没有祖国的，哪一个国家都可以是他的祖国，在保加利亚不搞革命，他就到中国去搞革命。而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无处可去，它是一个类似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政党，精准地说它是一个企图发明民族的民族主义政党，但它企图发明的对象又被隔在自己的境外。它想把马其顿拉到保加利亚境内，本来只能以保加利亚为基地的，但是它被当作恐怖分子狠狠地镇压了，连在保加利亚境内都没有办法立足了。这就相当于，同盟会如果在东京都没有办法立足，它的革命活动根本没法继续下去。于是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就从此

衰弱了。希腊和塞尔维亚的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原先就是流亡在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在总部被保加利亚政府镇压后，自然也就活跃不起来了。今后的几十年，人们几乎没有听到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的消息。当然这时候，无论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还是希腊，都不认为马其顿是一个国家，它们只是对马其顿的归属有争议。保加利亚人认为这些地方天然是归它的，而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也都认为是归属自己的，而马其顿人自己当时主要是亲保加利亚。

然后歷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在史达林和狄托[28]的主导下，共产主义者席捲了大半个巴尔干半岛—除了希腊以外，希腊也差一点让他们拿下来。这时狄托开始考虑，以前的这些争议怎么解决呢？例如保加利亚和源自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之间，最主要的歷史纠纷就是马其顿问题。狄托提出，为了解决这个歷史纠纷，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干脆组成一个联邦，大家既然是同一个联邦，那么马其顿归谁还是不归谁就不太重要了[29]。但是联邦条件正谈到一半的时候，南斯拉夫跟苏联又闹翻了，史达林拍了一下脑袋，觉得情况不对：南斯拉夫已经相当不听话了，如果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合併，拥有巴尔干半岛的绝大部分领土，那是不是会形成跟足以抗衡苏联的力量？最好还是不要让它们合併。既然合併的问题没法解决，马其顿问题就更没法解决。

我们知道狄托在南斯拉夫为了抑制塞尔维亚人的势力，把塞尔维亚人自称的南塞尔维亚也划出来，建立了一个马其顿共和国[30]。这件事情让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很不高兴，他们认为他们在瓦达马其顿（也就是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推动塞尔维亚语教育的事业已经是很有进步了。经过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这样几代人的努力，在一九四〇年代的瓦达马其顿境内，会讲保加利亚语的人跟今天的东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中会讲满语的人也差不了多少，没有几个了。眼看把他们同化成塞尔维亚人的事业就要成功，没想到狄托为了打击塞尔维亚人，把波士尼亚也划出去了，马其顿也划出去了，科索沃也成立了自治省。但是狄托靠的是克罗埃西亚和斯洛维尼亚这些比较先进的地方支持，塞尔维亚人拿他没有办法。于是就产生了作为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的马其顿。而希腊统治的「爱琴马其顿」，这时候已经涌入了大批被凯末尔赶出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东正教徒，人口结构完全变了。

最后一幕就是一九九〇年代共产主义在东欧彻底崩溃后留下了政治真空。这时，已经国际社会遗忘、被认为早已经消失的马其顿内部革命

委员会，在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突然死灰復燃，而且赢得了议会选举。接着保加利亚也成立了自己的内部革命委员会[31]，但是这个内部革命委员会在保加利亚民主化以后的议会选举中一败涂地，以后再也没有翻过身来。结果，一九九〇年以后的内部革命委员会只在马其顿执政。接下来就是克罗埃西亚人和波士尼亚人争取独立，爆发了克罗埃西亚战争和波士尼亚战争，马其顿便趁这个机会宣布独立。现任塞尔维亚总统斯洛波丹．米洛塞维奇[32]害怕两线作战，同时因为塞尔维亚人在波士尼亚实施了种族清洗，很像是以前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大屠杀，遭到联合国的制裁，这时候狄托就觉得，马其顿如果独立出去会对他有相当的好处：一方面，马其顿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地区，需要塞尔维亚补贴；另一方面，马其顿如果独立以后，塞尔维亚就有了一个与走私的管道。

大部分周边国家严格地执行对塞尔维亚的制裁政策，使塞尔维亚人感到很头疼。如果马其顿独立以后，表面上执行对塞尔维亚的制裁政策，暗地里开一个管道、搞一点走私活动，那么塞尔维亚的压力将会减轻很多。而对马其顿来说的话，马其顿如果留在南斯拉夫内部，那么国际社会制裁南斯拉夫的时候，马其顿就要跟塞尔维亚一起被制裁；而马其顿一旦独立了以后，就可以左右逢源，它可以加入国际社会对塞尔维亚人的制裁，那样它自己就在制裁区外了，还可以得到国际援助。同时马其顿在名义上制裁塞尔维亚的情况下，暗地里还可以给塞尔维亚放水，搞边境贸易，这样它就可以两头占便宜。事实上马其顿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可以说，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透过相当高明的外交手腕，使它没有付出波士尼亚人和科索沃人那样沉重的代价，而且左右逢源地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又没有得罪塞尔维亚，便实现了独立。

当然从保加利亚人的看法来讲，马其顿这种独立的方式实在令他们非常头痛。当时的保加利亚人根本不承认世界上有一种马其顿人，他们认为马其顿人是一九四四年由狄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发明出来的[33]。举个例子，「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的马其顿语名称：「Внатрешна Македонска Револуционер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ја」及保加利亚语名称：「Вътрешна Македонск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大家可以清楚看到：第一，它们全都是同一套字母；第二，字母和字母之间也差得很少。前两个单字接近二十个字母，总共只有二个字母不一样。你如果稍微粗心一点，就以为是有人把同一个名字写了两遍。但不是的，一个是马其顿语，一个是保加利亚语。但是既然这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

马其顿语跟保加利亚语有什么区别？粤语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别比这个要大多了。任何人如果把粤语写成无论是拼音文字还是方块字的话，至少像我这种受普通话教育的人看了以后，至少三分之一、有时一半以上都看不懂。

但是什么叫做语言，什么叫做方言，并不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度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决定的。如果狄托决定马其顿的方言尽管跟保加利亚的主流语言相似度很高，但是他要建立马其顿共和国，他就说它是一种语言了。保加利亚人誓死不肯承认它是一种语言，坚持它是保加利亚的方言，但是也争不过狄托造成的既成事实。同时，最根本的原因是，保加利亚在过去追求「大保加利亚」时，打了几次败仗后已经元气大伤，再也不敢「星辰大海」了。而且在冷战期间，整个巴尔干半岛过去发明「大希腊主义」的这个区域里面，只有希腊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其他都是原属于共产主义阵营，非常穷困，在外交上也很消极，它们不像希腊那样理直气壮，即使心里面不满，也只敢在自己国内做宣传，不敢到国际社会上去闹。只有希腊人敢公开反对马其顿独立，他们跟保加利亚人一样，认为马其顿人根本不是一个民族。由于希腊既是北约成员国又是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马其顿、科索沃未来是否能够加入北约或欧洲，希腊都有一定的发言权，所以它底气十足。

希腊公开宣布，独立的马其顿不该叫做「马其顿共和国」，因为亚歷山大的那个马其顿是希腊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你们自称「马其顿共和国」就是企图吞併希腊领土，或者想要分裂希腊，各种不利于希腊。只要马其顿人不肯改名，希腊就会在欧盟委员会及北约委员会投反对票，不让「马其顿共和国」加入希腊或者北约。因此马其顿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国际上把自己的国号叫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这个稀奇古怪的国号，别人看上去觉得极其荒谬，但是台湾人应该相当熟悉，它跟「中华台北奥会」是同一个意义。如果台湾人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或者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奥运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从头抗议到尾，说这如何不好、如何不对了。希腊人也是这么做的，如果马其顿就叫马其顿的话，希腊就要抗议了。于是北约和欧盟不得不买希腊的面子，跟马其顿说你就不要直接叫「马其顿共和国」吧，而改叫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要不然希腊人便会指控马其顿人图谋不轨，意图分裂希腊领土。

当然马其顿自己也不是完全老实的，它在国内宣传时也是说，希腊

北部的「爱琴马其顿」自古以来就是马其顿的一部分，将来我们还是要收復失地的。但是在国际上，它为了赢得舆论的支持，便坚持说它是承认现有边界的。一九九〇年復活的这个内部革命委员会是马其顿的长期执政党，它其实并没有真正放弃重新发明一个「马其顿民族」的计画。其实，马其顿民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不是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九四四年以前，马其顿本地的居民大多数认为自己是保加利亚人，有一部分则愿意加入塞尔维亚和希腊；一九四四年以后，狄托把原来作为保加利亚语一个分支的马其顿方言发明成为独立的马其顿文字以后，马其顿民族才正式出现；一九四五年在新南斯拉夫联邦内部成立马其顿共和国以后，作为政治实体的马其顿才正式存在；一九九〇年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和平分离后，马其顿才获得事实上的独立；之后跟希腊抗争了几年，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加入了联合国，最终马其顿才获得完整的、作为独立国家的国际法主体的身分。但是马其顿的国号争议持续至今，仍然吵吵闹闹。直到此时此刻，希腊人仍然在义愤填膺地抗议，马其顿人叫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叫「马其顿」；马其顿人敢把自己叫做马其顿，这实在令人无法接受[34]。

追根究柢的说，希腊民族、保加利亚民族和马其顿民族都是发明出来的，而且时间隔得很近，希腊是十九世纪初期发明的，保加利亚民族是十九世纪中期发明的，马其顿民族则是二十世纪中期才发明的，它们之间的合法性相差不是很大。所以希腊人非常害怕，马其顿的合法性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动摇希腊的合法性。相反地，像法国、德国，他们民族发明的时间较早，大家已经习惯了，合法性较充足，所以他们就不大在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德语世界的各邦国也是在一百余年前发明出来的，他们在刚刚建立政权时也是像今日希腊人那样神经紧张的，但是在他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后，就开始觉得这些巴尔干人太歇斯底里，巴尔干人的性格有问题、传统文化有问题、国民性有问题，诸如此类。

当然最紧张的还是马其顿自己。马其顿的民族发明家最清楚，在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绝大部分时期，都是把自己看成是保加利亚政党的。况且此时此刻，在保加利亚也留存着一个规模不大、不成气候，坚持原有宗旨的「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于是在马其顿的内部革命委员会又做了一次重新包装，把自己发明成为马其顿民族的大救星，重新把马其顿的歷史一直追溯到远古的亚歷山大大帝，把一九四四

年以后才建立起来的马其顿民族说成是从古老的亚里斯多德和亚歷山大时代的马其顿帝国直接后裔。这种说法的含意就差不多是相当于，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不但没有继续坚持打回南京去（希腊人其实是这么做的），而是反过来把自己做了重新包装，说：我们台湾人自古以来就是「台湾民族」，国民党是「台湾民族」的代理人，为了争取「台湾民族」的独立，我们国民党做了重大牺牲。尽管国民党前面四分之三的歷史都是一直企图把台湾合併到大中华民国里面的，但是以后的国民党却要说，是我们国民党解放了台湾，实现了台湾的独立事业。现在的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也就是这么主张的。

马其顿的歷史和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是分不开的。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前四分之三的斗争都是想要把马其顿合併到保加利亚里面，而后四分之一的斗争则是想要发明出一个从亚歷山大那个时代开始的「马其顿民族」。所以他们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上到处嘲笑希腊人对「马其顿」这个词如此神经过敏；另一方面在自己国内大规模地搞民族发明，也就是说把我们最熟悉的中学课本改了，发明一套「自古以来」的新歷史，尽可能把具有保加利亚色彩的、塞尔维亚色彩的和希腊色彩的名字统统改掉，把国内所有的地名、路名、电影院名统统换成最古老、最正宗的亚里斯多德和亚歷山大时代的马其顿名字[35]，尽管现代马其顿人的血统其实也是斯拉夫人，跟今日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确实差别不大。如果他们变成了新一代的「马其顿民族」的话，那么就是当时人们主动认同，「我要做马其顿民族，我就是马其顿民族了」；要么就是负责教育他的中学教师、报纸或者政府官员告诉他，「你以后要做马其顿民族，然后他就变成马其顿民族了」。



马其顿首都的亚歷山大塑像　图为马其顿首都斯科普耶的马其顿广场上的「亚歷山大骑马像」。纵然古马其顿人与现今的马其顿人关系薄弱而且亚歷山大大帝从未到过斯科普耶，但是并不妨碍推动「古代化」政策的马其顿政府将他发明为民族英雄。

当然发明民族最主要的方式，语言、文字、纪念物、国家象徵，这些东西在一九九五年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内正明火执仗地进行。西方国家看待这种肆无忌惮的去希腊化、去塞尔维亚化、去保加利亚化的做法，觉得这种发明很可笑。但他们忘记了，法兰西共和国过去也是这样做的。法兰西共和国为了塑造它的国家认同，最着名的做法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刻着「祖国感谢伟人」的先贤祠，为什么要如此？就是要发明法兰西民族。法兰西民族在一七八九年前也是不存在的，只有法兰西君主国。君主国要依靠国王作为共同体的凝结核，但共和国的核心则需要依靠民族。过去法兰西王国只要塑造路易十四就够了，有一部着名的歷史专书叫做《制造路易十四》[36]便是在讲路易十四如何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因为君主国的凝聚力就在君主身上，所以便要依靠路易十四的政治形象，便能有效维持法兰西君主国的统治。相同的，后来的法兰西共和国就必须塑造法兰西民族的政治形象。因此它必须有一个先贤祠，把过去那些法兰西王国臣民中的杰出人物，统统发明成法兰西民族的伟人，然后来一个「祖国感谢伟人」。其实，在那些伟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自认为诺曼第人或者普罗旺斯人，他们心目中的法兰西也只是指「法兰西岛」这个地区，而不是「法兰西王国」。

法兰西为了发明自己的民族，也是塑造过各种政治形象的。只不过

法兰西的民族发明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后歷经了一百多年，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也就是戴高乐将军的这个时候，除了布列塔尼和普罗旺斯也许还有一些疑问以外，大多数人都已经觉得法兰西民族好像是理所当然存在了。其实，回顾民族发明的歷史，并没有什么理所当然。而马其顿现在所做的其实就是法兰西在十九世纪初期从事的民族发明。因为马其顿才刚刚开始做，所以就显得很笨拙，给人留下一种很可笑、很神经质的印象。但是其实所有的民族发明在它的初始阶段都是这样的。况且马其顿还有一个法兰西民族发明没有的特殊现象：它是民族发明后连锁效应之下的产物。民族发明像下蛋一样，大蛋下小蛋，一路产生新的民族发明，一路发明到马其顿的头上。从希腊发明出保加利亚，从保加利亚又发明出马其顿。所以马其顿人对于「民族本质上是发明出来的，是人为建构的政治共同体」的印象格外深刻。民族发明对于他们来说，最早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四五年的事情，是他们的祖父一代还记忆犹新的。现代马其顿的民族发明，则是在他们刚刚成长、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投票权以后由他们亲自参与的歷史现场，对他们是有格外重大的刺激作用。这种刺激作用，就像是今天香港那些参加反国教运动和雨伞运动[37]，或是今天台湾那些参加太阳花运动[38]的学生才能够亲身体会到。

马其顿
民族发明大事记

西元前**808**年至前**168**年
古代马其顿王国统治时期

兴起于西元前9世纪的古代马其顿王国，继前4世纪亚歷山大大帝时代后统治整个古希腊世界，直到前2世纪被罗马人征服后灭亡。古马其顿王国的人种和文化，与现代的「马其顿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关系，却是马其顿民族发明的主要材料。

1371/9/27
马里查战役爆发，奥斯曼帝国占有马其顿

奥斯曼军队在巴尔干东部的马里查河击败了以塞尔维亚王国

为首的各国联军，自此奥斯曼帝国併吞了马里查河以西的区域，包括马其顿地区。

1878/3/3

马其顿地区被划归为保加利亚领土

原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地区，在结束第十次俄土战争的《圣斯特凡诺条约》中划归为新成立的「大保加利亚公国」领土。

1878/7/13/

马其顿地区重新回归奥斯曼帝国

欧洲列强缔结《柏林条约》并将马其顿地区重新归还给奥斯曼帝国，此举催生了反抗奥斯曼统治的马其顿民族发明运动。

1893年

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成立

以达梅．格鲁耶夫为首的马其顿民族发明家在马其顿地区成立「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进行武装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活动，例如1903年8月2日爆发的伊林顿起义。

1913/8/10

《布加勒斯特条约》签订，马其顿地区遭到瓜分

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参战各方缔结《布加勒斯特条约》，将马其顿地区划分为三部分，瓦达马其顿属于塞尔维亚，皮林马其顿属于保加利亚，爱琴海马其顿属于希腊。

1918/12/1/

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建立「南塞尔维亚省」

原属于塞尔维亚的瓦达马其顿地区，在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成立时被改制为「南塞尔维亚省」，「马其顿」此时被发明为

「大塞尔维亚民族」的一部分。

1923/6/14

保加利亚首相遭刺身亡，导致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式微

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受到苏联影响，採取更激进的反抗活动，刺杀了保加利亚首相斯塔博利斯基，因此遭到巴尔干各国排斥及强力镇压，在1930年代后逐渐式微。

1929/10/3

瓦达马其顿省的建立

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南塞尔维亚省」在第二南斯拉夫王国成立时被重新划分为两个省分：以瓦达马其顿地区为核心的「瓦达省」，还有包括蒙特内哥罗及波士尼亚的「泽塔省」。

1941/5/18

保加利亚併吞瓦达马其顿

二战爆发后，德国、义大利等轴心国占领南斯拉夫王国领土，将瓦达马其顿地区交由保加利亚统治。

1945/11/29

狄托建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

二战结束后，瑟纳普．狄托为了遏制「大塞尔维亚主义」，允许瓦达马其顿地区独立，并建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成为「六族共和」的南斯拉夫联邦成员国。

1990/6/17

VMRO–DPMNE政党成立

VMRO–DPMNE自称为1893年的「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政治继承者，全名为「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马其顿民族统一民主党」。它成立后赢得议会选举，成为马其顿的主要

政党，积极推动马其顿民族发明运动。

1991/9/8

马其顿独立

在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允许下，马其顿从南斯拉夫联邦中和平独立，建立马其顿共和国。不过希腊认为「马其顿」仅为地理名词，因此拒绝承认马其顿共和国。

2006/9

马其顿实施「古代化」政策

赢得议会选举的VMRO□DPMNE政党成为执政党，实施「古代化」政策，以建立「马其顿民族」与古马其顿王国之间的歷史关联性。

2019/2/12

马其顿更改国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马其顿举行全民公投，更改国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获得希腊承认，并在2020年申请加入欧盟。

---

1. 马其顿王国是古希腊时期，位于希腊世界边陲地带的君主国家。菲利普二世（359–336 BC）与他的继承者亚歷山大大帝（336–323 BC）为古代马其顿最知名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统治期间，马其顿人不断侵攻希腊，在西元前三三八年透过签署「科林斯同盟」而获得了全希腊的霸权。从西元前三三六开始，亚歷山大大帝率领希腊联军，进攻波斯，最终以少胜多，灭亡波斯帝国，开创马其顿–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
2. 西元一三七五年（洪武八年），朱元璋下诏颁行《洪武正韵》，以南京白话为基础音，取代原本在南京通行的吴语及其他本地方言，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
3. 佩特科．斯拉菲可夫（Petko Slaveykov, 1827–1895）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教育家，一生致力于收集民谣，以保加利亚语进行文学创作，反击希腊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保加利亚独立后曾任国民大会主席、内政部长等职，并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担任《马其顿报》（*Makedonia*）的主编。《马其顿报》的主要宗旨是反对大希腊主义、宣扬大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及促进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独立。
4. 上海《申报》，于一八七二年创刊于上海，创办人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为近代东亚地区歷史最早且最具广泛影响力的商业报纸之一。中共解放军于

一九四九年占领上海后，《申报》宣布停刊。

5. 「内部革命委员会」，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组织，一八六九年由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瓦西尔．列夫斯基创立，一八七二年併入「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后者为保加利亚激进民主主义者柳宾．卡拉维洛夫（Lyuben Karavelov, 1834–1879）于一八六九年在布加勒斯特创立，该组织策划了保加利亚境内的多次起义，包括一八七六年的「四月起义」。
6. 第一革命区在「保加利亚」东北部，以特尔诺沃（Tarnovo）为中心；第二革命区在「保加利亚」东南部，以斯利文（Sliven）为中心；第三革命区在「保加利亚」西北部，以弗拉察（Vratsa）为中心；第四革命区在「保加利亚」西南部（包括今马其顿地区），以普罗夫迪夫（Plovdiv）为中心。一说还有第五革命区，以索菲亚（Sofia）为中心。此种方式类似于东亚的同盟会，除总会外尚有十一省区的分会，包括了由胡瑛负责的中部同盟会（统筹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各分会）与陈少白负责的南部同盟会（统筹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蓬洲各分会）。
7. 《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是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在俄土战争结束后，于一八七八年在土耳其西部的圣斯特凡诺签署的条约，本条约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近五百年的直接统治，成立半自治的保加利亚公国。
8. 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条约》规定，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允许马其顿以东、巴尔干山脉和洛多皮山脉之间的地区成立名为「东鲁米利亚」（Eastern Rumelia）的自治省，以普罗夫迪夫（今保加利亚第二大城）为首府。
9. 由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于一九〇一年在东京成立的民间组织，宗旨为驱逐满洲地区黑龙江一带的俄罗斯势力，其组织名即从「黑龙江」而来。日俄战争于一九〇五年结束后，黑龙会开始与日本军方合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改组为具有法西斯色彩的大日本生产党。二战结束后，于一九四六年遭到驻日盟军司令部（GHQ）勒令解散。
10. 索菲亚．斯托扬诺夫（Zahari Stoyanov, 1850–1889），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活动家、政论家。出身农民家庭，他在一八八五年建立「保加利亚祕密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东鲁米利亚地区的普罗夫迪夫发动政变，要求和保加利亚大公国合併。一八八六年，奥斯曼帝国同意任命保加利亚大公为东鲁米利亚总督，东鲁米利亚併入保加利亚。
11. 「马其顿和阿德里安堡内部革命委员会」（Internal Macedonian-Adrianopl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组织。一八九三年由马其顿地区的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成立于塞萨洛尼基，以将马其顿地区併入保加利亚为组织宗旨。一八九七年后开始游击战活动，与当地的亲塞尔维亚势力和亲希腊势力频繁冲突。一九〇三年八月，在马其顿和东色雷斯地区发动起义，遭到奥斯曼帝国镇压。一战后，保加利亚因战败而丧失马其顿，该组织在马其顿的分支重组为「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IMRO），对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和希腊占领军开展武装袭击，并多次实施暗杀政治人物的活动，被三国视为恐怖组织，遭到联合镇压，一九三四年后逐渐式微。
12. 达梅．格鲁耶夫（Dame Gruev, 1871–1906），保加利亚民族主义革命家。生于今北马其顿境内。早年先后在塞萨洛尼基、贝尔格勒和索菲亚接受教育，最终接受了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思想。一八九三年与哥策．德尔切夫（Gotse Delchev, 1872–1903）和赫里斯托．塔塔尔切夫（Hristo Tatarchev, 1869–1952）等人一起创立「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德里安堡革命委员会」（Bulgarian Macedonian-Adrianopl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简称BMARC），即「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的前身，试图以一八七六年「四月起义」的模式在马其顿和色雷斯推动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一九〇三年参与

伊林顿–普列欧布拉兹赫尼起义时战死，保加利亚和北马其顿均视格鲁耶夫为民族英雄。

13. 塞萨洛尼基的第三军（Third Army），奥斯曼帝国驻扎在希腊塞萨洛尼基的军队，一九〇八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诸多重要人物，如恩维尔帕夏、凯末尔都出自此军。于一战期间跟俄罗斯的「沙俄高加索集团军」作战，并负责镇压亚美尼亚民族解放运动。
14.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蒙特内哥罗于一九一二年缔结的「巴尔干同盟」，通过祕密协定作出一系列瓜分奥斯曼领土的安排。其中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约定，双方以「克里瓦帕兰卡–奥赫里德线」（Kriva Palanka-Ohrid line）为界瓜分马其顿地区，该线东南归保加利亚，该线西北则归塞尔维亚。希腊也要求马其顿部分领土，但塞尔维亚及保加利亚均不肯让步，引发了一九一三年六月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15.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因将主力军集中于东线阿德里安堡等地，导致马其顿西北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被塞尔维亚和希腊占领。塞尔维亚拒绝撤出所占领的马其顿土地，并与希腊缔结了祕密军事同盟。一九一三年六月三日，保加利亚攻击马其顿的塞、希军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除塞、希外，蒙特内哥罗、罗马尼亚、奥斯曼帝国也先后加入战争。保加利亚于七月二十日求和。根据八月十日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和九月三十日的《君士坦丁堡和约》，保加利亚放弃了对马其顿大部分地区的领土要求，并将南多布罗加和包括阿德里安堡在内的东色雷斯地区分别割让给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国。
16. 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 1881–1922）奥斯曼帝国末期的三巨头之一，与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及杰马尔帕夏合称「三帕夏」。恩维尔帕夏是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袖，一战结束后，他在哈萨克地区参与反苏俄的巴斯玛奇运动（Basmachi movement），被苏军击毙，得年四十岁，被现在的土耳其人视为民族英雄。
17. 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王国的一个省区，存在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管辖范围包括北马其顿、科索沃、桑札克（Sandžak）等地。
18. 火烧赵家楼，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爱国学生因不满日本在巴黎和会取得山东半岛的租借权利，发起游行并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居所「赵家楼」。
19. 保加利亚在一战中战败后，根据一九一九年的《讷伊条约》（*Treaty of Neuilly-sur-Seine*），保加利亚将西色雷斯割让给希腊，从而丧失了爱琴海出海口。另外，与塞尔维亚的边界也进行了一些不利于保加利亚的调整，即所谓「西部失地」。
20. 农民党（Bulgarian Agrarian National Union）于一八九九年成立，代表保加利亚小农利益。该党于一战后成为保加利亚第一大党，并在一九二〇年执政。该党推行有利于小农的民粹路线，并拥有武装组织「橙色卫队」。一九二三年六月，农民党政府被军方和民族主义发动的政变推翻，之后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附随统战组织。
21. 亚歷山大．斯塔博利斯基（Aleksandar Stamboliyski, 1879–1923），保加利亚农民党政治家，一战前为农民党制定意识形态纲领，对内主张维护小农利益，对外反对政府的扩张主义和亲德路线，鼓吹巴尔干联邦主义。一战后，他领导的农民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组阁，任内运用威权手腕同时打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致力于建立有利于小农的教育和财产体制。承认凡尔赛体系的战后安排，与巴尔干邻国和欧洲各国实现和解。一九二三年三月，他与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王国签订《尼什条约》，联手打击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此举引起国内军方和民族主义者不满并于一九二三年发动政变，斯塔博利斯基最后被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人员捕杀。
22. 义大利的赤军旅是一九七〇年代义大利的左派武装组织，创建者为雷纳托．库乔（Renato Curcio），主要成员为工人和学生，该组织最着名的行动是在一九七八年绑架

并处决了义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 1916–1978）。

23.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1882–1949），于一九一九年开始领导保加利亚共产党，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长期从事共产国际的特务活动。一九三三年他被纳粹德国以「参与柏林国会纵火案」的罪名逮捕，最后无罪释放。一九三五年后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总书记，前往中国负责协调莫斯科、毛泽东及中共的关系，并推动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二战结束，季米特洛夫返回保加利亚，出任新成立的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理，直到一九四九年病逝。
24. 由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的左倾成员于一九二一年九月成立，主张马其顿自治和巴尔干联邦主义（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同组成联邦），反对大保加利亚主义路线。在一九二〇年代与农民党政府合作，共同打击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农民党政府倒台后，该组织又寻求苏联的援助，逐渐沦为共产国际的附随组织。
25. 一九二四年五月六日，三方代表签署《五月宣言》，宣布致力于在「多族群的」马其顿地区建立独立国家。但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的多数成员对该宣言背离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而感到愤怒，拒绝支持该宣言。
26. 《孙文越飞宣言》，由孙文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Adolph Joffe, 1883–1927）于一九二三年共同发表，奠定了国民党和苏联合作的基础。内容主要分为四点：一，共同促成中国的统一，强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中国。二，苏联愿意放弃俄罗斯帝国时代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另行订立新约。三，中国和苏联政府应共同协商东北铁路管理问题。四，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
27. 保加利亚军事政变（Bulgarian coup d'état of 1934），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由保加利亚军官组成的「环节集团」和「军官同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左派的人民党政府，以基蒙．格奥尔基耶夫（Kimon Georgiev）为首相建立新政府。新政府禁止了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摧毁了该组织在佩特里奇（Petrich）的基地。此后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日益衰落，除二战期间与德国占领军有过短暂合作外，战后即完全停止活动。
28. 约瑟普．布罗兹．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父亲是克罗埃西亚人、母亲是斯洛维尼亚人。一九三七年接任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二战后就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持续执政到一九八〇年过世为止。尽管他被批评为独裁统治，但个人形象通常被视为南斯拉夫联邦内各民族统一的象徵。美苏冷战期间，狄托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瑟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又被称为狄托主义。
29. 二战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曾就两国合併为「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问题进行协商。一九四七年狄托和季米特洛夫签订《布莱德协议》（Bled agreement），双方同意赋予两国境内的马其顿人以独立民族地位，并就马其顿各个地区的合併、「西部失地」交还保加利亚、在两国间废除护照并成立关税同盟等问题达成了一致。一九四八年六月，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恶化，保加利亚追随苏联而与南斯拉夫断绝关系、废除了各项条约，进一步谈判遂不再举行。
30. 二战后期，以狄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承认「马其顿民族」的独立性，支持马其顿人在南斯拉夫联邦内的主体地位。故一九四四年八月，南斯拉夫宣布成立「民主联邦马其顿」，并在一九四五年改名为「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加入南斯拉夫联邦。一九九一年独立后改名为「马其顿共和国」。
31. 一八九三年成立的「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请参考注释［请参考本讲注释11］）在二十世纪中期消失后，二十世纪有两个政党宣称该组织为他们的前身，分别是在一九九

〇年成立的VMRO–DPMNE，全名为「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 - 马其顿民族统一民主党」，为现代北马其顿的政党；另一个是一九九一年成立的IMRO–BNM，全名为「马其顿内部革命委员会 - 保加利亚民族党」，为现代保加利亚的政党。

32. 斯洛波丹．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 1941–2006）南斯拉夫政治人物，歷任塞尔维亚总统（1989–1997）、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1997–2000）、塞尔维亚社会党创始人和领导人（1992–2001）。米洛塞维奇于一九八九年就任塞尔维亚总统后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导致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解体并陷入长达八年的内战，被西方媒体称为「巴尔干屠夫」。二〇〇一年，米洛塞维奇被塞尔维亚政府逮捕后、以战争罪移送荷兰海牙监禁，于二〇〇六年死于狱中。
33. 保加利亚迄今为止的官方立场是，承认北马其顿国家的政治独立，但不承认马其顿民族和马其顿语的存在，认为马其顿人事实上是保加利亚民族的支系，所谓马其顿语是保加利亚语的一种方言。
34. 希腊坚持「马其顿」一词仅指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省，所以不承认从前南斯拉夫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有权使用「马其顿」作为国名，而是将其称为「斯科普耶共和国」（Republic of Skopje），「斯科普耶」即马其顿首都。一九九二年，塞萨洛尼基的希腊人发动百万人大游行，强调「马其顿」概念专属于希腊。马其顿政党和民间舆论也提出「马其顿再统一」、「索隆（即塞萨洛尼基）是我们的」等口号作为回击。希腊尽力阻止马其顿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及获得国际承认，直到一九九三年，联合国安理会允许马其顿暂时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FYROM）的名称加入联合国。一九九四年，希腊对马其顿实施全面禁运，要求马其顿放弃现有国名。一九九五年九月，希、马双方签署临时协定，规定希腊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临时名称承认马其顿，希腊取消禁运，马其顿同意更换国旗，双方建立外交联络，直到此篇讲稿发表的二〇一七年为止，马其顿国名争议仍未解决。二〇一九年，马其顿共和国透过全民公投更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Republic of North Macedonia），并于二〇二〇年加入北约及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
35. 马其顿的「古代化」（Antiquization）政策，由当时执政的「马其顿民族统一民主党」政府于从二〇〇六年开始推动，引发各种国际批评及内部争议，最后于二〇一七年停止。
36. 《制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作者为英国歷史学者彼得．柏克（Peter Burke），本书分析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各种政治宣传文献，包括绘画、雕刻、文学、纪念章、戏剧等，论述十七世纪的政治宣传者如何包装君王形象。
37. 雨伞运动，又称「雨伞革命」或「占领行动」，二〇一四年九月香港学生及民众自发占领多个主要干道进行静坐及游行，占领区包括金钟、添马、中环、湾仔、铜锣湾、旺角及尖沙咀，其主要诉求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回二〇一七年行政长官选举及二〇一六年立法会选举框架和候选人提名方案，争取行政长官选举的公民提名权，以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占领群众面对警方多次以胡椒喷雾驱散时使用雨伞抵挡，「黄色雨伞」也成为此运动的主要象徵。
38. 太阳花学运，又称「三一八学运」，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试图强行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此举引起学生与民间团体的不满，隔日透过占领立法院表达抗议。占领期间，民众赠送大量「向日葵」声援占领人士，故媒体称之为「太阳花学运」。学运持续到四月六日，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提出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承诺，抗议学生与民众于四月十日退出立法院。

五

塞尔维亚

「五族共和」的残山剩水



塞尔维亚
Republic of Serbia
Република Србија
独立时间：2006年6月5日
首都：贝尔格勒

我们今天讲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代表了民族发明学的一个特殊类型，它不仅是奥斯曼主义留下的一个残片，而且是奥斯曼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一般意义上的奥斯曼主义是依託近代以前各多族群的大帝国的版图，企图把多种族群发明成为一个帝国民族。它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帝国和民族恰好是相互矛盾的概念。奥斯曼主义的一般形式，正如「奥斯曼」这个词所暗示的，它是有一个前近代的帝国作为依託基础的。奥斯曼主义是推动「坦志麦格」改革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发明的，它依託的就是歷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其他类似的例子，如大俄罗斯主义、大德意志主义之类的，它们都依託于歷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帝国。塞尔维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企图用「文化民族主义」（像泛日耳曼主义、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一样的文化民族主义，对于它来说是斯拉夫主义）发明出一个歷史上本来没有的帝国，这就是南斯拉夫。然后依靠外交协商填补国际政治的真空地带，人为地把这个新的帝国安插进去。所以它的失败就比奥斯曼主义的失败更加凄惨。塞尔维亚的命运和波士尼亚的命运是联繫在一起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耳熟能详

的种族清洗、族群灭绝，总是跟塞拉耶佛（Sarajevo）和波士尼亚联繫在一起，这就是人类迄今歷史上最极端的一种民族发明所造成的恶果。

我们回顾一下塞尔维亚的起源。当然今天塞尔维亚人的所谓祖先，在十八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他们的故事跟我们以前讲过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马其顿人的故事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类似大明国的拜占庭帝国和类似大清国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希腊东正教徒。但是在细节上，组成今天塞尔维亚的这个地区跟希腊、保加利亚和马其顿有一点点不同。用东亚读者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讲，鲁米利亚行省（也就是今天保加利亚）所在的大部分地区是一个相当于成都平原的地方，是一个郡县制因素比较强、顺民文化比较多、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也比较多的地方，奥斯曼帝国在这里面的统治力比较强，土地出产较多，是帝国的核心地区。作为今天罗马尼亚前身的瓦拉几亚公国则像是湖南，是一个土司领地，奥斯曼帝国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改土归流才把它改造成像是鲁米利亚行省（也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的郡县制地区。而塞尔维亚所在的地方呢，不仅比今天的保加利亚和今天的罗马尼亚更边陲，而且它这个边陲的方向还很特殊，是位于东西方两大帝国的交界线上，所以它在奥斯曼帝国中期和后期的地位比较像是明清时代的云南，它不仅像当时的瓦拉几亚，是一连串的土司领地，而且这些土司领地——用明帝国和清帝国的术语来讲，主要不是熟番而是生番，或是说他们是边境地带的豪强。

可以说「湖湘尼亚」或者湖南的土司在明朝或者清朝如果做上了都指挥使就会心满意足；但是明代的云南布政司和清代的云南省，这些地方的豪强一般来说是对北京的皇帝勉勉强强称一个臣，很礼貌地承认一下你封给他的封号，但是他对内是经常要称王的。比较强大的土司，例如像八百媳妇、澜沧、阿瓦这三大土司[1]，后来发展成近代东南亚的三大王国：元代和明代的八百媳妇土司，就是今天泰国的清迈，他们是近代暹罗王国和现代泰国民族国家的起源；另一个连名字都没有改过，寮国，也就是现在的瑯勃拉邦，就是近代寮国的起源；第三个，阿瓦，当然它是近代缅甸的起源。但是在大明国的云南布政司、三宣六慰[2]当中，上述三个地区都还不算是最强大的。像思任发[3]、沙定洲、普名声[4]这几个土司，其实比寮国、泰国和缅甸这三大土司更加强大。只是由于封建主义内在的博弈，当时显得最强大的这三大土司最后反而没有发展成功，反倒是当时不太显眼的另外三个比较小的土司发展成了独立王

国。但是你如果从蒙元和大明国的角度来看，我刚才提到的这六大土司当中，是很难看出它们之后的不同发展。它们的发展之所以会有不同方向，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大明国时其看上去势力最强大的、号称疆域广袤万里的麓川土司，就是思任发的对内称王的那个土司集团，被大明国派来的官兵消灭了。当然这也是因为思任发称王后大肆招摇的缘故。

假如有朝一日要把「大不列滇」[5]发明成为「大不列滇民族」的话，那么我必然要到大明国统治下的这些土司中，去寻找民族的起源，那么思任发的土司集团、普名声的土司集团或者沙定洲的土司集团必然会被我发明成为「大不列滇民族」的始祖。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出，假如我要把近代的辛亥革命以后的「滇军政府」发明成为「大不列滇民族」的话，前者由蔡锷和唐继尧开启的军政府跟歷史上的大土司—普名声、沙定洲或者思任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这几个土司政权强大过一段时间，后来灭亡了，然后又在辛亥革命以后兴起了蔡锷和唐继尧的滇军政府。但是如果滇军政府要把自己发明成为民族，要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跟你们不一样的话，那它必然会把过去的土司政权发明成自己的祖先。

塞尔维亚的故事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的。在「希腊辛亥革命」以前，塞尔维亚人的故事跟巴尔干半岛其他的希腊东正教徒是差不多的。在更早以前，在今天塞尔维亚和波士尼亚的版图之上有过几个巨大的土司王国，它们都像是普名声和沙定洲的集团一样，在某个时期非常强大，但是过段时间后就被拜占庭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消灭了。在这之中有两个土司王国，后来被十九世纪的塞尔维亚民族发明家发明成为他们的歷史祖先。但是我们要弄清楚，近代的塞尔维亚王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跟这几个所谓的前塞尔维亚的土司王国的关系，类似于沙定洲、普名声跟蔡锷、唐继尧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政治继承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它们其实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中一个王国在今天塞尔维亚和蒙特内哥罗边境上的斯塔里拉斯（Stari Ras），包含了波士尼亚的大部分土地。另一个王国是在今天的马其顿境内，也包含了今天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土地。它们的统治中心都不在今天的塞尔维亚和波士尼亚的核心地带。所以后来所谓的科索沃战役[6]和塞尔维亚人自古以来抵抗土耳其人的传说，都是一八四〇年代以后的发明。十九世纪的人看待这些发明，就像是我们看到今天马其

顿人一天到晚给他们的广场和学校搞正名游戏，一定要说他们是亚歷山大大帝的后代，而且跟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都没有任何关系的感觉一样。但是年深日久，过了一百多年，大家可能就习以为常了，甚至是把科索沃战役的神话视为理所当然了。这方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下面我会再提到。



科索沃之战　由塞尔维亚画家亚当·史蒂芬努（Adam Stefanović）创作于1871年的绘画作品，描述古赛塞尔维亚王国与奥斯曼帝国两军于科索沃激战的场景。此战役被1840年代的塞尔维亚歷史学者称为「科索沃神话」，成为塞尔维亚民族发明的主要材料。

在「希腊辛亥革命」的前夕，后来成为塞尔维亚民族英雄的卡拉乔尔杰，他原本是一个反叛成性的土司首领，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压力之下，他便前往敖得萨投靠了希腊友谊社。这个故事放在东亚的话，那就是相当于，云南有一个大土司头目跟清兵打了一阵以后，打不过清兵，他就跑到日本去投靠东京的同盟会，宣布他以后就是孙中山的信徒了，再靠着同盟会的力量打回云南。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就更简单了，可用几句话带过：卡拉乔尔杰带着同盟会的军队和俄国人的支持打回巴尔干，然后又失败了，接着列强进行了干涉，除了允许希腊独立以外，还要求奥斯曼帝国允许边境的这些土司王国实行自治。但即使是允许这些基督徒自治，享有自治权的土司总督仍然要由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挑选。也就是说，奥斯曼苏丹既然拥有边境土司的最高主权，他自然不喜欢卡拉乔尔杰这个造反派，于是另外挑了一个妥协性较强的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7]来当这个总督，在今天的塞尔维亚境内实行一国两制。这个一国两

制的塞尔维亚自治区，而不是上一段提到的那两个塞尔维亚土司王国，才是近代塞尔维亚的起源。

这个塞尔维亚自治区的居民，跟边界另一边——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徒、今天的内地克罗埃西亚居民的祖先，实际上是同一批人。他们形成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奥斯曼帝国推翻了拜占庭帝国、像清兵入关一样吞併了包括土司领地在内的所有拜占庭帝国的土地的时候，今天塞尔维亚居民的祖先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他们要么就像是过去侍奉拜占庭皇帝那样继续侍奉奥斯曼苏丹，要么就像是南明时期的李定国[8]，扬言宁死荒野也绝不投降鞑子。于是后者就越过边境，逃到了内地克罗埃西亚那一边，神圣罗马帝国收留他们，也封他们做土司首领，让他们负责守边。这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克罗埃西亚边疆区的起源。

克罗埃西亚边疆区的起源构成了今天的内地克罗埃西亚人的起源，但是沿海克罗埃西亚人是另外一回事。克罗埃西亚沿海的土地又称为伊利里亚或者达尔马提亚（Dalmatia），上头的居民是义大利人的亲戚，跟内地的克罗埃西亚人或内地的塞尔维亚人不是同一拨人。在古代，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划界的时候，他们是划在西罗马帝国一方的。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和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划界的时候，他们是划在神圣罗马帝国一方的。在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达尔马提亚变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殖民地或者附属地。这个地方的菁英阶级自古以来一直是讲义大利语的。他们跟内地这些人，实际上直到十九世纪以前，从来没有在同一个政权之下联合起来过。

但是十九世纪的民族发明学促成了一个异常奇特的现象：本来是投降了土耳其人、为奥斯曼帝国打前锋、跟着穆斯林进攻维也纳、而且产生出了很多重要的奥斯曼帝国大臣和军官——包括率领奥斯曼帝国军队围攻维也纳的大维齐尔索库鲁[9]的那些塞尔维亚人，他们通过「科索沃战役神话」或者诸如此类的歷史神话，宣布他们自己是为欧洲抵抗穆斯林入侵的功臣，实际上他们在歷史上发挥的作用恰好相反；而真正是欧洲抵抗穆斯林的功臣，当时也被称之为是希腊东正教边区居民或者是塞尔维亚居民（当时的塞尔维亚还是一个地理名词）、后来把自己发明成为内地克罗埃西亚的这批人，坚决否认他们在歷史上做过这些事情，他们坚持说自己跟沿海地区的达尔马提亚义大利人是同一家，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德国人，不是义大利人。

从歷史考证的角度来讲，这些说法是极其牵强的。你如果要把它换

到东亚的语境中，那么故事情节就等于是：日本人打来以后，汪精卫带着一拨人留在南京投靠了日本，蒋介石带着一拨人去重庆投奔了美国，直到日本人被美国人打败，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十年，突然有一天，汪精卫的子孙发明了一套歷史神话说：以前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是汪精卫率领广大军民打败了日本人；蒋介石带到重庆的那拨人的子孙也发明另一套歷史神话说：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抗日战争，我们重庆人自古以来都是西藏人，是达赖喇嘛同胞的一部分。而且最后达赖喇嘛还宣布承认，古代的重庆自古以来就是西藏的一部分，蒋介石自古以来就是达赖喇嘛的属下。最后，重庆人跟西藏人合併起来发明了一个民族，而南京人则宣布当年他们是跟着汪精卫抗日才打败了日本人的。如果你把近代南斯拉夫各民族发明的故事搬到东亚来，那么故事情节就会变成这样。此时此刻的汉语居民会觉得这样的故事简直荒谬绝伦，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讲结尾说的，在民族发明学的领域里，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你想做而做不到的。至于克罗埃西亚人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的民族发明涉及另外一套比较复杂的系统，请见本书的第九讲。

从塞尔维亚的角度来讲，塞尔维亚人在奥斯曼苏丹任命的「特首」、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的统治之下，根据苏丹许诺欧洲列强所制定的一国两制规矩实施自治时，他们仍然跟巴尔干半岛其他各国的斯拉夫希腊东正教徒没有什么区别。故事就这么发展下去，直到一八四四年。这时塞尔维亚人还记得他们的歷史，包括两年前刚被政变赶下台的「特首」奥布雷诺维奇家族在内，塞尔维亚的所有世家大族都跟土耳其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今天被发明成塞尔维亚人国耻的科索沃战役结束后，塞尔维亚的王公和土司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奥斯曼苏丹，然后他们也成批地皈依了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发动的战争当中，塞尔维亚人出力最多、打仗最英勇的。在奥斯曼帝国最着名的奴隶禁卫军当中，出身塞尔维亚和波士尼亚的人数最多。亚洲各地的穆斯林，包括安纳托利亚那些歷史悠久、三代上百年、甚至几百年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人，跟他们相比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地位。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奥斯曼帝国主要是一个巴尔干帝国，主要是由今天保加利亚人的顺民祖先出钱、今天塞尔维亚人的土司祖先出兵构成的一个军事政治结构，而亚洲地区可说只是奥斯曼帝国的次要部分，直到一八四四年，今天的塞尔维亚人的对祖先的认识、土耳其人对和欧洲人对他们的认识仍然都是如此。



1915年塞尔维亚起义　由塞尔维亚画家帕亚·约万诺维奇（Paja Jovanovic）创作于1898年的绘画作品，描述1815年爆发的塞尔维亚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场景，此图中央手执十字旗帜的人物为这次起义的领袖──塞尔维亚民族发明家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这次起义的结果是塞尔维亚建立了「一国两制」的自治区。

今天克罗埃西亚人的祖先、其实是今天塞尔维亚人的表兄弟的那一批人，对他们的认识尤其是如此。两者本来是一家人，但是相互之间的感情恰好是最为恶劣的，双方都把对方看成是叛徒，跟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一样。他们跟美国人还可以妥协，跟苏联人还可以妥协，跟共产党还可以妥协，但就是为了他们都要说自己是孙文的正统的缘故，蒋介石的追随者一定要把汪精卫的追随者赶尽杀绝，相反也是如此。这都是因为，当初大明国灭亡──也就是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帝国的当时，本来是同一家人，一拨人愿意跟着穆斯林走，另一拨人宁愿离乡背井也要流亡到「重庆」去，跟着神圣罗马帝国、跟着我们的基督教亲戚走。这样一来你可想而知，造成的后果就是，双方都觉得对方才是叛徒，然后双方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尽管双方的血缘关系是最亲近的，但也是最水火不容的。真正同文同种的就是近代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所以他们的语言也叫「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Serbo–Croatian）。这说明了，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血缘兄弟，仍然可以因为政治选择的不同而发明为不同的民族。

当然在一八四四年以前，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只是一种很模糊的方言，它也是更古老的斯拉夫–希腊语的一种方言。但是塞尔维亚跟希腊和保加利亚有点不同，就是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是一个

荒远的边区土司辖地，所以它跟富裕又靠近内地君士坦丁堡、学校多知识分子也多的保加利亚和希腊不同，它受到希腊新文化运动和希腊白话文的影响是很小的，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方言当作国语。一八四四年以前的「一国两制」下的塞尔维亚，没文化的文盲老百姓说民间的方言土语，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说的是土耳其语。当时的贝尔格勒还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边界城市，塞尔维亚最重要的城市是塞拉耶佛。塞拉耶佛绝大部分居民是穆斯林和犹太人，穆斯林占压倒多数，犹太人占一小部分。他们共同的沟通语言，不是现凯末尔发明的那种现代意义上的新土耳其语，而是老土耳其语或者说是奥斯曼语。

我们要明白奥斯曼语虽然被有些人称之为是老土耳其语，但是它到底算突厥语的一个分支还是算波斯语的一个分支是很难说的。奥斯曼语就像是印度莫兀儿人经常使用的乌尔都语（Urdu）一样，是受到古波斯语及波斯文化深刻影响的一种雅言，按照当时穆斯林社会的观点来看是非常高雅的，是适合于吟诗作赋的语言。这跟二十世纪以后才临时发明出来的，除去了波斯语成分的新土耳其语是完全两回事。新土耳其语就不是雅言了，因为除去了几百年长期以来就已经使用习惯了的波斯词汇，它不得不从古代内亚的什么突厥汗国的碑文里面去找各式各样的词汇来填补空缺。在一八四四年以前，一国两制的塞尔维亚总督辖区，上层人士跟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来往中东与欧洲各地的犹太商人都说通用奥斯曼语、混合奥斯曼语，普通的老百姓说谁也瞧不起的民间方言。故事直到一八四四年，民族发明家才开始介入。

民族发明家之所以介入也是有原因的。我们在前面提过，在一八二一年的「希腊辛亥革命」开始爆发时，也就是卡拉乔尔杰本人以革命党人的身分加入同盟会的那个时代，是只有希腊主义而没有斯拉夫主义的。到一八四〇年代，斯拉夫主义逐渐成型并开始跟希腊主义平分秋色。因为在小希腊独立及俄军进入多瑙河两公国以后，本来是同一个希腊主义覆盖的这片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由于列强的介入，在政治上开始分歧了。这个分歧的模式就有点像，例如张作霖接受了日本的保护；陈炯明接受了英国的保护，尽管他们双方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还觉得可以共建中华民国，但是英国人和日本人插手、双方各有各的列强保护人以后，他们就产生别的想法了。

希腊主义者的核心领土当然是在希腊。在希腊独立以后，由于《君士坦丁堡条约》和《伦敦协定》的关系，保护希腊的主要任务就落在大

英帝国的头上了。可以说，希腊跟英国的关系就像现在的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或像二十世纪初古巴跟美国的关系，《伦敦协定》发挥的作用就有点像现在的《台湾关系法》和《普拉特修正案》（*The Platt Amendment*）。列强对希腊实施保护权，但是真正能够执行保护的只有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伦敦协定》对希腊的保护是非常具体的，其中包括，土耳其在侵略希腊的时候，列强（但实际上是只有英国人）会负责保护它；在希腊发生内乱的时候，皇家海军和列强的多国维和部队可以在雅典附近的比雷埃夫斯港口登陆，进入雅典强行维持秩序。英国人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开进比雷埃夫斯港和雅典维持秩序的条约权利，他们在十九世纪至少使用过两次。俄罗斯帝国虽然实质上占领了构成今天罗马尼亚前身的多瑙河两公国，但是众所周知，俄国人在海上的势力是远远不如英国的。尽管它也是《伦敦协定》的签字一方，按说干涉希腊的事情应该由英法俄三国共同进行的，但自身是陆上强国而不是海上强国的法俄两国，很快就不得不自动退休了，让英国人独家承担这个使命。

结果就是，尽管希腊主义革命者最初是拿敖得萨当基地，但是发展到最后，小小的希腊王国实际上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这样就使得大希腊主义者中有很大一拨人感到不满意。他们原先设想的希腊民国是一个高度亲俄的国家，但是实际上希腊王国却走向了亲英的路线，他们感到自己吃亏了。后来在保加利亚问题和塞尔维亚问题上，这一拨人的后代也感到吃亏了。最后他们这种吃亏的感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后话了。总之在十九世纪中期，他们有种吃亏的感觉：他们费尽心力发明的希腊主义本来是为了俄国和全世界东正教徒团结起来的，结果搞到最后便宜了大英帝国。但是现在木已成舟，唯一的办法就是：大英帝国无论如何只控制着希腊群岛和希腊沿海的这一小部分，大英帝国对于贫穷落后、布满群山的内地（特别是土司领地）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英国人拿去了这一部分，也就只有随它拿去了，英国还没有拿去、目前还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这些地区，我们还可以重新发明一次，这一次我们吸取教训，我们不再发明希腊主义了，我们要发明斯拉夫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的斯拉夫主义跟最初的希腊主义一样，也是高度亲俄的。希腊主义认为，希腊东正教徒当中只有俄罗斯最强大。斯拉夫主义则认为，在斯拉夫文化和斯拉夫种族来源的各国当中，只有俄罗斯最强大。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一样的，都是要在俄罗斯的领导之下，把广大的

斯拉夫人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在十九世纪中叶，他们还没有这个胆量要求所有斯拉夫人都从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或者普鲁士王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时候他们的目标还仅仅只是奥斯曼帝国，直到十九世纪末，他们的野心才进一步扩张到连德国人都要推翻的程度。但是我们要注意，民族发明学这种东西都是「先射箭、再画靶」的游戏，也就是说，你把箭射出去以后，再在你射中的那个地方画一个靶心，这样你就百发百中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因为巴尔干半岛的居民自古以来都是斯拉夫希腊东正教徒，所以他们才发明了希腊主义，然后才觉得我们应该亲俄，或者是，巴尔干半岛的居民在种族文化上是斯拉夫人，然后他们才觉得自己跟俄国人是一家。实际情况是恰好相反，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亲俄派政治家觉得，我们当带路党的时候最好是要跟着俄国人走，然后再拍拍脑袋，我们应该怎样把自己的政治诉求合法化，怎样发明一个自古以来的理由呢？

例如，如果我不想要台湾，那么我就可以说台湾自古以来就不属于中国，因为它在明代以前就跟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要的是朝鲜的话，我可以说朝鲜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台湾自古以来就不属于中国的，因为朝鲜早就被汉武帝征服过，那时候谁都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呢。但是如果我的政治决定恰好相反，我不去打朝鲜、而是要打台湾的话，那我就可以说，尽管朝鲜在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时候都是你的，但是我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台湾在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但是我一定要硬着头皮说它自古以来就是我的。西藏的状况也是这样的。你可以说，从汉武帝开始，西藏就不是你的；你也可以说，自从蒙古帝国或者满洲帝国那个时代，西藏就是你的。这都是看你随便选择了，关键是要看你当时的政治动机是怎样。

对于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总督辖区这一批斯拉夫民族发明家来说的话，他们在一八四四年发明斯拉夫主义跟他们的老师在一八二一年发明希腊主义的逻辑是一样的，本质上都是政治投机。而且政治投机的目的都是为了，我们不要做英国人的带路党，而要做俄国人的带路党。只不过原先那一批本来想要给俄国人带路的人，带着带着就被国际体系给带偏了，最后给带到英国人怀里面去了。然后他们觉得自己上当了，就觉得有必要重新发明一下，于是斯拉夫主义的发明就开始了。后来的南斯拉夫，也就是「大塞尔维亚」是斯拉夫主义民族发明的第一个实验品，也是今天塞尔维亚悲惨命运的主要原因。

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主义有两位发明家，第一位是语言学家武克．卡拉季奇[10]。他当然不是后来在海牙上战犯法庭的那一位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语言学家卡拉季奇的功能跟全世界民族发明家当中负责语言学的那一拨人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运用德国浪漫主义的原则，运用格林兄弟写《格林童话》的原则，运用安徒生通过编写《安徒生童话》发明丹麦文的原则，把原来只不过是农民和乡民使用的方言土语（就是今天的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发明成为正式的国语，发明成为一种可以写进中小学教科书的语言。第二位仁兄更重要一些，就是伊利亚．加拉沙宁[11]。加拉沙宁的重要性就是在于，他不仅在一八四四年写出了被认为是后世「大塞尔维亚」起源的《备忘录》，而且他还是塞尔维亚公国的内政大臣。他掌握着贝尔格勒的强力部门；掌握了强力部门，基本上就掌握了大半个国家。他要通过本国的官方档、报纸、中学教科书之类把他认同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全国人民，那是很容易的。

同样在一八四〇年代，另一拨民族发明家重新发明了科索沃战役的歷史。他们的发明方式就跟我刚才讲的那样，比如说蔡锷决定宣布云南独立，他就要拍拍脑袋，到明代以前的云南歷史中去找古圣先贤，然后他自然会说：「金庸《天龙八部》里面的段誉是我们的先王，跟大明国打仗的土司头目思任发是我们的先王」，把他们都发明成为「大不列滇民族」的先王。这样发明了以后有一个重大的效果，他们把科索沃战役发明成「代表欧洲文明的塞尔维亚人反抗穆斯林入侵的英雄伟业」，所以从今以后就有了一个塞尔维亚的天命，「塞尔维亚民族」也就此诞生了。「塞尔维亚」从地理名词变成政治名词，本身就是为了让塞尔维亚人夺取实际上原本是由今天的克罗埃西亚人、当时的克罗埃西亚边疆区的天主教徒承担的歷史使命—为欧洲抗击奥斯曼帝国。当然这个功劳实际上是由现代克罗埃西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đman）的祖先—当时的克罗埃西亚边疆区的天主教徒所承担的。但是塞尔维亚民族发明家通过这样一个伟大的发明，就等于是把汪精卫的后代发明成为抗日英雄、把蒋介石完全抹掉一样，因为他们发明的那些塞尔维亚人其实恰好就是投靠了伊斯兰穆斯林、带着奥斯曼帝国大军进攻维也纳的那一批人；不但不是为欧洲保卫维也纳的主要功臣，恰好还是在土耳其统帅之下进攻维也纳的主力军。这一点是很容易考证明白的，一百个塞尔维亚民族发明家也掩盖不了，但是歷史真相为何对于民族发明来说是没

有影响的。

科索沃战役之所以在汉语世界的读者当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其实是出于一个很荒谬的原因。这个原因其实也跟民族发明学有点关系，因为民族发明学本质上讲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政治站队学」，它要维护谁、要伤害谁都是有明确动机的。我们大家要想想，今天的塞尔维亚人口总共不到一千万人，再加上跟塞尔维亚人友好的或者不友好的、干涉过巴尔干政治的那些周边各国，加起来人数也就只有那么几千万。当今世界上信誓旦旦地、无比虔诚地相信：「科索沃战役是欧洲歷史的转捩点，塞尔维亚人对欧洲人立下了大功。」这个理论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不在塞尔维亚，也不在巴尔干半岛，甚至不在欧洲，他们绝大多数都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我估计，今天人类当中可能有两亿左右的人相信塞尔维亚人是保卫欧洲、反抗伊斯兰穆斯林侵略的英雄，而其中大概有一亿五千万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这个现象的形成主要应该归因于我们亲爱的江泽民同志。因为当时的塞尔维亚人与波士尼亚人及科索沃人到处打仗，塞尔维亚民族发明家重新拿着科索沃战役的故事来证明他们屠杀科索沃人是很有道理的，说科索沃是代表土耳其人那一方面的、而他们是保卫欧洲的民族英雄时，江泽民所领导的中国是国际社会当中极少数愿意支持米洛塞维奇的人。而理所当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比较偏向自由派的这一拨人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反塞尔维亚的人，比较忠党爱国、比较五毛的这一拨人自然就维护塞尔维亚人了，于是他们围绕着科索沃问题激烈论战。当时网路还不流行，要不然一定会留下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在当时那些泛自由派的眼中，「江泽民」这个名字是自从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12]和邓小平死后全世界最可恶的人，而柯林顿总统则是一个基本上不可能犯错误的神圣人物。当时他们恐怕想像不到，时间还过了不到二十年，世界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居然会有人觉得江泽民本身就代表了走资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后希望。按照江泽民同志在科索沃战争时期的形象，那就是契尔年科和邓小平这种人在当时的化身，「撒旦」在人世间的代理人。事情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也就可以看出，从一九九〇年代发展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态是怎样的每况愈下。

无论如何，这一次争议就把科索沃战役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些文学青年，在咖啡馆和书店里面振振有词地争论政治的一个重大题

目，结果制造了大批的科索沃粉或者反科索沃粉。当然这个反对或者支持都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骨子里也还是为了眼前的政治问题。所有的歷史发明学都是这样的，所有的民族发明学也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假如要瞭解民族发明的动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考证相应的歷史。歷史方面的证据，在如此漫长的歷史当中，你总可以选择出一部分对你有利的，然后忽略掉另一部分对你不利的。关键是，你在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一八四四年的加拉沙宁要达到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希腊东正教基督徒一方面从奥斯曼帝国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要把他们从万恶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错误领导下解放出来，把他们拉回斯拉夫主义与大塞尔维亚的正确道路当中。这样就少不了俄罗斯沙皇的支持，但是沙皇如果想要在离奥地利边境这么近的地方，像他在瓦拉几亚或者后来的保加利亚那样直接出兵的话，那是会引起强烈外交反应的，所以你只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要打代理人战争之前，首先就要培养代理人。加拉沙宁的作用就是在一国两制的塞尔维亚公国内培养出一批斯拉夫主义者，这批斯拉夫主义者要发明一个「塞尔维亚民族」，再把塞尔维亚民族引到俄罗斯帝国一方来。

于是就在一八五八年，加拉沙宁和他所在的政治势力通过发动政变，把当时占据大公位子的亚歷山大．卡拉乔尔杰赶出了塞尔维亚公国，把已经倒向斯拉夫主义的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及其家族再次捧上了塞尔维亚公国的大位。这样做等于是你在香港发动了一场政变，把董建华给赶走了，另外派上一个你喜欢的人。而奥斯曼苏丹之所以没有做出反应，是因为俄国人陈兵多瑙河边境，威胁君士坦丁堡说：「塞尔维亚是在内地，是在皇家海军炮火射程之外的。英国人在海上是大王，但在陆上我才是大王。你以为英国人可以把舰队开到玛律马拉海去救你，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不可能把舰队开到贝尔格勒去救你的。你有本事就跟我开战吧！」奥斯曼苏丹跟英国人商量后发现他们对内地果然不感兴趣，于是就屈服了，接受斯拉夫主义者在贝尔格勒的统治。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加拉沙宁先生，「塞尔维亚民族」真正的始祖，就在「一国两制」的塞尔维亚公国当上了总理和外交部长。今天的「塞尔维亚民族」，就是由伟大的民族发明家加拉沙宁及其继承者经营了一百多年的结果。有他这样站住脚，塞尔维亚公国实际上已经注定会发明「塞尔维亚民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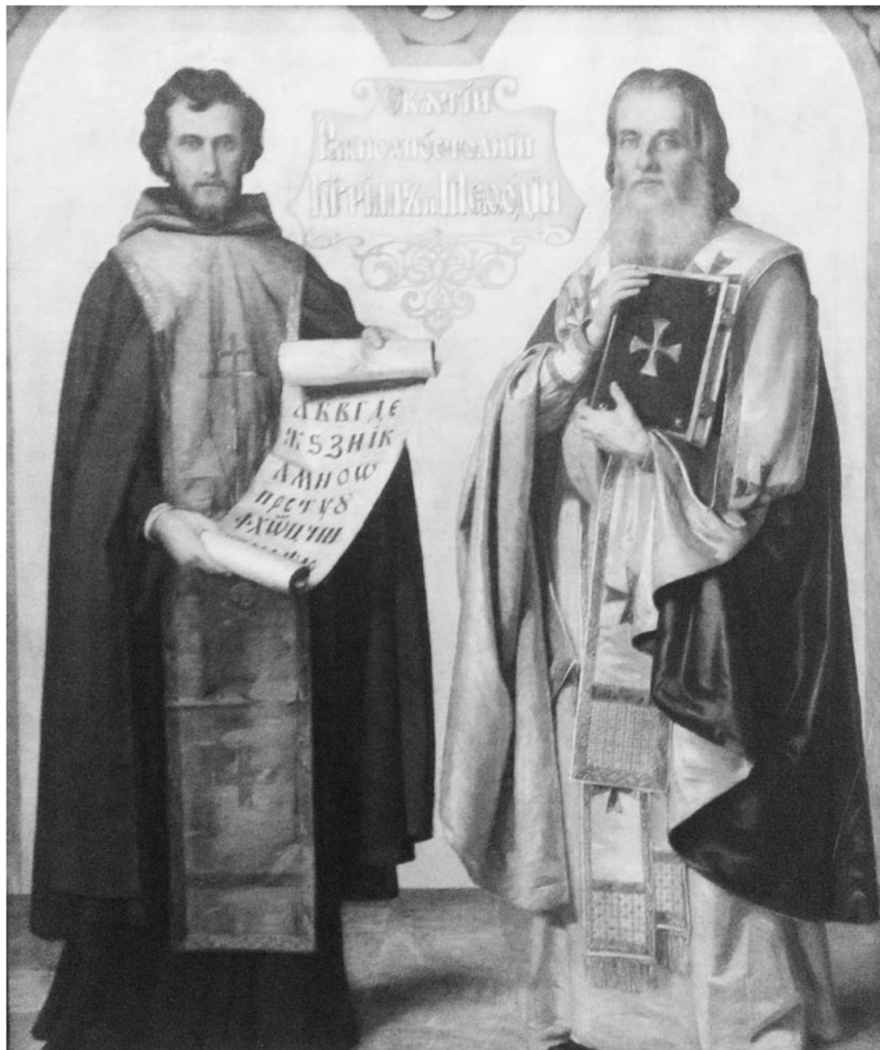
但是斯拉夫主义者的伟大计画可还没完成。区区一个小塞尔维亚，英国人也不会在乎巴尔干半岛上多出「罗马尼亚民族」、多出「保加利亚民族」之后再多出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但是如果塞尔维亚民族是「大斯拉夫民族」的先锋队呢？它的任务如果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小小的塞尔维亚公国，而是要把斯拉夫文化所在的每个地区都带到沙皇俄国的领导之下呢？那就是兹事体大，不仅奥斯曼苏丹要跳起来，大英帝国要跳起来，奥匈帝国也会跳起来，普鲁士国王也会跟着跳起来，这样一来就会引起全欧洲的大乱。以上这几个帝国原先的政治安排，都要因为这样一个空前巨大的民族发明而作废。事实上，后来塞拉耶佛的一声枪响，格雷勋爵所谓的「全欧洲的灯光都要熄灭了」[13]，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都是由于大斯拉夫民族的发明而造成的。这个发明动摇了旧欧洲的统治基础，动摇了东方和西方统治结构的整个基础，是当时前所未有、到现在也是后无来者、空前大胆的民族发明。

是因为到当时为止，最大胆的民族发明也只是奥斯曼主义这一级别的，就是把古代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发明成为德国，大俄罗斯帝国发明成为俄罗斯，大清帝国发明为中华民族，大奥斯曼帝国发明为奥斯曼民族之类的，这还是有点根据的，因为这样的发明并没有超越各帝国既有的边境；但是「大斯拉夫民族」一旦诞生，它就要粉碎各大帝国的边境，特别是要越过古老的东方帝国和西方帝国的边境。这条边境穿过了今天的波士尼亚，直到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这条边境古老的程度，比分割内亚和东亚的长城及山海关要古老得多，稳固得多。从人类最古老的时代开始，这条线以东是希腊文明，这条线以西是罗马文明；罗马帝国分裂的时候，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边界从今天的波士尼亚穿过；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帝国取代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势力范围和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势力范围也被这条边界线所分割。

在「大斯拉夫民族主义」发明以前，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势力曾经想像过把这条边界两方面的各个群体结合在一起。大家会认为，按照歷史的经验，这是极其荒谬的，荒谬的程度就相当于你要把位于蒙古的哈拉和林与位于河南的驻马店[14]统一在同一个国家那样荒谬。在歷史上，长城两侧的民族━东亚人和内亚人无论内部的政治结构怎样，东亚人永远要跟内亚人打仗，内亚人也永远要跟东亚人打仗。即使一个政治势力暂时越过了以长城为代表的这条划分东亚和内亚的边境，它到了新地方去

也会改变自己的身分。例如像是女真人，他们原先在「靖康之耻」的时候明显是内亚人征服东亚的代表，但是搬到汴梁城以后过了几代人，到金章宗（1168–1208）那一朝的时候，在蒙古人的眼中，女真人就变成「汉儿」和「汉公主」了[15]，他们反倒变成东亚人的代表了。他们一旦进入了东亚，就没有办法有效地管治内亚，而内亚人自然又会拥立出新的政治代理人──这一回就是蒙古人了。

像这样的故事在歷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我们都知道，唐太宗他们的祖先也就是北魏的鲜卑人。大家往往由于受近代中华民族发明家的误导，以为汉唐宋明是一个连续体，特别是汉唐并称，但是汉和唐其实是两个敌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像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是直接的敌对势力。唐朝人的鲜卑祖先正是汉朝人的主要敌人，东汉官兵一次又一次出塞攻击的那些鲜卑人就是后来李渊和李世民的祖先。正是在五胡乱华、汉魏帝国像拜占庭帝国一样崩溃、鲜卑人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占领了它过去的土地以后，才建立了后来的北魏帝国、北齐帝国、北周帝国和唐帝国。这几个帝国都是汉帝国在沙漠和草原上的敌人，他们本来就是汉帝国的内亚敌人的后代。但是他们进了汉帝国的故地以后，也像金章宗一样，「胡儿学得汉儿语」，开始以汉家子弟自居，把自己发明成为汉朝的继承者，这时草原上又会出现新的突厥人，像蒙古人取代女真人一样。结果，内亚和东亚对立的两极格局还是打不破。



圣西里尔与圣梅特迪乌斯肖像图　圣西里尔与圣梅特迪乌斯（Cyril and Methodius）为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传教士，于9世纪时前往斯拉夫地区传教，并参考希腊字母发明了「西里尔字母」以便将圣经翻译为斯拉夫地区的当地语言。他们死后被东正教会封为圣人，并在19世纪成为泛斯拉夫主义的象徵人物。

歷史上东方和西方的边界──波士尼亚边界、西欧的西部和东欧的东部这条边界，是比长城更古老、更稳固的。所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一八四四年以前，从来没有人认真考虑过打破这条边界。有很多人认为，「漫长的十九世纪」是在一九一四年结束的、「短暂的二十世纪」是在一九一四年开始的[16]；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歷史所有灾难的开始，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灾难的开始。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不可能有纳粹主义；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教育、培养、庇护和薰陶，也不会有今

天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可以说，包括宾．拉登，包括史达林，包括希特勒，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的一切灾难都始于一九一四年塞拉耶佛的那一声枪响。然而塞拉耶佛的那一声枪响是谁制造的？就是一八四四年的斯拉夫主义者。一八四四年的斯拉夫主义者设计发明出来的这个「大斯拉夫民族」，注定要颠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结构，将二十世纪的人类投入我们所知的现在这种状态。如果没有他们，一九一四年以后的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这一切最关键的焦点都体现在塞拉耶佛和贝尔格勒之间，所以法国的密特朗总统（François Mitterrand）在波士尼亚战争爆发以后访问塞拉耶佛的时候，塞拉耶佛的枪声还没有停息，可是让他百感交集的。因为密特朗是法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他还记得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岁月，没有想到一九八九年以后，在他担任总统的时候，塞拉耶佛的枪声又会重新响起。

经过斯拉夫主义的一系列薰陶，新成立的塞尔维亚公国就变成了斯拉夫主义的一个先锋兵，他们的斯拉夫主义比沙皇宫廷和俄罗斯帝国内部的斯拉夫主义者更加强大。因为沙皇本人毕竟还有一些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遗产在，他还要犹豫不决，觉得按照亚歷山大一世留下来的外交方案，沙皇俄国应该是欧洲正统君主制的堡垒，应该是跟德国、奥地利等君主国在同一阵营的，不应该支持像斯拉夫主义这样具有高度革命性、势必摧毁维也纳会议的全部和平安排、势必摧毁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所有古老君主国的边界和安排的可怕发明，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斯拉夫主义在沙皇的宫廷中间还只是竞争性的各党派之一。但是随着十九世纪后期的几次战争，包括我们前几次提到过的第十次俄土战争，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在俄土战争之前的那个时候，后来所谓的塞尔维亚人迪米塔尔．奥布西奇[17]也是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方面军司令，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当时还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两国的民族发明还都处在初级阶段，但是再过二十年就不是这样了。

可以说从输出斯拉夫主义革命的角度来看，塞尔维亚人的地位相当于是一九一九年的苏联，当时的苏联是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的大本营，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是伊斯兰国向全世界输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大本营，而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七八年──甚至是到一九一四年之间的塞尔维亚是向全世界输出斯拉夫主义的大本营，输出对象包括沙皇俄国。在贝尔格勒执政的斯拉夫主义者知道，小小的塞尔维亚支持不起他们「星辰大海」的巨大野心，只有把强大的沙皇俄国拿到自己手里面才能

够做得到。为此，他们必须在沙皇俄国发动长期的游说活动，也要借助外交形势以及沙皇政体的弱点。弱点在于，因为沙皇本身是专制主义的缘故，经常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受到西方人的批评。然后沙皇俄国的公众舆论就像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众舆论一样，重新解读这些批评。他们不能理解西方是因为不民主不文明才批评他们的，而要把这一点妖魔化成为，「我们俄罗斯人无论做什么，西方人都会恨我们，所以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然后在俄土战争导致保加利亚事实独立、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国际和会上强迫沙皇做出让步以后，就更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俄国人跟西方人打交道，总是俄国人吃亏。我们俄罗斯的战士努力打垮了土耳其人，结果得到的战利品都让英国人和德国人给夺去了。大保加利亚变成了小保加利亚，而且我们安置到保加利亚的王室还让德国人赶出来了。我们俄罗斯战士流了多少血，付出了多少牺牲，结果全让英国人和德国人坐享其成。所以我们放弃吧，欧洲人是不可信赖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有我们斯拉夫人，才是我们斯拉夫人的兄弟，只有俄罗斯海军和俄罗斯陆军才是斯拉夫人真正的朋友（Russia has only two allies; its army and navy.）。」这种意识形态在十九世纪末期越来越占了上风。

沙皇政府随着革命形势的成熟开始左右为难。一边是自由派要自由要民主，要让沙皇变成西方式的立宪君主制，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者到处扔炸弹，要在沙皇俄国搞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是斯拉夫主义者一天到晚这么游说，再加上沙皇自己也确实是在西方外交上吃了亏，他在自身力量越来越衰弱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在面临自由民主派、社会主义派和斯拉夫主义派这三种都具有高度群众性的新生力量当中，只能三害相权取其轻。自由民主派是可恨的西方代理人，社会主义者则是可恨的全人类之敌。反反覆覆看起来，只有斯拉夫主义者，虽然也喊革命，但是他们至少还认东正教，至少还愿意承认沙皇是东正教的领袖和所有斯拉夫人的领袖。看起来，在这三种革命思想当中，也就是斯拉夫主义对沙皇制度最友好了。于是随着沙皇制度的衰落，沙皇宫廷便一点一滴地落入斯拉夫主义者之手了。当斯托雷平[18]在一九〇七年担任首相的时候，沙皇的官方政府态度还不是这样的。但在一九〇八年奥地利帝国兼併波士尼亚以后，沙皇最后一次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最终便在一九一二年投入了斯拉夫主义的怀抱当中，斯拉夫主义者成功掌握了圣彼得堡的政权，就在两年以后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就在三年以后断送了沙

皇尼古拉二世和俄罗斯帝国的寿命。

波士尼亚的故事是这样的：按照塞尔维亚人发明的「大塞尔维亚」，它的核心实际上是在波士尼亚而不在塞尔维亚（当然这些并不重要，民族发明学是随便怎么样都可以的，你总可以找得到有利于你的论据），但是波士尼亚不属于一国两制的塞尔维亚行政区管辖内。即使是在土耳其帝国已经丧失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时候，波士尼亚在法律上仍然是土耳其人留在欧洲的一块飞地。土耳其人本着宁可让敌人的敌人得到好处、也不愿意让敌人得到好处的逻辑，宁愿把这块地方放弃给奥匈帝国，也不愿意放弃给虎视眈眈的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

波士尼亚的人口结构跟一八二一年以前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人口结构是差不多的，都有极大比例的穆斯林人口。在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方，今天的穆斯林人口之所以变得这么少，实际上是多次革命、战争和种族清洗的结果。尽管这个「种族清洗」是一九九五年以后西方媒体才发明的词汇，实际上跟种族也没有什么关系，清洗的双方无论自身是塞尔维亚人、波士尼亚人还是克罗埃西亚人，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们其实是一家人，清洗的标准不是「种族」，而是「认同」，但是西方媒体既然这么叫，我们就勉强承认它是「种族清洗」好了，反正这些名词的用法都是约定俗成的。那些地方的土耳其人其实就是穆斯林，因为按照十九世纪欧洲的普遍用法，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上，穆斯林和土耳其人是可以通用的。波士尼亚原先的东正教徒在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如果改信了伊斯兰教，那你把他们叫穆斯林也行，把他们叫土耳其人也行，这个无所谓的，这两个称号是同一个意思。

这些人看到俄国人入侵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土耳其人的统治垮台以后，像印巴分治以后的情况一样，大批穆斯林难民在本地无法生存，都必须背井离乡地逃亡到边界的另外一边，所以他们很害怕发生同样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立场比较中立的奥地利帝国对他们会更好一些──而他们这个判断也不错。这样，就在土耳其帝国和波士尼亚穆斯林双方的努力之下，再加上西欧列强，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没有哪一个大国愿意让不守规矩的沙皇俄国在中欧又获得一大片势力范围，于是在一八七八年，列强开会决定，把波士尼亚交给哈布斯堡帝国委託管理。

当然这个委任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殖民地管理。其实一九九五年以后的波士尼亚也是由北约和欧盟委任统治的。这样的委任统治比交给任何

一个族群管理至少都要人道一些，因为无论哪一族占了上风都要杀其他人，但是哈布斯堡的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族群帝国的领袖，而且他是欧洲人，他没有动机要杀任何一方的。他从奥地利派了一些高高在上的殖民者官员，正如一九九七年以后行使「波昂权力」[19]的欧盟官员一样，当地人在外来官员的政府中没有任何发言权，都只能服从外国殖民者，但他们的统治是相对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是人道和文明的，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波士尼亚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提高，主要是在这段时间内。

当然，塞尔维亚人吞併波士尼亚的企图落空后就很不高兴。在正式的战场上，他们没有把握打赢有德国人撑腰的哈布斯堡帝国，但是他们可以採用革命党喜欢的暗杀手段，于是塞尔维亚的总参谋部就组织了一个名叫「黑手党」[20]的组织，他们在波士尼亚活动的结果就是塞拉耶佛的一声枪响和斐迪南大公的死亡。一个国家的特工人员到另一个受列强合法委任统治的国家境内面去开了一枪，杀了该国的王位继承人，这种事情如果是在一八一二年发生的话，沙皇俄国一定会带头讨伐；但是在一九一二年以后，沙皇俄国自身已经被斯拉夫主义绑架以后，沙皇俄国居然会做出他们的祖先想像不到的事情—站到了斯拉夫主义一边，为塞尔维亚人出头。





第一南斯拉夫王國行政圖

第二南斯拉夫王国行政图
建立于1918年的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图右），在1922年推动行政改革，将国内行政区划分为33个「州」（Oblasts），并在1929年成立第二南斯拉夫王国（图左）时，再度将行政区重划为9个以自然地理为名的「省」（Banates），都打乱了原有的文化与族群边界并造成议会政治的混乱。

后来的发展我们都很熟悉，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三大帝国—德意志帝

国、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都土崩瓦解，在巴尔干半岛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这一下塞尔维亚人总算是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成功建立了「大南斯拉夫」，也就是第一南斯拉夫王国[21]。第一南斯拉夫王国跟「大塞尔维亚」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首先，第一王国内部划分为三十三个省，后来在第二南斯拉夫王国[22]时又划分为九个省，都打乱了原有的文化与族群边界。就像法国人把「阿尔萨斯–洛林省」划分为「上莱茵省」和「下莱茵省」[23]是同样的动机。按照一九一八年以后这个新南斯拉夫的政治逻辑，南部斯拉夫人是同一个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和斯洛维尼亚是同一个民族的三个不同的名字。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联合王国，以及后来的第二南斯拉夫王国，是一个「三族共和」的国家。「三族共和」的国家要继承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国际法地位，替协约国维持东欧的秩序。这个三族共和的民族发明，在人类歷史上其实最接近于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以后发明的「五族共和」。

当然按照小民族主义的原则，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与一九一八年的「三族共和」都不是真正的「民族」。克罗埃西亚的民族发明其实也是拼凑两种不同族群的结果。斯洛维尼亚人到底算德国人还是算斯拉夫人，是很有争议的。「三族共和」中发明的塞尔维亚人包含了今天的科索沃和波士尼亚的大批穆斯林人口，而这些穆斯林人口则是塞尔维亚人的死敌，他们誓死不肯承认自己是塞尔维亚人。所以这个「三族共和」的发明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但它还是能够维持这几十年，维持这几十年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塞尔维亚人的统治很有效或者是两个南斯拉夫的居民很拥护塞尔维亚人、很愿意接受他们的同化，关键是因为国际形势的缘故。三大帝国的解体，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在中欧留下的政治真空总得有人来填补，否则的话就没有一个国际法的主体了。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需要有人签字，二战以后的安排也需要有人直接继承。

这个逻辑，就是一九一二年大清帝国解体以后，满洲和蒙古可以继续跟十八省合作建立中华民国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就是朱迩典[24]、袁世凯以及梁启超指出的那个事实：如果大清帝国突然垮了，那么满洲怎么办呢？大清帝国在的时候，满洲高度自治，尊重日本和俄国的条约权利，事情还是很好解决的，大家都可以混得过去；大清皇帝一旦退位以后，如果没有一个继承国出来安排的话，那么日本人和俄国人马上就会为了满洲打一仗，西藏和四川之间也是非打不可的，甚至十八省之间，

广东人和湖南人为了争权力，也是非打不可的。尤其是大清帝国跟西方列强签订的那些贸易条款，如果全都作废的话，很多企业家都要吃大亏。所以大家都觉得，如果能够让袁世凯出来担任「善后维持会」的会长、把大清帝国原有的版图维持住的话，对大家都很方便。但是蒙古、西藏和满洲都是只认大清皇帝的，他们绝不会承认被大清皇帝征服的这一批降虏够资格跟大清皇帝的盟友平起平坐。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是征服者，而你们十八省是被征服者。征服者和征服者联姻、共同统治大清帝国是可以的，但是要双方平等，这是让征服者很难接受的。

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用「五族共和」这一个仓促设计的民族概念来弥补矛盾了。「五族」中的各族，汉、满、蒙、回、藏，按现在的观点来看都不是真正的民族，而是继承大清帝国内部中多元政治实体的「宪法性政治团体」。但是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只有临时拼凑出这样的法团来继承，才能拼凑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有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在远东的国际条约体系的安排当中，才有人来继承大清皇帝在条约上签字，列强在东亚的条约利益、贸易利益、扬子江的航行安全、东南沿海的海道安全、租界安全、外国企业的安全才有人负责管理。如果大家都散了，袁世凯不上台搞这个「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那么一九一二年的东亚马上就变成一九九五年的南斯拉夫了。各方的军阀和势力，满洲人和蒙古人大打出手，日本人和俄国人大打出手，十八省的各路军阀大打出手，事情马上就没法收场了。所以就只能让「中华民族、五族共和」这个民族发明来填补空缺了。

列强虽然知道巴尔干半岛的形势非常复杂，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发明很不靠谱，但是他们除了接受「三族共和」的南斯拉夫发明以外，也找不出更好的填补空缺的方法。于是他们就像是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四五年承认中华民族、承认「五族共和」一样，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四五年都承认了「三族共和」与「六族共和」的南斯拉夫。「三族共和」是第一南斯拉夫，「六族共和」是第二南斯拉夫。当然这点细节上的差异并不重要。因为篇幅关系，我就不再讲三族是怎样变成六族的具体情况了。但是实际上从宪法结构的角度来讲，「三族共和」与「六族共和」的差异是不大的。

依靠国际条约扶起来的，也会随着条约体系的变化而崩溃。列强之所以愿意承认南斯拉夫「三族共和」与「六族共和」的这个发明，也就是因为中欧这一块需要有人填空的缘故。等到冷战结束，苏联崩溃，欧

盟和北约东扩，中欧和东欧的政治真空终于不復存在了。扩大后的欧盟，重新肩负起一八一二年以前神圣罗马帝国、一八四八年以前日耳曼邦联的作用。它像以前的奥匈帝国、日耳曼邦联和神圣罗马帝国一样，重新覆盖了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由于歷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造成的政治真空。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在一九一八年为列强填补了真空、在一九四八年替列强抵御过苏联人、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的这个南斯拉夫「三族共和」或「六族共和」的安排变得不合时宜也没有必要了。曾经在冷战时期左右逢源的南斯拉夫，现在变得左右不逢源，失去了列强资格而变成一个多余的角色。苏联解体以后，南斯拉夫作为东欧最后一个残存的共产主义国家，不但不能像狄托的南斯拉夫那样左右逢源，反而变成了一个同时被俄罗斯和西方世界遗弃的物件。



强大的杜尚皇帝　此为塞尔维亚画家穆拉特（Marko Murat）创作于1899年的作品，描述杜尚（Stefan Dusan）在1346年接受塞尔维亚大主教加冕为塞尔维亚帝国皇帝。「杜尚皇帝的加冕礼」象徵了古塞尔维人最强盛的时刻，近代以来常被塞尔维亚或斯拉夫民族发明家称颂。

　　于是「三族共和」与「六族共和」掩盖之下的旧矛盾一旦爆发，南斯拉夫一下子就曝露了「大塞尔维亚」的本质。「大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必须在科索沃和波士尼亚跟过去的土耳其人（也就是现在的科索沃人）和过去的奥地利人（也就是现在的克罗埃西亚人）打仗。这些战争在熟悉歷史的人看来，实际上就跟一八七六年和一八四四年以前在东方帝国和西方帝国的边境上、奥斯曼帝国的各路杂牌军和奥地利帝国（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各路杂牌军相互作战的情况一模一样。克罗

埃西亚人回到了他们的祖先原有的位置上，塞尔维亚人回到了他们的祖先原有的位置上，波士尼亚和科索沃的十九世纪意义上的土耳其人、现代意义上的波士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也回到了自己原有的位置上。

塞尔维亚
民族发明大事记

1389/6/15
科索沃战役

奥斯曼帝国在这场战役后征服了古塞尔维亚王国，开始了对塞尔维亚地区长达五个世纪的统治。此战役被1840年代的塞尔维亚歷史学者称为「科索沃神话」，视为塞尔维亚人代表欧洲文明对抗穆斯林入侵的壮举，成为塞尔维亚民族发明的主要材料。

1804/2/14
卡拉乔尔杰与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

在卡拉乔尔杰的领导下，塞尔维亚爆发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歷经多次镇压，1813年宣告失败。卡拉乔尔杰逃亡到俄国境内的敖德萨，加入希腊友谊社并继续从事反抗运动，直到1917年过世后，被发明为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

1815年
塞尔维亚公国的建立

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领导了塞尔维亚的第二次起义，并成功建立了高度自治的塞尔维亚公国。这是近代塞尔维亚的起源。该公国的自治权利，直到1830年才被奥斯曼帝国正式承认。

1844年

加拉沙宁写作《塞尔维亚独立备忘录》

塞尔维亚政治家与民族发明家伊利亚．加拉沙宁创作《塞尔维亚独立备忘录》，宗旨为「建立以塞尔维亚为首的南斯拉夫国」，此政治纲领是「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起源。

1858/11/30

加拉沙宁政变

加拉沙宁发动政变，流放塞尔维亚大公，并迎立失势已久，但亲俄的斯拉夫主义者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再次担任塞尔维亚大公。此举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拉沙宁为对抗其宗主国奥斯曼帝国，而寻求俄罗斯协助的一项政治行动。

1878/7/13

塞尔维亚公国正式独立

在1878年列强签署的《柏林条约》中，塞尔维亚公国获得俄国支持，正式被国际承认并取得合法的独立地位，并于1882年升格为塞尔维亚王国。

1914/6/28

塞拉耶佛事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信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黑手党成员在塞拉耶佛刺杀奥匈帝国王储斐南迪大公，成为一次大战的引爆点。一战结果使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帝国等三大帝国相继解体，在中欧及巴尔干留下了政治真空。

1918/12/1

南斯拉夫王国的建立与「三族共和」

奥匈帝国的解体促使塞尔维亚王国吞併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王国，建立「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此王国建立在以塞尔维亚人为首的「三族共和」之上，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和斯洛维尼亚人是同一个「南斯拉夫民族」的三个不同

宗族、是同一个民族的三种不同名字。

1945/11/29

南斯拉夫联邦成立与「六族共和」

二战结束后，约瑟普．狄托成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名为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一个由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阿尔巴尼亚、蒙特内哥罗及波士尼亚等「六族共和」组成的「南斯拉夫民族国家」。狄托提倡「六族共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斯拉夫民族发明思想。

1991/6/25

南斯拉夫联邦解体

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同时宣布独立，南斯拉夫解体并面临内战危机。1992年，波士尼亚与阿尔巴尼亚也宣布独立，南斯拉夫只剩下塞尔维亚及蒙特内哥罗，二者重组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再改为「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联盟国」。

2006/6/5

塞尔维亚独立

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的联盟关系在蒙特内哥罗于2006年6月3日独立后宣告终止；塞尔维亚随即在6月5日独立，建立小民族主义立场的共和国，宣告「大塞尔维主义」彻底失败。

1. 八百媳妇，即兰纳（Lan Na, 1292–1775），泰国歷史上一个曾经控制泰北地区的王国，其国名在兰纳语中意为「拥有百万稻田的土地」。兰纳在元代的汉字名称为「八百媳妇」，明代称为「八百」，清代称为「景迈」或「整迈」。澜沧（Lan Xang, 1353–1707），寮国歷史上的古代王国，于一三五三年建国后定都琅勃拉邦（今寮国首都），其国名在寮语中意为「百万大象」。阿瓦（Inwa, 1364–1555），缅甸歷史上的古代王

国，于一三六四年建国后统治上缅甸地区，其国名在印度巴利语中意为「宝石」。

2. 三宣六慰是大明国在永乐年间（西元十五世纪初期）设置于云南地区及今缅甸、泰国北部和寮国中部的管理机构。「三宣」是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是车里宣慰司、缅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养宣慰司和寮国宣慰司。
3. 思任发是曾统治云南和缅甸交接处、接受大明国册封的傣族政权「勐卯土司」的统治者。他于一四一三年即位，一四三七年併吞南甸土司，引起大明国起兵征讨，史称「麓川之役」。思任发兵败后逃往缅甸的阿瓦王国，一四四六年死去。
4. 沙定洲、普名声皆为明代末期的云南土司首领。王弄土司沙定洲在阿迷州土司普名声死后併吞其领地因而势力大增，并于一六四五年起兵反明并攻陷云南昆明，最后于一六四七年遭到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击败后灭亡。
5. 大不列滇（The Great Diantnam）为当代云南民族主义者所发明的词汇，又称为「滇尼亚」（Diannia）或「滇兰」（Dianland），指涉范围为中国的云南省及其周边地区。
6. 科索沃战役（Battle of Kosovo），古塞尔维亚王国和奥斯曼帝国于一三八九年的科索沃进行的大型战役，塞尔维亚军队由大公拉扎尔．赫雷别利亚诺维奇（Lazar Hrebeljanović）率领，奥斯曼帝国军队则由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亲自统帅，双方军力相当，战役结果由奥斯曼帝国获胜，但双方主帅皆战死。相传穆拉德一世遭到诈降的塞尔维亚贵族米洛斯．奥比里克（Miloš Obilić）以淬毒匕首刺杀。科索沃战役过程的传奇性，被后世塞尔维亚人视为民族建国神话，拉扎尔．赫雷别利亚诺维奇和米洛斯．奥比里克都被视为塞尔维亚民族英雄。
7. 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š Obrenović, 1780–1860），一八〇五年时追随塞尔维亚民族英雄卡拉乔尔杰参加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武装起义，成为起义军的重要人物，一八一五年被奥斯曼帝国任命为塞尔维亚大公，长期统治塞尔维亚公国并实行威权主义。一八三五年在国内自由派舆论声浪下被迫实施君主立宪制度，一九三九年在俄国及奥斯曼帝国的主导下被迫退位并流亡海外。一八五九年在加拉沙宁主导的塞尔维亚国民议会邀请之下，返回塞尔维亚復位。于一八六〇年病故。
8. 李定国（1621–1662），张献忠义子，原为反明势力的大西军将领，在张献忠败亡后归顺南明永历政权；并积极对抗满清军队，先后于靖州、衡阳、桂林三次大败清军。
9. 大维齐尔索库鲁（Sokollu Mehmed Pasha，1506–1579），本名索库鲁．穆罕默德，于一五四三年任职苏丹侍卫队的指挥官，因为屡建功勋受到苏莱曼一世的信任，于一五六五年成为大维齐尔，其权力如同奥斯曼帝国的「宰相」。
10. 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 1787–1864），塞尔维亚与语言学家，积极收集并推广塞尔维亚地区的民间诗歌及民俗传说，而被称为「塞尔维亚民俗学研究之父」，其代表作为一八一四年出版的《塞尔维亚民间诗歌》。
11. 伊利亚．加拉沙宁（Ilija Garašanin, 1812–1874），塞尔维亚政治家，他在一八四四年担任内政部长时，写下未公开的文件《备忘录》（*Načertanije*）并以此作为个人的施政纲领。在《备忘录》中，加拉沙宁主张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塞尔维亚人居住地区的「大塞尔维亚国」，包括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加拉沙宁被后世认为是「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起源。
12.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 1906–1982）和康士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 1911–1985），分别为一九八〇年代冷战后期的苏联前后任

领导人。

13. 原文为“The lamps are going out all over Europe”，出自于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格雷回忆录》（*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作者为英国政治家及外交家爱德华．格雷勋爵（Sir Edward Grey）。
14. 作者术语，驻马店为中国河南省中部一个地方城市，位于中国古代歷史的「中原」地带。作者以此名称比喻「在一个文明中最落后、处于秩序的最低阶的地方」。
15. 比如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纪录：「七月二十五日，有汉民工匠络绎来迎，悉皆欢嗯归礼，以彩幡、华盖、香花前导。又有（金）章宗二妃，曰徒单氏，曰夹谷氏，及汉公主母钦圣夫人袁氏，号泣相迎，顾谓师曰：昔日稔闻道德高风，恨不一见，不意此地有缘也。」
16. 漫长的十九世纪（Long nineteenth century, 1789–1914）及短暂的二十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语出英国歷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7. 迪米塔尔．奥布西奇（Dimitar Obshti, 1835–1873），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于一八六二年参加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保加利亚第一军团」，多次参与武装起义，一八七三年遭到奥斯曼帝国逮捕后处死。由于他出生于当时位于塞尔维亚境内的贾科维察（Gjakova，现位于独立的科索沃境内），故被塞尔维亚人视为民族英雄。
18.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 1862–1911），于一九〇六年担任俄罗斯帝国首相，任内推动土地改革并致力于培养富农阶级，以促进经济发展及现代化，于一九一一年死于刺杀。
19. 一九九五年波士尼亚战争末期，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及欧盟代表的监督下，波赫联邦、南斯拉夫及克罗埃西亚三国在巴黎签订《岱顿协议》（Dayton Agreement），同意结束内战并保障波赫联邦及塞族共和国的独立事实，并在波士尼亚设立「国际社会驻波赫高级代表办公室」（OHR），以监督多国维和部队执行协议内容。一九九七年，美国及欧盟再度于西德波昂（Bonn）召开国际会议，决议由欧盟各国轮流担任高级代表，具有凌驾于当地各政权之上的绝对权力，以保证《岱顿协议》的彻底执行，此权力被简称为波昂权力（Bonn Powers）。
20. 黑手党（Black Hand）为塞尔维亚王国军人德拉古廷．迪米特里杰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所建立的秘密社团，全名为「统一或死亡」（Unification or Death），诉求以武装及暴力行动促成「大塞尔维亚国家」的统一，其成员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刺杀了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21. 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即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王国（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 1918–1929）。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南斯拉夫委员会」的主导之下，塞尔维亚、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三个王国共组的联合王国，国家元首由塞尔维亚国王担任，这是第一个由「南斯拉夫民族」建立的国家，故后世又称之为「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同时，蒙特内哥罗也召开会议，废除本国国王后加入第一南斯拉夫王国。
22. 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即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王国在国王亚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的主导下，废除议会政治并推行君主专制，并将国号改为「南斯拉夫王国」（Kingdom of Yugoslavia, 1929–1941）。一九四一年二战爆发后，遭到德国、义大利、保加利亚等轴心国成员占领而灭亡。

23. 亚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位于法国及德国交界处，自中世纪以来便是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相互争夺的争议区域。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政府将此区画分为两个独立的省分：上莱茵省（Haut-Rhin）和下莱茵省（Bas-Rhin）。
24. 朱迩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英国政治家及外交官，一八七六年开始任职于英国驻大清国北京使馆，一九〇六年开始担任全权公使，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期间促成袁世凯的北洋军与革命党之间的停战议和及大清国宣统帝退位，为中华民国建立的关键人物。

六

波士尼亚

从「三族共和」到「六族共和」



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

Bosnia and Herzegovina

Босна и Херцеговина

独立时间：1992年3月3日

首都：赛拉耶佛

我们今天讲波士尼亚[1]。波士尼亚是南斯拉夫从「三族共和」转型为「六族共和」的一个副作用。十九世纪的波士尼亚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有族群和宗教的差别，但是还谈不上民族构建的问题。整个故事是由一八四四年，我在上一讲提到的那位塞尔维亚的政治家伊利亚．加拉沙宁开始的，他是斯拉夫主义在塞尔维亚的体现者。加拉沙宁在一八四四年撰写了《备忘录》，是后世大塞尔维亚的起源。按照这个计画，今天的塞尔维亚、波士尼亚、科索沃、马其顿及阿尔巴尼亚，也就是说，原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西部的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大塞尔维亚民族。

这个发明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发明家和希腊主义的发明家，跟在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未来即将变成斯洛维尼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的那些人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故事在一八四年增加了当时还不存在的克罗埃西亚元素，当时「大塞尔维亚」的民族发明家并没有把奥地利帝国境内的那一拨人算进去。后来变成克罗埃西亚人的这批人，当时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后来变成斯洛维尼亚人的这一部分，当时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一八四八年的「匈牙利革命」导致了匈牙利和奥地利

之间的战争。匈牙利的民族发明家认为，今天的克罗埃西亚这拨人毫无疑问地是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他们所讲的语言只是匈牙利语的一种方言。以前，匈牙利王国和所有中世纪的王国一样，是以拉丁语为国语的，无论是后来的匈牙利语还是后来的「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都只是不同地方的方言而已；今后匈牙利要把自己发明成为一个民族，就要让国内的各个地方都开始学习匈牙利语。

然后构成今天克罗埃西亚内地的这一拨人在匈牙利化政策之下就感到不高兴了。他们觉得自己原来跟布达佩斯人一样，讲的都是方言，要学也一样学拉丁语；现在你们布达佩斯方言变成匈牙利国语，而我们说的语言不仅仍然是方言，而且由原来那种被容忍的方言变成了即将被消灭的方言，因此十分不高兴。于是他们在匈牙利独立的关键时刻倒向了奥地利帝国，跟着奥地利帝国去镇压匈牙利的独立革命。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裴多菲俱乐部」[2]的歷史源头，镇压的正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作者山多尔．裴多菲参加的匈牙利革命军。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时候正在指挥他们的追随者参加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他们对一八四八年弥漫于整个东欧、最后终将蔓延到整个世界的民族发明狂潮下了一个简单粗暴的站队学定义。他们的解释是：「凡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就是真民族，凡是站在我们敌对势力一边的就是假民族。」所谓站在进步势力这一边的，就是站在革命势力（欧洲的宪兵队长沙皇俄国及其盟友奥地利帝国的敌对势力，以及东方诸君主国的盟友的敌对势力）这一边的。以波兰为代表，因为他们反对俄罗斯、奥地利以及其他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定义为反动势力的各大君主国，所以他们是革命的朋友，客观上发挥了革命的力量，所以革命者也要承认波兰民族的存在。但是站在反革命势力这一边的，站在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帝国这一边镇压革命的种种力量，例如未来的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家，他们代表的是反动势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知识分子最喜欢使用的那种「地图开疆」[3]、用笔桿子杀你的办法预言：「在客观上为革命势力做了贡献的波兰民族必将发扬光大，未来的欧洲解放以后必将使波兰復国；但是站在封建反动势力一边的克罗埃西亚人、伊利里亚人诸如此类的，他们必将因为站在那一边而遭到种族灭绝；革命者在推翻反动势力的同时，必然要对这些坚持落后的、中世纪的、反动政治遗产的敌对势力，像消灭俄罗斯哥

萨克人一样，把他们从肉体上、文化上彻底消灭干净。」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这件事情在世界歷史上有很多起源，这就是起源之一。我们可以去翻翻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论述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很多文章，他们像我们今天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不能够区分自己的愿望和政治现实，于是就假定自己的笔桿子有非常庞大的力量，把自己讨厌的政治力量通过笔桿子消灭殆尽。

但是这样的「消灭」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实际后果。克罗埃西亚人固然是没有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伤害，但是他们打算消灭的另一拨反动势力—哥萨克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确实遭到了肉体消灭。哥萨克人跟着沙皇俄国一路镇压过去，把俄国的、匈牙利的、奥地利的革命者都给镇压掉了，他们发挥的作用跟克罗埃西亚人是非常相似的。最后，布尔什维克得势以后，就把乌克兰的全体哥萨克人作为阶级敌人而消灭掉了。马克斯和恩格斯的门徒可以说替他们的祖师爷报仇了。克罗埃西亚人则因为这一次贡献，因此他们在奥地利帝国内部的政治位阶就有所提升。

克罗埃西亚作为一个民族的发明，起源于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他们透过革命的对立面—以反革命发明了民族，但这只是未来克罗埃西亚的其中一部分。一八四八年给「克罗埃西亚民族」增添了三类不同的发明家：一类发明家希望把克罗埃西亚人发明成为匈牙利人；另一类发明家希望把克罗埃西亚人发明成为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4]当中的克罗埃西亚邦；第三类克罗埃西亚发明家对这两者都感到不满意，他们希望克罗埃西亚人联合奥匈二元帝国内部的所有「非奥地利人、又非匈牙利人的其他语言和文化族群」，通过一个类似虚拟的南斯拉夫发明把他们全部团结起来，在克罗埃西亚首都札格拉布（Zagreb）的知识分子领导之下成立一个南斯拉夫联盟，这就是南斯拉夫主义（Yugoslavism）的起源。

你要注意，斯拉夫主义、南斯拉夫主义和大塞尔维亚主义是三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最早的南斯拉夫主义者并不是在俄罗斯或者塞尔维亚产生的，而是在克罗埃西亚产生的。最主要的发明家是克罗埃西亚的一位天主教主教—约瑟普．斯特罗斯马耶[5]，他于一八四八年提出了歷史上首次出现的「南斯拉夫」概念。此时未来的斯洛维尼亚人还以为自己是奥地利人。「南斯拉夫」这个概念主要统战的对象是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当时他还没有考虑到塞尔维亚人。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称斯拉

夫人的发明家，无论多么讨厌奥地利人或者是多么讨厌匈牙利人，他们同时也都是瞧不起奥斯曼土耳其境内的所有东正教徒的。这就像是，如果你是一个香港人，无论你看英国人多么不顺眼，但是你绝不会瞧得起河南人。尽管作为香港人的你跟英国人闹得不愉快，一天到晚说我们是中国人，而且还要看黄飞鸿、霍元甲和精武英雄陈真的电影，一天到晚骂英国是殖民主义者，就以为你将来到了河南驻马店、会跟当地的贫下中农相处得很好，那么你真是太不瞭解人性了。未来克罗埃西亚人的祖先和未来塞尔维亚人的祖先就处在这种状态。

在一八六〇年代，我们刚才提到的，天才的民族发明家加拉沙宁和斯特罗斯马耶主教拍拍脑袋，就想到了一个主意。加拉沙宁当时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混得并不是好，斯特罗斯马耶主教在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君主国的境内也不是混得很开心，于是他们就搞了一次民间的会议，发表了一个「南斯拉夫宣言」[6]。这个宣言在当时的意义，就相当于现在的港独分子、藏独分子和突厥人在东京开了一次私人会议，然后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但没有被任何一个列强政府承认，这样的「南斯拉夫宣言」在将来能不能结出任何果实，在一八六〇年代他们自己心里也是没底的。至于列强，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没有任何像样的政治家愿意理会他们。

况且这时还没有被克罗埃西亚的民族发明家发明为「南斯拉夫民族」的沿海克罗埃西亚居民，也就是伊利里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还在搞他们自己的民族发明。尽管沿海克罗埃西亚居民从血统及文化上讲，与威尼斯人和义大利人实际上更相近，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把自己发明成为义大利人，因为「义大利人」在一八四〇年代到一八六〇年代也还是一个尚待发明的民族概念。未来的「义大利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以托斯卡纳为中心的民族概念，还是指的是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民族概念，都还很难说。伦巴底人和威尼斯人都对「义大利民族」的发明都非常冷淡，更不要说比伦巴底居民更远的、以的里雅斯得（Trieste）和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为核心的达尔马提亚。从这些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不愿意做匈牙利王国的臣民或者奥匈帝国的臣民，那么他们发明什么都可以。义大利民族发明跟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南斯拉夫民族发明、大斯拉夫民族发明和大塞尔维亚民族发明一样，都是纸上谈兵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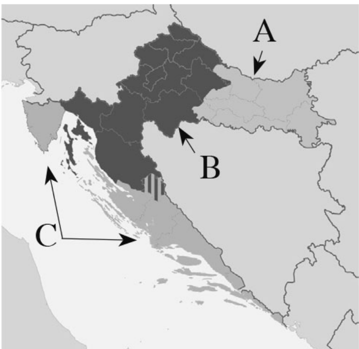


南斯拉夫联邦行政图　在1945年成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将南斯拉夫王国原本的「三族共和」扩大为「六族共和」，这「六族」分别是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波士尼亚、蒙特内哥罗、马其顿等六个自治国，此外还有科索沃及佛伊弗迪纳两个自治省，其多元且复杂的族群结构，埋下日后南斯拉夫内战的远因。

如果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就要这些实际存在的政权好了。如果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要想发明点什么，那么这些发明对我来说价值相同。义大利人也好，克罗埃西亚人也好，斯拉夫人也好，全都是纸上谈兵，根本犯不着厚此薄彼。就像是今天的香港人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做大英帝国的臣民，也可以选择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可以选择移民到加拿大去做加拿大的公民，现实主义者就会在这几种选择中间选。如果你让他选要不要做「坎通尼亚民族」[7]或者是要不要做「闽越民族」，对于他来说这两种发明的意义是基本相同的，因为这样的政治实体是根本不存在的。哪怕是在香港的越南人后裔，他也只能够选择，要么他发明一个「香港民族」，要么就在大英帝国、中国或者加拿大之间认同的选择其一。既然同样都是虚幻的，「诸夏」也好，「诸亚」也好，「坎通尼亚」也好，「闽越民族」也好，「客家民族」也好，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些纸上谈兵的虚幻概念。

在这些各式各样的泡沫思想发明当中，「南斯拉夫」的发明看上去是没有任何一点点分量的。「大塞尔维亚」和「大斯拉夫」的发明还算有点分量，因为斯拉夫主义在沙皇俄国内有一派宫廷势力是愿意支持他们的。这一派宫廷势力通过沙皇俄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塞尔维亚自治区的领事，不断在塞尔维亚境内掀风作浪，还发展了自己的第五纵队[8]，就

是塞尔维亚的人民激进党。人民激进党模仿法国的共和激进党[9]推动公立教育制度的政策，试图通过教育，把科索沃战役神话和「大塞尔维亚」神话灌输给小小的塞尔维亚自治区内的广大学生，通过他们发明未来的「塞尔维亚民族」。



克罗埃西亚歷史区域图　今天的克罗埃西亚主要由三个歷史区域的居民所组成，包括：A、斯拉沃尼亚，B、内地克罗埃西亚，C、达尔马提亚及沿海克罗埃西亚。前两者的起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设立的军事边疆区居民，后者则主要是威尼斯等义大利拉丁人的后裔。



波士尼亚的塞族共和国区域图　波士尼亚于1992年宣布独立并脱离南斯拉夫联邦后，其境内的塞尔维亚族群旋即成立「塞族共和国」，引发「波士尼亚内战」。内战持续至1995年，在北约介入下内战各方达成《岱顿协定》并宣告停火。直至今日，塞族共和国仍在波士尼亚境内保有一定的自治权利。

奥斯曼帝国直接管辖的波士尼亚省区，从文化上讲跟塞尔维亚自治区没有任何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别就是深圳和香港的差别。深圳和香港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不同就是，深圳在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之下，而香港则在英国总督的管理之下。从文化上讲，他们都是「坎通尼亚人」的不同分支，而且香港有很多商人原本就是在清末民国时期从深圳那里过来的。在一九五〇年代边界封锁以前，双方之间的来往非常自由、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两家人的。波士尼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个样子，它们纯属是地理意义上的关系。塞尔维亚境内也有很多穆斯林，

波士尼亚境内也有很多东正教徒。

我在上一讲提到了波士尼亚的国际纠纷，列强认为，与其让老迈的、残暴的奥斯曼帝国继续统治波士尼亚，或者听任波士尼亚落入同样残暴危险、由人民激进党主政的塞尔维亚自治区手中，倒还不如交给比较温和且客观公正的奥匈帝国来负责託管。于是奥匈帝国接管了今天的波士尼亚这个行政区（当然当时是没有任何波士尼亚民族的）以后，指派匈牙利人贝尼．卡洛伊[10]主管这个殖民政权。卡洛伊採取开明的政策，一面发展波士尼亚经济，一面就像今天的马来西亚一样，允许波士尼亚的各族群，只要自己高兴，爱怎么办学就怎么办学，爱怎么教授语言就怎么教授语言，跟塞尔维亚实行的那种法兰西式的公立学校制度、强迫所有人接受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发明有所不同。于是波士尼亚的族群和文化认同因此就变得更加复杂。

既然各个族群都可以兴办学校了，那么必然的结果是，首先，克罗埃西亚人代表了波士尼亚境内文化水准最高的族群，因为既然波士尼亚变成了奥匈帝国託管的殖民地，那么奥匈帝国唯才是举的殖民地当局选择的文化水准最高的教师必然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匈牙利王国的克罗埃西亚发明家。这些发明家在波士尼亚学校任职的结果，就是在波士尼亚内创造了一批接受了刚发明的克罗埃西亚文化、坚信克罗埃西亚文化比奥斯曼色彩浓厚的塞尔维亚文化和波士尼亚文化都要优越得多的克罗埃西亚学生。这些克罗埃西亚学生因为自己不在克罗埃西亚境内，所以「远距离爱国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是特别强烈的，所以要特别强调自己的克罗埃西亚身分认同，强调自己比那些没有接受克罗埃西亚教育的波士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要更加优越。他们比起达尔马提亚人和内地克罗埃西亚人，更积极地要把三个克罗埃西亚发明在一起，构建成一个克罗埃西亚民族。

另一批人则是未来的波士尼亚人的始祖，当时的波士尼亚土耳其人。他们本来是青年土耳其党和奥斯曼主义的重要发明家，但是因为已经被划在了奥匈帝国的殖民地当中，他们不得不另行寻找政治上的出路，组织了穆斯林联盟。穆斯林联盟在波士尼亚推行学校现代化的结果是淘汰了古老的奥斯曼语，推行新型的以教派为中心、而不是以民族为中心的穆斯林认同。他们把自己发明成为奥匈帝国的穆斯林居民，既不承认自己是塞尔维亚人，也不承认自己是克罗埃西亚人，而且也不承认自己是任何民族。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地区，宁愿接受君士坦丁堡的中央

集权统治，而不愿意接受希腊主义发明家、保加利亚发明家和塞尔维亚发明家的民族发明。而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的穆斯林，也是宁愿把自己发明成为哈布斯堡主义者，宁愿做奥匈帝国的臣民，也不愿意做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埃西亚人。这一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假如你是英印帝国的一个锡克教徒，你是愿意做一个印度人，还是愿意做一个巴基斯坦人？或是愿意做一个旁遮普民族主义者[11]？还是愿意做一个泰米尔民族主义者[12]呢？结论很简单，他们很可能愿意做一个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者，坚决拥护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因为一个大帝国最能公正对待向他们这样的少数族群。如果搞起民族发明来，无论是哪一派的民族发明家占上风，他们都要吃亏。唯有大英帝国是相对上较一视同仁的，不会让那些比较强大的民族发明家欺负他们这些弱者。所以波士尼亚的穆斯林就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发明成了哈布斯堡主义者。

他们对哈布斯堡的奥匈帝国怀着今天的很多香港人对大英帝国的同样感情。但是他们爱奥匈帝国，而奥匈帝国却不见得爱他们。奥匈帝国就像是英国人并不怎么想要香港一样，并不是十分想要波士尼亚这块土地。他们觉得他们只是波士尼亚的殖民者，而殖民地早晚是要独立的，而且这块殖民地要让他们费很多心思来治理，里面的人又不是他们的自己人。于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无论你怎样忠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你顶多是做哈布斯堡的臣民，但做不了奥地利的公民。但是未来的斯洛维尼亚人则是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就是奥地利公民，认为他们跟奥地利人、跟其他的德语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讲的就是德语，而且做梦也不会想到，奥匈帝国竟然有朝一日会把未来的斯洛维尼亚划出境外。但是奥匈帝国在塞拉耶佛则是一开始就讲，我们在这里是来维持秩序，防止像土耳其人在科索沃大杀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在贝尔格勒大杀穆斯林土耳其人之类的种族屠杀的。我们是为了维持和平、防止你们自相残杀来的，并没有打算让你们全体香港人都自动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公民，那是不用想的。你们香港人当中的优秀分子可能会移民英国，最终变成英国的公民。但是大多数香港人只是英帝国的臣民，将会随着英帝国的撤出而自己另找出路。大英帝国不会永久的管辖香港人，波士尼亚的穆斯林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

最后一批人则是塞尔维亚的民族发明家，特别是人民激进党在一八八〇年代以后培养出的这批新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他们根据卡洛伊实施的自由办学政策，跑到波士尼亚来办学，培养出了一批本来也是波士

尼亚居民、但是因为受了塞尔维亚民族发明家的教育就把自己认同为「塞尔维亚人」的波士尼亚人。这一批波士尼亚的塞尔维亚学校培养出来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地位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普通话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这些地方的居民原本比如是说闽南语或者客家话的，然后因为来了一批「中华民族」的发明家，无论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的还是共产党派来的，还是自己送上门去的，但是他们只要根据马来西亚和大英帝国的语言开放政策办了一些新学校，既不说闽南话也不说客家话，就是要用「国语」或普通话教学，那么他们培养出来的人就要教育他们的子孙：「以后你们就是中华民族了，你们是马来西亚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或者新加坡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跟那些血统上讲跟你同样是马来人、但是信了伊斯兰教、认同了大英帝国和马来民族发明家的人以后就再也不一样了。你们要在马来西亚的国会当中发挥分裂性的作用，跟血统同样是马来人、但是信了伊斯兰教、把自己发明成为马来民族主义者的那些马来人不一样，也跟那些虽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继续相信中国文化，但是继续说闽南语和客家话、认为自己是闽南人或者广东人的人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你在马来西亚看到的民族发明，就是十九世纪末期在波士尼亚的民族发明翻版。

要注意他们实际上大多数都是「马来—波利尼西亚人」（Malayo–Polynesian），一部分讲了汉语而没有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发明材料了，但是在这些材料中，只有一部分人被成功发明为「中华民族」，另一部分人还是继续自己的闽南人、客家人或者广东人的认同。波士尼亚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波士尼亚人的这些材料当中，只有一部分被塞尔维亚人发明成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材料。这样，在后来一九九一年分裂波士尼亚的这种文化族群认同，在匈牙利人卡洛伊的殖民统治之下就已经基本形成了。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些塞尔维亚发明家发明出来的这些波士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认为自己是「大塞尔维亚民族」；克罗埃西亚教师发明出来的这些波士尼亚的克罗埃西亚人，自认为自己是三个克罗埃西亚的一部分；但是哈布斯堡帝国主义者培养出来的这批哈布斯堡的穆斯林臣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哈布斯堡人，正如他们过去是奥斯曼人一样，因此他们就是民族发明潮流中的落伍者。当然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者，比民族主义者要高级许多。谁都能看得出，过去的奥斯曼帝国和现在的哈布斯堡帝国，比「大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大斯拉夫」这些发明家的

「逼格」[13]都要高得多。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你爱帝国，但是帝国不爱你；你爱帝国、帝国却抛弃了你。结果就是，你没有自己的民族发明，结果那些已经发明出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就自然而然觉得你是一块肉，他可以把你吃下去。你是原材料，他们是已经铸造出来的成品。你这块原材料既然没有固定的主人，没有自己的发明，他们就想给你发明过去。如果你抗拒他们的发明的话，他们就要用枪指着你的脑袋。这正是后来即将出现的事情，而这在奥匈帝国殖民统治的末期已经一一具备了。

我在上一讲提到的塞尔维亚黑手党，此时一方面在贝尔格勒夺权，一方面也在波士尼亚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地下党—波士尼亚青年组织（Young Bosnia）。这个组织在波士尼亚的地位就像是中联办和地下党[14]在香港的地位一样。他们在香港连一个合法身分都没有，但人人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的分支机搆，是要企图消灭香港的民间组织的。塞尔维亚黑手党在波士尼亚搞出来的这个波士尼亚青年组织也是这样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波士尼亚併入「大塞尔维亚」当中，塞拉耶佛的一声枪响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当然知识分子的态度跟现实政治家不一样，跟民间的革命家和恐怖分子也不一样。知识分子自身没有武力，所以发明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温和，但是也因为如此，他们也没有能量去兑现自己的发明。我们讨论民族发明学要弄清一个基本事实：不是说话温和、主张文明的人就是好人；他之所以说话温和、主张文明，主要是因为他是没有力量的人。

在一八六〇年代加拉沙宁和斯特罗斯马耶主教发明的「南斯拉夫」，实际上是根据奥地利帝国改组为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君主国的模式。他们觉得，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既然可以搞一个二元君主国，那么我们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为什么不能搞一个「二元南斯拉夫国」呢？克罗第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这个「二元南斯拉夫国」中的关系，就跟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在奥匈帝国中的关系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派系在未来的克罗埃西亚当中只是极少数。未来的克罗埃西亚人当中，有很多人是主张把奥匈帝国改建为三元君主国的，使未来的克罗埃西亚人通过给裴迪南王子加冕、变成「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埃西亚三元君主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当然是宁愿跟文明程度较高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搞三元联盟，也不愿意跟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塞尔维亚人搞二元联盟。所以南斯拉夫主义者在克罗埃西亚人中其实只占了极少数，而在

塞尔维亚人当中也是极少数。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都不贊同将纳入克罗埃西亚人。他们预见到，克罗埃西亚人仗着自己逼格高、文明高、受过德国人的教育、文明程度较高，一旦进入了这个联盟，原先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比较落后和野蛮的塞尔维亚人用比较文明的方式（例如在教育和经济领域里面）是斗不过这些克罗埃西亚人的。到时候，我们自己牺牲流血、千辛万苦建立的国家，很可能会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落到这些克罗埃西亚人手里面。所以他们也不高兴。南斯拉夫民族发明家在塞尔维亚的境内也是极少数。

但是因为这种联邦主义的发明看上去比较文明、逼格比较高，所以特别符合知识分子的希望。比如塞尔维亚的贝尔格勒大学有不少教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亚歷克桑德．贝利奇，就对这样的联盟感到很高兴。他觉得应该编一部「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的联合词典[15]，作为未来的「南斯拉夫联盟」的官方语言；他还提出，其实也可以把斯洛维尼亚人发明到这个联盟之内，把二元联盟变成三元联盟，未来的南斯拉夫将是一个「三族共和」的民国，建立在塞尔维亚民族、克罗埃西亚民族和斯洛维尼亚民族「三位一体」的南斯拉夫民族之上。对外就如同顾颉刚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是一个」[16]；但是对内就可以「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仍然保有各自的民族文化。这个发明看上去极其公正、极其合理，但是麻烦在于，基本上除了知识分子以外没有人支持它。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当中支持它的人都非常之少。至于斯洛维尼亚人，他们当时还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当时斯洛维尼亚人的主要政党是人民党（Slovene People’s Party），跟今天在奥地利执政的那个天主教的人民党（Austrian People’s Party）是同一类党派；况且他们讲的是德语，对于把自己发明成斯拉夫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更别说什么「三族共和」了。



塞拉耶佛事件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于波士尼亚的塞拉耶佛市遭到「黑手党」刺客刺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黑手党由塞尔维亚军官成立，诉求以武装暴力促成「大塞尔维亚国」的统一，其成员以塞尔维亚人及波士尼亚塞族人为主。

真正政治上的发展不是依靠「三族共和」这种看起来很完美的理论，而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塞拉耶佛一声枪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塞尔维亚迅速地被德奥联军占领，残余的人马在英法联军的保护之下翻山越岭，逃到阿尔巴尼亚海岸，然后被英国舰队运到了希腊的科孚岛，然后他们就在希腊的科孚岛上像坐牢一样渡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岁月。这时，奥地利境内那些主张南斯拉夫的流亡者跑到伦敦，跟塞尔维亚的那些流亡者一起，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南斯拉夫委员会」（Yugoslav Committee）。他们跟盟国的政治家协商，在解决战后问题

的时候，根据奥匈帝国模式来建立一个「三族共和」的国家，来接替奥匈帝国，填补中欧的权力真空。

他们之所以要讲「三族共和」，跟贝尔格勒的战前的知识分子的「三族共和」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出于外交上的策略考量。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这两个现实存在的政治实体已经变成英法和协约国的敌人，英法和协约国不能容许它们在战后继续维持帝国的规模。但是又必须有人继承它们留下来的这个帝国的烂摊子，然而这个留下来的多语言和多族群的地方，你发明成什么，看上去都显得既不公平又不能持久。大塞尔维亚看上去就是斯拉夫主义的一个白手套，斯拉夫主义看上去就是沙皇帝国主义的白手套，英法都不放心让俄罗斯帝国控制中欧这一大片土地。况且英法也知道，中欧的大多数居民即使在背弃了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以后，也不会甘心服从俄罗斯人或者俄国扶植的任何政权。为了让这些人满意，那么我们只有理性客观公平一点，发明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实体。看上去，「三族共和」的南斯拉夫，对内分为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和塞尔维亚三族，对外是统一的「大南斯拉夫民族」，这种模式能够使所有各方面都感到满意。

「斯洛维尼亚民族」作为一个概念，实际上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政治家和伦敦流亡者所组织的「南斯拉夫委员会」联合发明出来的。它在概念上涵盖的并不是今天的斯洛维尼亚，而是奥地利帝国境内所有愿意做斯拉夫人、脱离奥地利的居民。这些居民到底有多少，居住在哪些地方，协约国心里没数，只是依据比较文明的西欧标准规矩说：「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做奥地利人，你就继续做奥地利人；不愿意做奥地利人，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斯洛维尼亚的壳子，你们可以继续去搞『三族共和』。在三族共和之下，你们原有的民族权利仍然会像过去在奥匈帝国境内一样，仍然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各选区自己投票，愿意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完全由你们自己解决。这样应该是足够文明民主了，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满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流亡政治家，比如说来自阿富汗的流亡政治家不能在阿富汗本地开会，而是在赛普勒斯岛上开会，在赛普勒斯制定了阿富汗未来的宪法，然后再带回喀布尔，至于能不能执行，那是天晓得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先在美国人的主持之下在赛普勒斯把会开完、把宪法大纲制定出来以后再说。南斯拉夫委员会和塞尔维亚逃

出来的那些塞尔维亚在科孚岛的军队和流亡政府就这样联合开了一次会议，签订了一个宪法纲领，也就是《柯孚宣言》[17]。这个宪法纲领就是未来的凡尔赛和约建立的这个「三族共和」的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联合王国的临时宪法。为了让大家都满意，南斯拉夫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由克罗埃西亚人担任，但是联合王国的国家元首则继续由塞尔维亚的国王担任，王国的军队便以塞尔维亚的流亡军队为核心组成。结果，王室是塞尔维亚的王室，军官团是塞尔维亚的军官团，但是宪法委员会和议会政治家主要是克罗埃西亚人，波士尼亚人在这个「三族共和」当中没有地位。

「三族共和」就像是满蒙藏回一样，「回」并不是维吾尔人或者哈萨克人，也不是所谓的「回族」，而是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有待发明为真正民族的类似泛伊斯兰主义的文化族群概念。「三族共和」也是这样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埃西亚因为是已经有了民族发明家，所以算是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因此斯洛维尼亚不是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指的是奥地利境内所有愿意做斯拉夫人的居民。另外，波士尼亚的穆斯林，虽自称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忠实臣民，但是哈布斯堡的君主连奥地利和匈牙利都不要了，退位后流亡到葡萄牙去了，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一批没有君主的人。他们接下来的处境是，塞尔维亚的民族发明家坚持说「你们这些穆斯林其实是改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的民族发明家也要坚持说「你们这些穆斯林其实是改信伊斯兰教的克罗埃西亚人」，而实际上他们则变成了一群巴尔干的孤儿。如果说台湾是亚细亚的孤儿，那么波士尼亚的穆斯林就变成了巴尔干的孤儿。他们仍然承认哈布斯堡君主，但哈布斯堡君主却不要他们了。

他们不愿意做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都想把他们发明进去，因为「三族共和」这里面到底谁占的比例高还是有现实政治的意义。例如，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家[18]，他们在「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中算是哪一族呢？算是「汉族」还是算「回族」，这很成问题。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像今天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一样说自己是「回族」；但是他们又用汉字，完全可以像江苏人和浙江人一样把自己发明成为「汉族」。然而，青海的马家军中有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说，地球上根本没有「回族」这种东西，蒋介石这个浙江人明明信了基督教，他都没有把自己发明成为基督族，那么

我们信了伊斯兰教，凭什么把我们发明成为「回族」呢？我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正如蒋介石是信奉基督教的汉人[19]是一个道理。

他们这么说的理由就是因为甘肃、青海和宁夏这几省对于他们的野心来说是太小了。他们觉得，如果不到南京政府里面去当几任官，简直是死不瞑目。如果他们把自己发明成「回族」的话，就等于说他们以后只能在西北独立建国，没有办法到南京去做官了，这不能让他们满意。因此他们一定要说自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所以假如你是大汉族主义者，你别急着感动说他们是多有民族情操的一帮人，他们这样说是有扩张自己权力的动机的。但是同样在马家军当中，有一些势力比较小的，论资格不可能像是马步芳那样跑到南京或者广州还能做得了大官，顶多只能在本省做一些小官的人，他们就要动脑筋说，我们还不如在西北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或者是建立一个穆斯林独立王国，干脆就不要说我们是「汉族」了，我们是「回族」。做了「汉族」，到南京去做官也轮不上我；做了「回族」，那么在西北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我说不定还能够做大官。马仲英就是这些人的代表之一，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也不只是马仲英。

同一个马家里面，有些人说自己是「汉族」，有些人说自己是「回族」，道理到底在哪儿呢？你如果去问一九一二年的宪法制定者，「好呀，你说得很好，你们朱迩典和袁世凯商量得好好的，大清帝国以后『五族共和』了，有回族也有汉族，那你说说看，我们马家算是回族还是汉族？」袁世凯和朱迩典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意思是：「你们只要把大清帝国这个盘子接下来，把国际条约的工作给做好就行了，至于你们甘肃人、宁夏人到底愿意做回族还是汉族，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吧。只要你们自己能够处理好，那么怎么样都可以。如果你们自己处理不好、打起来了以后，你们千万别来找我善后。我没有意思要让你们打起来，也没有意思让你们不打，我设计这个框架完全是出于善意，要尽可能用文明的方式解决你们之间的纠葛。但是我把这么好的框架提供给了你们，你们还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纠纷，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大英帝国概不负责，袁世凯概不负责，你们自己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波士尼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波士尼亚人要把自己发明成为什么民族，那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决，解决不了，到最后还是要打一仗的。

但是在解决民族发明的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纯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技术问题，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帝国主义虽有一千一万个好，也

要他们愿意要你。」如果大英帝国愿意要上海的话，我第一个要说，上海人做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吴越人也好，浙江人也好，江苏人也好，或者是任何人也好，都没有做大英帝国的臣民好。在大英帝国境内当一个没有资格到威斯敏斯特去当国会议员的臣民，比起当一个中华民国的有资格当国民大会代表的公民，逼格至少相差五十级。但是前提条件是大英帝国愿意要你。如果大英帝国已经不要你了，你再怎么热爱大英帝国也没有用。而且，你因为热爱大英帝国而拒绝发明「上海民族」，结果就很可能是河南驻马店的爱国者把你发明成为「中华民族」，然后把你流放到新疆或者青海去支援边疆去了。或者是，苏州人或者杭州人把你发明成为「吴越民族」，把你上海的钱分出来去支援南京的建设去了。如果你机灵一点，趁着大英帝国还没有走的时候面不改色地发明一个「上海民族」，那么上海所有的钱都留在自己手里面了。但是这件事情你就别指望大英帝国替你安排好，当你是一个婴儿一样把你扶起来，扶到权力的椅子上。大英帝国才不会这么多管闲事呢。

波士尼亚穆斯林的问题也就是这样的。他们的路线本来没有错，做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臣民是比做克罗埃西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要好上五十倍的事情，但是前提条件是哈布斯堡君主愿意要你们，而事实证明哈布斯堡君主不要你们了。因为你们留恋帝国主义而没有及时发明民族，所以无论你们的帝国主义逼格有多么高级，塞尔维亚人、南斯拉夫人、克罗埃西亚人、大斯拉夫人逼格有多差；结果你们这些逼格高的人就因为发明民族晚了五十年，就要受那些早五十年发明民族的人欺负。因为发明民族早，所以我已经有了一个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的模型，在第一南斯拉夫王国的宪法里面便有了一个宪法主体的身分；而你波士尼亚人没有一个宪法主体的身分，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有一个宪法主体的身分在各方面都会占便宜；没有宪法主体的身分，那你的痛苦就要像是现在的「香港民族」发明家一样。他们现在就很能体会到：新加坡人有一个国家主体的身分或者台湾人有一个中华民国的空壳，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而你香港人呢？你什么也不是，你顶多有一个特区立法会，这个立法会还不是自由选举的，你简直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新加坡人哪一点都不比你强，但就是因为人家有一个正式的身分，人家就各方面都占便宜；就算你各方面都比新加坡人强，就是因为你是孤儿，你样样都吃亏。在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境内，未来将会发明成为波士尼亚民族的这些穆斯林就要感觉到这方面的痛苦。

克罗埃西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可以一会儿在贝尔格勒争权打架，一会儿发动政变，一会儿搞选举，也可以动不动扬言说我们要独立，我们要把你踢出去；而波士尼亚的穆斯林对政治总是无能为力、要吃闷亏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们除了政治上的吃亏以外，还要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人身安全上的危险。因为波士尼亚是一大片山区，是打游击战最好的地方。塞尔维亚的民族发明家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20]，通过流亡政府指挥塞尔维亚白军，在波士尼亚的山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应该是抗德根据地。同时，狄托在史达林同志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远东革命的总司令季米特洛夫的指挥之下，也在波士尼亚建立了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红色革命根据地和白色革命根据地以波士尼亚为战场相互之间打了起来。他们除了反击德国人和互相打仗以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欺负当地的穆斯林。而且欺负穆斯林这件事情做起来比欺负德国人、欺负塞尔维亚人和欺负克罗埃西亚人都要容易得多，因为穆斯林是各方中最弱势的。名义上他们都是要打德国人，但是德国人像是远东日本人一样，是最难打的。所以双方多半是以此为藉口向盟军要武器要资金。而要到资金以后，多半是保存实力，偶尔打一下，尽可能地保存实力相互打。双方的游击队还都算是有点实力的，只有波士尼亚的穆斯林是没有武装没有实力的，没有武器的人最容易被欺负。



帕维里奇会晤希特勒　图为乌斯塔莎的领导者帕维里奇（Ante Pavelić）于1941年会晤希特勒的场景。二战爆发后，乌

斯塔莎在轴心国的扶植下建立「克罗埃西亚独立国」，被后世部分克罗埃西亚人认为这是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克罗埃西亚民族国家，其合法性引发诸多争议，如同东亚的「满洲国」。

而德国人在占领了南斯拉夫以后，认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的关系毕竟还是比较接近，原来奥地利人的臣民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组织「乌斯塔沙」（Ustasha）为主的克罗埃西亚独立国。这个独立国，是在第一南斯拉夫当中认为议会政治保护不了克罗埃西亚人的权利、决心武装革命斗争的这一帮克罗埃西亚独立运动家发明出来的。他们的故事是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的故事，跟波士尼亚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行了：这些克罗埃西亚人宣布，波士尼亚的穆斯林都是克罗埃西亚穆斯林。经过他们跟德国和义大利的外交周旋，他们把今天的波士尼亚大部分都划进了克罗埃西亚境内。因此他们要通过学校教育同化波士尼亚穆斯林，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同化，就要适当地予以镇压。同时，塞尔维亚白军在米哈伊洛维奇的领导之下，在波士尼亚跟他们打仗；狄托领导的红军也以波士尼亚为根据地，在这里打仗。波士尼亚的倒楣之处就在于，波士尼亚主要是山地，是打游击战最好的地方，所有人都要在这里打一打游击战。因此他们就像是现在的黎巴嫩人一样十足的倒楣，吃所有人的亏，所有人都要拿他们做发明的原材料。而他们唯一热爱、忠心耿耿的哈布斯堡君主早已经跑到中立的葡萄牙去，下定决心不来管他们的闲事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波士尼亚的穆斯林才在痛苦中感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做帝国主义者是不行的。香港人再怎么热爱大英帝国，但大英帝国却不爱香港。香港人唯一的现实选择就是：你到底愿不愿意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呢？愿意做当然可以，你可以去爱国，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在共产党的体系里面去加官进爵。但不是所有人都受得了共产党的。实在是受不了共产党的那批人，以及就算是拥护共产党、在共产党的体制内也加不了官进不了爵、除了受气以外什么也得不到的这批人，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呢？第一种选择就是，你们什么都不做、无可奈何；第二种选择就是，既然英国人不要我们，我们又受不了共产党，那么我们只能够发明出「香港民族」来了。于是他们开始主张，波士尼亚的穆斯林并不是哈布斯堡帝国主义者，也不是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或者信伊斯兰教的克罗埃西亚人，而是一个叫做「波士尼亚民族」的新民族国家。

大多数人──不论是米哈伊洛维奇也好、乌斯塔沙也好、德国人也

好、奥地利人也好、俄国人也好，都不肯承认「波士尼亚民族」，但是一九四四年的狄托却偏偏承认了，正如我们后来都知道的发展，他决定把旧南斯拉夫王国的「三族共和」改组为「六族共和」。这里面的原因其实很清楚，狄托自己是克罗埃西亚人，他年轻的时候本来想移民美国去的。如果移民成功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加入共产党了，但因为它没有搭上移民船，留下来的结果就是加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他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之内是属于非塞尔维亚的那批势力，他不高兴让塞尔维亚的势力太过于强大。他感受到，正如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的那样，「三族共和」是不平衡的。「三族共和」当中，斯洛维尼亚人不太积极，克罗埃西亚人的人口也不够多，占大部分人口的是经济上最落后的塞尔维亚人。「三族共和」的不平衡性导致宪法结构没有办法长期稳定。在过去的第一王国时期，克罗埃西亚人之所以总是跟塞尔维亚人起冲突，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塞尔维亚人已经占据了王室和军官团，如果通过人口优势再把议会给了他们的话，这样的「三族共和」跟大塞尔维亚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退出也罢。

正如同在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中，汉人的人数是不是太多了一点？满人、蒙古人、藏人、回人都会觉得，你们汉人占了这么多人口，如果推动公民投票、议会政治、国民大会什么的，所谓的民主选举跟「人口统计」有什么不同？我们在你这个所谓的「五族共和」之下肯定要受压迫的。但是如果汉人把自己重新发明成为「诸夏」各民族，那么「坎通尼亚民族」和「满洲利亚民族」的人口差别就不算很大，三千万满洲利亚人对三千万坎通尼亚人，跟四万万汉人对三千万满洲利亚人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满洲利亚人不可能信任四万万汉人跟他们一起「五族共和」的，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五族共和」必然是汉人对满人的压迫；但如果是三千万坎通尼亚人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三千万坎通尼亚人和三千万满洲利亚人的分量差不多。如果搞成「十二族共和」甚至「三十六族共和」的话，满洲利亚人和蒙古人就会觉得自己不会再受压迫了。

狄托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很强大，所以重要的就是重新发明「大塞尔维亚」，把「三族共和」改成「六族共和」，从「大塞尔维亚」里再划分出几个民族，例如马其顿、科索沃、波士尼亚、蒙特内哥罗之类的，这些人在原先的「三族共和」体系中，都是被划在大塞尔维亚人里面。现在把「大塞尔维亚」这么一拆散，就像把「大汉族」拆成吴越人、南

粤人、巴蜀利亚人和其他各族人一样。这一下斯洛维尼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就可以放心了吧？以后岂不是可以长治久安了？尽管狄托并不是穆斯林，而且对万恶的穆斯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也抱着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对那些立宪民主党人的同样鄙视，他还是认为，为了未来的第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的长治久安，可以利用他们重新发明「六族共和」。

于是狄托就根据统战的原则，把一拨波士尼亚的穆斯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吸纳入未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当中，把波士尼亚人作为一个民族主体的身分第一次予以承认，同时顺便把波士尼亚的方言也发明成为正式语言。他在将「三族共和」改组为「六族共和」的过程当中，把马其顿语言和波士尼亚语言都由方言变成了正式语言。方言变成正式语言、再变成民族语言，并不代表着以前的方言和以后的民族语言在实际内容上有任何改变，只是大家的称呼方式有所不同了。例如，以前我可以说粤语是汉语的一种方言，以后我再拍一拍脑袋说粤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在这之前和之后，粤语的发音我一个都不用改，粤语的单词我也一个都不用改，只需要改一下在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措辞就行了，以后「坎通尼亚语」（Cantonese）和满大人语（Mandarin）就是两种语言了。所以实际上，从文学和日常应用的角度来讲什么也没改变，只是在法律承认的角度上稍微有一点转变而已。

对于狄托的第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来说，推动「六族共和」就是一个类似用「诸夏」取代「中国」的过程，在最初几十年的产生了相对良好的效果。至少，过去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经常闹翻天的那些矛盾，在第二南斯拉夫的最初几十年内好像暂时被压住了。狄托经常联合「南共联盟」内部的斯洛维尼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打压亚歷山大．兰科维奇[21]的塞尔维亚共产党和塞尔维亚民族势力。当然这样就在民族发明当中产生了许多后果。我们都知道，在希腊民族发明家开始搞希腊主义、开始搞「希腊辛亥革命」、发明相当于是「大汉族」的希腊民族之前，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居民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同样，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居民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统一都叫土耳其人，有的时候还自称为奥斯曼人。但是既然要发明一个波士尼亚民族，那么在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穆斯林也就自动变成波士尼亚民族了。但是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共和国之外的穆斯林，原来同样是土耳其人，那么该怎么发明他们的民族呢？那就由当地的共和国做主

了。

有些人被发明成为科索沃人。我们要注意，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原先也是自称和被称为土耳其人；但经过了「六族共和」的二次发明以后，他们就被兰科维奇领导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发明成为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了。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和土耳其穆斯林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纯粹玄学的问题，照我看是没什么区别的。政治家认为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就是阿尔巴尼亚人；认为他们是土耳其人，他们就是土耳其人。如果你是一个穆斯林，住在波士尼亚境内，你以后就变成了波士尼亚民族；如果你住在科索沃境内，你以后就变成了阿尔巴尼亚民族；但是如果你既不在波士尼亚共和国境内，又不在科索沃自治省境内，而是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或者是在南斯拉夫或其他什么地方的话，那你是什么人？看来你什么人也不是，所以你就只能是土耳其人了。或者如果你热爱南斯拉夫、觉得南斯拉夫比任何具体的民族都更能保护你们这些超小型文化族群利益的话，你也可以把自己发明成为南斯拉夫人。

于是原本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穆斯林就这样被发明成了四个新民族：人数最多的那一批，变成了波赫联邦首任总统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22]所在的波士尼亚民族；人数比较少的一批，变成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人数再少的一批，变成了南斯拉夫土耳其族；最少的一批，变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南斯拉夫民族。他们有什么区别？答案是，什么区别也没有，就是发明的区别，认同的区别。选择不完全是主动的，但是无论你是纯粹自愿也好还是完全被迫也好，还是介于绝对自愿和绝对被迫之间的那个漫长光谱当中的某一个点也好，无论是偏向光谱的哪一边，因为同一家人居住在不同的地点，以及处在不同的环境，做了不同的认同选择以后，就变成了四个不同的民族，以后你们就是波士尼亚民族、阿尔巴尼亚民族、土耳其民族和南斯拉夫民族了。

最后如我们所知，狄托的第二南斯拉夫跟苏联闹翻了。尽管它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却投入了西方的怀抱，因此跟北约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建立了一系列的关系。关系当中就包括侨民协定，南斯拉夫境内的土耳其人可以移民到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境内。由于当时南斯拉夫是在搞共产主义，而土耳其是在搞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生活可以买「大彩电」，比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生活要容易得多，于是许多后来的阿尔巴尼亚人──科索沃的穆斯林决定把自己的身分证改一下，把自己改成土耳其族，然后迅速地利用这个协定，一窝蜂地熘到土耳其去

过资本主义的好日子去了。这个做法立刻引起了众多人的效仿，于是很多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都决定自己不愿意再做阿尔巴尼亚人，而要做土耳其人。

同样的事情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云南人，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民族发明还很混乱的时候，你可以拍脑袋把自己发明成为「彝族」，也可以把自己发明成为「白族」，也可以把自己发明成为「汉族」。由于负责发明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很少能够弄的清楚这几种云南族群到底有什么区别，所以同一家人完全可以把自己发明成为几个不同的民族。发明成功了以后，到八十年代，发明成为「汉族」的那些人就开始拍脑袋说是，啊！我太吃亏了！发明成为「白族」的那些人，高考就可以多加很多分；而把自己发明成为「傣族」的那些人更占便宜了，「傣族」和泰族是关系很近，他们可以直接了当地跑到资本主义的泰国去，到了泰国境内就可以说自己是泰族人了。

云南的「西双版纳人」跟寮国的佬族人和泰国的泰族人有什么区别呢？答案是，没有任何区别。过去西双版纳的土司、八百媳妇的土司和寮国的土司都是蒙古帝国时期统治下的土司政权，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欧洲封建体系之下的贵族一样，大家都是表兄弟关系。只不过后来划分边界的时候，西双版纳的土司被划到清国境内，寮国的土司被划到法国境内，清迈的土司被划到泰王国境内，结果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不同国家的民族了。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沾亲带故，都是三亲六戚，在寮国和泰国之间来往很方便。你如果是云南人，把自己发明成了「傣族」，然后你跑到寮国或者泰国去，你硬着头皮说自己是「泰族」或「佬族」，那样一来，曼谷和清迈会有一大帮远房表兄弟来照应你，他们会集体在泰国当局面前发誓说你就是中国境内的泰族或佬族同胞，于是你就能顺利地跑到曼谷过上资产阶级生活了。如果你在一九五二年犯了一次错误，把自己发明成为「汉族」了，那就算了，曼谷的资本主义好日子就没你的分儿了。

南斯拉夫的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波士尼亚人的民族发明故事也都是这样展开的，就看你在一九四四年之后是怎么发明的。你要问这里面有什么道理，答案是，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唯一的道理就是政治。民族发明纯粹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比较极端和边界分布的地方表现得特别清楚，在其他表现得比较模糊的地方也是如此。如果有些人跟你说民族发明有什么天然的种族因素、语言因素或文化因素，那

么你就可以拿这个例子去给他们看，让他们清楚，民族发明唯一绝对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政治选择。有了政治选择，其他的种族、文化、语言、歷史传统方面的条件都是次要的，就算是完全没有，硬着头皮发明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民族发明的真正本质，这在波士尼亚的案例表现得极为明显。我们所知的波士尼亚民族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最终在一九四〇年代发明出来的，而波士尼亚后来在一九九〇年代遭遇的种种问题，都是随着过去而来的副作用。

波士尼亚
民族发明大事记

15世纪以前

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早期歷史

波赫早期居民为伊利里亚人。该地先后由罗马帝国、东哥特人、拜占庭帝国所占领或局部占领，直到15世纪由奥斯曼帝国接管。奥斯曼帝国直接管辖的波士尼亚省区，从文化上来说，与塞尔维亚地区没有任何不同，所以波士尼亚的民族发明早期一直和「南斯拉夫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纠缠在一起。

1878/7/13

奥匈帝国建立波士尼亚特区

第十次俄土战争结束后，奥匈帝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接管了相当于今日波士尼亚的行政区（当时是没有任何波士尼亚民族的），指派匈牙利人贝尼．卡洛伊主管这个殖民政权。在卡洛伊开明的文化政策之下，包括「南斯拉夫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以及「奥斯曼主义」等各种民族发明思想，皆流行于波士尼亚，导致长期的文化冲突。

1915/4/30

南斯拉夫委员会在伦敦成立

一战期间，塞尔维亚及波士尼亚的民族发明家在伦敦成立「南斯拉夫委员会」，他们与英国为首的列强协商，企图建立一个包括塞尔维亚（及波士尼亚）、克罗埃西亚及斯洛维尼亚的「南斯拉夫民族国家」。

1918/12/1
第一南斯拉夫王国的建立

一战结束后，原属于奥匈帝国的波士尼亚特区被併入以塞尔维亚为首建立的「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此王国建立在「三族共和」（克罗埃西亚人、斯洛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基础上，波士尼亚穆斯林在这个「三族共和」当中没有宪法地位。

1941/12/21
狄托建立反抗轴心国的军事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士尼亚成为轴心国傀儡政权克罗埃西亚独立国领地的一部分，但约瑟普．狄托在苏联的支援下，在波士尼亚山区建立军事组织，反抗德国和义大利等轴心国势力。二战结束后，狄托凭恃其军事组织的武力优势，建立「南斯拉夫联邦」。

1945/11/29
波士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

虽然克罗埃西亚人把今天的波士尼亚大部分都划进了克罗埃西亚境内，认为波士尼亚穆斯林都是克罗埃西亚穆斯林，不肯承认「波士尼亚民族」，但是二战结束后，狄托却决定把旧南斯拉夫王国的「三族共和」改组为「六族共和」，以改变「三族共和」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宪法结构的不稳定。所以，波士尼亚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分加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为狄托推动的「六族共和」成员之一。

1992/3/3

现代波士尼亚的独立与内战爆发

脱离南斯拉夫联邦的波士尼亚正式宣告独立，建立「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共和国」。波士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成立「塞族共和国」，与波士尼亚政府当局爆发严重冲突，史称「波士尼亚内战」。内战一直持续到1995年，在北约派遣维和部队介入后才得以终止。

---

1. 波士尼亚的全名为「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全国区域主要以伊万山（Ivan Mountain）为界，分为北方的波士尼亚区及南方的赫塞哥维纳山区，前者约占全国面积百分之八十，后者约占面积为百分之二十。本书所使用的「波士尼亚」，若未特别解释或标示地理位置，均是指涉「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民族国家，而非单指波士尼亚地区。
2. 裴多菲俱乐部（Petőfi Circle），于一九五五年由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的成员组建的文学社团，最初以匈牙利诗人拜塞涅伊（Bessenyei György, 1747–1811）为名，之后改为更具有政治性及叛逆性的匈牙利民族英雄山多尔．裴多菲之名，吸引匈牙利全国各地的各类型知识分子参与讨论现实政治与歷史议题，引发了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裴多菲（Sándor Petőfi, 1823–1849），匈牙利爱国歌曲《民族之歌》的作者，在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期间负责起草《十二条宣言》。他在一八四九年对抗俄奥联军的什瓦拉战役（Battle of Segesvár）中阵亡，被后世匈牙利人视为民族英雄。
3. 中国网路用语，讽刺当事者沉浸在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当中。
4. 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建立于一八六七年《奥匈折衷方案》的条约基础上，由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组成的双元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管理，内政则由两国政府各自管理，最后于一九一八年一战结束后解体，奥地利和匈牙利各自成立小民族国家。
5. 约瑟普．斯特罗斯马耶（Josip Juraj Strossmayer, 1815–1905），罗马天主教会主教及克罗埃西亚政治家，出身于斯洛维尼亚的克罗埃西亚人家庭，早年担任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宫廷牧师，一八六〇年担任克罗埃西亚人民党的党魁，致力于克罗埃西亚的独立运动，并提倡「南斯拉夫主义」。
6. 一八六〇年代，塞尔维亚首相加拉沙宁与克罗埃西亚政治家斯特罗斯马耶主教达成的政治协议，双方同意共同建立「一个独立于奥地利帝国或奥斯曼帝国的南斯拉夫国家」。
7. 当代广东民族主义者用语，意指以「广东人」（Cantonese）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坎通尼亚」（cantonia）一词源于晚清时期广东的官方英语翻译「canton」，并加上表示地名的拉丁语系后缀「-ia」所造的新词。
8. 第五纵队（Fifth column），此用语起源于西班牙内战（1936–1939），泛指在内部进行破坏并与敌方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政治组织。
9. 人民激进党（People’s Radical Party），于一八八一年成立，在精神上模仿法国的共和激进党，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该党试图推动塞尔维亚的民主改革，实施君主立宪政

体，促成了一八八八年的塞尔维亚宪法改革。在一九一七年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成立后，人民激进党长期执政，于一九二九年被南斯拉夫国王亚歷山大一世下令取缔而解散。

10. 贝尼．卡洛伊（Béni Kállay, 1839–1903），匈牙利出身的保守派政治家，曾将英国思想家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翻译成匈牙利文，其对巴尔干地区的政治见解影响奥匈帝国外交部长安德拉希（Gyula Andrássy）甚深。一八八二年起担任波士尼亚地区的管理者，直到一九〇三年过世为止。
11. 旁遮普民族主义者（Punjabis nationalists），是在锡克帝国（Sikh Empire, 1799–1849）兴起后、其文化和疆域所形塑的旁遮普民族概念的产物。他们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殖民统治时期受到严重打压。现代旁遮普民族主义者于印度一九四七年独立后，企图重建属锡克民族国家。
12. 泰米尔民族主义者（Tamils nationalists），是位于斯里兰卡的民族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政教分离、奉行世俗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独立国家，与斯里兰卡当权的僧罗迦人有深厚的歷史仇恨，目前透过「泰米尔伊拉姆勐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从事恐怖行动。
13. 中国网路用语，最初来自北方的粗口「傻逼」和「格调」的结合，意指假装很有格调和档次。刘仲敬借用该词，指代不同层级的制度或状态。但依然有反讽的含义。
14. 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新华字典》中对「地下党」的解释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和日本侵略军侵占的地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党组织，通常称为地下党。」而作者认为位于香港的中联办（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也像过去的中共地下党，负责执行某些秘密任务。
15. 亚歷克桑德．贝利奇（Aleksandar Belić, 1876–1960），塞尔维亚语言学家、贝尔格勒大学（University of Belgrade）教授，致力整合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埃西亚语并于一九二三年出版《标准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文法规范》（*Standard Serbo-Croatian Normative Guide*），后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百科全书》（*Serbo-Croatian-Slovene National Encyclopedia*）。
16. 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日，歷史学家顾颉刚于昆明《益世报．边疆週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该文认为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反对将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伪满洲国』即是一例」。
17. 科孚宣言（The Corfu Declaration），由斯洛维尼亚人、克罗埃西亚人、塞尔维亚人及其王国代表组成的「南斯拉夫委员会」于一九一七年七二十日在希腊科孚岛上发布的政治宣言，诉求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上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并由塞尔维亚国王担任国家元首。
18. 青海的马家军，二十世纪前半叶控制东亚地区甘肃、宁夏、青海三地的军阀，其中马步芳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仲英合称「西北五马」。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命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被马家军击退，史称「四马拒孙」。一九四九年与解放军的战斗失败，马鸿逵、马步芳跟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
19.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讲话时称：「中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称回民。过去我和马云亭（即马福祥，北洋宁夏护军使）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很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中国的回教，多半是汉人信仰回教。」

20. 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Draža Mihailović, 1893–1946），外号「德拉查大叔」，南斯拉夫王国将军，于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后，组织反抗势力「南斯拉夫祖国军」从事游击战，并与狄托领导的左派反抗势力争夺国家控制权，战后遭到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联邦政府逮捕并被枪决。
21. 亚歷山大．兰科维奇（Aleksandar Ranković, 1909–1983），塞尔维亚人，曾为仅次于狄托的南斯拉夫第二号人物。反对削弱联邦中央权力与向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放权，主张取消地方自治，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也主张保护科索沃境内塞尔维亚人，并给予他们特权，支持以强硬手段对付科索沃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于一九六六年被狄托下令撤职。兰科维奇被视为塞尔维亚的民族领袖，米洛塞维奇即为其政治思想之继承者。
22. 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Alija Izetbegović, 1925–2003, 波士尼亚首任总统），首任波士尼亚总统。一九九二年以总统身分要求欧洲承认波士尼亚为独立国家，遭到境内塞尔维亚裔反对，导致波士尼亚内战（1992–1995）的爆发。

七

蒙特内哥罗

欧洲「黑龙会」的孤儿



蒙特内哥罗

Montenegro

Crna Gora

独立时间：2006年6月3日

首都：波多里察

我们今天讲蒙特内哥罗（又译作「黑山」）。蒙特内哥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在巴尔干半岛算是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它的歷史又是极其奇特的。它既是「斯拉夫主义」的第一个实验品，又是「斯拉夫主义」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它有两种属性截然相反且相互矛盾的国民：既是斯拉夫的，又是奥斯曼的；既是东正教的，又是穆斯林的。这两种国民，一半跟斯拉夫主义者联繫在一起，一半跟奥斯曼主义者——也就是今天的波士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联繫在一起。如果「歷史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这句话属实的话，那么蒙特内哥罗便是这句话的最适当证明[1]。

蒙特内哥罗在欧洲歷史上的地位，很像是俄罗斯帝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领土里设置了一支「关东军」，就像是日本帝国在满洲境内设置的那一个关东州军事基地[2]，而这个军事基地的关东军不仅扰乱了满洲的歷史，扰乱了大清国的歷史，扰乱了中华民国的歷史，也扰乱了母国——日本帝国的歷史，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宪法结构。所以假如旅顺口的关东军像蒙特内哥罗的王公和菁英一样发明了一个「关东州民族」，成

立了一个「旅顺口王国」或者「旅顺口共和国」，在今天又加入了类似北约的「北太平洋公约组织」的话，那我们就真的很难说歷史到底应该怎么写，到底是说旅顺口的关东军是日本帝国干涉亚洲大陆的一个桥头堡呢？还是恰好相反，反过来说是旅顺口的「关东州民族」彻底地改变了日本歷史的走向。

如此之少的人操纵了如此之大的帝国，在人类整个歷史和所有帝国的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在十九世纪，真正的蒙特内哥罗人只有二十五万。把两种相互矛盾的蒙特内哥罗人加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也不超过五十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二十世纪中叶，也勉勉强强才有一百万人。而更严格地说，区区二十五万的蒙特内哥罗人——其实还可以划分得更精确一点，真正搅动歷史的蒙特内哥罗宫廷成员及菁英，恐怕总共就只有几百个人，比最初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和黑龙会还要少得多，但就是这批人，最后就把俄罗斯和欧洲的歷史搅得一团混乱，完全改变了歷史的发展。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小的蒙特内哥罗，其实是它在政治上翻云覆雨以后，从歷史的混沌中剩下来的最后一点点残余，跟它最初时所怀抱的伟大理想和起到的巨大作用根本不相称。它不相称的程度差不多像是，将旅顺口北面的那个小小的瓦房店[3]，跟珍珠港、中途岛、新几内亚、基斯卡岛、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的这个辽阔而浩瀚的太平洋相比，这样一种巨大的、极不相称的比例关系。



蒙特内哥罗主教国　图为蒙特内哥罗主教国最后一任「佛拉基卡」（Vladika）彼得二世。自16世纪初开始，蒙特内哥罗各部落联合建立神权性质的「主教国」以对抗奥斯曼帝国，其领导者称为「佛拉基卡」，兼具有神圣的主教与世俗的亲王身分。

位于伊利里亚的蒙特内哥罗，不论是在古罗马时期或拜占庭时期，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蒙特内哥罗就是蒙特内哥罗，仅此而已，跟湖北的荆山、武当山没有什么区别，从来就没有什么「蒙特内哥罗民族」，也谈不上有什么蒙特内哥罗行政区。歷史上的佩拉斯特（Perast）和波多里察

（Podgorica）在行政区划上的地位都比蒙特内哥罗要高得多。蒙特内哥罗是一片贫瘠的山区，它的居民也顶多是一些部落性质的土司，在拜占庭和奥斯曼的行省制度当中，它都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它的居民大致上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在比较接近平原地带、较接近统治中心的居民，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就像是波士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平原居民改信了伊斯兰教，就变成了奥斯曼人或者土耳其人。奥斯曼人或者土耳其人当然也不是按照血统算的，指的都是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另外一批主要是居住在山区的人，保存了过去的东正教信仰，然后按照奥斯曼帝国的划分方法，他们就被称之为是「罗姆人」（Rum Millet），这个词指的就是东正教徒。但不论是奥斯曼人或者罗姆人，这两种人实际上都是从过去大明国或者拜占庭帝国那些东正教徒一脉相传下来的。

另外还有人数比他们都少的另一种人，按照奥斯曼帝国的划分方法——也就是相当于谁是汉人、谁是满人、谁是回人的这种划分方法，他们是属于拉丁人。所谓拉丁人，就是受威尼斯共和国和义大利文化深刻影响的一些沿海居民，他们生活在今天克罗埃西亚的沿海一带。但是整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居民结构本来就是混沌不清的。今天我们叫做克罗埃西亚沿海、过去叫做伊利里亚沿海的那一带是连绵不断的，从今天的杜布罗夫尼克、克罗埃西亚一带算起，一直延伸到今天希腊的西北海岸，实际上包括了今天阿尔巴尼亚和蒙特内哥罗的西部海岸。这些地区有为数极少的拉丁语系居民，大略估计的话，他们的人口可能只有几万人，不到十九世纪蒙特内哥罗居民的十分之一。他们跟山地的东正教徒和平原的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就像是上海租界那一批洋商和买办跟内地吴越或者苏北居民的那种关系一样。他们主要是跟义大利人做生意，在政治上经常是接受威尼斯人保护的。

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衰落、奥斯曼帝国兴起这个歷史空档期里，就像是倭寇在大明国衰落、满洲人兴起的那个空档期一样，曾经多次进入希腊海岸，控制了这个地区的沿海地带。后来奥斯曼帝国兴起、把拜占庭帝国全部吞併以后，便开始整顿边疆的沿海地带，开始消灭「郑成功集团」，然后把威尼斯人和拥护威尼斯人的这拨汉奸从他们占领的地区上赶走了。虽然威尼斯人的贵族和大商人基本上都走了，但是总还有一些小商人和深刻接受威尼斯文化和义大利文化的普通人留了下来，这批人就是奥斯曼帝国划分的所谓「拉丁人」的后代。

如果按照简化的民族发明学思维来说的话，第一，十八世纪蒙特内哥罗山区的居民，很难说他们具备发明民族的条件。如果说他们都可以发明成民族的话，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不能发明民族的地方了。即使是大别山区或者是武当山区，都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发明「大别山民族」或者「武当山民族」了。第二，如果真的要发明民族的话，蒙特内哥罗内部的两大族群再加上沿海地区小的拉丁人族群，为了排除冲突起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把他们划分为三族，谁家的孩子就谁家自己抱回去，不要把三块划成一块儿。但在最后，出于民族发明的阴错阳差，他们还是被划分在一起了。当然他们之间不是没有主次之分，这就得依靠当地酋长和菁英运用外交手腕来区分主次的能力了。

这个时候俄国的凯萨琳女皇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开始了。在第一讲提过的，这场战争有一部分是在希腊海岸进行的，由奥尔洛夫兄弟率领的俄国海军，完成了俄国建国以来的一项壮举──从波罗的海越过地中海，在义大利停泊以后一路开到希腊海岸，在希腊海岸打败了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过去彼得大帝虽然曾经打败瑞典的查理十二世国王（Karl XII），但是在黑海沿岸却未能打败奥斯曼帝国，因此俄罗斯仍然只在波罗的海才有海军，在黑海是没有海军的。直到凯萨琳女皇登基，才突破了这个歷史限制，把俄罗斯的北方舰队一路开进了地中海。这场战役的结果是，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签署了一七七四年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

《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以后的那种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签署的条约，而是帝国之间带有宪法性质的谈判，因为交涉的双方──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多族群的帝国，都兼有属于欧洲的成分和不属于欧洲的成分。俄罗斯帝国不仅是代表俄罗斯帝国本身作战的，而且也是代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作战的。它作为拜占庭皇帝的直接继承者，继承了拜占庭帝国保护希腊、叙利亚各地东正教徒的权利，所以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战争，从理论上看，可说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继承者之间的战争。俄罗斯帝国是拜占庭帝国的行在或者流亡政权，它作为拜占庭的继承者，继续打这场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已经输掉的战争。

所以当俄罗斯帝国打败了奥斯曼帝国以后，它按照当代被普遍理解的「国家利益」（虽然按照后世民族国家的原则来讲这根本就不能叫国家利益，但是对于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来讲这就是最重大的国家利

益），要求战败的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做它过去一直不肯做的事情：承认俄罗斯帝国继承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各路东正教徒的权利。这个权利，假如要东方人想像一下，那就同等于：日本天皇继承了大明皇帝的权利，有权保护满洲帝国境内所有信仰孔孟之道的臣民。这样一来，任何一个会到孔庙祭孔的苏州人或者杭州人，当他跟满洲人或者蒙古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找日本天皇和大日本皇军做他的靠山，这样一来，满洲人和蒙古人就再也不敢欺负他了。此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徒就可以说，自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垮台以后，你们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总是欺负我们，以前我们拿你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新兴的沙皇来做我们的靠山。有了沙皇在，比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更加强大，现在你们穆斯林就不可能再欺负我们了。

奥斯曼帝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首先，他们作为穆斯林，继承了穆罕默德创教以来就一直持续的优待「有经人」的传统。穆罕默德过去曾经说过，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交纳了人丁税[4]，那么穆斯林就有义务保护他。如果穆斯林亏待了这些「有经人」的话，「有经人」即使是找穆罕默德本人伸冤，穆罕默德也不会偏袒穆斯林。这个权利是穆罕默德给予作为伊斯兰教先驱者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严格来说并不适用于其他宗教信徒。但是有的时候由于其他穆斯林统治者在征服或统治上的方便，这个传统也会被从宽解释，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跟巴尔干没有什么关系。而奥斯曼帝国，他们作为最初信仰异教、后来才改信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在接替阿拉伯人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主要统治者、甚至兼任了哈里发的职务后，它在法统上是不可能否认伊斯兰政体的这个基本原则的。穆斯林对犹太人和基督徒传统的尊重，就体现为众所周知的米勒特教团自治制度。所以无论有没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或者俄罗斯的沙皇，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兼哈里发从法统上讲，只要他仍然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自居，表示说要遵守沙里亚法和歷代伊斯兰帝国的传统，那么他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允许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社区享有自治权。

然而在一八六〇年条约体系[5]的远东，沿海的租界或者其他什么治外法权社区享有的自治权，实际上是远远比不上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以后，在没有遇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主动给予热那亚人、拉丁人和匈牙利人的自治权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从来就没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丧权辱国」，是害怕西方人的奥斯曼苏丹，在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对西方人的让步。奥斯曼人一向觉得，第一，这种做法

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伊斯兰教的传统，我们的穆罕默德和他的前四位继承者—最正统的四位哈里发[6]在征服了叙利亚以后，对战败的基督教徒一向是主动给予这种宽容的。同样的，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后，对吃了败仗的热那亚人和西方的各种商人团体，也是主动给予他们自治权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国耻，而是穆斯林统治者的一贯传统而已。奥斯曼帝国在《库楚克开纳吉和约》[7]当中给予凯萨琳女皇的权利，实际上是在穆斯林的政治传统、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传统之上，稍微给了俄国沙皇一个面子，仅此而已。

于是你就可以对西亚和东亚的政治传统做出具体的对比了。尽管以西欧的标准来看，西亚算是专制国家，但是所谓西亚专制国家允许臣民享受的自治权远比东亚的专制国家要大得多。尽管从西欧基督教徒的观点来看，穆斯林的帝国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化身，奥斯曼帝国本身就是迫害基督教徒的一个重大的嫌疑犯，但即使是奥斯曼帝国对待基督教徒的宽容程度，也比大清帝国，无论是在一八四〇年以前、一八六〇年之前或是之后，对待国内的穆斯林社团和基督教社团，乃至于对待国内的所有臣民，都要宽容得多。西亚的任何少数派的教派或者种族团体，享受的自治权都比在东亚各帝国享受的自治权要大得多。如果说西亚的统治者按照欧洲标准就已经是极端专制的话，那么东亚的政治体制按照欧洲标准来看就已经是没有一个适当的形容词可以来形容它了。奥斯曼帝国的体制在东亚人看来就已经是极其自由和开放了。

早在《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签订之前的十八世纪初，蒙特内哥罗当地的王公（其实还只能算是酋长和土司）就敏锐地看到，俄国沙皇跟他们的东正教联繫可以被他们利用，作为提高他们政治地位的基础。《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给予的这种权利普遍地适用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各派东正教徒。例如，它既适用于耶路撒冷的东方正教徒，也适用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方正教徒。但是耶路撒冷的东正教徒得到了这个权利以后，他们只是採取了一些礼仪性的行动，例如把教堂的钥匙送给圣彼得堡的沙皇、请求圣彼得堡沙皇派出领事诸如此类对后世影响不大的动作。如果他们也具有蒙特内哥罗的政治敏锐度的话，那么伯利恒（Bethlehem）或者耶路撒冷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就很可能存在像蒙特内哥罗一样小的「耶路撒冷东正教共和国」或者「伯利恒东正教共和国」。耶稣出生地的伯利恒很可能会像是今天的蒙特内哥罗一样，要求叶尔钦总统和普丁总统保护他们的利益，支持他们跟周围的阿拉伯穆斯林及以色列打仗，

保卫他们的国家主权，但是伯利恆或耶路撒冷当地的菁英没有这样想。


蒙特内哥罗的山地部落战士　此图为1952年的纪录照片，一群来自切沃（蒙特内哥罗语：Čevo）氏族，身着传统服装的蒙特内哥罗人正进行着军事操练。「切沃」氏族是蒙特内哥罗的传统山区部落之一，许多近代蒙特内哥罗的军事领袖皆出自该氏族，也包括着名的女战士瓦希里亚（Vasilija Vukotić）。蒙特内哥罗在歷史上是由各山区部落联合建立的国家，其民族文化直到今日仍保有许多传统氏族社会的特色。

而蒙特内哥罗的山地东正教徒部落的酋长和族长拍了一下脑袋，觉得俄罗斯人是一批很好利用的冤大头，可以好好利用他们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于是他们就及时地抱上了俄罗斯人的大腿，向俄罗斯人推销了后来被我们称之为所谓的「泛东正教主义」。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徒跟俄罗斯的东正教徒全是一家人，我们都应该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东正教徒的大帝国。这个大帝国应该定都君士坦丁堡，恢復大明国的盛世。但是我们这些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大明国遗民太弱小了，实现不了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只能像郑成功和朱舜水[8]一样，说服大日本帝国的天皇继承大明国的遗产与疆土，十八省的臣民也共同拥戴大日本天皇，把满洲人和蒙古人都赶出大明国的十八省。

蒙特内哥罗的王公把这一套理论推销给了圣彼得堡的沙皇，虽然沙皇像江户幕府的将军一样没有完全接受朱舜水的理由，但还是觉得他们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蒙特内哥罗这拨人毕竟跟我们一样，都是东正教的同胞。我们虽然不能像他们要求的那样放下德国的利益、瑞典的利益、波兰的利益不管，放着俄罗斯本土不管，全心全意地去攻打君士坦丁堡，但是这批人既然途穷来归，请求我们俄罗斯帝国的保护，也只好「穷鸟入怀，猎人不杀」。沙皇抱着日本人对孙中山的那种感觉，觉得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帮着你们少康復国，但是给你们提供一些外交和物质援助。这事儿，我们慷慨大方、强大勇敢的俄罗斯人完全做得到。然后他们就这么做了。结果就是，未来的蒙特内哥罗人完全抱上了圣彼得堡的大腿。当时的蒙特内哥罗其实包括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居民、穆斯林居民和拉丁居民，但是蒙特内哥罗民族发明家就经常理直气壮地跑去圣彼得堡要援助，让慷慨大方的俄罗斯人包养他们，正如孙文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跑到东京去，让慷慨大方的梅屋庄吉[9]和黑龙会把包养他一样。孙文在被包养的时候，可是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日本人和我们大明人都是一家人，都是华夏一家，泛亚一家，我们有「驱除鞑虏、恢復中华」的共同事业，亲兄弟之间还算什么帐，你们日本人包养我是应该的。蒙特内哥罗人在被俄罗斯人包养的期间也抱着同样理直气壮的态度，认为你们都是应该的。

于是蒙特内哥罗在这场政治游戏中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就在一八五二年宣布成立了「蒙特内哥罗公国」。在俄罗斯帝国的积极支持之下，奥斯曼帝国承认以策提涅（Cetinje）为首都的蒙特内哥罗公国享有自治权，由东正教的王公来统治。然后，在圣彼得堡的沙皇支持下，达尼洛一世[10]就当上了这个蒙特内哥罗公国的大公。蒙特内哥罗公国从法律上讲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只是它在俄罗斯皇帝的保护之下享有了宗教和司法的自治权而已。虽然达尼洛大公的家族在法律上是奥斯曼苏丹的臣民，但是在宗教上他们是俄罗斯沙皇的亲兄弟，而且他们拿沙皇当后盾时时刻刻对抗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苏丹。所以可以理解，他们经常跑到圣彼得堡去活动，打沙皇的秋风。蒙特内哥罗的王公家族绝大部分都在圣彼得堡的宫廷里面打过秋风，所以他们受俄罗斯国内政治思潮变化的影响远比起其他人都要大得多。他们从一开始就採取绑定俄罗斯帝国、搭俄罗斯帝国便车的政策，所以他们操纵俄罗斯帝国的意志也比其他人要坚定得多。

近代俄罗斯内部的政治思潮大约是这样变化的：拿破崙战争以前，沙皇亚歷山大一世继承了他的祖母凯萨琳女皇的「启蒙主义」西化政策。凯萨琳女皇在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思想史当中是亲欧派的一个重要柱石。在亚歷山大一世推翻了反欧洲派的保罗一世以后，重新把俄罗斯帝国的轨道拉到亲欧洲的路线上去，所以亚歷山大一世的宫廷才会培养出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这样的强烈亲欧洲、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团体。但是在拿破崙战争（1803–1815）以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发生了

变化，转为跟俾斯麦亲王和塔列朗亲王[11]一伙，在维也纳会议上根据正统君主制的原则维持欧洲协调，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和凯萨琳所代表的启蒙派、西欧派当权的时代很快就成了明日黄花。虽然亚历山大一世本人还统治了一段时间，但是从俄罗斯历史的角度来讲，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最后几年跟他的继承者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最初几年是差别不大的，跟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的前半截及凯萨琳女皇的时代就已经不是同一个时代了。新时代的原则是正统主义，最具体的事件就是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和任命卡尔．内斯尔罗德（Karl Nesselrode）作为他的外交大臣。内斯尔罗德的外交政策跟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外交政策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到了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罗斯的政策再度发生了迅速转变。



俄罗斯启蒙运动　此为18世纪末期的俄国绘画作品《舒瓦诺夫的画廊》（*View of Ivan Shuvalov's art gallery*）。舒瓦诺夫为凯萨琳统治时期的俄罗斯教育部长，亦是欧洲启蒙运动理念的积极推广者，在他的主导下，俄国成立了史上首座艺术学院。

在凯萨琳女皇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时代，俄罗斯的宫廷既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同时也认为自己是欧洲文化的代表；到了尼古拉一世的时代，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但是他们不再像凯萨琳和亚历山大一世那样喜欢欧洲人和启蒙主义，而是像梅特涅一样喜欢欧洲正统主义。在后来的正统主义者看来，启蒙主义以其开明的态度，孕育了种种危险的启蒙思想，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迫使整个欧洲的正统君主制都陷入动摇之中，并陷入了拿破崙战争的混乱当中，因此在维也纳会议后如果要

维持和平的话，首先就要恢復正统主义。因此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宫廷由亚歷山大一世和凯萨琳时代相信启蒙主义的欧洲人变成了相信正统主义的欧洲人。相信启蒙主义的欧洲人，像法国的路易十六国王那样是推动启蒙主义的；相信正统主义的欧洲人，像梅特涅那样是坚持正统主义的，认为欧洲的所有正统君主都是一家人。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以后，俄罗斯人对欧洲的信心动摇了。他们觉得：「俄罗斯自亚歷山大一世打败拿破崙以后，一直是欧洲正统主义的柱石。一八四八革命的时候，是俄罗斯人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镇压了欧洲革命。俄罗斯人为了维持正统主义的原则，没有放开手来支持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因为梅特涅害怕如果大家都搞独立的话，那么奥地利帝国也会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分崩离析。而俄罗斯帝国本来可以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当中得到最大的利益，甚至可以收復君士坦丁堡，打开从彼得大帝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通向温暖水域的通道。就是为了维护奥地利的正统派君主，他们才牺牲了如此巨大的机会。正统主义的维护主要依靠俄罗斯的士兵浴血奋战，得到好处的却是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皇帝，这本来就已经是俄罗斯吃亏、维也纳占便宜的事情。但是就连这样的局面都维持不下去。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以后，维也纳宫廷居然公然忘恩负义，站到英法联军一边去，帮着土耳其人打俄罗斯帝国。这真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俄罗斯真是白白做出无谓的牺牲呀！」

因此一八五四年以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思潮发生了急剧转变。从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主义，变成十九世纪初叶的欧洲正统主义；又从十九世纪初叶的欧洲正统主义，转向十九世纪末叶的「斯拉夫主义」。为什么要讲「斯拉夫主义」？就是因为我们俄罗斯人被欧洲出卖了。我们把欧洲的正统君主当作我们俄罗斯沙皇的一家人，但是欧洲的正统君主却不把我们俄罗斯沙皇当成一家人。我们为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操碎了心、流尽了血，而等到我们要跟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打仗的时候，这些卑鄙的、毫无诚信的欧洲正统君主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我们，跟万恶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站在一起。谁是俄罗斯人的朋友呢？沙皇亚歷山大三世痛定思痛，就说出了一句名言：「俄罗斯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俄罗斯陆军，一个是俄罗斯海军。」维也纳会议上曾经是俄罗斯盟友的那些正统君主，现在都不再是俄罗斯沙皇的朋友了。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跟蒙特内哥罗很有关系的话：「俄罗斯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sole true and loyal friend of Russia），就是蒙特内哥罗的尼古拉大

公。」

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写了一部着名的书叫做《俄罗斯与欧洲》[12]。它不仅在俄罗斯的思想史上，也在全欧洲的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这部书的许多观点都可算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3]前身。它提出的思想，在亚歷山大一世的时代、在罗蒙诺索夫[14]的时代看起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但到了现在差不多就是老生常谈了。今天的普丁、杜金[15]和索忍尼辛这些人，对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基本上都是耳熟能详，甚至可说是陈词滥调了。丹尼列夫斯基要表达的思想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俄罗斯文化从来就不属于欧洲」，俄罗斯对应的并不是如普鲁士或奥地利的欧洲国家个体，它对应的是整个欧洲文明。过去的亚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错误地以为，俄罗斯跟法兰西王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层次，这是错的，俄罗斯跟欧洲整体是一个层次的，俄罗斯文化的对应并不是欧洲的某个地方性文化，而是欧洲文化整体。而且，俄罗斯文化由于在性质上跟欧洲文化有根本不同，所以不应该也不能够像欧洲那样推动多国体系、推动「解体论」。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以后的欧洲形势是英国、法国、普鲁士、西班牙、荷兰各个小国，这个小国林立的形势、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国家、自私自利的多国体系是西欧文化堕落的标志。我们俄罗斯人高尚无比，俄罗斯沙皇像一个大家长一样保护我们全体，所以我们是不搞多国体系的，我们俄罗斯人的帝国体系比西方的多国体系更高级，我们跟他们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当然不能再信任他们，俄罗斯过去的失败都是因为错误地信任了欧洲人的缘故，今后要彻底改变这种思维。

我们俄罗斯人是斯拉夫人，斯拉夫人跟欧洲人是两个世界，欧洲人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代表，斯拉夫人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代表，而我们俄罗斯人是斯拉夫人的最佳代表。同时，还有很多斯拉夫人在卑鄙的异教徒—也就是我们斯拉夫东正教徒的世仇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斯拉夫人在不可靠的盟友奥地利皇帝的统治之下，我们俄罗斯人将会解放他们全体。当然这样的说法是带有浓厚的报復意味的。我们俄罗斯私人为了维持梅特涅的外交政策，不得不牺牲了很多，然后你们这些梅特涅的继承者却偏偏在政治上出卖我们。现在我们有办法报復你们了。我们可以说：你们奥地利皇帝的斯拉夫臣民，尽管按照维也纳和会的正统原则是哈布斯堡君主的臣民，但是按照「斯拉夫主义」的原则，自然应该服从俄罗斯的沙皇，而不是服从奥地利皇帝。这

样一来，我们俄罗斯人就同时报復了奥地利皇帝和奥斯曼苏丹。

政治思潮是有一定的时政意义的，但是效果一般不会太好，原因在于它克服不了时差。克里米亚战争的背叛是一八五四年的事情，「斯拉夫主义」要产生政治伦理上的效果还要等到几十年后。这就像是德国的儿童文学《吹牛大王歷险记》里面的明希豪森男爵，他在美洲的火车站上跟一个火车站站长吵架，想要打他一耳光，结果这一耳光打下去的时候火车已经出站了，结果打到下一个火车站站长的脸上了，这个站长其实跟他是无冤无仇的，结果我们可怜的吹牛大王男爵就不得不向他道歉。斯拉夫主义者企图发明的政治伦理也是这样的，他们报復的目的是一八五四年的奥地利帝国，但是这一耳光打下去却报復在了一九一四年的奥地利帝国头上，结果顺便把他们自己最亲爱的俄罗斯帝国也在这一记耳光之中打没了。这种事情在「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语出谭嗣同）、想用笔桿子代替枪桿子的知识分子身上是很常见的。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发明家的影响，导致产生了如爱沙尼亚之类的泛日耳曼系统的各个民族，间接促成了德意志帝国的解体。「斯拉夫主义」的民族发明家对于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也做了同样重大的贡献。

但是无论如何在一八五四年这个关键时刻，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家做出了这个发明，就被我们擅长投机的蒙特内哥罗民族发明家抓到和利用了。蒙特内哥罗民族发明家在他们最大的保护者俄罗斯帝国已经转变了政治思潮的情况下，率先倒向了最新的斯拉夫主义发明。此时读者大概已经发现，「泛东正教主义」这个旧发明和「斯拉夫主义」这个新发明所针对的原材料和动员对象是同一批人，主要就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十八世纪的泛东正教主义者要求他们把自己当成东正教徒，一八五四年以后以俄罗斯为基地的「慈善社」（Slavic Benevolent Committee）却要求同样一批人的儿子和孙子把自己发明成斯拉夫人。这两者在外交上都是有利于俄国的，但是由于俄国国内的政治思潮发生了变化，所以原先讲的东正教徒一家的逻辑，现在就变成了「斯拉夫主义」—「全世界斯拉夫人团结起来」这种新的发明。近代的蒙特内哥罗就是慈善社推动「斯拉夫主义」的发明产物。

前面提到，沙皇亚歷山大三世在被欧洲人气得说出那句「只有俄罗斯陆军和俄罗斯海军才是俄罗斯的盟友」的名言以后，在克里米亚战争时又被气得说了一句名言：「俄罗斯只有一个朋友，就是蒙特内哥罗大公尼古拉。」他说这句话主要是为了气西方列强，意思是：「你们太靠

不住了，是我们的假朋友。我们俄罗斯人怀着一片赤诚对待你们，没想到你们这么靠不住。算了，我还是让到我们圣彼得堡宫廷打秋风的蒙特内哥罗人做我们的朋友吧，只有他们是对我们真心诚意的。」他主要是为了气西方大国，但是蒙特内哥罗人听到这句话之后当然是受宠若惊。当时蒙特内哥罗人口总共才只有二十五万，俄罗斯帝国可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不用说，俄罗斯有没有蒙特内哥罗，对俄罗斯来说是基本没什么影响；蒙特内哥罗有没有俄罗斯，对蒙特内哥罗来说影响就大了。

于是蒙特内哥罗的尼古拉大公听到这句话以后立刻就说了一句受宠若惊的话：「我们蒙特内哥罗人代表着斯拉夫人，我们的同胞有一亿多人。」请问这一亿多人是哪一亿多人呢？答案是，蒙特内哥罗大公尼古拉的「一亿多同胞」其中有一亿多是俄罗斯人，还有二十五万是他的蒙特内哥罗臣民。这话的意义就像是，梁启超同志早上说「我们三千万同胞」、晚上又说「我们四万万同胞」。他说的「三千万同胞」是什么呢？是三千万「坎通尼亚」的同胞。他说的四万万同胞又是什么呢？是大清帝国的四万万臣民。当梁启超这样说的时候，无论是三千万同胞还是四万万同胞，会不会跟着他走，这不好说，但是如果四万万同胞愿意跟着他梁启超走，那么声势确实是比只有三千万「坎通尼亚」同胞要大得多了。尼古拉大公只有二十五万臣民，在列强面前自然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如果俄罗斯的沙皇愿意跟他做朋友的话，他立刻就抖起来了，因为他有了一亿多同胞了，现在奥斯曼的苏丹自然不是他的对手了，全世界的穆斯林都顶不住俄罗斯沙皇的一脚，把君士坦丁堡踩在脚下都不成问题。虽然尼古拉大公管辖的二十五万人民是经不住奥斯曼苏丹的马靴一碾的，但是既然做了俄罗斯沙皇的同胞，他马上就抖起来了。



蒙特内哥罗的尼古拉大公　此为纪念一战结束的作品《战争的万神殿（局部）》（*Panthéonde la Guerre*），蒙特内哥罗的统治者尼古拉大公作为战胜国的领导者之一，与其他大国并列在第一排的显目位置（前排左方第四位）。

亚歷山大三世说尼古拉大公是他唯一的朋友，这个只是说说而已。他的外交政策主要还是由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16]主持的。吉尔斯是一个比较持平的政治家，没有完全被斯拉夫主义者绑架。等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权的时候，他的宫廷就完全落到两位蒙特内哥罗公主[17]的手中了。蒙特内哥罗的这两位公主，米莉卡和安娜塔西亚对尼古拉二世的王后费奥多罗芙娜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尼古拉二世则是一个耳朵很软、常常受到王后影响的人。尽管尼古拉二世从来没有说过他在世界上唯一的朋友就是蒙特内哥罗的两位公主，但是蒙特内哥罗的两位公主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比起尼古拉大公对亚歷山大三世宫廷的影响要大得多。



负伤的蒙特内哥罗　此为塞尔维亚画家乔瓦诺维奇（Paja Jovanović）创作于1882年的作品，以1876年爆发的蒙特内哥罗独立战争为主题，描绘了受伤的士兵回到家乡的场景以引起读者的哀伤与愤慨，在当时的塞尔维亚及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之间引起热烈共鸣。

然后就顺着我们以前在塞尔维亚民族发明中提到的那个故事，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由维护欧洲正统君主制，逐步转向支持斯拉夫主义革命家颠覆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最终引起了塞拉耶佛的一声枪响。塞拉耶佛的一声枪响导致了黑海海峡的封闭，在几年之内就断送了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的江山社稷，而只有五十万人口的小小蒙特内哥罗在一九一八年被塞尔维亚人轻而易举地占领，连一个泡沫都没有泛起。塞尔维亚的民族发明家按照我们以前在塞尔维亚的故事中间讲到过的那种方式，直接了当地实行「三族共和」。「三族共和」是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和塞尔维亚，根本否认了「蒙特内哥罗民族」的存在。当然即使是在蒙特内哥罗大公和蒙特内哥罗国王尼古拉统治的时代，蒙特内哥罗那三种相互矛盾的居民彼此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点点认同，本身也是非常可疑的。他们在被塞尔维亚吞併的过程中间，确实是谈不上有什么反抗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塞尔维亚的故事中间曾经讲过的那样，狄托用「六族共和」取代了旧南斯拉夫的「三族共和」。他希望削弱塞尔维亚的势力，于是又重新把歷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蒙特内哥罗又从「大塞尔维亚」内挖出来，以它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新省区，即泽塔省（Zeta Banovina）。

从蒙特内哥罗的歷史传统来讲，它曾经跟塞尔维亚一样是激烈的东正教主义者和激烈的斯拉夫主义者。而在二十世纪末期，南斯拉夫开始解体的过程中间，马其顿和波士尼亚都独立了，克罗埃西亚和斯洛维尼

亚重返欧洲了，只有蒙特内哥罗跟着塞尔维亚，坚决地要求叶尔钦总统和普丁总统派兵来维护它。别人会以为它这一回跟着塞尔维亚是跟到底了，但是其实也没有多久。塞尔维亚在北约的打击下很快就不行了，然后小小的蒙特内哥罗像是大多数小国一样採取机会主义，迅速背弃了众叛亲离的米洛塞维奇和塞尔维亚，废弃了塞尔维亚的货币「第纳尔」，开始使用德国的马克，然后开始使用欧元。然后，由同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直接脱胎而来、由米洛塞维奇扶植起来的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Đukanović）政权，在科索沃危机当中国际社会制裁塞尔维亚的同时迅速地抛弃了塞尔维亚，封锁了塞尔维亚的出海口，倒向了国际社会一边，因为出卖和制裁塞尔维亚的功劳，抢先在塞尔维亚前面投入了北约所在的阵营。这整个过程之中起作用的仍然是採取高度外交机会主义的一小拨蒙特内哥罗的菁英。他们原先强烈地亲东正教，强烈地主张把大塞尔维亚、把小南斯拉夫作为叶尔钦和普丁的俄罗斯在亚得里亚海的军事基地，现在戏剧性地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把蒙特内哥罗变成了北约反对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这种做法其实就像是假如关东军真的成功建立满洲国了，然后在日本和美国发生冲突以后，驻扎在旅顺口的关东军又迅速发动政变，抛弃了日本和满洲国，站到美国一边，把旅顺口变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并在基地上面发明了一个「关东州民族」。「关东州民族」的主要成分就是居住在关东州的日本海陆军战士，而战士以外的原住民在政治上是始终消极的，无论你把他们发明成为希腊人、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或者蒙特内哥罗人，他们都无动于衷。只有这一小拨统治关东州的日本海陆军军官，首先操纵日本东京政府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建立了满洲国；然后在满洲国和日本跟美国人打起来、眼看就要打败了的时候，又迅速抛弃了日本和满洲国，宣布关东州独立，宣布关东州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关东州民族」，关东州的日本海陆军将校自古以来都是属于「关东州民族」，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打败了日本和满洲国，变成了美国的盟友，加入了美国主导之下的北太平洋公约组织，最终宣布他们自古以来就是欧洲人，跟日本人、满洲人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刚才我讲的这套虚拟歷史故事在远东真的发生过，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蒙特内哥罗在欧洲的歷史。

蒙特内哥罗民族发明成功的主要祕诀就是，利用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利用少数菁英对于消极的居民完全能够做主的这个优势，迅速地、

极端机会主义地利用国际秩序的变化，在俄罗斯人占上风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绑定俄罗斯，即使是利用「斯拉夫主义」使俄罗斯国破家亡也不在乎；接着在塞尔维亚失势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弃南斯拉夫，紧紧抱住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大腿。小国的好处就是抱大腿最方便。旅顺口如果成功建立为一个独立国家，它要利用日本的实力打倒大清国和中华民国是很容易的事情，利用美国的实力打倒日本和满洲国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就是蒙特内哥罗民族发明的故事。

蒙特内哥罗
民族发明大事记

15世纪前

蒙特内哥罗早期歷史

蒙特内哥罗的先民为伊利里亚人，西元前3世纪时被古罗马征服。罗马帝国衰落以后，伊利里亚落入哥特人之手，后来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又将该地区重新纳入版图。西元6、7世纪，斯拉夫民族抵达此地，并且和当地先民融合，建立自己的国家。其中，杜克里亚公国比较接近蒙特内哥罗的版图在15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征服。

1774/7/21

《库楚克开纳吉条约》和蒙特内哥罗主教国

第五次俄土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库楚克开纳吉条约》，俄罗斯沙皇取得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基督徒及藩属国的保护权，包括採取政教合一制度的蒙特内哥罗主教国。

1852/3/13

蒙特内哥罗公国成立

在俄罗斯帝国的支持下，蒙特内哥罗从主教国转型为世俗公

国，统治者名号从达尼洛主教改称为达尼洛大公。蒙特内哥罗公国拥有独立的宗教和司法自治权，但在法理上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1869年

《俄罗斯与欧洲》的出版与「泛斯拉夫主义」兴起

克里米亚战争后，「泛斯拉夫主义」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主流政治思潮，其代表事件为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于1869年出版《俄罗斯与欧洲》。「泛斯拉夫主义」思潮的兴起，促使俄罗斯帝国在政治上更加支持作为「斯拉夫同胞」的蒙特内哥罗公国。蒙特内哥罗民族发明家在他们最大的保护者俄罗斯帝国已经转变了政治思潮的情况下，率先倒向了最新的斯拉夫主义发明。

1876/6/18

「蒙特内哥罗–土耳其战争」爆发

蒙特内哥罗公国在俄罗斯帝国的支持下，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爆发「蒙特内哥罗–土耳其战争」。战争持续到1878年3月3日，蒙特内哥罗公国获得胜利。

1878/7/13

蒙特内哥罗公国的独立

蒙特内哥罗公国在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及西方列强签署的《柏林条约》中，正式被国际承认为独立国家，并于1910年升格为蒙特内哥罗王国。

1918/12/1

蒙特内哥罗被併入第一南斯拉夫王国

1914年一战爆发，加入协约国的蒙特内哥罗王国被奥匈帝国完全占领，直到战争末期才由协约国盟友塞尔维亚夺回领土。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成立是「三族共和」（斯洛维尼亚、

克罗埃西亚和塞尔维亚）的产物，从根本上否认了「蒙特内哥罗民族」的存在。蒙特内哥罗在塞尔维亚的主导下废除王国体制，并改为「泽塔省」，併入「第一南斯拉夫王国」，直到1941年为止。

1941/4/17

义大利占领蒙特内哥罗

二战爆发后，义大利占领蒙特内哥罗全境，并成立协助轴心国的傀儡政权。

1945/11/29

蒙特内哥罗加入南斯拉夫联邦

二战结束后，蒙特内哥罗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分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第二南斯拉夫）。约瑟普．狄托用「六族共和」取代旧南斯拉夫的「三族共和」，为了削弱塞尔维亚的势力，他再次把歷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蒙特内哥罗又从「大塞尔维亚」内挖出来。

1992/3/1

蒙特内哥罗举办独立公投

1990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蒙特内哥罗于1992年举办脱离南斯拉夫联邦的独立公投，表决结果未通过，独立失败的蒙特内哥罗在同一年与塞尔维亚共组「南斯拉夫联盟国」，2003年改为「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联盟国」。

2006/6/3

蒙特内哥罗正式独立

蒙特内哥罗再次举行全民公投，通过后终止与塞尔维亚的联盟关系，正式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并追认成立于1878年的蒙特内哥罗王国的政治合法性。

1. 「歷史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此段文字源自于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发表的〈实验主义〉，原文如下：「『实在』（Reality）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它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胡适原文所指的「小姑娘」并非「歷史」，但在冯友兰发表于一九五五年的文章〈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中被改写为「歷史」，原文如下：「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歷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歷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涂抹的。」
2.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俄国位于辽东半岛旅顺口的「关东州」军事基地，并设立「关东都督府」作为当地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日本将「关东都督府」辖下的陆军部独立为「关东军」并以「关东州」作为主要根据地。
3. 瓦房店，位于辽宁省南部，在帝俄和日本殖民时代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因轴承工业发达又被称为「轴承之乡」。作者常以「瓦房店化」比喻东亚帝国（尤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累积技术的能力，所有技术都是外来的移植，一旦技术输液管道切断之后就立刻劣化，技术衰退的过程。
4. 人丁税（Jizya）一般认为起源于《古兰经》第九章二十九节的叙述：「当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所谓「曾受天经的人」一般是指犹太人和广义上的基督徒，也包括了袄教徒及印度教徒，他们以缴税换取伊斯兰穆斯林的保护，因此在法律上也被称为「被保护者」。
5. 一八六〇年条约体系，即《北京条约》，是一八六〇年大清国于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分别与英国、法国、俄国各自签订的战败条约。
6. 穆罕穆德于六三二年死后，其继承者依序是：阿布巴克尔（Abu Bakr）、欧玛尔（Umar）、奥斯曼（Uthman）、阿里（Ali），此四人被合称为「正统的哈里发」。
7. 《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于一七七四年第五次俄土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和约，内容包括奥斯曼帝国需割让南乌克兰、北高加索地区给俄罗斯帝国，并赋予俄罗斯沙皇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基督徒的保护权。
8. 朱舜水（1600–1682），原名朱之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史家。力图反清復明，并协助郑成功北伐。于一六五九年东渡日本，在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水户黄门）的保护下长期定居当地，其儒家思想激发德川光圀编纂《大日本史》，希冀承接中华思想，是日本「尊王攘夷」思想的初祖。
9. 梅屋庄吉（1868–1934），出生于日本长崎的企业家，一八九五年与孙中山相识后，长期支持其革命事业，是孙中山在日本的重要友人及贊助者。
10. 达尼洛大公（Danilo I, Prince of Montenegro，1826–1860），蒙特内哥罗的统治者，因拒绝出任弗拉基卡（Vladika）的教会职务，于一八五二年在俄罗斯帝国支持下，推动蒙特内哥罗从政教合一的主教国转变为世俗公国，并担任首任蒙特内哥罗大公，最后于一八六〇年遇刺身亡。
11. 全名为夏尔．莫里斯，塔列朗–培里戈尔（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法国政治家及外交官，一八一四年受封为塔列朗王子。塔列朗是拿破崙时期的法国首席外交官，在拿破崙失败后基于正统性原则推动波旁王朝復辟，并在维也纳会议中为法国争取各项有利条件，一八一五年代表法国与奥地利及英国缔结秘密盟约。

12. 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y Danilevsky, 1822–1885），十九世纪后期俄国思想家、哲学家，反对流行于欧洲的达尔文主义，主张目的论取向的「自然神学」，于一八六九年开始发表《俄罗斯与欧洲：斯拉夫世界及罗曼–日耳曼世界的文化与政治关系》（*Russia and Europe: A Look at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of the Slavic World to the Romano-German World*），否认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并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
13.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德国思想家，致力于歷史哲学研究，于一九一八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以平行对比的方式，阐述了世界各文明从兴盛到衰亡的阶段，犹如春夏秋冬般的季节变迁，是为「文明季候论」。
14. 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 1711–1765），俄国自然科学的奠基者，同时亦是哲学家、诗人。提出着名的「质量守恆定律」，也因系统整理俄罗斯语言及统整文法结构而被称作「俄罗斯现代语言之父」，亦是莫斯科大学的建立者。
15. 亚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当代俄罗斯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者，也是谢尔盖．纳雷什金的首席顾问，以「第四政治理论」和「多极世界」等政治理论着称。
16. 尼古拉．吉尔斯（Nikolay Girs, 1820–1895），俄罗斯沙皇亚歷山大三世统治期间的外交官，任内积极推动俄罗斯帝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外交关系，也是法俄同盟（1891–1894）的奠基者。
17. 分别是米莉卡（Princess Milica of Montenegro, 1866–1951）和安娜塔西亚（Princess Anastasia of Montenegro, 1868–1935），其父为蒙特内哥罗大公尼古拉一世，从小被送至俄罗斯帝国接受贵族教育，成年后均与俄罗斯贵族联姻，并活跃于圣彼得堡的宫廷。她们喜好神祕学及占星术，被俄罗斯贵族社交圈暱称为「黑色危险」（The Black Peril）。相传最后被处死的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丁（俄语意为「淫逸放荡」）便是由她们介绍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费奥多罗芙娜（Alexandra Feodorovna）。

八

阿尔巴尼亚

突厥联邦主义的无奈发明



阿尔巴尼亚

Republic of Albania

Republika e Shqipërisë

独立时间：1912年11月28日

首都：地拉那

我们今天讲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代表了民族发明学上的另一种特殊类型，跟塞尔维亚的类型非常相似，但也有一点点不同。它跟塞尔维亚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把自己发明成为自己的敌人了。不同之处在于，阿尔巴尼亚人因为自己是穆斯林系统的后代，所以在这一方面，临阵倒戈的色彩更加明显。东方读者如果想要理解这一段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用以下这个比喻来说明问题，要不然巴尔干的歷史上会有过多的纠结和特殊的名词扰乱我们的理解力。你就可以假设一下，在满洲兵入关灭了大明国、建立大清国以后，把一支满蒙八旗驻防部队派到了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岛一带，然后他们留在此地长期居住，负责镇压浙江省当地反清復明的復国势力。等到辛亥革命的时候，浙江和江苏都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革命军扬言要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后代统统杀掉或者赶回到山海关以外去。这时，这批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后代就来了一个急中生智，宣布他们根本不是满洲人和蒙古人，而是明朝末年倭寇的后代，以此作为理由得到了日本帝国的承认，然后就在日本帝国的保护之下跟浙江国、江苏国、福建国一起独立

建国了。这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故事。

阿尔巴尼亚的民族发明学和民族歷史包含了两种截然相反、互相矛盾的部分，这是它建国过程极其仓促、民族发明过程也非常仓促的一个侧面反映。这两部分歷史，其实一部分是假的，一部分是真的，代表着两个不同族群的不同故事。这两个族群在真实的歷史上彼此是冤家对头，但是在重新发明后的民族歷史上却变成了的继承者关系。阿尔巴尼亚今天的民族神话把自己的祖先放在乔治．卡斯翠奥蒂——也就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1]身上。斯坎德培抗击土耳其人、抵抗奥斯曼帝国入侵的故事，变成了阿尔巴尼亚近代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但是我们都要清楚，现在的阿尔巴尼亚人主要是穆斯林和穆斯林的后裔。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名字要么就是阿卜杜拉（Abdullah），要么就是伊斯梅尔（Ismail），如同近代的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与穆罕默德．谢胡（Mehmet Shehu）。「恩维尔」就是土耳其那位恩维尔帕夏的同一个「恩维尔」，「穆罕默德」就是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一个「穆罕默德」。你自然难免会感到奇怪，既然他们的名字都是穆斯林的名字，他们为什么还要抗击穆斯林，而且还要把抗击穆斯林的封建领主发明成自己的独立英雄？答案当然是，这些人虽然在歷史上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祖先，而是他们的敌人。



斯坎德培像　图为17世纪画家对斯坎德培的想像素描。斯坎德培是反抗奥斯曼帝国、镇压穆斯林最知名的歷史人物之一，到了现代却被以穆斯林为主的阿尔巴尼亚发明为民族英雄及开国先烈。

今天的阿尔巴尼亚的史前史跟希腊东正教徒的史前史是一样的，他们在类似大明国的拜占庭帝国统治之下过着东正教顺民的日子。然后，在相当于是大明国的拜占庭帝国倒台、相当于是大清国的奥斯曼帝国接管的时候，居于西部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带、最接近义大利的这部分没有直接落入相当于大清的奥斯曼帝国手中，而是落入了类似倭寇的威尼斯人、拉古萨人、那不勒斯人和其他义大利各城邦的手中。这里本来就是亚得里亚海的东岸，离义大利最近，而当时拜占庭帝国灭亡、奥斯曼帝国兴起的这个中间期，恰好就是义大利的城邦结构最繁荣、最发达、对外殖民最强盛的时代。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沿海地带包括了今天的沿海克罗埃西亚人，也就是奥匈帝国时代的克罗埃西亚人。我们要注意，克罗埃西亚人是有两支的，今天的克罗埃西亚民族神话来自于匈牙利王国境

内的克罗埃西亚人，而不是来自于奥地利王国境内的克罗埃西亚人或者伊利里亚人。这两部分人能够被拼凑在一起，靠的也是歷史发明学的技巧。另一部分就是今天蒙特内哥罗的沿海地带，再有一部分就是今天阿尔巴尼亚的沿海地带。这三个地带在当时都被称之为是伊利里亚沿海地区。伊利里亚沿海地区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都是义大利的一个分支。当地的下层人士可能会讲一些方言土语，但是这些方言土语跟义大利语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上层人士当然都是讲他们的义大利主人的语言，或者是威尼斯方言的义大利语，或者是拉古萨方言的义大利语，或者是那不勒斯方言的义大利语。

斯坎德培的正式名字叫做乔治．卡斯翠奥蒂，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义大利人的名字。他是那不勒斯王国（Kingdom of Naples）所属的义大利人的一个藩属。因为拉古萨人跟威尼斯人作战，在义大利的城邦体系中间，拉古萨人和那不勒斯人结盟，反对威尼斯人，所以他也就相应地跟着他的宗主去反对威尼斯人。于是威尼斯人就跟奥斯曼土耳其结盟来反对他们。这在义大利的城邦体系间是非常常见的关系。在这个四边形结盟和战争的过程当中，作为那不勒斯藩属的斯坎德培率领他的公国和盟友，跟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的联盟作战。在他活着的时候打了几场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胜仗，在他死以后，在他儿子的领导之下就完全打了败仗，公国领土也被威尼斯和土耳其瓜分了。在这场战争当中，他的封建联盟和后来的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起的作用是极其微不足道的。那不勒斯人之所以被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的联盟打败，关键是在其他地方，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这个战场只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部分。他对这场战争的贡献大概就跟伊迪．阿敏[2]率领的非洲兵团对消灭希特勒的贡献那样，所以也只有在阿尔巴尼亚的民族史中才把他看得很重要。而在义大利战争的歷史当中，无论是站在威尼斯一边还是站在那不勒斯一边，他所负责的这一个小小的方面军都被看成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无论如何，他在生前替那不勒斯人立了功。尽管后来那不勒斯人打了败仗，他的儿子最后在丧失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领地以后就跑到那不勒斯王国去，变成了王国内的一个贵族，然后他们家族的歷史就消失在义大利的歷史当中了。他们父子走后，遗留的封建领地和他的那些盟友在亚得里亚海东岸沿海地带的封建领地，就被威尼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瓜分了。瓜分的土地当中，包括今天克罗埃西亚、蒙特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沿海的许多城市，像是后来上海和宁波的租界一样，划给了

威尼斯做租界，内地和山区的土地都割给了土耳其人。在威尼斯共和国迈向衰落时，这些亚得里亚海东岸、希腊阿提卡地区留下的租借领地也渐渐被奥斯曼帝国吞併了。所以等到十七末至十八世纪初的时候今天阿尔巴尼亚的这个地理区域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在奥斯曼帝国的手中。

当地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时还剩下三种人口类型：第一种人是过去的大明国或者是拜占庭帝国遗留的希腊东正教徒。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特徵，跟后来建立希腊王国、罗马尼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的那些希腊东正教徒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他们被称为希腊人，也自称为希腊人。第二种人是奥斯曼人，他们包括被奥斯曼帝国从亚洲带到巴尔干半岛来、分布到原拜占庭帝国领地的那些封建武装骑士，其中也包含了本来是大明国或者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他们原本是希腊东正教徒，但是在奥斯曼帝国享国日久、江山看来已经是坐稳了的情况下渐渐改变了主意，觉得信奉穆罕默德的宗教也不错，享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也有税收上的优惠，方便自己在大清国或者是奥斯曼帝国中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种人在巴尔干穆斯林当中是占绝大多数的。也就是说，真正从亚洲过来的、相当于是满洲和蒙古驻防八旗的那一部分人，在后来的巴尔干半岛（包括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当中是只占一小部分。这是后来的阿尔巴尼亚的第二种居民，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中都被划分为穆斯林。第三种人，照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划分是拉丁人。所谓「拉丁人」，包括了所有的西欧人，但主要就是义大利人。义大利人不一定具有义大利血统，而像是在我刚才讲过的威尼斯人、拉古萨人和那不勒斯人称霸亚得里亚海西海岸的时候，真正到这些地方做生意和打仗的义大利人，以及在文化上羡慕他们、学习义大利语的当地王公和居民的后代。斯坎德培的家族和他的同僚都是讲义大利语、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人。他这一家虽然后来离开掉了，但是他的同侪还留着，他们在威尼斯人撤出西海岸的时候没有全部走掉，一部分人留在了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巴尔干半岛，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中就被称为拉丁人。直到一八二一年的「希腊辛亥革命」的爆发前夕，当时称之为是伊庇鲁斯一带的山区和亚得里亚西部沿海地带居民，照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他们被划分为三种人：相当于满蒙的奥斯曼人或土耳其人、相当于汉人的希腊东正教徒及相当于西方侨民后裔的拉丁人。

阿尔巴尼亚地方的政治形势和文化结构跟希腊和其他地方相比起来，穆斯林（无论是原先从亚细亚来的各种穆斯林，还是原先是希腊东

正教徒、后来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势力和人口比重，比起后来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来说是要大得多的。所以在「希腊辛亥革命」时，他们等于是站到了希腊革命家相反的立场上。如果说「希腊辛亥革命」的革命家像洪秀全一样要求「驱除鞑虏」的话，那么今天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马其顿这些地方的穆斯林人口就会像是曾国藩组织的湘军、淮军一样，当地穆斯林组织起自己的民兵，坚定不移地站在土耳其人一边，全力镇压希腊革命军。如果说他们和土耳其帝国的正规军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站在希腊东正教徒的立场上来讲，他们所率领的非正规军恐怕是更可恶的一部分。土耳其的正规军尽管经常欠饷，也经常烧杀抢掠，但是理论上讲还是要守一点军纪的，是要服从奥斯曼苏丹及帕夏总督的命令，但是民兵可就不见得是这样了。

民兵代表的是当地的穆斯林社区，当地的穆斯林社区和当地的希腊东正教社区是同出一源的。他们在血缘上和文化上的差别不大，而且往往是同一家人，仅仅是因为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选择不同，就变成了两类人。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仇恨才会特别深刻。比如说，日本人到了南京以后，有一拨人跟了汪精卫，有一拨人跟了蒋介石。你可以想像，跟着蒋介石的这拨人对跟着汪精卫的这拨人的仇恨，会比他们对日本人的仇恨还要更大一些。他们会觉得，日本人打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本来就是要被打的，但是你们汪精卫这一拨人跟我们本来是一伙的，现在你们居然站到日本人这边去了，我们是不是要恨你们恨得更厉害一点？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在未来的阿尔巴尼亚以及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形势之下，希腊东正教徒和原先是希腊东正教徒、但是现在改信伊斯兰教的这一拨新穆斯林之间的仇恨，比他们跟奥斯曼苏丹之间的仇恨都还要大。

所以歷史上经常记载的以及西方媒体经常报导的所谓奥斯曼帝国残酷镇压希腊东正教徒的起义，经常不是土耳其正规军和希腊东正教徒之间的战争，而是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兵和希腊东正教民兵之间的战争。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民兵，性质上讲跟一九九〇年代波士尼亚和科索沃的那些民兵相同，所以他们也不像正规军那样守军纪。他们对于改变宗教信仰或者是不肯改变宗教信仰的邻居的仇恨，比起他们对无论哪一方面的官军的仇恨都要大得多。而且他们也不像官军那样受过军事训练，战斗力不如官军，因此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往往必须採取比官军更狠毒的手段。但是这些差异在西方媒体的眼中却是毫无区别的，他们

也分不清楚哪些事情是奥斯曼苏丹派来的正规军做的，哪些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民兵做的。总之黑锅都是归咎给奥斯曼苏丹和奥斯曼帝国。

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在一八二一年「希腊辛亥革命」的时候，主要是支持奥斯曼苏丹的。不仅本土的阿尔巴尼亚土豪和民兵首领协助奥斯曼苏丹，而且它还出了很多奥斯曼帝国总督级的人物，像后来发明「埃及民族」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埃及人称阿里总督为「阿尔巴尼亚人」，但希腊人却说他是「伊庇鲁斯人」，其实这是没区别的。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到底算是希腊的伊庇鲁斯呢，还是算是阿尔巴尼亚的山区呢？你问这句话的意义就相当于，今天的西安市是算「秦国」还是算陕西省？答案是，它既可以说算「秦国」，又可以说算陕西省，两者在地理范围上是没区别的。如果有什么争议的话，那么汉中到底是属于「秦国」还是「蜀国」可能有点争议，但是西安没有问题，不管算是「秦国」或算是陕西省都是一样的。「秦国」就是陕西，陕西就是「秦国」；伊庇鲁斯北部就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就是伊庇鲁斯北部[3]。这两个名词本来都是地理名词。后来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是因为希腊主义者或者希腊民族发明家信誓旦旦地说，伊庇鲁斯北部和南部都是希腊自古以来的一部分，当地的人顶多也就是改信了伊斯兰教的希腊伊庇鲁斯人，所以理所当然地应该归我们希腊。而另外一批不愿意归希腊的人则信誓旦旦地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北伊庇鲁斯或者南伊庇鲁斯，所谓的北伊庇鲁斯就是阿尔巴尼亚内部的希腊背叛者奸细。到底谁有理，从协力厂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谁打赢了谁就有理。当然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在一八二一年的时候这个故事还没有出现。

在列强的干涉之下，希腊独立战争于一八三二年结束时，巴尔干半岛的绝大部分地方，除了小小的希腊王国以外，仍然都是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而且，因为今天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是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体的部分，不像是今天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是以基督教人口为主体的部分，所以他们连自治权都没有得到，而且他们也没有要求自治权。这是不难理解的，比如说在大清国末年的时候，浙江的孔孟信徒起来要求争取自治，说我们不愿意被满洲人统治，在列强的支持下获得了自治，那么浙江的驻防八旗会不会要求自治呢？不会的。如果说汤寿潜[4]在浙江要求自治的话，那是因为他觉得我是汉人，你们是胡人。胡人有很多种类，汉人也有很多种类，但是胡人和汉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你们胡人的统治之下，汉人要求自治是合理的。但是杭州

城的驻防八旗就觉得，我本来也是胡人，我根本不是你们汉人，你们汉人要求自治跟我没关系，我不会要求自治。我不但不会要求自治，还会理所当然地说，我的命运是跟北京的皇室联繫在一起的，我天生就是要支持北京的皇室。所以根据这个逻辑，今天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不但没有要求独立，连自治都不要求，连司法自治都不要求。

司法自治与宗教信仰是有密切关系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是东正教徒，那么我的婚姻家庭结构跟你们伊斯兰教徒是不一样的，继承权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我就不能娶姨太太，所以我的财产继承方面跟可以娶姨太太的穆斯林就不一样。如果用穆斯林的沙里亚法来裁判我的话，那么对我是不公平的。所以在列强的支援下我就要求司法自治，就是说我们东正教徒跟东正教徒打官司的时候，要由东正教的法官来判案。根据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以色列国就有很多宗教法庭，这些法庭不是用来管宗教的，而是管民法的。因为信仰不同宗教的信徒，尽管他们在法律上都是以色列公民，但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和财产继承规矩都是根据他们的宗教经典，所以以色列的政策就是，德鲁兹人（the Druzes）用德鲁兹人的宗教法庭，亚美尼亚人用亚美尼亚人的宗教法庭，穆斯林用穆斯林的宗教法庭，阿拉伯基督徒便用阿拉伯基督徒的宗教法庭，诸如此类，这样可以使大家相安无事。

在「希腊辛亥革命」以后，列强为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徒争取到的自治权利是有各种不同性质的，有些是行政自治，有些是司法自治。行政自治的自治程度就比较大。比如说塞尔维亚得到了行政自治，那就是说本地可以任命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王公来担任总督。这个总督仍然要由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来任命，但是他还是可以管辖当地的行政事务。当然当地的法官，不用说，更是按照东正教的习惯法来办事的。有些地方就只有司法自治。司法自治的意思就是说，当地的总督仍然不是基督徒，仍然是苏丹随意任命的任何人，可以是犹太人，可以是土耳其人，可以是亚美尼亚人，或者是苏丹认为合适的任何人。但是当地的不同族群的人口在打官司的时候，无论总督是谁，都可以用自己的宗教法庭——像我刚才讲到的那种以色列的宗教法庭来判案。即使苏丹任命了一个亚美尼亚人来当总督，本地的穆斯林也可以找本地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也就是「穆夫提」（Mufti），让穆夫提去用伊斯兰教徒习惯的沙里亚法来判案。虽然总督是亚美尼亚人，但他们仍然可以享有司法自治。东正教徒，即使总督是穆斯林，同样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实行司法自治。

「希腊辛亥革命」以后，属于土耳其帝国管辖的那一部分巴尔干半岛，有些就像是塞尔维亚那样取得了行政自治，有些就只有司法自治。但阿尔巴尼亚呢，是个不论是行政自治或司法自治的权利都没有的地方。今天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在当时是被看成奥斯曼主义的铁桿核心地区。当时的巴尔干基督徒看待这些地方，就像是后来的美洲爱国者看待「加丘平」（gachupin），或者像是辛亥年间的「炎黄子孙」看待山海关外的满洲一样，把它看成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核心地带，本来就是奥斯曼主义的发源地，根本就不可能是其他民族。尽管当地的穆斯林大部分是后来改信东正教的东正教人口，那一小部分真正从亚洲来的穆斯林的成分也是千奇百怪的，有些是真正从中亚来的突厥人，有些是从高加索来的，有些是从阿拉伯来的，有些是从伊拉克、埃及或者叙利亚这些地方来的，他们在投效奥斯曼帝国以前、在亚洲的时候不会认为彼此是一家人，但是入关后他们就会被认为是一家人。

我们随时都要记住，民族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热那亚人（the Genoese）、亚拉冈人（The Aragonese）和卡斯蒂利亚人在欧洲大陆，彼此之间并不相互认为是一家，在西班牙国王的宫廷之上他们每天都在争吵；但是一旦获得了西班牙国王的任命，都跑到美洲大陆去了，他们面对美洲的土生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马上就团结得像是一家人。在土生的美洲人面前，他们都是「加丘平」。也就是说，按照大清国的政治术语来说，他们都是关外来的旗人。至于你是汉军旗人、蒙古旗人还是满洲旗人，是满洲的哪一部分旗人，那是根本无关紧要的。反正在十八省汉人的眼里面你们就是旗人，那就对了。这些西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东正教徒眼中也是一样的。无论你们原先是什么人，卡拉曼人、奥斯曼人还是其他什么人，反正你们已经到了希腊的土地上，就都是奥斯曼人。

西奥斯曼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命运跟奥斯曼帝国的统一和统治是紧密联繫的。所以希腊主义者可以争取独立，保加利亚的民族发明家可以把他们从希腊民族中划分出来，塞尔维亚的民族发明家也可以把他们从希腊民族中间划分出来，但是十九世纪的穆斯林一般来说是没有这种意愿的。他们即使不是积极支持，至少也是默认了奥斯曼帝国对他们的划分办法，也就是拉丁人、奥斯曼人和希腊人这三分法。然后希腊人当中有一拨希腊人不愿意当希腊人，一定要说自己是保加利亚人。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来讲，这是你们希腊人内部的事情。而后来的阿尔巴尼亚人

是划在奥斯曼人当中的一部分。巴尔干半岛的歷次起义和战争当中，他们都是跟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站在一起的。等到一八七八年巴尔干大起义和俄土战争爆发的时候，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的西奥斯曼人组织了自己的「湘军和淮军」，建立了一个叫做穆斯林联盟的政治组织，说明奥斯曼苏丹，一面抵抗援助巴尔干东正教徒的俄国人，一面镇压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反抗。



阿尔巴尼亚源于四个歷史区域　「阿尔巴尼亚」一名来自拉丁文，并非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区域。现今阿尔巴尼亚的领土来自于奥斯曼帝国于1867年行政改革时制定的四个「州」（vilayet）的部分区域，这四个州分别是：科索沃州、斯库台州、莫纳提尔州、贾尼纳州。「普里兹伦同盟」起初推动合併此四「州」并建立的「大阿尔巴尼亚」涵盖范围，远大于现今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范围。

从性质上来讲我们要注意，这个联盟是巴尔干半岛各地穆斯林的联盟，而不仅仅是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穆斯林联盟，它是包括今天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各地的穆斯林联盟。只是从人口结构上来看的话，马其顿、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人口是最多的，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人口是占多数的，科索沃是占压倒多数的，马其顿是占了接近半数的，其他各地的穆斯林基本上就是少数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穆斯林的政治立场都是反对列强分裂奥斯曼帝国，而希腊爱国者、罗马尼亚爱国者、塞尔维亚爱国者和保加利亚爱国者的逻辑是恰好相反，他们就是要求列强支解奥斯曼帝国，所以双方之间的立场是截然相反、不可调和的。但是在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史书上你却会发现，当时一八七八年的这个穆斯林联盟在他们的史书上却被发明成了「普里兹伦同盟」（League of Prizren），而且这个同盟到后来成为阿尔巴尼亚爱

国者争取独立、脱离土耳其的一个主要工具，他们把这段歷史跟塞尔维亚人、蒙特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反抗奥斯曼帝国、争取独立的歷史放在一起。

这种写法是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政治演变所造成的，他们的发明技巧如下：这些穆斯林的「湘军和淮军」在柏林条约结束以后还不肯撤出条约中规定划归希腊人、蒙特内哥罗人或者塞尔维亚人的土地，以至于列强必须把军舰开到奥斯曼帝国的都城门口，强迫奥斯曼帝国派出正规军去解除这些民兵的武装；然后阿尔巴尼亚的民族发明家就把这个故事解释成为，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和先驱者为了争取自己的独立，跟奥斯曼苏丹的官兵发生了冲突。其实这个冲突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在二〇〇五年，当初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议和的时候规定把加萨走廊划归巴勒斯坦，以色列需要撤回在加萨走廊的移民，但是当地的移民拒绝撤出定居点，以至于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夏隆不得不派出军队来强制执行，把这些定居点的犹太人移民强迫撤回到以色列本土去。

因为外交上你总是要讨价还价的，以奥斯曼帝国为一方、巴尔干各基督教国家为一方的战争打到一定程度，俄国人、英国人都开始干涉的时候，列强就要召开柏林会议了。在会议中各方都来讨价还价一番，哪些土地该归谁，哪些土地不该归谁。结果就是，列强让愿意独立的人自己独立，不愿意独立的人就留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但是边界划分总会有些犬牙交错的地方。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奥斯曼人和希腊人，也就是说穆斯林和东正教徒，像今天的波士尼亚一样，是犬牙交错的。这也像是印巴分治时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你很难说哪一个地方是纯粹只有穆斯林居民或者纯粹只有印度人居民的，所以边界划分非常困难。你只能勉勉强强说是，穆斯林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就划分给巴基斯坦，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地方就划分给印度，但是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地方并不是一个穆斯林也没有。

那些被划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很可能会觉得，我不愿意留在印度，我要跑到巴基斯坦去。或者是觉得，我们穆斯林的人口虽然在整个地区算少数，但是在我们这个村还是算多数，我们可以武装起来，坚决要把我们村划在巴基斯坦境内，无论列强的决定是什么，我们这个村就是要归巴基斯坦，我们不走。而周围的印度教徒就会说：「列强已经把这个地方划分给我们了。你们穆斯林虽然在你们村是占多数，但是在我们省是占少数，我们省占多数的是印度教人口，所以列强把我们这个省划分

给了印度。你们这些只在本村占优势、在本省却是少数的穆斯林应该识相一点，遵守列强划定的边界，你要嘛就老老实实当印度联邦的穆斯林公民，如果要做巴基斯坦人，你就给我『人滚地留』，带上你的财产和家人赶紧离开，把土地给我们留下。」当时的巴尔干半岛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

当然列强无论怎么样划分边界，总不可能划得整整齐齐，让印度这边一个穆斯林都不剩，让巴基斯坦边境这边一个印度教徒都不剩。我们只要稍微有点常识就可以知道，无论你怎么样谴责万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公平，其实换作你自己去划分，也顶多是另外换一种划分边界的方式，也无非是让另一批人离乡背井而已。所以被划分到希腊人、蒙特内哥罗人和塞尔维亚人一方的穆斯林就很不高兴。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间，他们当然也是穆斯林联盟的一个成员，他们就通过自己的政治组织，首先向苏丹请愿，要求苏丹不要接受列强的把这些土地划归境外的要求。但是在苏丹以大局为重、已经接受了列强的条约以后，那么他们就要武装反抗苏丹了，然后在列强看来，这种行为就是苏丹不执行条约。你已经答应了把东正教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割让出来，现在这些地方上面还有一部分穆斯林人口拒绝你的割让，那么奥斯曼苏丹的任务就是，他们是你的臣民，你要负责说服教育他们接受条约，如果说服无效的话，你就要强制执行。这就是普里兹伦同盟和奥斯曼帝国官兵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当然最后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普里兹伦同盟是打不过列强和奥斯曼苏丹的，所以边界最后还是被划定了，跟印巴划分边界的方式差不多。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方继续留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马其顿（包括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保加利亚西南部的「皮林马其顿」和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因为今天的科索沃和今天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人口比较多，被列强划在了奥斯曼帝国境内。而其他的地方，包括南部的希腊伊庇鲁斯，北部的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尽管这些地方也有为数相当不少的穆斯林居民，他们也是普里兹伦同盟或者穆斯林同盟的成员，但是因为他们即使是在小聚居范围内占多数，在比较大的地方也是占少数，就被列强划给了新兴的巴尔干半岛各国。这些人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就不得不像印巴分治时期被划在印度境内的那些穆斯林一样离乡背井，重新逃回到土耳其境内。

穆斯林难民刺激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局势，造成极大影响。站

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立场上来讲，这就叫做「丧权辱国」。我们奥斯曼帝国过去继承了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全部领土的，现在却被西方帝国主义和我们内部的革命分子搞得山河破碎。现在如果我们再不变法自强，眼看就要无力回天了。到时奥斯曼帝国整个灭亡，变成西方的殖民地，或者是遭到进一步的瓜分豆剖，都是不无可能的事情。因此奥斯曼帝国当然便爆发了内部的维新变法，在变法期间，国内自然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政治冲突和理论冲突。理论冲突是知识分子这个层面的事，政治冲突属于土豪、军阀和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的事情。这两部分交会在一起，就形成了自由协和党和青年土耳其党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就是近代土耳其和近代阿尔巴尼亚的起源。这个线索的发展是极其复杂的，可以说在每一个具体歷史细节上来讲都有很多例外，但是如果要简单粗暴地只划粗线条、不管那些细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近代的土耳其，便是来自于产生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青年土耳其党这个集团，他们在恩维尔帕夏的时代是奥斯曼主义的发明家，在凯末尔以后的时代是土耳其民族的发明家，他们的来源就是十九世纪末期的「青年土耳其党」；另一个集团是「自由协和党」，便是今天阿尔巴尼亚人的起源。

自由协和党的外交和内政主张是互相关联的。从外交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张奥斯曼帝国应该继续十九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联合英国抵抗俄国的政策。因为很明显，俄国是拜占庭帝国在法律上的继承者，莫斯科大公和俄罗斯沙皇自称是第三罗马，而拜占庭帝国是第二罗马，所以俄罗斯帝国从一开始就是攻占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天敌，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仇恨像大明国和大清国的仇恨一样，是不共戴天的。而且俄罗斯是一个陆权国家，它在内亚和巴尔干两线扩张，这都是以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为主要牺牲品的。同时，俄罗斯帝国利用自己也是东正教徒的优势，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各种东正教徒有极大的号召力。而英国是一个海权国家，海权国家以贸易立国，它不贪图领土，只要自由贸易。奥斯曼帝国只要把一亿人的自由市场向它敞开，英国人就没有理由非要支解奥斯曼帝国不可。英国人的海上生命线是经过地中海、马尔他岛和苏伊士运河通向印度的航路，俄罗斯的南下对这条航路形成了最大的威胁。而奥斯曼帝国微弱的海陆军对大英帝国的海军不能构成威胁，只有俄罗斯才能对英国人构成威胁。所以英国人为了自身利益和保证地中海航道畅通的需要，便有理由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只要软弱的奥斯曼帝国存在

的话，那么俄罗斯帝国就不可能打开黑海海峡深入地中海，威胁到大英帝国从直布罗陀、马尔他岛直到苏伊士运河这条关键性的航道。所以无论是从自由贸易、商业利益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角度来讲，大英帝国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天然盟友。

同时从内政的角度来讲，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实行的是「因俗而治」的政策，把印度、东南亚、非洲、美洲的无数殖民地统一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只用了极少数的军队。英国人维持整个印度帝国只用了六万军队，而且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它的法宝就是因俗而治。女王陛下或者国王陛下的统治是名义上的，它允许臣服于大英帝国的各附庸国和各社区继续使用自己的习惯法。这样，一方面大英帝国省了钱，一方面当地人也容易相安无事。自由协和党的逻辑是，奥斯曼帝国国内的文化族群，各方面的矛盾是极其尖锐的，族群复杂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重大弱点，如果能够采取类似大英帝国这样的地方自治的路线，把过去的米勒特制度加以现代化，变成现代式的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从中世纪以来的多民族、多族群、多文化问题，把实质上是多国体系的奥斯曼帝国转化为一个现代国家。

在他们看来奥斯曼帝国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帝国，而不是法兰西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所以它要现代化，也只能学大英帝国，不能学法兰西或者学欧洲的民族国家。学了欧洲的民族国家，那么奥斯曼就必然要解体。学大英帝国，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降低帝国的统治成本，把地方政务交给各族群的土豪来办，让他们以地方自治和联邦主义的方式解决奥斯曼的问题。尽管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蒙特内哥罗人都已经独立了，但是奥斯曼帝国现在残存下来的领土内部还是有很多异质的族群，这些族群将来仍然有可能闹独立。例如亚美尼亚人[5]，他们不像是位居边陲地带的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就算独立了，顶多也就像是满洲独立，对本土没有直接影响。但亚美尼亚位于奥斯曼帝国的咽喉地带，如果他们独立了，奥斯曼帝国就会被切成好几块了。那怎么办呢？对付这件事情的最合理办法就是，一方面进一步发挥原先旧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一方面是学习大英帝国的因俗而治和地方自治制度，进一步扩大地方权力，把过去的奥斯曼帝国改组成为一个突厥联邦或者奥斯曼联邦，允许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无论是哪一种宗教还是族群的，掌握自己的事务，这样一来就可以低成本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理论层面上，无论是自由协和党是联省自治论者，他们主张通过联省自治方式改造「五族共和」的奥斯曼帝国。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说的话，一个既具有大英帝国这种多元统治特点、又拥有美利坚合众国这种联邦主义特点的未来奥斯曼国家，可以用极低的成本实现政治转型。但在现实政治的层面上，自由协和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地方上的土豪，特别就是「湘军」、「淮军」之类的军事将领。这些将领和青年土耳其党支持的「土耳其新军」有着非常尖锐的矛盾，这主要是出于现实利益的原因。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所组建的北洋新军是依靠大清国中央政权的拨款才建立起来的，而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和淮军则是依靠各地的地主土豪，在当地商人的支持之下徵收「釐金」[6]，也就是自己筹款建立的，具有强烈的民兵性质；而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则具有高度的中央军性质。从技术上讲，北洋新军产生比较晚，引进的西方技术比较新，但是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来讲，武器比较旧、成立时间比较早的湘军和淮军更接近于地方自治的类型。

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形势也就是这样的，自由协和党除了一帮知识分子以外，主要依靠的是穆斯林联盟的民兵和土豪，而穆斯林联盟最大的基地就是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他们依靠的当然也是在一八七八年的战争当中曾经保卫过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这批土豪，他就很像是组织民兵起来保卫大清皇帝的曾国藩、李鸿章。他们的武器装备往往不是最先进的，因为他们既然是民兵，土豪的兵，所以他们的技术必然是相当落伍的。但是亚美尼亚的大教长和其他的东正教或者阿拉伯人的土豪酋长一样，他们都是地方势力，尽管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使他们有可能产生宗教冲突、认同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的阶级利益相同，他们都是属于地方上的大地主阶级，他们的利益都是把财政资源、军事资源和各方面的资源尽可能留在各省而不是收归到中央去。从理论上冠冕堂皇地说，「联邦主义」是解决奥斯曼帝国政治转型的一条妙计，看起来很好，但是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大臣把权力下放给各省的土豪，而各省的土豪是谁呢？那就正是这些联邦主义者自己。

知识分子热爱的是联邦主义的理想，而地方上的土豪要求的则是联邦主义的现实利益。他们像是一九二〇年代的湖南军阀或者四川军阀一样，他们想到的是，联邦主义能够使湖南和四川理直气壮地独立，不再受北京政府的约束，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和财政资源。而知识分子则考虑的是，像美国一样的联邦制度有多么的美好。奥斯曼帝国末期的自由

协和党就是这两种人组成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在君士坦丁堡，而土豪和军阀主要就在阿尔巴尼亚。因此奥斯曼帝国末期也就像是大清帝国末期一样，军阀分裂的倾向越来越强。自由协和党在军事方面的主要支柱就是阿尔巴尼亚军团和阿尔巴尼亚的土豪民兵，还有安纳托利亚的一部分土豪民兵，但是最强的支持者还是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土豪民兵。

另一派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青年土耳其党。青年土耳其党的外交政策是主张亲德不亲英。他们正确地指出，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不是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好处，而是为了大英帝国自身的好处。如果说大英帝国一般来说是支持自由贸易和政治自由主义的，那也主要不是出于理想主义，而是出于维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按照十九世纪的逻辑来看，十九世纪前期，大英帝国是最强大的国家，跟着大英帝国走好像是没错的。跟着大英帝国走、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之下遏制沙皇俄国的入侵，好像是一步好棋。但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就不见得是唯一的选择和最好的计策了。普法战争以后，德国蒸蒸日上，直到一九一二年时，看样子德国已经跟大英帝国平起平坐了，而且它的发展速度比大英帝国要快，要是到了一九五〇年，德意志帝国的军事、政治实力、科技水准都势必远超过大英帝国。那么，虽然我们过去跟大英帝国结盟抗俄是没错的，但是今天跟德国人结盟就是更好的选择了。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大英帝国随着它在国际秩序当中的地位相对衰落，它渐渐倾向于跟法国和俄国结盟。而大英帝国一旦跟俄国走近，就不再是土耳其人最好的盟友。同时，随着俄国的外交政策逐渐走向「斯拉夫主义」，逐渐背叛维也纳会议形成的正统君主联盟，德国的对外政策在俾斯麦去职以后也渐渐走上帝国主义。德俄两国由忠实的盟友、保守主义君主制的柱石，变成欧洲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德俄矛盾渐渐超过了英俄矛盾，那么土耳其帝国既然作为俄罗斯帝国的天敌，它最好的盟友就不再是大英帝国，而是德意志帝国。同时，德意志帝国也代表了不同于大英帝国自由贸易体系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另一条现代化道路。在十九世纪早期和中期，你要想搞现代化，那么毫无疑问，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不走自由主义的道路好像是不行的；但是在十九世纪末，情况好像就不一样了，德国所代表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那种集权主义的道路，似乎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向，而且它好像更能速成。尤其重要的是，十九世纪末期的德国的军事科技的优

势是由普鲁士军官团主导的。而大英帝国的强项在海军，在陆军方面的军事改革是落在德国后面的。在十九世纪末期，无论是远东的大清国、日本、暹罗，还是巴尔干半岛的各国和土耳其，它们学习陆军的新技术，首先是到德国去学习的。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斯曼帝国练出的最后一批新军基本上是德国教官练出来的军队。

青年土耳其党的主要支持者就是这批德国教官训练出来的新军，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当中的地位比较接近于袁世凯。你可以想像，袁世凯的新军跟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湘淮军是必然会有巨大的利益冲突的。德国人训练出来的新军是按照德国那种中央集权的模式展开的——不是苏联那种极端的极权主义，这是两种不同的结构，但是无论如何，它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一个强有力的参谋总部，把帝国各地的军队都牢牢地握在参谋总部的手中，在帝国铁路网和交通系统的支援之下迅速地调动军队。依靠高效率的参谋总部、中央的军官团和铁路系统调兵作战的方式，是德国人在普法战争以后发明出来的。这种模式跟自由协和党所主张的那种地方分权的联邦主义政治结构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把一切资源都集中到君士坦丁堡，优先发展一支强大的中央军。

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自然而然的，中央的资源多了，地方的资源少了。军事制度跟财政制度自古以来都是有密切关系的，要想在中央练新军，那么你就必须削减地方上的财政资源。同时，从中央军的角度来看，地方上的各路土豪民兵在以前还有些用处，但是在普法战争以后，陆军的军事革命一日千里的发展情况下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湘军、淮军和绿营其实都是应该解散的东西。解散了湘军、淮军和绿营，把省下来的钱集中起来练北洋新军，才是奥斯曼帝国最好的选择。同时，根据德国提出的现代化模式，我们非但不应该搞地方分权，反而应该像是林肯消灭美国南方、俾斯麦消灭旧的日耳曼邦联的各小邦那样，把原先还存在的那些缺乏效率的、自由散漫的地方上各省的旧权力机构统统消灭掉，也就是「打倒土豪」，把他们的权力和资源都匯集到中央这一层面来，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央集权就是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纲领，而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结合的。他们的军事支柱是以塞萨洛尼基为基地的第三军。我们要注意，塞萨洛尼基的第三军既是恩维尔帕夏和「统一进步委员会」的母体，也是后来的凯末尔和「安纳托利亚护权协会」[7]的母体。可以说，

近代的土耳其就是由塞萨洛尼基的第三军产生出来的。奥斯曼帝国末期的政治斗争，在议会这一个层面是亲英的自由协和党及联邦主义者和亲德的青年土耳其党及中央集权主义者的斗争，在地方上和军队这一层面就是马其顿军团和阿尔巴尼亚军团的斗争。马其顿军团是青年土耳其党的军事支柱，阿尔巴尼亚军团则是自由协和党的军事支柱。双方的议会斗争很快就变成了军阀斗争。如果中央集权主义者在议会处于劣势、再也斗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把袁世凯的军队调进京来镇压国民党；如果国民党斗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把蒋介石的黄埔军调进京来支持国民党。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也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自由协和党撑不住了，那么阿尔巴尼亚军团就要站出来替自由协和党撑腰；如果青年土耳其党撑不住了，那么塞萨洛尼基的第三军就要替青年土耳其党撑腰。塞萨洛尼基在当时，我刚才已经提到，不是属于希腊的，而是属于马其顿的。当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全军覆没，马其顿被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三国瓜分以后，凯末尔的家乡、第三军的驻地塞萨洛尼基才变成了现在希腊的领土。在十九世纪末期，它其实是奥斯曼人或者穆斯林人口的一个主要聚居地。

我们撇开细节不谈，奥斯曼帝国在它最后一次实施议会政治、最后一次搞「戊戌变法」的这几年内，斗争层级迅速由议会斗争升级为军事斗争，结果还是笔杆子斗不过枪杆子，议员的嘴斗不过军阀的枪，最后的一切还是要通过军事政变来解决。军事政变的结果就是，青年土耳其党赢了。他们统帅的北洋新军或者说是塞萨洛尼基的第三军，装备的武器最先进，代表了德国军事革命的最新进展。跟它作对的阿尔巴尼亚军团和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军团，从军事角度来讲，都比它落后了一代、一代半或者是两代，在军事上打不过它。所以青年土耳其党在军队的支持之下夺取了政权，解散了议会，成立了统一进步委员会，以统一进步委员会代替国民议会的职权。于是自由协和党全军覆没了，自由协和党的主要政治家伊斯梅尔．捷马利[8]便乖乖回到了他的阿尔巴尼亚老家。这位伊斯梅尔就是近代阿尔巴尼亚民族发明的核心人物。当然在青年土耳其党搞政变的时候，他像梁启超一样，仍然认为自己是奥斯曼人，仍然认为自己是自由协和党的主力，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认为总有一天青年土耳其党会交出政权，自由协和党会回到君士坦丁堡去当权。阿尔巴尼亚的土豪在当时也基本上跟他是同一个意见。直到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在一九〇五年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土豪仍然没有把义大利

人斯坎德培当作自己的祖先，直到这时，他们仍然是把这些义大利天主教徒当作自己祖先的敌人。

但在随后几年巴尔干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也就是一九一二年的巴尔干战争爆发了。青年土耳其党尽管用中央集权的方式加紧演练新军，但还是双拳敌不过四手，还是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了。除了阿德里安堡以外，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完全丧失了。无论是青年土耳其党的军事堡垒马其顿，还是自由协和党的军事堡垒阿尔巴尼亚，在战争结束以后都落入了巴尔干东正教各国的手中。这时，阿尔巴尼亚的土豪民兵已经跟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相互隔离了。他们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到下一届的君士坦丁堡议会去大显身手、或者是能不能在下一次军事政变当中夺回君士坦丁堡政权的问题了，而是他们这些居住在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人口在列强的善后会议当中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的问题。如果他们坚持像过去那样说我们是奥斯曼人，那么他们的敌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蒙特内哥罗人就有理由说，「你们都是亚洲的侵略者，现在我们驱逐亚洲侵略者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希望你们『人滚地留』，你们可以回到君士坦丁堡去。你们不是说你们是奥斯曼人吗？你们不是要讲土耳其语吗？奥斯曼帝国在哪儿？在君士坦丁堡啊，不在欧洲。这里是欧洲，你们不是欧洲人，请你们回亚洲去。」

阿尔巴尼亚的土豪民兵要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已经打了败仗的君士坦丁堡政权是靠不住了，何况这个君士坦丁堡政权是在他们的政敌青年土耳其党的掌控之下。唯一能够把他们从塞尔维亚人、蒙特内哥罗人和希腊东正教徒的威胁中解救出来的势力就是西欧列强。无论巴尔干半岛的诸希腊和奥斯曼帝国打得多么热闹，无论谁占了多少土地，他们最后能不能够合法地控制这些土地，能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意，归根究底还是西欧列强说了算。西欧的列强对巴尔干半岛上鸡零狗碎的争斗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相对于无论是东正教徒还是伊斯兰穆斯林来说，列强的态度都会比较公正。这就像是，在二十世纪末的波士尼亚危机和科索沃危机当中，如果说谁判决会比较公正，那显然既不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穆斯林、科索沃人，也不是马其顿人，而是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或者英国人，他们判案会相对公正。当然不是绝对的公正，因为地球上没有绝对公正的人，况且在巴尔干半岛这种文化、种族认同交错纵横的地方，谁也做不到绝对公正。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失败一方来说的话，与其落到自己直接的敌人手里，还不如让远方

的列强来决定。远方的列强相对于当地的邻居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更公正的判官。所以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穆斯林，包括君士坦丁堡的前议员伊斯梅尔先生，也就只能把最后的希望放在欧洲列强身上了。

但是你要在欧洲列强那里为自己辩护，你就要有一套说辞。如果你一定要说自己是奥斯曼人，那么就等于是帮了你们敌人的忙。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蒙特内哥罗人已经自己签署了条约，把今天的阿尔巴尼亚一分为二。南部的阿尔巴尼亚算是北伊庇鲁斯，划归希腊；北部的阿尔巴尼亚算是塞尔维亚的穆斯林人口或者是将来塞尔维亚民族发明的原材料。这样一划分，未来就会不再有阿尔巴尼亚人了。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其实即使是在当时，对于民族本身还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很正确地估计到，在他们自己帮着土耳其人压迫了几百年的东正教徒以后，要自己向那些东正教统治者俯首称臣的话，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们的下场多半就像是落到米洛塞维奇和卡拉季奇手里面的那些波士尼亚穆斯林的下场一样，这样的日子太难过了。如果直接了当地成为奥匈帝国或者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日子都要更好过一些。所以他们的优先选择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分离出去，只要不是让他们统治，随便怎样都行。他们首先是希望像波士尼亚一样把自己变成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因为奥斯曼帝国显然是不可能回来了，穆斯林最好的保护人就是西方列强。但是等到他们发现西方列强对于这一片贫困的土地谁都没有兴趣，就只有拿出第二招了—发明民族。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杂技表演式的民族发明、面不改色地宣布：「你们不是说我们是亚洲蛮夷、应该滚回亚洲去吗？好，现在我们就来证明，我们也是欧洲人。我们不是中亚蛮夷的后代，不是奥斯曼人，我们是阿尔巴尼亚人，是斯坎德培的阿尔巴尼亚联盟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斯坎德培，在奥斯曼帝国侵略欧洲的时候，曾经为罗马教皇国、为那不勒斯王国、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当过前锋，打过头阵。难道你们能抛弃我们吗？」但是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真正的祖先实际上不是斯坎德培这些讲义大利语的天主教徒，而是跟斯坎德培打仗的那些效忠奥斯曼苏丹的穆斯林人口，所以这个发明其实是相当笨拙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发明结果可以证明，我们阿尔巴尼亚穆斯林跟塞尔维亚东正教徒和希腊东正教徒一样，也是欧洲人。

如果说塞尔维亚人说他们在科索沃战役当中为保卫欧洲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我们的斯坎德培难道不曾为保卫欧洲立下汗马功劳吗？你说

我们的歷史发明是假的，难道塞尔维亚人的歷史发明就是真的吗？塞尔维亚人当时不也是跟着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进攻维也纳吗？他们以前也是效忠土耳其人的，现在可以把自己发明成欧洲的保卫者，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发明成欧洲的保卫者呢？这个逻辑有一定的道理：你是假的，我也是假的。但是也有它没道理的一面：塞尔维亚人虽然是假的，但他们至少还是东正教徒；阿尔巴尼亚人也是假的，但他们是穆斯林。所以可以说，阿尔巴尼亚人作为欧洲人，假的程度比起塞尔维亚人作为欧洲人还是要更假一点。但是这没关系，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在当时已经处在走投无路的状态，所以即使破绽百出，也非得作假下去不可。

同时这个斯坎德培的民族发明还有另一层意思。老牌的列强，包括奥匈帝国在内，尽管他们也很讨厌塞尔维亚，但谁都不愿意赔本去占领阿尔巴尼亚。但是有一个新兴列强愿意，那就是义大利。义大利是列强当中最弱、最穷的。在很多欧洲列强的眼中，义大利南部如那不勒斯这些穷困的地方，比起希腊和土耳其来说好不到哪里去，与其说是欧洲，还不如说是东方。但是义大利刚刚统一，刚刚在国际社会中间崭露头角，很想向全人民和全欧洲证明我也是欧洲人。要证明自己是欧洲人的一个现成办法就是要捞一块殖民地，所以义大利人要出兵衣索比亚，而且还在衣索比亚打了一场败仗[9]。衣索比亚是一个极其穷困的地方，所有欧洲殖民大国都不稀罕这块地方，只有一块殖民地都没有、有一块哪怕是最穷的殖民地也可以增加门面的义大利人才愿意要这种地方。所以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把自己送给了义大利人，觉得只有义大利人才可能愿意要他们。而事实证明，他们这个猜测是没错的，也只有义大利人完全是为了妆点门面，才愿意赔本来要他们。

当然这也需要有点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斯坎德培是谁呀？他不就是乔治．卡斯翠奥蒂吗？他不就是一个讲义大利语的那不勒斯人吗？我们阿尔巴尼亚自古以来就是义大利的一部分，斯坎德培在阿尔巴尼亚打仗不也就是为了保护义大利吗？所以阿尔巴尼亚和义大利自古以来就有特殊关系。我们是斯坎德培的后代，也就是说我们是义大利藩属国的后代。我们跟义大利王国的关系，就相当于是朝鲜国跟大明国的关系一样，你们大明国总不能对我们朝鲜国见死不救吧。现在你们新兴的义大利王国不是已经混成列强了吗，你们可不能对我们阿尔巴尼亚人见死不救哦！」虽然事实上他们的祖先就是当年斯坎德培的敌人，但是他

们只要肯冒充斯坎德培的子孙，至少从理论上讲就有了一定的希望把义大利人招来保护他们。

不过他们的民族发明计画只成功了一半，没有像塞尔维亚那样成功。可以说，尽管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是假欧洲人，但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是穆斯林的缘故，所以他们这个欧洲人的身分比塞尔维亚人更假一些。所以在划分领土的时候，很多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占多数的领土，包括科索沃，都被划分到塞尔维亚境内，而东正教徒占多数的土地很少会被划分在阿尔巴尼亚境内。但是他们好歹还有一半的成功了，如果他们不及时地搞一点民族发明的话，在一九一二年就被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和希腊瓜分干净，地球上也就不会有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就是因为阿尔巴尼亚的前奥斯曼帝国的自由协和党人及时把自己发明成为义大利的天主教徒斯坎德培的子孙，才在最后一刻，在六大列强的《伦敦会议》当中，抱上了最小、最弱的列强义大利的大腿，靠着义大利人的保护，从塞尔维亚和希腊人的压力之下虎口余生建立了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如果没有先前的民族发明，他们连这个一半阿尔巴尼亚的残山剩水都保不住。现在阿尔巴尼亚之所以只有这么小，那是因为有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占多数的地方都被划归了塞尔维亚和希腊。由于义大利在列强当中是最弱的一个，列强愿意把这个小阿尔巴尼亚给它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一九一二年的《伦敦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一个在国际社会保护之下的、由义大利代表的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列强派遣德国的韦德亲王（Prince William of Wied）去当阿尔巴尼亚大公国的领主，负责善后事宜。也就是说相当于欧盟的代表在波士尼亚那样，在过渡期负责善后。但过渡期还没有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然后，塞尔维亚军队进占了它的北部，希腊军队进占了它的南部，义大利军队进占了它的中部。如果只有希腊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的话，那么阿尔巴尼亚在战后可能就不存在了，但是幸好还有一支义大利军队在。所以在一战后，塞尔维亚人建立南斯拉夫、再次企图吞併阿尔巴尼亚的时候，义大利人再度跳出来反对，说阿尔巴尼亚在歷史上是我们的保护国，再一次把阿尔巴尼亚给保下来了。然后阿尔巴尼亚人经过了一段义大利保护下的议会政治时期，上演了「民主不能当饭吃，民国不如大清，议会政治就是自私自利的党派政治」这一齣现成的好戏。各党派都歌颂自由民主，但他们都治理不了国家，政变不断发生，人民怨声载道。然后就发生了第三世

界国家经常发生的事情：军官艾哈迈德．索古在一九二四年发动军事政变，然后当上了阿尔巴尼亚的「袁世凯」，大搞威权主义下的改革开放，开放外资进入市场，使专制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直到一九三九年好大喜功的墨索里尼决定吞併整个阿尔巴尼亚为止[10]。不过这后半截的阿尔巴尼亚歷史就跟阿尔巴尼亚的民族发明完全没有关系了。

最后我们只需要清楚一点就够了：阿尔巴尼亚人其实原先并不想发明阿尔巴尼亚民族的，他们原先是西奥斯曼人，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在帝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又是属于联省自治那派。后来奥斯曼帝国自身难保，阿尔巴尼亚被分隔在敌人之中，才被迫通过发明民族把自己变成了欧洲人。无论如何，他们把自己变成欧洲人这一招还是管用的。尽管他们是穆斯林，但是直到今天还很少有人质疑他们的欧洲人身分。由于他们站队正确的缘故，抢先在他们的敌人塞尔维亚之前与北约和欧盟缔结外交关系，从而保证了自己的未来比敌人会更加有利一些。从他们当初四面受敌的处境来看，他们能够混到这一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这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在最后关头发明民族、并把自己发明成为欧洲人所获得的政治红利。他们如果早一百年发明民族，抢在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之前发明民族，可能今天的「大阿尔巴尼亚国」就会一直包括塞尔维亚南部、整个科索沃和马其顿的大部分；如果他们再晚个十年发明民族，那么今天地球上恐怕就不会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了，只会有希腊的「北伊庇鲁斯省」和塞尔维亚的「南塞尔维亚省」。

阿尔巴尼亚
民族发明大事记

1415年以前
古代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是伊利里亚人，最晚在西元前2000年前便已在该地生活。伊利里亚人属于印欧民族，不过也有学者持不同见解。希腊人曾在阿尔巴尼亚沿海建立一些殖民贸易城邦。在西元前146年成为罗马共和国的一部分。4世纪末先

后被东罗马帝国和斯拉夫人占领。1415年起受奥斯曼帝国统治。

15至19世纪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地区

阿尔巴尼亚地区在15世纪后期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直属领地，由于移入大量穆斯林人口，成为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在巴尔干西部的主要集中地。

1463至1479年
斯坎德培与「威土战争」的爆发

拜占庭贵族后裔斯坎德培与威尼斯共和国合作，共同在阿尔巴尼亚地区阻挡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史称「威尼斯土耳其战争」（1463-1479）。斯坎德培是反抗奥斯曼帝国、镇压穆斯林最知名的歷史人物之一，他公开放弃伊斯兰教信仰，皈依天主教。他使用黑色的双头鹰作为标志，代表阿尔巴尼亚是「山鹰之国」。这个标志后来演变为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国旗及国徽标志。虽然斯坎德培镇压穆斯林，却被以穆斯林为主的现代阿尔巴尼亚「发明」为民族英雄。

1821/3/6
阿尔巴尼亚与希腊独立战争爆发

19世纪初期的阿尔巴尼亚地区的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在希腊独立战争爆发时，当地穆斯林社区组织的大量民兵是奥斯曼帝国抵抗希腊革命军的主要力量之一。「希腊革命」以后，原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管辖的巴尔干半岛上，很多地区取得了行政自治或司法自治。但今天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在当时依旧是奥斯曼的铁桿核心地区。

1878年
列强瓜分阿尔巴尼亚与「普里兹伦同盟」的成立

俄土战争结束后，列强签订《柏林会议》，将阿尔巴尼亚部分地区划分给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及希腊，此举导致当地穆斯林反对，并成立「穆斯林联盟」政治组织，即「普里兹伦同盟」。此同盟原本是奥斯曼帝国内穆斯林组成的政治组织，在国际形势转变后，却成为了阿尔巴尼亚独立的推动者。该联盟在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史书上也被视为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争取独立、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工具。

1912/11/28

阿尔巴尼亚大公国的建立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六大列强「伦敦会议」的结果是「普里兹伦同盟」获得义大利的支持，产生了一个在国际社会保护之下、由义大利代表的阿尔巴尼亚公国。列强派遣德国的韦德亲王担任阿尔巴尼亚公国的领主，负责善后事宜。
刘仲敬认为，正是阿尔巴尼亚的前奥斯曼帝国的自由协和党人及时把自己发明成为义大利的天主教徒斯坎德培的政治上的后裔，才在最后一刻的伦敦会议当中，靠着义大利人的保护，从塞尔维亚和希腊人的压力之下虎口余生建立了小小的阿尔巴尼亚。
这就是他们在最后关头发明民族、并把自己发明成为欧洲人所获得的政治红利。如果他们再晚十年发明民族，那么今天地球上恐怕没有阿尔巴尼亚，只会有希腊的「北伊庇鲁斯省」和塞尔维亚的「南塞尔维亚省」。

1924/6

艾哈迈德．索古政变与义大利併吞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军官艾哈迈德．索古发动军事政变，将阿尔巴尼亚大公国改为共和国，并自任总统，推行威权主义下的「改革开放」政策。1928年索古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改为王国，自任为国王「索古一世」。1939年阿尔巴尼亚王国被墨索里尼主导的义大利併吞，索古流亡海外。

1946年以后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二战结束后，阿尔巴尼亚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分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在1991年以后民主化，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

1. 乔治．卡斯翠奥蒂（George Castriot, 1405–1468），拜占庭帝国贵族末裔，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封建领主，早年臣服于奥斯曼帝国，于一四四三年起兵反叛，并先后与威尼斯共和国及那不勒斯王国组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其优异的军事才能使他获得「斯坎德培」（Skanderbeg，阿尔巴尼亚语，意为亚歷山大老爷）之称号，其黑色双头鹰纹章为现代阿尔巴尼亚的国徽。
2. 伊迪．阿敏（Idi Amin, 1923–2003），乌干达第三任总统。早年加入英国于非洲的殖民军队，一九六二年乌干达独立时任陆军上尉，一九七一年发动军事政变并自任为乌干达总统。在任期间政治腐败，严重侵犯人权。一九七八年乌坦战争爆发后结束统治，流亡至沙乌地阿拉伯，于二〇〇三年过世。
3. 伊庇鲁斯北部（Northern Epirus）位于现今阿尔巴尼亚南部，主要居民为希腊人，自十九世纪以来便是希腊企图併吞的地区之一。一九一四年，此地希腊居民在希腊支持下于一九一四年成立亲希腊的自治共和国，一战期间则由希腊军事占领，但直到一九二一年希腊战败给土耳其后，此地又重新归还给阿尔巴尼亚直至今日。
4. 汤寿潜（1856–1917），清末民初的官员实业家，主张立宪变法并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于一八九〇年写作《危言》以宣扬维新思想，一九〇五年被推举为「商办全浙铁路公司」的总理，斡旋于英国和清政府间，并在三年内将「苏杭甬铁路浙江段」竣工，从而避免了英国的介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首任浙江提督。
5. 亚美尼亚自十六世纪以后为奥斯曼帝国统治，尽管在米特勒制度下，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得以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在十九世纪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亚美尼亚人从十九世纪中期发起民族解放运动寻求独立。
6. 釐金，大清国于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动乱时期为筹军费而新设的税目，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有过路税（行釐）和交易税（板釐）之分。由于利润颇丰，故难以禁绝，直到一九三一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才将此制废除。
7. 安纳托利亚护权协会（Association for Defence of National Rights），是成立于一九一八年的奥斯曼帝国民间组织，主要成员为不满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领土的知识分子及军人，在一九二三年由凯末尔改组为人民党（People’s Party），并于土耳其独立后的一九二四年更名为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至今仍为土耳其的主要政党之一。
8. 伊斯梅尔．捷马利（Ismail Qemali, 1844–1919），自由协和党政治家、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亦为阿尔巴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任国家元首。早年即致力于阿尔巴尼亚字母标准化的工作，后于一九一二年发表《独立声明》，宣告阿尔巴尼亚独立。
9. 第一次义大利–衣索比亚战争（First Italo-Ethiopian War, 1894–1896），起因于衣索比

亚不愿履行与义大利签署的《乌西亚利条约》（Treaty of Wuchale）而引发的战争。在一八九六年的阿杜瓦战役中，衣索比亚击败义大利后，双方于该年签订《阿迪斯阿贝巴条约》（Treaty of Addis Ababa），衣索比亚正式宣告独立。↩

10. 艾哈迈德．索古（Ahmet Zogu, 1895–1961），阿尔巴尼亚军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发动军事政变并自任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统，一九二八年将共和国改为阿尔巴尼亚王国，自任为国王「索古一世」（Zog I of Albania），其统治政策亲近并依赖义大利，导致阿尔巴尼亚于一九三九年被墨索里尼的军队轻易侵占，索古遭流放海外。↩

九

克罗埃西亚

反革命的民族发明



克罗埃西亚
Republic of Croatia
Republika Hrvatska
独立时间：1991年6月25日
首都：札格拉布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跟民族国家内部的党派斗争、或左右路线斗争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实，后者只是在民族发明已经非常完善后的「准稳态」（metastability）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状态。如果我们追溯民族国家的起源，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本身就是党派斗争的产物。在同一个国家内，党派斗争往往就会产生出新的民族。因为斗争总会有站在不同派别和相对利益的人，革命的一方和反革命的一方最终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纠纷在同一个政权之内没有办法解决，于是无论是谁先开头的，只要产生了革命的民族，就会产生反革命的民族，反过来也是一样。先不说别的，美国和英国的分离，在最初时看上去也只是英国国内常见的那种「托利党」和「辉格党」[1]之间的纠纷。这就是为什么埃德蒙．柏克[2]这样的政治哲学家坚定支持美洲革命的缘故。柏克认为美洲革命只是英国国内辉格党和托利党斗争的一部分。他作为辉格党人，觉得美洲革命者主张的政治纲领跟老辉格党传统的政治纲领是完全一样的。老辉格党人做了许多议会斗争甚至流血内战，最后砍掉国王查理一世的头，维护的就是

华盛顿将军的原则。美国革命时的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政府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美洲搞各种商业垄断行为，实际上就代表了在英格兰本土的辉格党人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一贯反对的东西。从歷史的长期发展来看，如果说美洲始终掌握在辉格党人手里面、而英格兰长期掌握在托利党人手里的话，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英国和美国各自立国。

对于中欧各国来说的话，一八四八年是一个重要的歷史节点。对于全世界的民族发明来说的话，一八四八年比一七八九年要重要得多。最早的荷兰、英格兰和美国的独立革命，虽然其实也是「解体论」[3]的一部分，也就是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成小民族国家这个过程的开端，但是在一七八九年以前是没有什么典型的民族国家的。尤其是，在一八四八年以前，根据语言文化族群发明民族的做法，即使在欧洲也还是行不通的。一八四八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它使整个欧洲大陆常见的那种传统的、保守的、天主教的绝对君主制与革命的共和主义者之间的长期斗争（这种斗争是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经典的政治斗争），从一八四八年后转化为众小民族国家—特别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波兰、匈牙利这些众小民族反抗德意志、俄罗斯这样的大帝国的斗争。

这场斗争最开始的时候，正如我们从马克思的着作和其他激进派文人的着作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围绕民族问题产生的。而是由于「激进和保守」、「革命和反动」这两方面的路线斗争，使原先本来是作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一个辅助方面的地方性的小共和国，变成了革命斗争的最终方向。典型的就是波兰共和国这样的发明。反过来，革命的发明又引起了反革命的发明。反革命的发明尤其是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特有现象，因为一七八九年革命尽管也是欧洲各民族发明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是在当时，反动的一方并没有要发明民族。请注意，「反动」这个词在这里是一个中性词，并不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宣传家意义上的那种「反动就意味着坏人，革命就意味着好人」，这完全是两回事。「反动」和「革命」在一七八九年的政治术语中，指的是拥护绝对君主制和天主教或者是反对绝对君主制和天主教这两种政治立场，跟个人品德没有关系。无论你是革命阵营的人还是反动阵营的人，你都有可能是品行很好或者品行很坏的人。有非常虔诚的天主教保守分子是道德高尚的反动派，也有非常卑鄙的、寻花问柳的、像塔列朗亲王这样的天主教反动派；革命这一方呢，有拉礼尔．卡诺[4]这种道德极度高尚的共和主义者，也有像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5]这种卑鄙无耻的马基雅维

利主义者。

在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崙战争中，法国革命军的基本立场是要解放全人类，把共和主义的福音传播到全欧洲乃至于全世界的所有地方，按照拿破崙的规划，至少是要传播到如土耳其和埃及的遥远东方。但是在他们做这件事的同时，因为他们并不是立刻就征服或者解放了全欧洲的，所以在他们控制的那一部分区域，他们必须建立一些地方性的政府，然后他们就把革命和共和的原则普及过去。在法兰西革命军和拿破崙大军所到的地方，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共和主义的组织，例如瑞士变成了赫尔维蒂共和国，荷兰变成了巴达维亚共和国，义大利变成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在法兰西革命军首先到达的德国境内，首先就建立了美因兹共和国[6]。建立美因兹共和国或者诸如此类的小共和国组织，并不意味着法兰西革命军或者美因兹当地的爱国者（照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这就叫「爱国者」。「共和主义者」、「爱国者」和「民族发明家」在整个欧洲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没有区别的词。说你是爱国者，差不多就说你是共和派、激进派或者是民族主义派了；反过来，如果你是反爱国主义者，就说明你是君主派、天主教普世主义者和正统主义者了。这几个称呼彼此之间都是相互通用的）已经打算建立一个例如像是二〇一七年的乌克兰民族这样的政治组织，他们并不认为做一个美因兹的爱国者和做一个德国的爱国者到底有什么区别。

如果美因兹的爱国者在法兰西革命军和拿破崙的支持下能够再打一些胜仗、扩大他们的领土的话，比如说建立一个莱茵联邦或者建立一个大日耳曼共和国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共和主义和绝对君主制这两种根本原则之间的冲突。至于共和主义走到哪个地方，当然就要在哪个地方建立共和国。法兰西有法兰西共和国，荷兰有巴达维亚共和国，美因兹有美因兹共和国，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之所以建立美因兹共和国，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革命军还没有打进柏林和维也纳。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打进了维也纳，我们当然也会建立奥地利共和国，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美因兹共和国长期也就仅仅是美因兹共和国了，它确实是很有可能最终变成一个美因兹民族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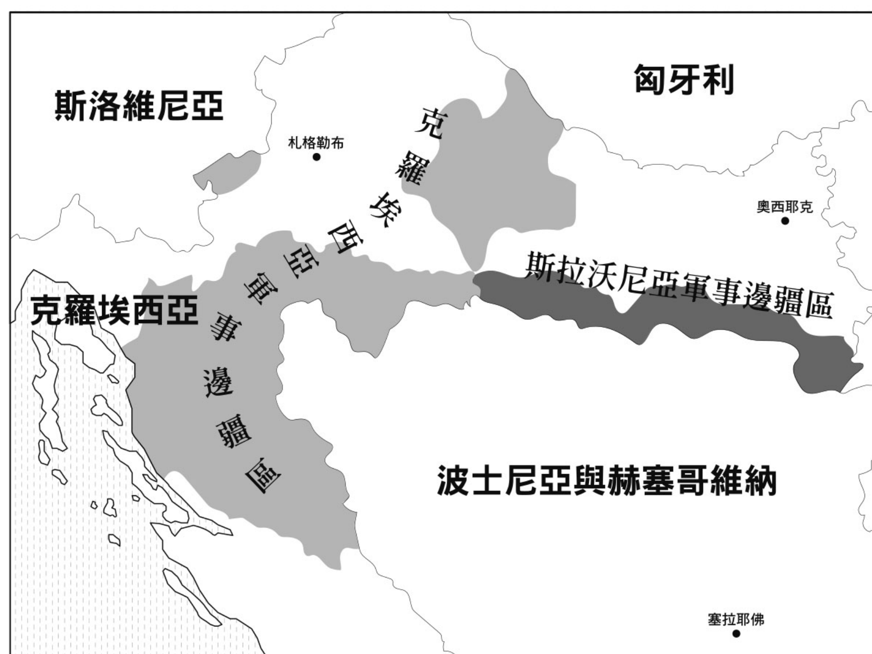
反过来说一七八九年的反动派、正统君主制、普鲁士国王、奥地利皇帝，以及支持他们的俄罗斯皇帝、凯萨琳女皇之类的，他们并没有想到要用类似的方式，他们只能復辟传统的君主国。属于法兰西国王的土地，我们重新交还给法兰西国；属于萨伏依公爵的土地，我们再交还给

萨伏依公爵；属于科隆大主教的土地，再交还给科隆大主教。或者顶多是调整一下边界。如果我们觉得科隆大主教兵力太弱了，不是拿破崙的对手，那么我们只有忍痛把科隆大主教併入普鲁士王国，希望相较于莱茵河地区的小诸侯更强大一些、国富兵强的普鲁士王国，能够抵挡得住法兰西大军，保护并维持君主主义。也就是说，在一七八九年，民族发明的艺术其实是仅限于共和主义这一方面的，反动派这一方面不懂得民族发明，所以就处在被动弱势的位置上。但到了一八四八年，局势已经有所不同了。这时，革命方和反动方都掌握了民族发明学的要义，开始以民族发明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了。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无论是革命的一方还是反革命的一方，无论是「共和主义」的一方还是「君主主义」的一方，他们运用民族发明都是为自身的利益及政治目的做辅助的。民族发明不是最终的目的，他们不是为了建立美因兹民族或者赫尔维蒂民族而建立这些政权的，而是为了把共和主义推广到瑞士和莱茵河畔才建立这样的组织的。如果有其他的方式能够使共和主义更好地在中欧推广的话，那它也是可行的。相反，反革命一方在一八四八年也是这么做的。对于他们来说，民族发明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到现在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副作用超过了主作用。民族发明尽管不是任何一方的主要目的，但五港同盟实际上却成了最大的赢家。革命的一方和反革命的一方都输掉了，而作为侧面目的的民族发明却因为他们之间的斗争，变成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正统的国际政治形态。在一七八九年和一八四八年，这还是很难想像的事情。

一七八九年的民族发明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北义大利的共和主义组织「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在一八〇四年拿破崙称帝之前把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改成「义大利共和国」，在称帝之后又改成「义大利王国」。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及其演化出来的义大利王国，继承了义大利诸邦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领地，也就是「伊利里亚行省」（Illyrian Provinces）。伊利里亚行省的第一位总督是拿破崙的元帅奥古斯特．德．马尔蒙（Auguste de Marmont）。他统治伊利里亚行省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合併原先属于义大利的那一部分沿海的克罗埃西亚和原先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那一部分内地的克罗埃西亚，并用法兰西式的统一的行政管理和学校教育把它们统一起来。马尔蒙是近代克罗埃西亚民族当之无愧的鼻祖，但是在当时，他的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像法国革

命军和拿破崙惯有的各种做法一样，是蔑视国际条约体系和歷史传统的。在拿破崙来到中欧以前，歷史上曾经统治过中欧的任何政权都没有把伊利里亚这两部分──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沿海克罗埃西亚和内地克罗埃西亚统一起来，它们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不同政权的。沿海那一部分，自古以来都是义大利的一部分。它们要么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部分，要么就是拉古萨共和国及其盟国。拉古萨共和国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杜布罗夫尼克，克罗埃西亚的最大港口和歷史名城。当然拉古萨的市民阶级、佛罗伦斯的市民阶级和威尼斯的市民阶级共用着一种义大利文化，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斯拉夫人。而且，直接了当地说，当时还没有「斯拉夫」这个词，「斯拉夫」这个词是十九世纪中叶发明出来的。以前虽然有「斯拉夫奴隶贩子」和「斯拉夫禁卫军」这样的词，但是斯拉夫自称和被称为民族是十九世纪中叶新一代民族发明家的产物。在拿破崙那个时代，这还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内地的克罗埃西亚及周遭地方，在当时则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属地以及两大边疆区之一。



19世纪初期的军事边疆区分布图　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为防范奥斯曼帝国并收容来自于巴尔干的基督徒难民，于1553年建立「克罗埃西亚边疆区」，再于1745年设立性质相同的「斯拉沃尼亚」建立相同性质的边疆区。

哈布斯堡帝国有几个边疆区，其中一个是斯拉沃尼亚边疆区（Slavonian Military Frontier），一个是后来称之为克罗埃西亚内地的

克罗埃西亚边疆区（Croatian Military Frontier），这两个边疆区都是哈布斯堡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战争的产物。一六九九年哈布斯堡军队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德拉瓦河和萨瓦河之间的土地，于是在这块土地的北部成立了斯拉沃尼亚王国，一七四五年在南部建立了斯拉沃尼亚边疆区，这些地区后来大部分併入了今天的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边疆区的起源则是来自塞尔维亚的流亡者，他们不愿意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投奔了哈布斯堡帝国以后，哈布斯堡帝国分出了匈牙利下属的克罗埃西亚王国的部分土地，在一五五三年为他们成立了克罗埃西亚边疆区。这一批人才是今天塞尔维亚歷史神话中对抗土耳其的那拨人的真正祖先。塞尔维亚是分裂了，坚持抗击土耳其的这一部分人投奔到奥地利这一边，最后变成了今天的克罗埃西亚人；投降奥斯曼帝国、跟着土耳其人去攻打维也纳的那一批，变成了今天的塞尔维亚人。今天的结果却是，跟着土耳其的那帮塞尔维亚人把科索沃战役和对抗奥斯曼帝国的荣誉给揽到自己身上了。至于克罗埃西亚人为什么不要这个荣誉，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发明有更好的素材。对于逼格比较低的塞尔维亚人来说，科索沃神话已经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东西了，哪怕是冒充一下也值得；对于逼格比较高的克罗埃西亚人来说，他们有的是更好的歷史素材，这点玩意儿不算什么。



流亡的塞尔维亚人　此为塞尔维亚画家乔瓦诺维奇创作于1896年的作品，描述自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以来，大量塞尔维亚人有组织地离开家乡并流亡西方的场景。为了收容难民及防御奥斯曼帝国，奥地利便在边境成立各「边疆军事

区」，成为日后克罗埃西亚民族国家的主要起源。

内地的克罗埃西亚在一七八九年时仍然掌握在奥地利皇帝的手中。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拿破崙大军一路东征的结果是把奥地利皇帝打得招架不了，于是奥地利皇帝必须割地赔款，分割出来一部分土地交给法兰西帝国。法兰西帝国保护下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和后来义大利王国的伊利里亚内地，就来自于哈布斯堡奥地利帝国的克罗埃西亚边疆区，这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上面提过的威尼斯和拉古萨在亚得里亚东岸沿海的城邦国家，这些地方跟内地的克罗埃西亚边疆区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伙的。但是早在拿破崙称帝以前，他作为法兰西共和国一个方面军的领袖，在众所皆知的浪漫地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出现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城门口以后，他也顺便占领威尼斯共和国了。于是他把原先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亚得里亚东岸沿海地区，当时称之为达尔马提亚，也併入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继承国义大利王国。然后，拿破崙封自己和奥地利公主路易丝的小儿子为义大利国王（King of Italy），准备由他来继承自己的伟大事业。但是拿破崙还等不到小儿子长大成人，他自己就遭遇滑铁卢了，不过这已是后话。拿破崙和马尔蒙就运用他们习惯的统治方法，把两个歷史上毫无关系的政治实体——内地的克罗埃西亚和沿海的达尔马提亚合併成为法兰西帝国的伊利里亚行省。

他们播种的结果就是在一八四一年产生了「伊利里亚运动」（Illyrian movement）及「民族党」（People’s Party），民族党是接受法兰西近代教育的第一批伊利里亚知识分子创建的。拿破崙在滑铁卢惨败以后，法兰西军队撤回法国，剩下的土地都被亚歷山大一世沙皇领导的联盟军队占领了。然后列强开了维也纳会议以后决定，既然威尼斯共和国跟莱茵河地区的小诸侯一样，没有力量抵抗强大的法兰西，那么我们列强就必须安置一个实力足够强大、能够抵抗法兰西进攻的力量在这里，于是就把威尼斯所属的达尔马提亚交给了奥地利皇帝，而本来就属于奥地利皇帝的克罗埃西亚边疆区当然仍然是归还给奥地利皇帝。于是组成近代克罗埃西亚的这两部分在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属于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帝国了。但是走的只是法国人和法国军队，法国人建立的学校培养出的这批知识分子还留在当地。这批知识分子觉得，有必要按照法兰西人发明法兰西语言和民族国家的方式，把他们习惯的语言发明成为伊利里亚语。于是伊利里亚语就这么诞生了。他们发明的伊利里亚语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Serbo–Croatian）。不过，

「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这么麻烦拗口的名字当时还没有人发明出来，当时发明这种语言的知识分子直接了当就把它叫做「伊利里亚语」。

现在歷史的时钟转到欧洲革命全面爆发的一八四八年，包括了匈牙利革命和波兰革命[7]。马克思本人是全程参加了这场革命，当然他是站在激进派一边的。尽管马克思所属的社会主义者在激进派、共和派的阵营当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兄弟，主要的斗争仍然还是在君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之间的，但是他从这次革命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很多经验被他用在了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后来他断定，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共和主义太不够激进了，只有实行更加彻底的社会主义，才能够达到当初共和主义者的目的，尤其是在落后的中欧—这是后话。无论如何，「神圣君主同盟」[8]的主力—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一八四八年站在了镇压革命的最前线，而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因为既反对奥地利帝国，又反对俄罗斯帝国，都跟俄奥两国军队打了一仗，自然而然就变成一八四八年法兰西革命者、柏林和维也纳起义者的天然盟友。

对于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的起义者来说的话，他们要的是共和国。如果维也纳和柏林取得了胜利以后，他们未必会让波兰和匈牙利独立，而且肯定不会让捷克独立。如果德国的共和主义者在柏林得胜了，建立一个类似日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设想的那种德意志共和国，那么这个德意志共和国毫无疑问会包括波希米亚（也就是捷克）在内，也很有可能会包括普鲁士分到的那一部分波兰。维也纳的共和主义者如果得胜了，也很可能会把斯拉沃尼亚边疆区和克罗埃西亚边疆区都算成奥地利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胜利，斗争正在进行当中，他们面前的君主国仍然非常强大，于是他们就需要统战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其实能不能算共和主义者是有待商榷的，但是他们既然打击了我们的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自然而然就要说这些人的好话，为拉拢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找到理由。最合适的理由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自古以来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而沙皇俄国则有一半属于个亚洲。欧洲的反动派竟然如此可恶，为了维持保守反动的君主制度，不惜将亚洲的蛮夷引进欧洲，利用鞑靼人的力量来镇压欧洲的革命者，可见他们是多么卑鄙无耻。而我们这些革命者不仅要维护共和主义的原则，而且事实上，歷史已经证明我们不仅是共和主义的保

护者，也是欧洲文明的保护者。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沙皇俄国。」当然在这些革命者当中，社会主义者是一小部分，但是他们也分享了这种修辞学。你如果去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着作，他们就会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论是共和派、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对准沙皇俄国开炮。沙皇俄国是一切邪恶的代表，任何人反对沙皇俄国都是正确的。波兰人虽然都是贵族，根本不是什么共和主义者，但他们反对沙皇俄国，所以他们就是好人。匈牙利人虽然打了败仗，但是他们至少跟沙皇俄国拼了刀子，所以裴多菲是好人，匈牙利革命者是好人，我们要坚决支持他们。」

当然有了好人就有坏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和被维也纳会议划归到奥地利帝国的这拨未来的克罗埃西亚人的关系是微妙而复杂的。从维也纳宫廷的角度来讲，既然未来的克罗埃西亚是两个边疆区，那就算了吧，我可以把你们都合併起来，作为同一个统治实体来统治。对于奥地利人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把你们放在同一个统治实体并不是为了鼓励你搞独立。而匈牙利人就觉得，既然这两个边疆区都是我们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们合併起来，发明一个匈牙利民族呢？匈牙利既然已经独立了，赶走了奥地利人，那么今天的匈牙利本土也好，特兰西瓦尼亚公国（Principality of Transylvania）也好，还有今天的克罗埃西亚也好，难道不都是匈牙利的一部分吗？于是他们通过了一个《匈牙利合併协议》（*April Laws, 1848*），把原先并不同属于一个政治单元的各个封建领地合併成一个法兰西式的统一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的语言第一次变成了匈牙利语。一八四四年以前的匈牙利，官方语言是拉丁语，跟中世纪的所有封建国家一样，匈牙利语和其他地方的各种方言、伊利里亚方言和罗马尼亚方言一样，它们都不过是方言而已。但是匈牙利要模仿法兰西共和国建立民族国家，拉丁语就不再适合做为匈牙利国语了。他们认为，布达佩斯方言，也就是今天的匈牙利语，才是最适合的匈牙利国语。

但是这样立刻就引起了语言战争。札格拉布人开始反对了。他们说：「论反对土耳其人的功劳，我们比布达佩斯哪一点差劲了？凭什么布达佩斯的方言就被你们发明成匈牙利国语了，而我们札格拉布的方言就不能变成匈牙利国语呢？我们还得学习你们的方言，这是极其不公平的事情。你们要自由要民主要解放，很好，大家一起自由民主好不好，怎么你的自由民主对于我来说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奴役呢？我们表示强

烈不满。」匈牙利共和国表示说：「虽然你们表示强烈的不满，但我们是从法兰西共和国学来的这一套手段的，我们还是要通过匈牙利语言法，按照法兰西的惯例，强制在匈牙利的各地推行匈牙利国语教育，包括你们札格拉布在内。」于是札格拉布的爱国者，包括约瑟．耶拉契奇[9]，就做了一个决定：「既然你们布达佩斯人要欺负我们，不是还有维也纳在吗？你们布达佩斯人在跟维也纳吵架，又欺负我们，那我们还是找维也纳合作吧。」于是一八四八年耶拉契奇就前往维也纳请求哈布斯堡皇帝将克罗埃西亚人从匈牙利王国中分离出去。请注意，这时是克罗埃西亚首次被称为一个民族，以前只有克罗埃西亚边疆区和伊利里亚民族这个词。伊利里亚民族是一七八九年法兰西人替它发明的，以前也只有伊利里亚地区。而克罗埃西亚一直是一个地理名词，从来不是民族名词，第一次变成民族名词是在一八四八年。

哈布斯堡皇帝一开始并没有同意耶拉契奇的要求，但是紧接着奥地利帝国的内战就全面爆发了，哈布斯堡皇帝一面跟维也纳的革命军打仗，一面跟匈牙利的革命军打仗，这时俄罗斯帝国的援助军鞭长莫及，让哈布斯堡皇帝处在焦头烂额的状态，这时克罗埃西亚人的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于是哈布斯堡皇帝就立刻慷慨地拍拍脑袋说：「很好，匈牙利人跟你们不和，你们愿意支持我们，那么我们也愿意支持你们。伟大的哈布斯堡皇帝封你耶拉契奇为大元帅。只要你们能够打败匈牙利人，一切都好商量。不过，我们现在正在维也纳打巷战，有点焦头烂额，没办法出兵援助，但是我们已经支持你们了。匈牙利人想抹消你们的存在，虽然你们以前是没人支持的，但从此以后你们克罗埃西亚人就不必担心了。」于是耶拉契奇就动员了克罗埃西亚本地的民兵，跟匈牙利人打了一仗。不过，最后决定整场战争关键的是沙皇俄国的军队。克罗埃西亚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还在僵持中的时候，沙皇俄国的大军已经打进了布达佩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匈牙利的种种问题。

欧洲各国的共和主义者、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对匈牙利的沦亡感到极其伤心，对于客观上援助了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反动派的札格拉布反动派真是深恶痛绝到极点。恩格斯在愤怒之下，写下了一份种族主义的重要文献，也就是《民主的斯拉夫主义》[10]。他说：「万恶的斯拉夫人本来就是全欧洲最亚洲化、最充满奴性的民族，拖累了欧洲的进步事业。他们不但不肯被先进的日耳曼人同化，反而助纣为虐，为落后的沙皇俄国打前锋，因此已经丧失了生存的权利。今后我们所有革命者，无论共

和主义者、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首要任务就是要对这些万恶的斯拉夫人展开种族灭绝，把他们从欧洲的土地上彻底消灭出去。正如把奥斯曼土耳其从欧洲赶出去、赶回亚细亚的黑暗当中去是一项进步事业一样，消灭这些万恶的、落后的斯拉夫民族也是我们欧洲进步各民族的正义事业，尤其是进步的日耳曼民族的正义事业。」他的话如果原封不动地录出来，放在今天的报刊上，那么铁定就是种族主义的文献，铁定就是美国的「安提法」[11]和欧巴马总统极度厌恶的那种东西了。当然恩格斯就像是一般的失败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他在战场上已经打不赢了，只有通过动动笔桿子的方式来发洩自己的愤怒。

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克罗埃西亚人投机反革命造成的客观形势，克罗埃西亚民族党从此在战后的奥地利帝国站稳了脚跟。奥地利帝国为了扶持他们跟匈牙利人作对，允许他们的特殊政治体制存在，鼓励他们的语言存在。这时，在克罗埃西亚王国内部，克罗埃西亚民族党人虽然站稳了脚跟，但是新一代更加激进的人正在产生当中。他们产生的原因在于伊利里亚语不仅是克罗埃西亚人的语言，也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自治区常用的语言，它是一种跨境语言，所以就引起了很多麻烦。塞尔维亚的故事我们已经讲过，它在「希腊辛亥革命」当中从奥斯曼帝国赢得了有限的自治权，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特区，由本地的投降派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担任总督。本地的激进派在失去政权以后希望通过文化教育来做到他们在军事上做不到的事情，于是就提出成立一个塞尔维亚和克罗埃西亚的文化联盟[12]，把一八一二年仍然称为「伊利里亚语」的这种语言重新解释为「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推动这件事情的人就是第五讲提过的塞尔维亚语言学家卡拉季奇和政治家加拉沙宁。

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伊利里亚人或者克罗埃西亚人跟我们塞尔维亚人都是用伊利里亚方言的，那么我们可以改一下名字，把伊利里亚方言改成「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然后把边界两侧，土耳其这一方的塞尔维亚人和奥地利这一方的克罗埃西亚人统一起来，发明成为一个新的「大塞尔维亚民族」，这个「大塞尔维亚民族」在俄国的支持下同时与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帝国划清界线，从此以后我们都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个主义就是后来大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直接起源。但是克罗埃西亚这一方面愿不愿意，那就很成问题了。他们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下，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都比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要高得多。显然，

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跟大陆表叔搞在一起的。尽管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但是深圳来的人就算是大陆表叔，香港来的人就算是大英帝国的香港臣民，这两种人的逼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多香港人宁愿为英国人擦皮鞋，也绝不愿意跟驻马店一起民主的。这一批人自然也就会产生他们的代表，他就是权利党（Party of Rights）的创始人安特．斯塔尔切维奇[13]。斯塔尔切维奇是第二代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家，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坚定不移地使克罗埃西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划清了界限。



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使用地区图　此图为2005年的人口调查。卡拉季奇与加拉沙宁等塞尔维亚民族发明家于1850年将「伊利里亚语」正名为「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其使用地区涵盖了今天的克罗埃西亚、波士尼亚、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与部分的科索沃地区。

本来第一代民族发明家伊利里亚主义者，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们像香港的泛民派[14]一样，觉得跟驻马店一起民主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既然大家都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在文化上也有不少的共同之处，在遥远的未来似乎不是不可能融合的。但是到了现实的具体状况，大陆表叔上门攀亲戚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年轻一代就像今天的「香港民族党」[15]一样，觉得老一辈的泛民派简直是混蛋，我们怎么能跟这么可恶的人当亲戚呢？这些人浑身都是落后的习惯，当街大小便，随地吐痰，一天到晚除了做「水客」[16]以外什么也不做。他们跑到我们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境内来，唯一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在德国人面前丢

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本来就觉得我们克罗埃西亚人是落后的一方，因为有了他们这些可恶的穷亲戚，我们显得更加落后了。我们凭什么要跟万恶的斯拉夫人搞在一起？尤其是，他们还要把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埃西亚语解释成为自古以来的斯拉夫语言和文字的一部分。「斯拉夫」这个词就是奴隶的意思，斯拉夫人的主要代表就是万恶的沙皇俄国，谁都知道沙皇俄国是最专制不过的，哪有我们哈布斯堡帝国又富裕又开明又进步？让沙皇俄国来保护我们独立，还不如在奥地利帝国的保护之下当个殖民地呢。



基督教世界的堡垒　此图为克罗埃西亚画家奎克雷斯（Ferdo Quiquerez）创作于1892年的《基督世界的堡垒》（拉丁语：Antemurale Christianitatis，此为十五世纪以来的罗马教皇赞美克罗埃西亚的用语）。克罗埃西亚被描绘成一位正与土耳其人搏斗的女战士，而她的背后则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及天主教圣徒们。克罗埃西亚从中世纪以来的主流信仰为罗马天主教，直至今日仍有超过八成人口是天主教徒，不同于主流信仰为东正教的大多数巴尔干国家。

第二代克罗埃西亚发明家根据这种想法，在斯塔尔切维奇的领导下成立了权利党。权利党的特点是，它是一个坚持欧洲性的党派。斯塔尔切维奇主要的功劳就是跟卡拉季奇打笔仗论战。他的着作，一千句一万句概括起来就是几句话，翻译成现在网路上常用的语言就是这样的：「你才是斯拉夫人，你们全家都是斯拉夫人，我们跟斯拉夫人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要记住我们克罗埃西亚人是欧洲人。」你只要理解了上面那些话，他的其余着作就不用看了，因为他翻来覆去的各种各样的论证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论证在一九九〇年和一九九五年的欧洲

报刊上非常流行，因为冷战结束后的克罗埃西亚首任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17]和一九九〇年代的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家在反对塞尔维亚的时候主要就运用的是他们这种逻辑：「我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和欧洲人，你们是亚细亚的蛮夷，土耳其统治下的东正教徒，拜拜！你们是斯拉夫人，我们是日耳曼人，拜拜！你们是东方人，我们是西方人，拜拜！你们爱滚哪儿去滚哪儿去，千万别在欧洲人面前拖累我们，让我们丢人，拜拜！」

权利党虽然已经成立，但是它和所有的新政党一样，要在政治上打败老牌的民族党还差很大一段距离。在奥地利帝国统治的时期，十九世纪中叶的议会选举当中，克罗埃西亚议会选举得票较多的党一般来说是克罗埃西亚民族党。克罗埃西亚权利党一般来说只能得到很少的选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激进的小党。正因为它是一个激进的小党，所以它才方便搞理论。一个党一旦变成大党，那就很麻烦，谁也不能得罪，见到谁都要陪着笑脸。只有别人骂你，你不能骂别人。为了拉选票，你什么都能做。别人骂你，你也只能够「理性、客观、中立」地解释，不能够跟他对骂。小党就不一样了，小党有一个好处就是，反正我也做不了执政党，所以我可以痛痛快快地想骂谁就骂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搞到最后，一百多年以后，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的主要理论居然是从权利党这方面来的，而不是从老一代的民族党这方面来的。但是这绝不是说老一代的克罗埃西亚民族党对民族发明的事业毫无贡献——他们的阶段任务就是推动经济发展。克罗埃西亚权利党所说的那些「我们是欧洲人，你们是亚洲人」，至少有一部分是要体现在经济文化水准的提升上面。如果没有克罗埃西亚民族党及其政府利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大发展这个时期痛痛快快地引入资本主义、使克罗埃西亚的生活水准能够跟得上奥地利本地的工业革命的话，后来克罗埃西亚人在塞尔维亚人面前也就不会那么有底气。克罗埃西亚的工业革命基本上是在克罗埃西亚民族党执政时期实现的，而克罗埃西亚的民族发明理论基本上是由在野的克罗埃西亚权利党实现的。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克罗埃西亚又出现第三个政党，就是克罗埃西亚农民党[18]。克罗埃西亚农民党是欧洲当时普遍出现的那种普选制和政治民主化、民粹化发展的一部分。在以前还是自由主义当道的世纪，在一八三〇年的英国或者是一八四八年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坚决维护的那种国会政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由地主和

资产阶级选举出来的有产阶级国会，贫下中农是没有参加资格的，工人阶级也没有参加资格。所以从人口比例上来讲，组成选民团、可以选举国会议员的这一批有效选民，通常是不占人口的大多数的，有的时候占人口的六分之一，有的时候比例甚至更小。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实行有产阶级选举制，那么有效选民团的人数是肯定达不到当地成年人口的一半的。然后随着议会改革的逐步推行，政治逐步民主化，选民团的人数不断扩大。在英国体现为议会改革，在法国体现为十九世纪的数次革命。即使是在没有革命或者革命失败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在俾斯麦这样的改革家推动的改革之下，德意志帝国最终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全体男性公民的普选制。奥地利的选举制度则是不断地将公民权扩大，由开始的比如说年收入是多少、拥有多少土地、纳税多少才能够参加选举，到最后只要你是个男人就可以参加选举。这时妇女还是不能参加选举的，妇女能够普遍拥有参政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穷人已经可以参加选举了。于是原先没有选票、无人理睬的无产阶级也就有人理睬了。

普选权的扩张造成了新的政治变化，在英法德等工业发达、城市化走得比较快的国家，就体现为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崛起。工人以前因为是钱不够、纳税额不够，一般来说，例如在法国的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 I，统治期间为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时代，不符合选民资格门槛的人是根本不能参加选举的，所以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愿意寻求他们的支持；有了选举权以后，自然而然就产生出了工人的议会代表——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像克罗埃西亚这样仍然是农民比较占多数的地方，工人人数不多，而贫下中农的人数还相当多，于是就产生了农民党。在保加利亚、克罗埃西亚这些地方产生农民党的理由，跟在德国和法国产生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理由是差不多的，都是选举权的向下扩张，使原先没有选举资格的穷人也得到了选举权。只不过在德国，主要的穷人是城市里面的工人；在克罗埃西亚和保加利亚，主要的穷人就是在乡下的佃农。而且在巴尔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佃农往往租的是土耳其穆斯林地主的土地，所以独立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就联繫在一起了，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当然克罗埃西亚这方面还比较简单，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波士尼亚在这方面的问题尤其严重。克罗埃西亚农民党瞄准的就是占人口多数、财产不多、或者甚至是完全依靠租种土地为生的佃农。尽管选举权已经获得，但是在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形成自己有效的政

治传统之前，他们得到的选票仍然是非常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克罗埃西亚就是这样三分天下。已经非常富裕、吃饱了的克罗埃西亚民族党，跟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合作得很好。在奥地利帝国还没有变成奥匈帝国的时代，克罗埃西亚人通过一八四八年的反革命行动，争取到了跟匈牙利人同等的待遇。在奥匈二元帝国成立以后，克罗埃西亚被划在匈牙利一边的时候，他们也成功地在匈牙利王国之内赢得了接近于本土的自治区权利。这样一来，克罗埃西亚的形势就比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那些地方好得多。那些地方要么就是没有自治权，要么就是只有司法自治，要么就是虽然有政治自治、但是不断爆发政变，有些政变是奥斯曼苏丹干涉的结果，有些政变是当地人自己造成的结果，总之是一个缺乏规范的议会政治。而克罗埃西亚人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不仅享受了高度的自治，而且享受了可以跟波希米亚和德国本土相媲美的工业化大发展，生活水准全面提高，有可以跟德国、奥地利和比利时这些君主立宪国相比的规范化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因此他们从各方面来看，都已经比土耳其的塞尔维亚自治区或者是后来从土耳其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要先进得多。

但是先进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抱有野心。这个克罗埃西亚自治区境内还有一个「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联盟」（Croat–Serb Coalition，一九〇五年成立），他们跟塞尔维亚境内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是一家的，他们都主张塞尔维亚和克罗埃西亚建立「大南斯拉夫民族」。这些人在克罗埃西亚的地位就相当于今天台湾的国民党、新党和香港的大中华主义者。他们认为，小小的克罗埃西亚虽然在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享受着富裕文明的民主生活，但是毋庸置疑，哈布斯堡帝国的上等人还是日耳曼人，克罗埃西亚人的地位没有办法跟日耳曼人相比的。而且，无论如何你是一个小邦，而日耳曼是一个大民族和大邦国，你就算是将来有朝一日在文明和先进这方面超过了德国人，仅仅在于你小他大，你也是不可能跟他平起平坐的。

这个逻辑其实在今天海外的很多民运人士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最怕的就是上海独立，一听到「上海民族党」[19]要使上海独立，比起共产党杀了他们全家都还难受。在他们心目中，总有一天推翻了共产党以后，大中华是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富强文明民主的强国，但是如果「上海民族」单独建立了上海共和国，无论这个上海共和国多么富强文明民主，都只是一个小国，上海共和国不可能跟美利坚合众国平起平坐的。

你再文明民主，也满足不了他们内心中无法割捨的大国梦。那么上海人怎样才能实现大国梦呢？只有一个办法：你必须跟河南驻马店一起民主。但是如果你要跟河南驻马店一起民主，而有驻马店在你就没有办法民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视而不见，坚持说：「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在我们上海人先进文明的灌输之下，驻马店人民的素质一定会得到迅速提高，我们一定可以跟驻马店一起民主的。」当然只要事实上他们还没有跟河南驻马店一起民主，这些说空话的事情谁都会说，谁也没法证明他们说的是错的，于是大家就这么样打嘴仗就好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克罗埃西亚各阵营中就包括了独立派和「跟驻马店一起民主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联盟」真的实现了「跟驻马店一起民主」的梦想。他们通过《圣维特宪法》[20]，成立了贝尔格勒的教授最喜欢的那种「三族共和」国家。塞尔维亚的国王宣布，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和斯洛维尼亚人是同一个「南斯拉夫民族」的三个不同宗族，是同一个民族的三种不同名字。这个理论当然是贝尔格勒的教授替他们发明出来的。这个内容跟戴季陶为蒋介石发明的民族理论是一样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汉回满蒙藏是同一个民族的五个不同宗族，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一个五族共和的实体。你如果问，为什么它既是五族又是一族？答案是：说是一族是对的，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说是五族也是对的，一个中华民族分成了五族共和的五个宗族，但是宗族只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叫法。」正如基督教讲究三位一体，你如果问他，你是不是一神论？你为什么又讲一神论又讲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一定会给你讲出一些振振有词的道理来证明：我们第一，只信奉独一无二的上帝耶和华；第二呢，圣子圣父圣灵还是存在的，三就是一，一就是三，诸如此类。依靠希腊哲学，他们也能够把这话讲圆。「五族共和」的理论和「三族共和」的理论其实也都是这样的。

当然讲理论是很容易的，只要限于纸上谈兵的层面，你总有办法把事情讲圆，但是实际上推动起来就很麻烦了。新的「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联合王国」或称「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到底搞不搞议会选举呢？好像不搞议会选举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搞了议会选举你就会发现，第一南斯拉夫王国不是法兰西，它产生出来的是一个小党林立的多党议会。我们前面提到的三个党派中，克罗埃西亚民族党在第一南

斯拉夫王国成立时解散；克罗埃西亚权利党由于只代表少数的中产阶级，所以选举中只能获得很少的选票；只有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在大选中能够与其他党派竞争。而克罗埃西亚农民党的选票，少的时候占南斯拉夫王国议会的七分之一，多的时候占五分之一。这个数目达不到执政党的水准，但是在多党林立的情况下，已经足以阻止塞尔维亚激进党（People's Radical Party）和塞尔维亚民主党（Yugoslav Democratic Party）这两个主流政党组织内阁了。在这两个势力不相上下的主流政党之外，同时还有穆斯林联盟（Yugoslav Muslim Organization）、蒙特内哥罗联邦党（Montenegrin Federalist Party）、斯洛维尼亚人民党（Slovene People's Party）诸如此类的小党派。

你要注意，这些党派都是具有高度地区性的。穆斯林联盟基本上是一个波士尼亚的党派，蒙特内哥罗联邦党当然是一个蒙特内哥罗的党派，斯洛维尼亚人民党是一个纯粹斯洛维尼亚的党派，克罗埃西亚农民党是一个纯粹克罗埃西亚的党派。塞尔维亚激进党和塞尔维亚民主党除了在塞尔维亚本土以外，在波士尼亚、克罗埃西亚和其他一些地方也能得到一些选票。但是可想而知，就凭我刚才列出这么多党你也可以看出来，议会选举是产生不出一个稳定的多数派的。每一个党派顶天也最多只能达到议会的三分之一名额，无论怎么样组成联合政府都不会是稳定的政权。结果「三族共和」搞出来的民主政府跟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埃西亚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专政政府没有什么区别，导致中央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实施有效统治。

无论宪法怎么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许可权怎么划，各省的边界怎么样改来改去，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在这方面是折腾得很厉害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反反覆覆讲了。总之结果都是一样：无论你怎么改，都无法形成稳定的结构。只要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始终是站在反对党的地位，那么贝尔格勒的议会政治是不可能稳定的。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如果进入政府，那么塞尔维亚激进党一定要誓死反对这个分裂国家的万恶政党。只有塞尔维亚民主党还有可能跟克罗埃西亚农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但是这样一来就要轮到塞尔维亚激进党充当万年反对党和事实反动派了，它在议会中占有的席位也不比在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当反对党时的议席少，结果政府照样无法稳定。结果就是，要么是塞尔维亚激进党入阁，那样的话，克罗埃西亚农民党是誓死不肯入阁、一定要斗争到底的，因此政府无法稳定；要么就是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入了阁，那么塞尔维亚激进党

又要誓死抗争，坚决不肯入阁，结果议会政治还是无法稳定。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事实上除非「南斯拉夫民族」真的是一个民族，否则的话南斯拉夫的议会政治是没有办法运作的。你要跟驻马店一起民主，驻马店不见得高兴跟你一起民主。任何嘴上说的话都是空话。在以前南斯拉夫没有成立的时候还可以说，我们上海人民跟驻马店人民一起民主，以前的错误都是殖民主义者和专制独裁者搞出来的事情，等到大家都自由民主了，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但是事实证明，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驻马店还是驻马店，上海还是上海，双方的代表在议会中间不断打架，形成不了一个有效的政府。事实证明，法兰西或者英格兰能够建立有效的议会政治，是因为他们就是只有一个民族。他们的民族发明比较成功，顶多剩下像威尔斯或者布列塔尼那样一点小的漏洞，影响不了大局。像英格兰，就因为留下了爱尔兰这一个重大的漏洞，最后为了维持议会政治，还不得不把爱尔兰人给踢出去了[21]。既然南斯拉夫民族发明的成功程度赶不上法兰西民族，消化不了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蒙特内哥罗，他们的政党始终是要在自己的名字上面挂一个「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蒙特内哥罗」、「塞尔维亚」之类的名字。那样的话，议会政治就永远运转不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军事政变了。

因此首先就出现了国王的个人专制，然后又产生了摄政王保罗时期由陆军总参谋部建立的「民族集中内阁」[22]，实际上就是专制独裁。由塞尔维亚来的国王和塞尔维亚军官团实行的专制独裁，在克罗埃西亚人看来毫无疑问就是比奥地利人的统治更加可恶的殖民统治，从各方面来讲都是更坏而不是更好。奥地利人就算是殖民统治了，人家至少是代表了先进的欧洲文明；而你们塞尔维亚人、你们驻马店人代表的是落后的亚洲文明。如果我们上海人或者香港人注定要做被殖民者的话，那么我们到底是让英国绅士做我们的统治者好，还是让驻马店的贫下中农做我们的统治者好，还是干脆让俄国的共产国际做我们的统治者好？只要你稍微有一点常识就会说，自由民主最好，但是如果只能退而求其次的话，当然我宁可让英国绅士做我的主人，也不愿意让俄国的共产国际或者驻马店的贫下中农做我的主人，这个逼格相差的可不是一般的大。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发生了：在军事独裁和国王专政的时期，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就渐渐由体制内的议会反对党，变成了体制外的分裂国家的革命党。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德国人和义大利人打进了南斯拉夫，自然会利用南斯拉夫王国本来就长期持续的政治分裂，于是就在克罗埃西亚扶植了傀儡国，正式名称叫做克罗埃西亚独立国（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它的主要支持者不是克罗埃西亚农民党，而是第六讲提过的「乌斯塔沙」组织。「乌斯塔沙」在政治上讲是克罗埃西亚权利党的政治继承者，他们是在权利党无法参加议会选举的时候，由议会斗争转向武装斗争而产生的一个政治组织。在他们产生时，克罗埃西亚农民党还是主张搞议会斗争的，当然这时议会斗争派和武装斗争派自然就要开始互骂了：乌斯塔沙认为，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已经跟叛徒没有什么区别了；克罗埃西亚农民党认为，乌斯塔沙其实只代表了一小撮激进分子，大多数中产阶级还是希望自由民主、希望和平发展的，不能走他们的道路。德国人建立起来的那个克罗埃西亚独立国之所以被很多人骂成是傀儡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举行符合西欧标准的议会选举，而是直接就把乌斯塔沙扶上了统治者的宝座。如果真的要举行议会选举的话，说不定胜利者是克罗埃西亚农民党。但是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太温和了，基本上还是走西欧模式的。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它是一个类似社会民主党的温和左派的政党。不搞暴力革命斗争，主张搞议会斗争。而且它在国际上是协调主义者，主张承认凡尔赛条约。承认凡尔赛条约就必须承认南斯拉夫王国，所以它只能在南斯拉夫王国境内搞克罗埃西亚自治和议会斗争。这样做就满足不了克罗埃西亚比较激进的那一派「自治是不够的，只有彻底独立才能使我们满意」的要求。

至于德国人的态度，因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不是议会民主的典范，它推翻南斯拉夫王国更不是为了替南斯拉夫各少数民族出气或者是为了在南斯拉夫推行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只不过是因为塞尔维亚人跟英法联盟，它自然就要来一个「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它建立起来的这个克罗埃西亚独立国在同盟国那里得到了「伪满洲国」一样的待遇。无论你国内的政治搞得有多好，但是只要你是跟德国人结盟的，我们就只能不承认你的合法性。克罗埃西亚独立国尽管也没有搞议会选举，但是从民主的角度来讲其实还是不如满洲国的。满洲国，哪怕是象徵性的政权，还是有一定的地方自治的；而克罗埃西亚独立国是不敢举行议会选举的，因为一搞议会选举就要面临克罗埃西亚农民党的问题。但是它的内部治理，平心而论的话，可能还是要比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和

后来的「红色南斯拉夫」要好一些。这是因为，德国尽管落到了希特勒手里，但是德国军官、商人和企业家原有的水准还是在的，他们还是维持着欧洲人的水准。所以德国人的统治，就等于是让一批具有欧洲专业水准的专家统治，他们实际上在经济水准上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盟国赶走德国人以后，南斯拉夫经过了白军和红军的短暂内战，最后落到了共产主义者狄托的手中。我在本书的第六讲中提过，狄托认为「旧南斯拉夫不稳定的原因就是塞尔维亚一主独大，跟克罗埃西亚和斯洛维尼亚不平等，如果把塞尔维亚再拆一拆分一分，由『三族共和』改成『六族共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于是就产生了我们都熟悉的红色南斯拉夫。名义上讲，红色南斯拉夫一方面实行一党制，让所有的资产阶级党派都遭到了取缔，包括农民党、乌斯塔沙和权利党，它们的政治诉求只能够通过克罗埃西亚共产党来表达了；而另一方面实行了联邦制，让「大塞尔维亚主义」受到了压制，克罗埃西亚人和斯洛维尼亚人可以说是扬眉吐气了。但是潜规则并没有被消灭，克罗埃西亚人传统上歧视塞尔维亚人、斯拉夫人和亚洲人的感情仍然存在于哪怕是最忠实的克罗埃西亚共产党员之中。只不过在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情况下他们不敢公开说话，但是心里面还是照样要想的。

比如说你想想当初新中国实行一党制的时候，上海有很多共产党员，你以为这些上海共产党员很瞧得起驻马店吗？会因为共产党搞形式上的民族平等，上海跟河南是同样的地位，他们就会瞧得起河南人吗？不是的，他们对驻马店的歧视会以各种乱七八糟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说体现为「膜蛤」[23]的形式。上海人或者扬州人动不动就要拿江泽民的影片出来恶搞，恶搞的内容不是江淮人，就是驻马店人。总之，上海人总是最特殊的，总会以某种方式表现他们高人一等。尽管我是上海的共产党员，我也绝不会认为像陈良宇[24]这样对上海有实际建设的人会跟从驻马店来的老干部或者山东南下老干部是同一个逼格的。我是共产党员，山东南下老干部是共产党员，但是哪怕是在共产主义的征服已经过了几十年以后，真正的上海租界人的后代，哪怕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在党内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他们仍然一天到晚说什么「上只角和下只角」[25]，一天到晚歧视山东老干部，尽管对方跟他一样也是共产党员。

克罗埃西亚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例如后来的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家、歷史学家和总统图季曼，他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不敢公开发表，但是暗地里面却说，无论是第一南斯拉夫王国还是第二南斯拉夫红色联

邦，对克罗埃西亚人都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对乌斯塔沙建立的克罗埃西亚独立国极其不公正。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像李硕[26]一样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抹煞了满洲国做出的重大贡献，忽视了满洲国是比你们国民党和共产党更先进文明的国家。图季曼的意思也就是这样的。他本来在党内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了，都已经混上南斯拉夫人民军（Yugoslav People’s Army）的将军职位了，原本可以作为老干部退休了，但是他在南斯拉夫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间还是忍不住中年改行，不做将军了，改行做歴史学家。你要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做歴史学家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歴史发明家」；而在苏联解体时期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期作歴史学家，就要把被共产党的歴史发明学掩盖的歴史真相重新揭发出来。对于图季曼来说，他要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为满洲国翻案，要把在盟国眼中跟满洲国处于同一地位的克罗埃西亚独立国重新翻出来，以作为克罗埃西亚民族的正统政权。

当然塞尔维亚人是要彻底反对图季曼的，他们不仅要用共产主义的逻辑反对他，而且还要用西方盟国的逻辑反对他。他们说：「为法西斯分子翻案和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是两回事。如果你要搞人权活动，我们不反对你，如果你要搞中华联邦或者中国自由民主，倒也罢了；如果你要重建满洲国，那么问题就严重了。你要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只是反对中国共产党而已；你如果要重建满洲国，那你不仅是要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是要反对中华民族。而且还更加严重的是，你是在跟同盟国作对。你不仅是在反对我们共产党阵营，反对我们共产党的人多得是，而且你还是在为法西斯招魂，是在跟英国和美国作对。不行，我们要到英国和美国去告你，你图季曼不是自由民主派，你是法西斯分子。我们可以承认周锋锁[27]是自由民主派，可以承认何岸泉[28]是自由民主派，但是我们一定要说你李硕是法西斯分子。周锋锁他主张的是中国自由民主，你李硕主张的是满洲国独立。所以周锋锁我们可以认，虽然我们共产党容不了他，但是美国容得了他是理所当然的；你李硕嘛，我们不仅要在中国把你搞臭，而且还要在美国把你搞臭，让美国人都知道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不仅反对我们中国和苏联，连美国都反对。」

塞尔维亚人就是这样对付图季曼的。他们希望，不仅塞尔维亚人和南斯拉夫人要反对他，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了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歴史定论，绝对不能容许克罗埃西亚独立国重新翻案，绝对不能容许乌斯塔沙组织翻案。但是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克罗埃西亚真正独立

的时候，德国人第一个跳出来，率先承认了图季曼的克罗埃西亚国家，克罗埃西亚新一代的民族发明家照样翻案，把他们的满洲国翻成了正统国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这件事情根本不置一词，柯林顿总统不但没有谴责德国人企图为法西斯主义招魂，反而支持德国人反对英法，派美国军队去执行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后来，波罗的海沿岸小国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推倒苏联红军的纪念碑，为德国党卫军树碑立传[29]；乌克兰的民族发明家也把支持德国的乌克兰游击队员的碑立起来、推倒苏联红军的纪念碑的时候，俄罗斯的共产党人和大俄罗斯主义者都做出了跟塞尔维亚人一模一样的事情：「你们搞自由民主倒也罢了，搞民族发明我们实在是忍不了；你们搞民族发明倒也罢了，你们居然把亲德势力发明成为正统政权，我们实在是忍不了。我们要到英国和美国去告状，让柯林顿总统修理你们，让欧巴马总统修理你们。」但是他们反对的结果，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乌克兰人照样把那些跟德国结盟的乌克兰民族游击队员发明成为自己的民族正统，写进自己的歷史教科书里面去，同时也丝毫没有妨碍欧巴马总统和川普总统继续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这就是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的故事，它涉及到的当然不仅仅是克罗埃西亚。



爱沙尼亚军团纪念碑　此纪念碑位于爱沙尼亚的利胡拉镇（Lihula），正面描绘了一位身着德式军装的士兵，但碑面上并未有任何纳粹的相关符号，下方的碑文文字为「致1944至45年捍卫爱沙尼亚独立的爱沙尼亚人。」二战期间，许多爱沙尼亚人参加纳粹德国军并反抗苏联的侵略，其纪念价值是否具有「正当性」，在爱沙尼亚引起许多争论，如同东亚日本的「靖国神社」争议。

克罗埃西亚
民族发明大事记

1553年

克罗埃西亚边疆区的建立

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于1553年建立「克罗埃西亚边疆区」，以收容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塞尔维亚基督徒流亡者，继而形成「内地克罗埃西亚」的歷史边界。1745年，哈布斯堡皇帝也在「斯拉沃尼亚」建立相同性质的边疆区。这两块封建领地在1868年合併为统一的政治实体。

1809/10/14
拿破崙建立伊利里亚行省

法国军队进入巴尔干后，皇帝拿破崙指派总督奥古斯特．德．马尔蒙合併了「达尔马提亚」（后来此地被称为沿海克罗埃西亚）和内地克罗埃西亚，建立伊利里亚行省，并推行法国式的启蒙教育，影响了克罗埃西亚的民族发明。

1841年
伊利里亚民族党成立

接受法国式启蒙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了推动「伊利里亚民族」的独立，建立「伊利里亚民族党」，并发明了「伊利里亚语」，这是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的起源。

1848/3/15
引发匈牙利革命的《匈牙利合併协议》

匈牙利议会通过《匈牙利合併协议》，将匈牙利与其他封建领地，包括斯拉沃尼亚及克罗埃西亚边疆区，合併为「大匈牙利」，导致克罗埃西亚人的不满，并导致奥地利的干涉，继而引发了「匈牙利革命」。

1848/4/7
「克罗埃西亚民族」首次出现

哈布斯堡皇帝同意民族发明家耶拉契奇的请求，将「克罗埃西亚民族」从匈牙利王国中分离出去。这是「克罗埃西亚民

族」在歷史上首次被完整表述，取代了「伊利里亚民族」或「克罗埃西亚的居民」。

1861/6/26

克罗埃西亚权利党成立

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家斯塔尔切维奇反对《维也纳文学协议》及「大塞尔维亚民族」的概念，为此建立了「克罗埃西亚权利党」。该协议由卡拉季奇与加拉沙宁等塞尔维亚民族发明家发表，他们将「伊利里亚语」正名为「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试图将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埃西亚人发明为「大塞尔维亚民族」。

1868/9/24

克罗埃西亚王国的建立

克罗埃西亚人与匈牙利人缔结《克罗埃西亚、匈牙利妥协协议》，合併克罗埃西亚及斯拉沃尼亚为统一的「克罗埃西亚—斯拉沃尼亚王国」（简称克罗埃西亚王国），并允许其高度自治。

1918/12/1

第一南斯拉夫王国的建立

一战后期奥匈帝国解体，为了填补此地的政治真空，克罗埃西亚王国、斯洛维尼亚王国与塞尔维亚王国被合併为「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此王国建立在「三族共和」的基础之上，克罗埃西亚人、斯洛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被定义为同一个「南斯拉夫民族」的三种不同名字。达尔马提亚的大部分地区也在此时併入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小部分地区则被义大利占领。

1929/4/20

克罗埃西亚独立组织「乌斯塔沙」成立

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成立的「乌斯塔沙」组织是克罗埃西亚权利党的政治继承者，主张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动克罗埃西亚脱离南斯拉夫王国的独立运动。

1941/4/10

克罗埃西亚独立国的建立

二战期间，德国及义大利等轴心国占领南斯拉夫后，指派「乌斯塔沙」组织建立傀儡政权「克罗埃西亚独立国」，这是克罗埃西亚歷史上的首次独立，领土包括了今天克罗埃西亚的大部分区域及波士尼亚、斯洛维尼亚北部。

1945/11/29

克罗埃西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

二战结束后，克罗埃西亚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分加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为狄托推动的「六族共和」成员之一。

1991/6/25/

现代克罗埃西亚的独立

克罗埃西亚总统图季曼追随民族发明家斯塔尔切维奇的理念，推动克罗埃西亚脱离南斯拉夫联邦，建立歷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克罗埃西亚民族」国家，其民族疆域包括了三个歷史区域：内地克罗埃西亚、达尔马提亚（沿海克罗埃西亚）及斯拉沃尼亚。

---

1. 托利党（Tory）和辉格党（Whig）是十七至十九世纪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两党的对立起源自十七世纪的英国王位继承问题，诉求正统性的托利党人支持作为天主教徒的约克公爵詹姆斯二世继任国王，以清教徒居多的辉格党人则坚决反对。
2.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818），爱尔兰裔英国作家、思想家及政治家，辉格党人，曾担任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他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代表着作为《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3. 作者术语，意指前现代的、多元的大帝国，如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中东的奥斯曼帝国及东亚的大清国瓦解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歷史过程。
4. 卡诺（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1753 - 1823），法国数学家，担任拿破崙政权的战争部长等职。法国共和政府推行徵兵法之后，由卡诺一手组训出来的七十七万新军投入战场，频获捷报。拿破崙能够称霸欧洲，过半原因都要归功于徵兵制与卡诺的贡献。
5. 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1759 - 1820），法兰西政治家，拿破崙一世时期的警政部长。大革命期间，他以兇暴镇压里昂起义而声名鹊起。一八一四年，富歇参与了流放与暗杀拿破崙的密谋。拿破崙在滑铁卢战役战败后，他勾结不同的势力以维持自己在政权中的地位。最终他使路易十八重新成为国王，并让自己成为王国的大臣。
6. 一七九二年十月时法军占领美因茨，当地随即出现拥护革命思想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多为当地大学生和教师），并于一七九三年三月建立「美因茨共和国」（Republic of Mainz），同年七月，普鲁士及奥地利联军攻占美因茨，撤销共和国。
7. 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及波兰革命请参考刘仲敬，《民族发明学讲稿，欧洲的感性边疆》中关于匈牙利及波兰的章节。
8. 神圣君主同盟（Holy Alliance, 1815–1848），俄国、奥地利及普鲁士在共同击败拿破崙及法兰西帝国后，以三国同属于基督教阵营及君主制国家为基础所建立的同盟，最后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因三国关系转向对立而解散。
9. 约瑟．耶拉契奇（Josip Jelačić, 1801–1859），出生于斯洛维尼亚边疆区的克罗埃西亚贵族，于一八四八年被奥地利帝国任命为陆军元帅并负责统领克罗埃西亚地区的奥地利军队，于一八四九年率军攻入布达佩斯以镇压匈牙利革命，一八五五年返回克罗埃西亚镇压当地叛乱，最终于一八五九年过世，后来的克罗埃西亚人视其为民族英雄。
10. 原载于一八四九年二月十五至十六日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收录于中国中央编译馆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
11. 安提法（Antifa），是当代美国的「反法西斯运动」（anti-fascist political movement）简称。它是一个激进左翼无政府主义、反法西斯的政治运动，提倡直接付诸行动，而非政治改革的无领袖抵抗。参与者往往持反资本主义，并包含一些衍生的左翼意识形态。
12. 指《维也纳文学协议》（*Vienna Literary Agreement*），一八五〇年，以塞尔维亚民俗学家卡拉季奇为首，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及斯洛维尼亚三国的文学家在维也纳共同发布的声明，企图发明一种全新的「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Serbo-Croatian），以取代「伊利里亚语」作为「大塞尔维亚民族」的共通语言。
13. 安特．斯塔尔切维奇（Ante Starčević, 1823–1896），克罗埃西亚的政治家，于一八六一年建立克罗埃西亚权利党（Party of Rights），主张「大克罗埃西亚主义」以对抗「大塞尔维亚主义」，对内则实施资产阶级民主并开放普选，被后世尊奉为克罗埃西亚的国父。
14. 泛民派又称「民主派」，为支持「特区自治」的香港政治派系之一。虽常在普选中占多数，惟在非普选功能组别议席中却受到限制，故难以在国会过半。被建制派及亲中媒体贬化为「反对派」。
15. 香港民族党，香港政治派系之一，主张香港独立并建立「香港共和国」。该派认为香港自一八四八年划分给英国后，就已展开跟今日的中国无涉的歷史进程，故主张「香港人」为独立的民族，目前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活动。

16. 水客，又称「水货客」，多指在港、澳、陆出入的走私者。透过规避进出口税额的方式来压低产品价格，赚取利差，目前已有组织系统化运作。但因为组成素质低落，易滋生社会问题，香港曾于二〇一二到二〇一三年公布打击水客的措施。
17. 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đman, 1922–1999），克罗埃西亚政治家、歷史学家、军人，现代克罗埃西亚共和国首任总统。被誉为现代克罗埃西亚「国父」。二战时期曾参与狄托的游击队，二战结束后任职于南斯拉夫联邦陆军，并被升为将军，一九六一年离开现役军队并从事歷史研究，一九七一年因致力于独立运动被入狱。一九八九年图季曼成立克罗埃西亚民主联盟（HDZ）并于隔年当选为该国首任民选总统。他于一九九一年签署《克罗埃西亚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南斯拉夫联邦。
18. 克罗埃西亚农民党（Croatian Peasant Party），于一九〇四年成立，宗旨为克罗埃西亚独立，支持君主制度并主张农民利益的政党。代表领袖为拉迪契兄弟（Autun& Stephen Radić），活跃时段为一战前夕及战后南斯拉夫王国时代，是塞尔维亚政党的主要政敌。
19. 上海民族党（Shanghai National Party），简称「沪民党」，由中国民运人士何岸泉于二〇一八于美国纽约註册成立，其宗旨为反专制及大一统专制政府、追求上海独立建国及沪人治沪政策。
20. 《圣维特宪法》（*Vidovdan Constitution*）以塞尔维亚的东正教节日「圣维特节」命名，为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王国」的法源依据，但此宪法一直遭到以克罗埃西亚农民党为首的诸多非塞尔维亚人组成的党派抵制，其合法性备受争议，最终于一九二一年改制为「南斯拉夫王国」时遭到废除。
21. 一九一四年五月英国下议院通过自治法案，宣布爱尔兰应该获得一个自己的宪法和自治权，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该法案未能生效。关于爱尔兰在大英帝国议会政治引起的混乱，请参考刘仲敬，《中东的裂痕》中关于爱尔兰的部分。
22. 「民族集中内阁」（德语：Kabinett der nationalen Konzentration）原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德国国会通过《授权法案》（Enabling Act of 1933），赋予德国总理希特勒及其内阁制定法律的行政权力，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纳粹德国覆灭为止。作者在此处借用此名词，比喻摄政王保罗的军事政权如同希特勒的「民族集中内阁」，拥有绝对独裁的权力。
23. 是指中国网民对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一些言行进行模仿恶搞的网路「迷因」（meme）行为，「膜」字取「膜拜」之意，而「蛤」则源于江泽民常佩戴一副「蛤蟆镜」及「江泽民的外表酷似蛤蟆」的歧视观点。
24. 陈良宇（194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生于上海，于一九八五年进入上海市党政机关工作，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六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并主政上海，在任期间与胡锦涛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意见不合，于二〇〇六年九月被中共官方以「严重违纪问题」移送法办。
25. 意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中基于地域发展差异而形成的歧视观点：「上只角」意指先进繁荣的上海租界区，「下只角」意指租界以外较落后或偏乡的华界区及其他城区，此观点类似于台湾人普遍使用的「天龙国」（指台北）及「南部」。
26. 李硕，中国吉林省长春人，当代满洲国民族主义者，二〇〇八年之后活跃于网路，致力于满洲国復国运动。
27. 周锋锁（1967–），六四民运学生，一九九五年流亡至美国后，致力于人道援助及中国民主运动，于二〇〇七年成立「人道主义中国」组织。

28. 何岸泉，民运人士、上海民族主义者，于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在美国纽约成立上海民族党（Shanghai National Party）。

29. 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EKRE）于二〇一八年发起政治运动并诉求舆论，企图恢復二〇〇四年遭到政府拆除的「爱沙尼亚第二十师团纪念碑」，该军团由二战时期参加德国纳粹党卫军（Schutzstaffel）的爱沙尼亚士兵所组成。拉脱维亚于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一千余名退伍军人自发性的纪念在二战时期加入纳粹党卫军的拉脱维亚士兵，此类事件皆受到俄罗斯官方的强烈谴责。

+

斯洛维尼亚

赫尔德的民俗学与「龙牙武士」遗产



斯洛维尼亚
Republic of Slovenia
Republika Slovenija
独立时间：1991年6月25日
首都：卢比亚纳

我们今天讲斯洛维尼亚（又译作「斯洛文尼亚」）。斯洛维尼亚的民族发明体现了塑造近代世界的两种巨大力量之间的博弈，这两种巨大力量则体现于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思想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身上。因为赫尔德太伟大了，所以按照现代歷史学家的科班方法研究他，你会发现他像胡适一样，什么专家都不像，根本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民俗学是赫尔德同时作为启蒙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播下的种子。为什么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概念相反的名词要放在一起呢？因为赫尔德本人就体现了这两种主义之间的转型：他的前半生是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代表，后半生是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代表，这两者在中欧的播种，他都是第一人。这就涉及到决定欧洲和现代世界命运的巨大戏剧：在封建时代结束以后，接替封建主义的两种巨大力量，一种是启蒙主义，一种是浪漫主义。它们的哲学背景分别是，启蒙主义的背后是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的背后是先验主义。这两种主义有先后之分，启蒙主义率先登场，浪漫主义紧追其后，都试图接管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这个世界。

它们之间的斗争推动了民族发明，准确地说推动了两种不同的民族发明，就是我在第九讲中提到的：革命的民族发明体现了启蒙主义的原则，它的民族最初是被称为PEOPLE的；反革命的民族发明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原则，它的民族最初是被称为NATION的。现代的民族发明是这两种民族发明的不同比例和不同方式的混合体。事实上，革命的民族和反革命的民族，这两种来源不同的民族发明在经过百年的博弈后，渐渐地在现代的世界政治版图中混合起来，连他们的国民都忘记了自己原先的出身。现代的民族理论都是这两种民族发明理论在不同程度上的混合，已经没有哪一种民族是单用某一种纯粹的民族发明理论的。第一种民族发明，启蒙主义的民族发明理论，以PEOPLE为中心的，就是法兰西的共和主义；第二种民族发明，以NATION为中心的，就是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而赫尔德的重要之处就是在于，他是德国由启蒙主义转向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同时是两种民族发明在中欧的主要推手，而他设计的模式对整个德语世界、欧洲和全世界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现在要把歷史的镜头拉大一点，移到封建时代的欧洲。封建时代的欧洲是什么呢？你要把它想像成为一个「没有主权者的世界」。如果你是中学歷史课本和政治课本教大的那些人，或者是海耶克所谓的「二、三流的思想二道贩子」[2]贩卖的歷史观点和政治哲学观点的接受者，你将无法理解封建主义世界。什么叫做「没有主权者的世界」呢？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吗？近代以后的歷史学家出于民族主义构建的需要，经常把中世纪的各种政治实体类比为现代的国家，就像是明清时期的歷史学家和通俗文学作家会把夏商周三代或者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诸侯类比为秦始皇以后的皇帝和国王一样。当然，这种类比是非常失真的。中世纪是一个威权粉碎的时代，它没有最高的政治权威。神圣罗马皇帝像周天子和日本天皇一样，他不是政治上真正的统治者，不是让．布丹[3]提出主权理论以后那种主权者意义上的统治者，而是兼有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的统治者。与其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一个负责实际政治事务的统治者，不如说是各路诸侯精神上的共主和道德行为的楷模。他能够真正实行有效统治的时间和地点是极其有限的。那么皇帝的权利怎样才能施展呢？这样会不会天下大乱？答案是不会。

封建主义下的国际法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国际法，尤其不是外交部发言人动不动就要说的那种国际法。外交部发言人说的那种国际法，实际上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而发明出来的一种政治理论，跟布丹为绝

对主义君主国发明出来的理论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封建主义是有无数种权利的，各种权利形成多层次的网路结构，但是不能说任何一种权利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而主权的特点恰好就是排他性和独占性，所以严格来说中世纪是没有主权的。最接近于主权的两种权利就是罗马教廷的权利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利。当然，这两种权利都具有高度的精神意义，根本谈不上政治上的统治权。罗马教皇被义大利的小诸侯一次又一次地赶出罗马[4]，即使在早期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与此同时，罗马教皇发布「通谕」（Encyclical）就能让强大的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瑟瑟发抖。神圣罗马皇帝经常是因为付不起酒钱，在佛罗伦斯或者罗马的酒店里面被一个普普通通的酒吧老闆扣下来，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皇冠或者其他什么随身物品来还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自己根本行使不了任何权利的瑞士山民眼中，在威廉．泰尔（William Tell）[5]及其伙伴眼中，是正义的唯一源泉，除了上帝只有皇帝。哈布斯堡家族君侯们横徵暴敛的行动因为没有得到皇帝道义上的许可，所以注定是非法的。

真实行使的封建主义权利是什么呢？它当然不仅仅是贵族权利和教会权利，而是任何自认为和被认为有能力输出秩序的个人和团体的各种私人权利的组合。这些私人权利形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多重身分。这种关系网路其实在现代社会——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号称多元社会，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它除了把使用武力的权利转交给了近代民族国家以外，继承了封建主义的所有特点。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具有多重身分的。你可以想像，一个女人是某一个小孩的母亲，同时她是某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时在商场里面她又是该商场的一个买主和顾客。请问这几个身分是相互矛盾的吗？显然不是。上班的时候她是一位律师，在超市里面买东西的时候她是一位顾客，下班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又是一位母亲。这三者的关系能够分开吗？显然不能。在小孩生病的时候，虽然她正在商场里面买东西，也会扔下商场里面的东西去带着孩子看病，或者说是从公司离开去带着孩子看病。这就说明，有的时候这几种关系会发生重叠和冲突，有的时候会发生优先顺序问题。

然而，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刚才的例子得出结论说，她的三重身分当中，母亲的身分是压倒一切的，压倒了律师的身分和顾客的身分，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她都首先是母亲、然后才是律师和顾客呢？其实不是。她

只有在孩子生病、需要紧急处理的时候，母亲的身分才是压倒一切的。如果孩子根本没有生病，只是在家里面玩闹或者是在学校里面跟其他孩子吵架，而他自己正在公司处理一项非常重要的案子的话，她就会说，这些事情等我下了班再处理，在这之前你找学校老师或者你们孩子和孩子之间自己去解决。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女人作为律师的身分始终是高于她作为母亲的身分呢？当然不是，这都是看具体情况的。孩子生病的时候，她作为母亲的身分是压倒一切的；公司有紧急案件而孩子没有什么大事的时候，她作为律师的身分又是压倒一切的；在需要买什么急需品而公司没有大事、孩子也没有大事的时候，她作为顾客的身分又是压倒一切的。你想要订出一个像宪法这样的至高法或者基本法，把她的某一项身分或者某一种关系置于最高地位，规定这三种关系之间的固定顺序，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她本人，也制订不出固定的顺序来。她作为一个活的人，在不断地生孩子，不断地处理新的案件，不断地买新的东西，她这三种关系都是动态的、往前发展的。她在不同时期，要根据健全常识来判断这三种关系对她的相对重要性，三种关系的优先顺序也随时随地都在改变之中。

假如有朝一日这三种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比如说变成了司法案件、需要裁决的时候，那么处理这些案件的是谁呢？就是跟她一样的有工作、会买东西、同时也在养孩子的父母，他们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常识来判断，这个母亲在这三种义务发生冲突的时候所做出的选择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错误的。例如，在美国经常就有母亲为了上班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最后孩子出了事，那么母亲是不是失职呢？她在三种优先顺序的选择当中是不是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行呢？那么就需要由陪审团来裁决。陪审团的成员必须是跟这个母亲处于同一个阶级的人，他们也都在带孩子，也都在工作，也都在买东西，所以他们能够根据相同的阶级身分和去理解相同的情境，适当地判断这位母亲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确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正确的。而他们做出的裁决就会构成一个先例，以后同一阶级的人在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需要裁判的时候，就要参考这些先例。然后先例越积越多，正如鲁迅所说的，走的人多了就变成道路了，这些判例就变成习惯法了。

中世纪是一个司法统治的时代，所有的关系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最高关系，没有一个固定的最高法院，它是在不断的动态演进之中。我刚才讲到的陪审团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穷人在某一位贵族领主的法庭

上打输了官司，你可以认为因为封建法通常是袒护贵族的，而教会法庭上是袒护穷人的，我可以去找主教的法庭，主教的法庭会为穷人伸冤的。或者反过来说，我认为主教的法庭偏袒了穷人，我可以去找国王的法庭，国王的法庭与贵族的法庭、主教的法庭相比是更加不偏不倚的，诸如此类。或者说你认为，因为国王自己也是一位军事贵族，不懂得商务上的复杂事务，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么你就到五港同盟（Cinque Ports）、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6]或者伦敦商人的商务法庭去，法庭陪审团的组成人员全都是商人，他们能够比国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如果各个法庭做出的判断不一样，怎样执行呢？答案是靠「打」，也就是武力解决。

中世纪的政治观念并不像是绝对君主国设想的那样，有一位垄断臣民的所有效忠权、而且必须为臣民的所有行动负责的国王或者国家。国王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他接受了臣民四十天的兵役义务、收了一定的税，就要尽一定的义务，但是义务并不是绝对和无限制的。就像是你公司的老闆一样，你既然为公司的老闆干活儿，他就有必要按照你们两人签署的合约付给你相应的待遇。但是这个待遇是合约规定的，他不能付给你额外的待遇。例如你得了什么重病，而保险公司不肯付给你医疗赔偿，那是你跟保险公司之间的纠纷；因为那是你跟保险公司的合约，而不是你跟公司老闆的合约。你在事务所当律师，事务所老闆付给你律师的工资；你跟保险公司的纠纷，那不在事务所律师老闆的负责范围之内。

国王的地位就跟公司的老闆一样，他跟不同阶级、不同地位的臣民签署了不同性质的契约，这些契约构成了他所在的那个王国宪法的组成部分。契约没有包括的部分，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例如，英国的一拨渔民和法国的一拨渔民打起来了，法国的渔民要求国王腓力二世[7]主持公道，国王就会问说：「你们有手有脚干什么吃的？你们为什么不打回去？」其实那些渔民也不是真想让国王去做些什么，他们只是觉得，你这位国王很有道德上的威望，如果国王都说我们可以正当地打回去，那么我们再打回去就没有问题了。他们听到这句话，马上就拿起武器去打英国渔民了。而英国国王也当作没事一样，因为这是渔民跟渔民打架，并不等于说是英国国王跟法国国王打架。这就是中世纪的多重正义。你要说它在没有最高权威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稳定？答案就是，它有多重的司法统治和多重的正义，这些正义是依靠各式各样的司法裁决

和各式各样的私人战争来维持的。

如果你理解不了，一定要问没有最高权威、没有统一权威的社会怎么能不乱？其实你的问题就像是苏联国家计委[8]的官员责问美国人说：「你们美国没有国家计委，一个老闆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想改行就改行，工人不听国家计委的安排，今天不高兴了就要辞职，明天不高兴了就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请问，你们的经济陷入一片无政府状态，你们的社会怎么样才能运转呢？你们的铁路怎么样才能准点到达呢？在我们苏联，如果说哪一个铁路工人不接受国家计委的指令，随随便便就从西伯利亚跑到莫斯科去了，那我们的铁路就要无法运转了。如果莫斯科的经理一不高兴就要跑到海参崴（Vladivostok）去，那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就要无法运转了。请问，为什么你们美国的工人和你们美国的经理如此之自由，你们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垮台？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恐怕美国的老闆是解释不了的。

如果你找到某一位经济学家，让他长篇大论给你解释什么叫做自由市场，谁是亚当．史密斯，什么是分工合作，什么叫做「各人为了自身利益而自然形成的分工合作能够实现社会正常运转的目标，而且比起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由国家计委进行的调控效率更高，从长远看来对社会整体更加有利」，那么一个普通的小老闆可能还回答不出来。而国家计委的官员会认为，我们苏联的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习惯了中央集权思维和绝对主义主权思维的读者看到封建主义的这种状态，就会像是苏联计画经济体系下的人看待美国的市场经济一样。他们不能理解，这样混乱的社会居然还没有灭亡，不但没有灭亡，而且还产生了近代世界最强大的势力，使奥斯曼帝国、伊朗帝国、蒙兀儿帝国和大清帝国被这些看似混乱无序的封建统治者轻而易举地一脚踢开、踩在脚下。

近代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封建体制当中武力色彩比较少的一部分，但是它最初也享有私人战争的权利。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凭一家私人公司的力量就消灭了印度很多王国，最后取代蒙兀儿帝国，统治了东方的印度。这是像严復这样深谙自由主义、深谙西学的东方人感到无法理解的事情。然而在欧洲，这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圣殿骑士团也好，医院骑士团[9]也好，他们在东欧和地中海世界进行的武装拓殖不就是这么回事吗？维吉尼亚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10]开拓美洲的时候，他们享有的战争和外交权利一点也不比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和东亚享有的战争权利更少。中文世界经常把这种现象说成是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实际上它只

是封建主义自古以来的一部分，只是封建秩序在自己发育成熟以后向外移、把它的活动范围放到了欧洲以外的广大世界所造成的效果，仅此而已。在封建主义之下，哪怕是最强大的君王，例如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首先，他们从道德上讲只是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皇帝的下属部分，基督教世界从理论上讲都要对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皇帝敬以道义上的遵从，但道义上的遵从和实际上的情况其实是两件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强大的君王，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国王，特别是法兰西国王，开始觉得：第一，哪怕是神圣罗马皇帝这种道义上的约束，对于他来说也是很没面子的事情；第二，在现实政治层面上，他迫切希望能够加强自己对勃艮第公爵、法兰德斯伯爵和各小邦、各公国之间的权力。道义上的理由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使他迫切需要给自己发明一种新的政治理论，这种新的政治理论比封建主义的习惯法对他更有利，能够使他一方面在道义上来讲不至于低于实际权力还不如他的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教廷之下，一方面能使他在现实中能够在跟勃艮第公爵和其他君侯打交道的时候获得更大的利益。法兰西国王这时候就需要一批知识分子来替他说话，于是就产生了「绝对主权」[11]的概念。「绝对主权」的概念是什么？第一，它不符合提出「绝对主权」思想家实际上所处的欧洲政治形势。当时，法兰西国王也不过是比其他封建君主的权力要大一点。在面对英国国王撑腰的法兰德斯伯爵和勃艮第公爵的时候，他不一定每次都能打赢，有好几次被勃艮第公爵和法兰德斯伯爵率领的封建诸侯联盟—「公益同盟」[12]之类的反法联盟一直追杀到巴黎城的城门口。最强大的法兰西国王尚且如此，其他的君王就更不用说了。第二，在法兰西国王的枪杆子不够硬的时候，笔杆子可以稍微帮一下忙。你可以说你的要求是正当的，然后就会有—或者说可能有比过去更多的支持者来维护你的事业。绝对主权的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法兰西国王说他是「最虔诚」的国王，就是因为神圣罗马皇帝的宗教色彩和道德色彩极为浓厚，他的权利主要不是依靠皇帝本人很能打，而是依靠他是基督在世界上的代理人之一（另一位代理人是罗马教皇）。凭着这个特点，即使法兰西国王能打得赢神圣罗马皇帝，心里面还是觉得我打他到底还是不对的。这个道理，也可见于日本战国时代的歷史。当织田信长率军上洛（京都）以后，听到这个消息的上杉谦信就说，我一定要讨伐这个胆敢威胁将军的大坏蛋[13]。上杉谦信跟京都的将军没有一点点利害关系，跟织田信长也是无冤无仇，但是他就产生了这

种道义上的愤怒。因为上杉谦信自认是日本封建道德的化身，他觉得在封建主义秩序之下，将军尊重天皇、各路诸侯尊重将军是理所当然的，你织田信长也不过是一位诸侯，竟然敢跑到京都去，把天皇和将军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把将军搞得走投无路，这简直是以下剋上、大逆不道。这种感觉就像是，孔子看到鲁国的贵族敢用周天子的礼乐以后，就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一个诸侯门下的贵族，竟然敢用天子的礼乐，你是反了吧！」[14]这就是他们的感受。所以，即使是实力超过神圣罗马皇帝的君侯，在反对神圣罗马皇帝的时候也要忌惮，说不定在基督教欧洲的某个角落里面会出现上杉谦信这样的人物发出愤怒的吼声：「尽管我跟你一点利害关系都没有，但我纯粹为了主持正义，觉得你这种大逆不道的人非受点惩罚不可。」

因此法兰西国王的笔桿子，也就是知识分子要反击了，要论证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论证的办法有两种，第一种，神圣罗马皇帝不是基督在世界上的代理人吗？因此我便要说法兰西国王是最虔信基督的君主，这样我跟你就平起平坐了。我也是为了基督呀，不是只有你才是为了基督。然后西班牙国王也就拍拍脑袋宣布，我是天主教君主。这两个头衔的目的都是针对神圣罗马皇帝的，要分他的权利，不高兴接受神圣罗马皇帝道德上的权威。同时还有另一种更世俗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一拨罗马法的律师和近代哲学家（他们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布丹）提出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绝对国家主权理论。绝对国家主权理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像是神圣罗马皇帝或者罗马教廷那样的最高道德权威，道德权威是谁也不重要。我们可以称神圣罗马皇帝是维也纳和德国的君主；我们也可以承认罗马教皇是罗马城和义大利的君主。但是德国和义大利以外的地方当然是由英国国王、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和各路地方君侯统治的，他们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只要他们实际上能够实施统治，他们的地位就是平等的。同时，每一个君侯在自己的辖区之内都拥有绝对权力。

当然，知识分子这样说，是为了替法兰西国王张目。第一，法兰西国王实际上是没有绝对权力的，他在自己的辖区之内只是各路封建诸侯当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君侯，甚至不是实力最强的一个君侯，法兰德斯伯爵、亚奎丹公爵或者图卢兹伯爵比国王的权力大、地盘多、势力更强大的时间不是只有一次两次；第二，就算是在法兰西国王实力比所有诸侯都强的时候，他也只是比各路诸侯高一级、强一点，能够根据封建习惯

法向诸侯提出若干要求，但是习惯法之外的要求他就没有权利提了。比如说，老闆可以要求你在八小时之内给他工作，八小时之外要工作的话，他得跟你商量，不然你可以拒绝的。如果你拒绝了，他并不能开除你。如果他开除了你，你可以根据当初你们之间签署的合约去告他。封建的藩属就是这样的，我虽然是伯爵，你是国王，我比你低一级，你打仗的时候，我带着我手下的兵马去给你打四十天仗，但是四十天时间一到，我就带着我的兵马回家了，哪怕是打到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一转头你就要转胜为败，但这跟我没有关系。我跟你事先签的合约规定我每年给你打四十天仗，记住了，是四十天，不是四十五天。你在第四十天的时候正打到关键时刻，我带着我的人马走了，一点也不违反封建契约。如果你找我的麻烦的话，那是你国王陛下理亏。我第一可以跟你打仗，藩属照样可以跟国王打仗，第二就是可以找别的封建法庭跟国王打官司。国王不一定能打得赢仗，也不一定能打得赢官司。

　　如果按照布丹那种绝对主权理论的话，那就麻烦了，比如我这位伯爵是你这位法兰西国王的下属，我就得像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总督一样，绝对服从你这位国王。如果我在打仗的时候抛弃了你，那就像帝国的总督一样，是可以撤职的。国王是享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这样一来，是不是对国王非常有利，而对封建诸侯非常不利呢？国王要的效果就是这样。绝对君主制的理论，也就是现在这种主权国家理论，在开始的时候是无法有效执行的，甚至不可能执行的。但是有人这么宣传，对国王就是有利的。就好像说是，苏联其实并没有征服美国，但是「全世界最终将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苏联有利了。假定有一拨美国人相信美国迟早要实现共产主义，那么他们就自动地变成了苏联外交的帮手。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吞併台湾，但是如果它到处宣扬「世界上有一个中华民族，台湾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且台湾还有一部分人是相信的，那是不是对共产党有利呢？要是有一部分台湾人真的相信「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早晚是要统一的」，那么是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共产党有利。那么共产党自然要宣传「中华民族」，哪怕是连广东都没有包括在蒋介石早期的中华民族理论里，这也没有关系。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粤寇和倭寇一样，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15]现在共产党可以借用蒋介石的「中华民族」这个词，把广东和台湾都包括进去，这样至少在舆论上可以有点帮助，说不定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大的用处。法兰西国王支持绝对主权国家

的理论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即使是在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哪怕是在法兰西王国境内，法兰西国王也从来没有任何一天真正实践过绝对主权理论。亚维农的教皇领地[16]、波兰国王在洛林的领地，还有诸如此类数不尽的领地，包括犹太人的各个社团在内，他们跟法兰西国王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边契约式的封建关系。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取消了封建义务以后，哪怕到了二十世纪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时候，绝大部分民族国家都没有像现在共产党的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那种权力。例如，波兰能够得到凡尔赛条约的认可，关键就是在于它跟国内的犹太人和但泽自由市签署了特殊条约[17]；芬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关键就是在于它跟奥兰群岛上的瑞典人签署了特殊条约[18]；而义大利王国必须承认阜姆自由邦[19]的权利，才能够得到国际联盟的承认。当然，德国和波兰也有但泽自由市之类的问题，数也数不清。直到今天，没有哪一个所谓的民族国家曾经实现过十七世纪以来提倡的绝对主权理论，哪怕是被希特勒和史达林清洗过两次的波兰也没有。

在封建法传统最为深厚的英语国家，国内法很明显是高于国际法的。例如像葡萄牙王国，它是一个王国，但是在英国人的几十部「葡萄牙关系法」当中，堂堂的葡萄牙王国就像区区的法兰德斯伯爵领地一样，是受英格兰王国和大英帝国保护的地区。如果你要问葡萄牙王国的绝对主权还算不算数，英国法官的答案会是：「这跟我没有关系。我根据英国的国会法规定，英国国会既是封建主义的最高司法机构，又是众多立法机构之一，我作为一个普通法的律师和普通法的法官，我根据无数的判例可以判断，英国跟葡萄牙之间歷年来签署的条约、英国威斯敏斯特国会通过的『与葡萄牙关系法』和诸如此类的相应法律是合法的，我要根据以往的判例来判决。至于你们外国人，你们歌德或者其他什么欧洲人说『这是不公平的，葡萄牙王国或者法兰德斯伯爵的领地怎么会变成英国保护的地方，这违反了一八一五年维也纳和会的各种条约协定』，那么我只能说，按照我看到的判例，这些累积几百年的惯例比你一八一五年刚刚签署的条约更重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我判惯例胜。」然后这种行为在欧洲各国，包括威玛公国的大臣歌德看来，那就是英国人认为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如果英国签署的国际条约跟国内法发生冲突了，那么英国法庭的裁决将以国内法为优先依据。像现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美国跟外国签署的条约跟美国国会

立的法律相冲突，那么任何一个美国法庭都会判国内法赢。

然后，一八一五年的德国人就要咆哮起来：「英国人太霸道了，极其不公平。我们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都是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如果国王签署一个国际法，那么国内的法官是非得执行不可的。如果国内的法律跟国王签署的条约发生冲突，那么他们必须根据国王的意志，首先执行条约。为什么唯独你们英国例外？你们负责签署条约的英国外交大臣居然还不如肯特郡一个地方法院的法官有力。你们英国的巴麦尊勋爵跟拿破崙三世签署了同盟条约，然后拿破崙三世到英国去控告一拨法国流亡者在英国搞颠覆活动，企图颠覆拿破崙三世政权，结果英国法官居然判拿破崙三世败诉，请问你们的首相跟我们的皇帝签署的条约算不算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普鲁士国王跟英国法官发生纠纷的时候，歌德大臣就要愤怒地责问卡斯尔雷外交大臣，你们英国外交大臣签署的条约算不算数？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英国是一个司法统治的国家，它继承了中世纪司法统治的传统，外交大臣不算什么。外交大臣签署的条约不是不管用，它只是普通法法官可以引用的众多先例之中的一种。司法统治是多元统治，各种各样的契约身分同时存在。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母亲一样，她的律师的身分、母亲的身分和顾客的身分同时存在，哪一个身分在哪一个具体情况优先，第一由她本人来判断，第二由与她同阶级的陪审团来判断。没有任何一个判例是绝对的，每一个新的判例都可以为旧的判例增加分量，但也不是说法官一定只能依据旧的判例进行判决。总之，这就叫「司法统治」。

「司法统治」在与英国签署条约的欧洲大陆君主——今天就是在跟美国政府签署条约的外国统治者看来，英国和美国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之上，这就是英美霸权主义的体现。然后他们可能会根据布丹和众多绝对君主制爱好者发明的主权国家理论说：「你们这样是不对的，在我们推翻了英美霸权主义之后，我们早晚要改变它」，诸如此类的愿望。但是就英国与法兰德斯、比利时、葡萄牙的关系来看的话，基本上没戏。英国的司法统治笼罩着法兰德斯地区已经持续了整整八百年，一直到了欧盟建立的现代，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和法国都已经加入了欧盟，相应的判例仍然存在于英国普通法的巨大记忆库当中，任何时候要用都可以用，相应的判例仍然是有效的。现在没有人再谈论英国对法兰德斯地区的做法是不是霸权主义，是不是侵犯国家主权了，那是因为法兰西和西班牙已经放弃了对法兰德斯地区的领土要求的缘故，所

以大家就不去争吵了。就像是英国国会至今仍然拥有随时可以执行「褫权法案」[20]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指名诛杀任何一个妨碍国会的人；它只是目前不使用而已，不使用不代表作废，它可以随时拿出来用。假设有一天，英国国家安全受到极为严重的威胁，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在英国国会兴起的时候，这些法律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这时一定会有一拨浅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跳出来说：「你们这样做跟希特勒有什么区别？」但是这样说是没有用处的，普通法是有牙齿的，它有从封建制度继承下来的牙齿，而且这个牙齿非常锐利。

法国大革命是布丹所提出的绝对主义理论在全欧洲真正推广的第一步。它做到了法兰西国王不敢做的很多事情，因为封建君主的个人统治被民族发明取代了。法兰西国王无论多么强势，他始终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他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即使对他自己有极大的利害关系，他反封建也不是彻底的。要想建立布丹所设计的那种绝对主权，就必须发明「民族」，也就是根据启蒙主义的原则，把原先是各个等级的人民发明成为一种完全平等、均质的共同体，用「想像的人民」来取代君主。法兰西民族通过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可以做到法兰西君主国做不到的许多事情。然后这种逻辑如果推广到全欧洲各地，那么布丹所设想的那种由平等的各个地方性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就要成为现实了。这样的社会，第一是没有封建主义情况下的那种罗马教廷和罗马皇帝的道德威望；第二呢，各国内部的封建团体对王权的侵蚀将会在国民公会的统一之下丧失大部分效力。法兰西大革命创造了「立法国」的传统，这跟英美体系的「司法国」不一样的地方，最简单地说就是「中央集权」。巴黎的国会做出的决定和通过的法律，都是执行拿破崙法典的法兰西法官裁决的依据。并不是说法兰西法官的地位比国会议员低，法兰西也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只不过立法权和司法权是分得很开的，国会立了法，法官负责执行和解释，但是法官是没有解释法律和发明法律的权力的。但是英国的普通法法官是不认这一套的，他像封建主义下的各个法官一样，他随时有权造法。立法国把权力集中到中央一层，大大削减了司法系统的权力。

由法兰西共和国开启的这种革命的民族发明模式，从理论上讲，将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伊曼努尔．康德[21]设想的那种欧洲变成各大共和国、然后各大共和国通过一个国际联盟式的组织团结起来的情况。但是康德所设计的的各民族国家之间完全平等的大联盟，是需要在各国实力平等

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的。现实情况中，有很多国家坚持过去的封建君主体制，拒绝接受共和主义原则。而接受共和主义原则的政治势力当中，法兰西共和国无疑是最强大的，因此接受共和主义跟接受法兰西的霸权变成了一回事，正如在二十世纪，接受共产主义跟接受苏联的霸权其实是一回事。于是康德理想上的各国家一律平等的国际联盟，在现实中就会变成拿破崙主导下的法兰西革命军对法国阵营内的各个小国——无论是赫尔维蒂共和国或是义大利共和国的霸权式专政。而不愿意接受法国霸权式专政的国家——是政治势力，不能说国家，我刚才犯的这个错误其实就跟明代歷史学家说「尧舜禹汤都是皇帝」是一样的错误，因为现在民族国家是主流意识形态，所以我们动不动就会把以前的政治实体都说成是民族国家。总之，反对法国式及启蒙主义式民族发明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家都必然要向另一方面去寻找思想资源和政治资源，从而导致了反革命的民族发明。

革命的民族发明催生了反革命的民族发明，体现在很多地方，首先就体现在第九讲提到的「伊利里亚行省」。伊利里亚行省是拿破崙建立的义大利王国的一个分支机构。「伊利里亚」这个词是拉丁天主教徒、跟法兰西有文化连结的启蒙思想家——例如瓦伦丁．沃德尼克[22]这种人最喜欢的概念。沃德尼克就是伊利里亚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他在歌颂伟大的革命军统帅拿破崙的时候说：「法兰西重新点起了希腊的火炬，左手拥抱高卢，右手拥抱希腊，扫尽了中世纪的黑暗，把伊利里亚人民带进了启蒙的光明之中」（出自沃德尼克的诗作《重生的伊利里亚》）。如果沃德尼克的理想实现了，那么包括现在的克罗埃西亚和斯洛维尼亚的「伊利里亚」，就要像现在的义大利发明成为义大利民族一样，发明成为一个亲法的「伊利里亚民族国家」，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概念。我们在第九讲时已经提过，法兰西建立的「伊利里亚行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拿破崙越过阿尔卑斯山征服了义大利之后，从威尼斯和拉古萨之类的义大利城邦在亚得里亚海北岸和东岸的领地中割让出来的，另一部分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从它跟奥斯曼帝国长期交战时所建立的东部和南部边区割让出来的。伊利里亚主义者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于拉丁天主教徒，受义大利文化薰陶比较深厚的那一边；而受到日耳曼文化薰陶比较深厚的那一边，对拿破崙和法国人支持的这个革命的民族发明——伊利里亚主义是看着十二分不顺眼的。但是时代在进步，连哈布斯堡家族都支撑不住的封建制度，他们已经不可能要求全部恢

復。这时，他们迫切地需要思想资源。就在同一时间，在拿破崙占领下的日耳曼地区，思想家赫尔德的思想正在转型中。

赫尔德和歌德一样，他一生横跨了两个时代。在他的背后是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时代，在他的面前是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代。他既是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播种者和先驱者。在他的脚下，成长起来了如路德维希．阿尔尼姆[23]、约翰．费希特[24]这些新一代的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都是吸着赫尔德和歌德这两位巨人的乳汁长大的。然而赫尔德和歌德本人的思想倾向——至少早期的思想倾向如同康德，他们都是启蒙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他们早期都曾经一度非常热爱法兰西文化，认为法语是文明的语言。歌德辱骂德国、热爱法国的言辞是连篇累牍的[25]。但是理想主义最终还是敌不过现实政治。他们发现，在拿破崙的领导之下，法国统治的欧洲似乎并不比封建的欧洲更加美好。说白了就是，法国人在哪里都坐了头一把交椅，而且他们对待理应跟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兄弟姊妹一样的各共和国——美因茨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赫尔维蒂共和国的态度，跟征服者对待被征服者没有什么不同。启蒙主义者设想的理想天地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乐园，各共和国像兄弟姊妹一样相爱，等于是一种褪去了基督教色彩的博爱主义理想。他们可没有想到让日耳曼地区的各共和国跪在拿破崙的面前。特别是，在拿破崙连「法兰西共和国」的外衣都撕了下来、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以后，他们就更加失望了。

但是现实政治的力量是无情的，法兰西的革命军在变成拿破崙的帝国军队以后，仍然是所向披靡的。然后拿破崙于一八一〇年娶了玛丽．路易莎以后，最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看上去都已经投降了。拿破崙封他与奥地利公主路易莎的儿子为罗马王，意思就是让他继承查理曼的伟业，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伟业，今后奥地利的皇帝不再是神圣罗马皇帝了，拿破崙和奥地利公主的儿子（这个未来的罗马王）就是未来全欧洲的统治者，未来全欧洲的统治者将要在法兰西文化和启蒙运动的统治之下繁荣昌盛，在理性主义的统治下步入康庄大道，一扫过去封建的分裂和黑暗。在这个伟大进步的图景之中，很不幸，除了天主教要被扫到一边以外，而且日耳曼的语言和文化都要像普通话推行以后的广东方言、四川方言和吴越方言一样被扫进歷史的垃圾堆。今后你们都讲满大人语就行了，满大人语可以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你们要忘掉你们的广东方言，要记住，广东方言、闽南方言都是野蛮人和落后分子的语言。你们

要把你们的子弟送进普通话学校，永远忘记你们未开化的祖先语言。这样你们就可以到巴黎或者北京去，大家一起享受启蒙主义的大快乐。这就是拿破崙和他周围的启蒙思想家为德国和全欧洲规划的美好未来。

曾经支持过法国启蒙主义理想的老一辈思想家如歌德和赫尔德，面对这个理想，感到无比的恐惧。但是，全人类自由民主博爱、全人类建立康德式的国际联盟这个理想，确实是他们曾经衷心热爱和支持过的，而实践他们自己理想的拿破崙，如黑格尔所说的通过「马背上的世界精神」[26]，在现实政治层面上把他们踩进了尘埃之中，而且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做法国人的奴僕。他们又愤怒又无可奈何，很难否认自己的过去，但是又不愿意接受现实。这时，赫尔德就拍了拍脑袋（当然也不是像拍脑袋这么简单，思想潮流的酝酿必然是在周围环境的长期刺激下、在跟他有共同想法的许多思想家的互动和刺激下才产生出来的），提出了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浪漫主义的原理。这里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因为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例如在《发现人民、创造民族—从大众文化到民族国家》[27]这样的文章中间曾经写过很多次。近代的民族发明，特别是反革命的民族发明，先验主义的民族发明，就是从他这条路线中间产生出来的。他在哲学上引用康德哲学关于「物自体」[28]的理论，用先验主义反对法兰西的理性主义。

如果按照理性主义的原则，欧洲统一于法语、用法语普通话取代拉丁语文言文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先验主义不这样认为。先验主义有一点跟英国经验主义是一样的，就是它认为世界是广大的，理性涵盖不了世界的全体。涵盖不了的那一部分，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29]和乔治．贝克莱[30]是用「经验」来解决的；而康德和他在哲学上的继承人，如赫尔德及费希特，他们都主张这一部分是属于「先验」的。到底是「经验」更合理还是「先验」更合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他们认为由拿破崙和法兰西革命军所代表的那种政治势力是涵盖不了全部的人类生活。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法兰西共和国很好很强大，但是有一部分东西是理性涵盖不了的，就是你牙牙学语的时候从你的老保姆和老祖母那里学来的东西，就像是大野狼和小红帽，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里的故事。那些用你童年时代学的方言土语讲的故事，对你来说是温暖亲切的；在你年纪大了、上了法语学校后用法语学到的知识，对你来说是冷漠生疏的。从道理上来讲，法语教师给你讲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感情上来讲，你仍然留恋着不识字的老祖母和老保

姆给你讲的狼和小红帽的故事。你留恋乡土、留恋不识字的农夫和樵夫唱的民谣，本能地反感行政官和学校教师给你讲述开明的拿破崙法典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福利。这种分歧是无法解决的，理性不是生活的全部。

感性的那一部分在文学上通过浪漫主义发洩出来，在哲学上通过先验主义发洩出来，从政治上通过反动的民族发明发洩出来。反动的民族发明家冷嘲热讽地说，法兰西的民族发明无非是让全世界各民族都变得像法国人一样，而我们德国人和波兰人跟法国人是不一样的。你们不要嘲笑我们留恋封建制度的遗产，不要嘲笑我们留恋天主教或者路德教的遗产，不要嘲笑我们留恋那些基督教来临以前异教时代的遗产。我们总是要听歌剧《莱茵的黄金》[31]，要听异教时代维京武士的故事，要听华格纳的歌剧。华格纳的歌剧也是德国浪漫主义在精神上和艺术上反攻法国理性主义的一部分。约翰．温克尔曼[32]的希腊哲学之爱，歌德的希腊哲学之爱，费希特发掘中世纪的德国，奥古斯特．施莱格尔[33]翻译莎士比亚、到印度中世纪文献中寻找思想资源，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在精神上打一个翻身仗，要击溃法兰西理性主义和拿破崙在日耳曼的崇拜者。对于赫尔德来说，他从事的就是通过收集民俗故事及民谣来重新发明民族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于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体现于「哥廷根七君子」的研究成果[34]。他们的民族发明播下了波希米亚民族、爱沙尼亚民族的种子，同时也播下了我现在要提到的斯洛维尼亚的种子。

斯洛维尼亚的主体，包括讲德语的城市莱巴赫（Laibach），虽然已经变成拿破崙的伊利里亚行省内的一部分。有很多人都像沃德尼克一样，衷心拥抱了拿破崙的伊利里亚主义。这时，反动派叶尔奈伊．科皮塔尔[35]出现了，他原先也是伊利里亚地区的居民，但是在拿破崙建立伊利里亚行省的时候逃到了哈布斯堡帝国。流亡的科皮塔尔拿起了赫尔德的理论，开始发明民族，发明了斯洛维尼亚语。这种语言无论是面对贵族的拉丁语还是市民阶级的德语，都只能算是乡下的农民和樵夫、乡下的阿公阿婆、给你讲大野狼和小红帽这种不科学不文明的乱七八糟故事的老祖母和老保姆使用的语言。除了没文化的社会边缘人以外，没有人使用斯洛维尼亚语。他重新整理斯洛维尼亚语，发明了斯洛维尼亚民族，去对抗拿破崙及其追随者发明的「伊利里亚民族」。没有革命的民族发明，就不会有反革命的民族发明的反击。近代的「斯洛维尼亚民

族」，是天主教徒和保守势力在反击拿破崙和进步势力发明「伊利里亚民族」的过程中间产生的。支持「斯洛维尼亚民族」发明的，一般是受日耳曼文化薰陶比较深的天主教反动派；而支持「伊利里亚民族」的，一般是受法国和义大利文化薰陶比较深的启蒙主义者。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随着维也纳会议的召开而暂时得到了解决。组成今天斯洛维尼亚的各个地方，无论是原先来自于哈布斯堡帝国还是原先来自于义大利各城邦的地区，在维也纳和会的政治家的安排之下都回归到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之下。这时的克罗埃西亚和斯洛维尼亚还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在我上次提到的斯塔尔切维奇这些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家跟塞尔维亚人打笔战的过程中，斯洛维尼亚人开始感觉到他们跟克罗埃西亚人不同，然后也打起笔战来了。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家，包括那位一天到晚都在说：「你们全家都是斯拉夫人，你才是斯拉夫人」的斯塔尔切维奇，在他的观点中，斯洛维尼亚人不过就是山地的克罗埃西亚人而已，他们都不是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都是受日耳曼文化影响的欧洲人，斯洛维尼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是一家，理所当然应该被发明为克罗埃西亚的一部分。而科皮塔尔和他的继承人则表示说，我们受日耳曼文化的影响更深，我们根本就是日耳曼人好不好。你们不高兴做塞尔维亚人，这是我们完全理解的，但是你们也要体谅我们，我们还根本不愿意做克罗埃西亚人呢。你们觉得你们比塞尔维亚人高贵，我们是可以理解你们的，但是你们要记住，我们斯洛维尼亚人比你们克罗埃西亚人更高贵，我们可是更接近维也纳呀。你们想要我们支持你们跟塞尔维亚人划清界限，你们就得支持我们跟你们克罗埃西亚人划清界限。歧视链是天下最重要的东西，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跟你们一起反对东方人，就会跟你们是一家。

在一八四八年以前，这些笔战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匈牙利王国还没有得到復兴。未来的匈牙利王国，所谓的匈牙利王冠领地（Lands of the Hungarian Crown），跟未来的捷克（也就是所谓的波希米亚王冠领地Lands of the Bohemian Crown）和克罗埃西亚的巴昂领地（Ban of Croatia）一样，都是奥地利帝国管辖下的不同边区。斯洛维尼亚也不过是奥地利的卡林西亚（Carinthia）诸边区而已，都是封建多元体系下跟奥地利皇帝签署了不同契约的各个组成部分，一时也很难看得清楚到底是哪个边区的地位更高一些。这个道理如同我在前面讲过的，你很难

判断一个女人到底是母亲的身分占优势、律师的身分占优势还是顾客的身分占优势。同样属于哈布斯堡皇帝的众多封建领地，你一定要把歧视链整理清楚，说是谁比谁高一级，到底是匈牙利高还是波希米亚高，克罗埃西亚高还是斯洛维尼亚高，这个事情也是没法说得清楚的。然后，大家就要各显神通。在一八四八年这场革命当中，革命的一方和反动的一方都开始大显身手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在革命失败以后，奥地利贵族和匈牙利贵族都感到有必要以比过去封建主义更清晰的方式界定哈布斯堡帝国内部的权利和义务了。于是产生了《奥地利–匈牙利折衷方案》[36]，把原来的哈布斯堡帝国一分为二，一部分变成了匈牙利王国的领地，一部分变成了奥地利王国的领地。

这些领地仍然是高度自治的，并不像是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共和国一样。虽然理论上讲大家都是法兰西民族，享有高度的自由民主平等，但是所有人选举完巴黎的国会以后，就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巴黎的国会。巴黎的国会虽然是全国人民，包括了阿尔萨斯人、洛林人、诺曼第人、布列塔尼人共同选举出来的，但是在选举之后，一切权力都归了巴黎的国会，无论是阿尔萨斯、洛林、布列塔尼还是诺曼第，各省的地方政府什么也不是，只能乖乖地服从巴黎的国会了。而匈牙利王国和奥地利王国都不是这样的，它们虽然把哈布斯堡帝国一分为二了，但它们境内都还有很多具有各种封建特权的领地，例如克罗埃西亚就是巴昂领地，波希米亚就是波希米亚王冠领地，它们各自仍然保有很多原来封建主义时代的各不相同的、高度多元化的特权，这些特权最终将会变成它们各自推行民族发明的基础。在这次分割当中，通过国王和贵族之间的讨价还价，原先边界并不清楚的克罗埃西亚和斯洛维尼亚被一分为二。克罗埃西亚被放在了匈牙利一边，变成了匈牙利的一个特殊自治区；而斯洛维尼亚则被放在了奥地利一边，变成了奥地利的南方边区。

接下来的发展就是，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大匈牙利主义者和斯洛伐克民族发明家、克罗埃西亚民族发明家、塞尔维亚民族发明家、罗马尼亚民族发明家开始打了几十年的文化战争。匈牙利的民族发明家很希望用匈牙利语取代拉丁语，一统匈牙利王国境内的所有居民；而上述的各路民族发明家则把匈牙利民族发明家看成自己的最大敌人，宁愿到奥地利去寻找朋友，宁愿到俄罗斯去寻找朋友，一定要反对匈牙利人的霸权和暴政。在奥地利这一方面，波希米亚人原来的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极力想发明出一个「波希米亚民族」出来，想让奥地利派一个亲王去当他

们的国王，或者干脆就由奥地利皇帝兼任波希米亚国王。后来在塞拉耶佛遇刺的那位斐迪南就是这种主张的积极支持者，所以他跟捷克人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理论主要的反对者其实还不是德国人或者捷克人，而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看到，匈牙利人现在已经跟奥地利人平起平坐了。他们非常不高兴让波希米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或者是世界上任何人能够跟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一样平起平坐。二元帝国对他们来说是足够好了，他们非常不高兴把二元帝国变成「三元帝国」或者「五元帝国」（五元帝国这个观念是捷克人非常喜欢的）。主要就是由于匈牙利王国顽固的反对，奥匈二元帝国的政治结构才得以一直维持下去。

与此同时，在各路民族发明家大显身手的情况下，泛日耳曼民族发明家就像是今天的「国粉」和「大中华主义发明家」一样感到十二分不满意了。在过去的封建主义时代，哈布斯堡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无论你们原先是属于哪一个文化群体或者种族群体，你们都是维也纳这位皇帝的属下。现在你们匈牙利人也自治了，克罗埃西亚人也自治了，波希米亚人也自治了，大家都自治了，我们讲日耳曼语、讲德语的这批人反而变成最吃亏的了。你有没有搞错，我们才是主体民族好不好。哈布斯堡帝国的江山能够打下来，能够在歷次革命当中屹立不摇，不就是我们讲德语的这拨人的功劳吗？我们是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我们跟皇帝是一家，为什么在我们的哈布斯堡帝国当中，你们都自治了，偏偏我们还没有自治呢？我们反而变成最吃亏的了。在二元帝国当中，奥匈两方完全平等，但是奥地利一方承担了百分之七十的财政开支，而匈牙利一方只承担百分之三十，这一点已经让我们讲德语的民族快受不了，结果没想到你们波希米亚人还要站出来再插我们一刀，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他们就产生了叶尔钦式的想法[37]：「苏联是什么东西？苏联不就是乌克兰人、高加索人和中亚人共同剥削我们俄罗斯人的工具吗？我们俄罗斯人也要独立呀，你不要以为只有立陶宛人才会想独立，我们俄罗斯人也很想独立好不好。俄罗斯人一旦独立了以后，立刻把你们高加索人和中亚人踢出去，我们再也不用贴钱补助你们了，也不用将我们俄罗斯的无数先烈流血打下来的江山分给你们这些被征服者了。」他们也就产生了类似的泛日耳曼主义思想，泛日耳曼主义思想的要求就是「皇汉主义」，我们才是主体民族好不好。要嘛在我们哈布斯堡帝国当中，

我们讲德语的这批人是一等公民，你们当二等、三等、四等、五等公民，我们没意见；要嘛一律平等的话，总不能只有你们自治，我们讲德语的泛日耳曼民族也要求发明民族，建立一个泛日耳曼共和国。

这样一来还得了吗？如果说立陶宛独立了，那么苏联还能存在；如果俄罗斯也独立了，苏联还能存在吗？所以戈巴契夫是一定不能答应的，哈布斯堡家族也是一定不能答应的。哈布斯堡家族对于其他各民族要求自治还可以妥协，对于泛日耳曼主义者则是採取了坚决镇压的做法。哈布斯堡帝国的「铁环内阁」[38]，就是坚决支持各民族中的贵族大团结、坚决镇压泛日耳曼民族势力的政权。「铁环内阁」的成员包含了日耳曼贵族、波希米亚贵族和各个族群的贵族，坚决镇压各地民族势力，尤其是要镇压主要以小资产阶级和讲日耳曼语的广大中下阶级为基础的泛日耳曼民族党[39]。未来的希特勒同志，就是从泛日耳曼民族党宣传的那种「深感哈布斯堡帝国『胳臂向外弯』、向着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歧视我们德语居民」的气氛当中成长起来的。

泛日耳曼民族党有两项政治主张，第一是反对犹太人，第二是反对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哈布斯堡帝国一视同仁、多民族共治的政策，结果就是养肥了万恶的少数民族，把我们主体民族给压得喘不过气来。按照他们的理论来说，波希米亚是什么？是日耳曼民族尚未同化的北部边区。斯洛维尼亚是什么？是日耳曼民族尚未同化的南部边区。于是，在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波希米亚和斯洛维尼亚地区，民族发明家的文化战争也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方是泛日耳曼主义者，一方是波希米亚民族发明家和斯洛维尼亚民族发明家，双方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哈布斯堡帝国解体之后，根据我们在第五讲塞尔维亚、第九讲克罗埃西亚中提到的方式，克罗埃西亚、塞尔维亚和斯洛维尼亚地区被凡尔赛会议的善后外交家划入了新的南斯拉夫王国。于是南斯拉夫王国的议会迅速变成了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和塞尔维亚激进党你死我活的战场。有了塞尔维亚激进党，克罗埃西亚农民党一定不能满意；有了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塞尔维亚激进党就一定不能满意。然后在双方斗争的同时，比较中立的斯洛维尼亚人就变成了双方的统战物件。双方都知道，老大和老二快要打起来的时候，争取老三的支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斯洛维尼亚人反倒得到了很好的待遇。所有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之类的都对塞尔维亚人怨声载道，克罗埃西亚人恨不得活剥了塞尔维亚人的皮，但是无论克罗埃西亚人还是塞

尔维亚人，都对斯洛维尼亚人很友好。

当然，斯洛维尼亚人即使在这个时候到底是斯洛维尼亚人还是德国人都是很难说的。尽管他们为了在南斯拉夫王国中间争取宪法地位，愿意自称为斯洛维尼亚人，愿意把莱巴赫改称为卢比亚纳（Ljubljana），但他们的政党结构跟维也纳的政党结构当时是一样的，现在还是一样的。他们有两大政党：第一个就是支持天主教会的天主教人民党，是以乡村为基础的保守势力；第二个则是社会民主党，是以城市为基础、以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早在佛洛伊德于维也纳读书的一八七〇年代，天主教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就已经是维也纳的两大主流政党。第三个非主流政党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希特勒在年轻时代曾经支持的泛日耳曼民族党。从佛洛德时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维也纳的两大党一直是这两大党，而斯洛维尼亚无论是在奥地利统治之下还是在南斯拉夫统治之下，他们的两大党也是这两大党，天主教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让人怀疑他们到底是德国人还是斯洛维尼亚人。因此可以说，南斯拉夫的「斯洛维尼亚人」其实只是被列强划进了南斯拉夫境内的德语居民的一块政治上的护身符而已。

在南斯拉夫解体的时候，斯洛维尼亚的独立是最轻松的，因为大塞尔维亚支持者最大的敌人是波士尼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他们不愿与鞭长莫及的斯洛维尼亚发生冲突。克罗埃西亚人和波士尼亚人为了争取独立，当然也没有理由反对，所以斯洛维尼亚的独立基本上是水到渠成、没有流血，轻而易举就成功了，而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的独立还必须要打几场血战。所以斯洛维尼亚的歷史在这一阶段是非常平淡乏味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仗好打，没有什么传奇故事好说，它符合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歷史纪录读来平淡的国家是有福的」（Happy the nations whose annals of history are boring to read）那种典范。但是，斯洛维尼亚民族是什么呢？它是赫尔德播下的众多龙牙武士（Dragon’s teeth）的一部分。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赫尔德从启蒙主义转向浪漫主义不为别的目的，就是不希望在他的孙子那一代仍然受法国人的统治。虽然在他进行民族发明的时候没有预料到，拿破崙的统治连「二世而亡」都没有做到，很快就被俄国人和欧洲联军打垮了。赫尔德原先的预期是，拿破崙将会子孙万代，当他的孙子长大的时候，正是拿破崙二世在罗马统治欧洲的时代。知识分子没有枪桿子，没有办法的赫尔德，只有用笔桿子为拿破崙帝国种下祸根。赫尔德的民族发明就像是希腊神话中卡德摩斯

（Cadmus）播下龙牙武士一样，他把龙牙种在土地里面，土地里面就会长出许多武士来。长大后的龙牙武士会拿起武器，完成播种者的未竟之业[40]。赫尔德和歌德的想法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后来德国浪漫主义的歷史，你会发现：第一，赫尔德和歌德他们的学说从「蛋头学者」（Egghead）的学术规范来看是极不严谨的；第二，他们的想法是前后矛盾的，从世界主义迅速转向民族主义；第三，他们自己愿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坚持世界主义，但是却很愿意培养一帮看上去非常反动、非常激进的民族主义青年作为自己的继承者。按说如果只讲理论的话，这些人应该是他们自己所代表的那种倾向的死敌，但他却对这些人非常友好，可以说像是我对「远古邪恶」[41]和对「诸夏」民族发明家那样友好。这种矛盾是怎么样造成的？答案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而拿破崙的兵威不可挡，他们自己也挡不住，而拿破崙家族和启蒙主义的霸权还将长期进行下去，但他们不甘心。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像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我不争一刻而争千秋，我做不到的事情，要让我的子孙后代去做。而知识分子的后代并不是他血统上的后代，并不是他生出来的孩子，而是他办的学校教出来的弟子。

赫尔德虽然是世界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但是他要发明一套浪漫主义的方法论，发明一套先验主义、浪漫主义和民族发明学理论。任何人拿起这套民族发明学理论，就可以到山野村夫、阿公阿婆的方言民谣当中去，到那些讲法语、讲普通话的资产阶级看不到的地方，从侧面打击他们。从阿公阿婆、穷人、樵夫、渔民当中发掘新的力量，把穷人、樵夫、渔民、把讲大野狼和小红帽的没有文化的家庭主妇和老祖母的力量发掘出来，让他们像播在地上的龙牙一样，长出未来的波希米亚人、克罗埃西亚人、斯洛维尼亚人。即使是布拉格的资产阶级和柏林的资产阶级、柏林的知识分子和维也纳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拜倒在法语文化和拿破崙大军的铁蹄之下，已经放弃了反攻復国的希望，不要忘记，爱沙尼亚的渔民、菲士兰（Frisians）的渔民、瑞士的山民、克罗埃西亚的边区居民、斯洛维尼亚的边区居民、波希米亚没有文化的樵夫和农民将会捡起贵族和资产阶级已经放弃的旗帜，他们将会由龙牙成长为武士。等他们长大的时候，将会运用他们的民族语言为武器，把文化上的武器转化为政治上的武器，为在耶拿和奥斯特里茨战役[42]中一败涂地的中欧诸民族復仇。他们将会拿起武器，驱逐法国侵略者，驱逐拉丁文化和启蒙主

义，重新解放中欧。

但是歷史的发展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偏差━拿破崙居然迅速地灭亡了，以至于他播下的龙牙武士，在长大后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敌人居然不是拿破崙的子孙，而是哈布斯堡皇帝和霍亨索伦皇帝的子孙，居然是泛德意志主义者。他们的敌人不再是法国的启蒙主义者，而是德国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假如我在今天发明了「诸夏」以后，明年就发生了政变，而共产党不復存在了，那么我发明出来的「诸夏」也要面临新的敌人，这些敌人将会和共产党一样，是大一统主义者。民族发明就像是生物体产生抗体一样，针对的是某些具体的目标，针对的是病毒和细菌携带的某些抗原。它的抗原有某些特徵，那么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设计出针对这些抗原蛋白质或者醣类的相应抗体。然后这些抗体会在设计者墓木已拱以后，还在一路追杀任何携带这些抗体的生物体，无论它是外来的细菌和病毒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赫尔德设计产生的民族发明传统，要反对的就是任何企图像拿破崙一样建立帝国主义和启蒙主义、建立吏治国家的人。然而他播下的种子生长出来的龙牙武士没有杀到早已灭亡的拿破崙的子孙，却杀到了刚刚兴起的俾斯麦的子孙。但是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播下的龙牙武士就是要对抗任何企图以「吏治国家」方式统一欧洲的人。至于他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已经是次要问题了。其实我发明「诸夏」，原本是准备让它去对抗共产党的，假如共产党明年就在政变中倒台了，那么我播下的种子将来长大以后恐怕就要对抗跟共产党具有相同特徵、同样企图在东亚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势力，而不是我朝思暮想地想要除掉的共产党人。

赫尔德当年播下的龙牙武士，在一八四八年以后影响了整个中欧、在一九一九年以后构建了整个东欧，然后在一九四五年以后流传到全世界的这种民族发明模式，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既有力又无力，既弱小又强大。弱小是因为他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没有武器，也是因为他设计出来的武器将来注定会掌握在他无法控制的后代子孙手里，他们打击的目标不一定是他最初设想的目标，甚至像「迴力镖」一样，会打击到自己的子孙后代，这一切都是他无法控制的；但他也很强大，他种下龙牙就会长出武士，就会收到相应的结果，他既然是抗体的设计者，这些抗体针对专门的抗原，因此就算这些抗体最后打击到的物件不是他最初针对的物件，但因为抗原是相同的，归根究底也会是他憎恶和反对的物件。因此，龙牙武士也仍然会以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方式，实

现他生前所未能实现的梦想。这就是赫尔德播种龙牙武士的故事，近代的捷克、近代的爱沙尼亚、近代的斯洛维尼亚都是他播种的结果，斯洛维尼亚只是其中的一个事例而已。



卡德摩斯的龙牙武士　由法国画家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创作于17世纪的绘画，描绘了古希腊神话英雄卡德摩斯杀死巨龙并将其牙齿播入土地后，生长出一些全副武装的武士，他们最终帮助卡德摩斯成功建立了新的城邦。

斯洛维尼亚
民族发明大事记

6至8世纪

卡拉塔尼亚公国

从六世纪起，斯洛维尼亚民族的祖先—古斯拉夫人渐渐在此地定居。7世纪时当地兴起了第一个斯洛维尼亚族国家，即卡拉塔尼亚公国。745年该国被法兰克帝国吞併，许多斯拉夫人自此转信天主教。

14世纪

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领地

斯洛维尼亚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领地、即卡林西亚诸边区的一部分。

1809/10/14
拿破崙建立伊利里亚行省

法国军队进入巴尔干后，皇帝拿破崙指派总督奥古斯特．德．马尔蒙合併克罗埃西亚及斯洛维尼亚，建立伊利里亚行省，并推行法国式的启蒙教育，影响了斯洛维尼亚的民族发明。

19世纪上半叶
科皮塔尔发明斯洛维尼亚语

叶尔奈伊．科皮塔尔（Jernej Kopitar, 1780-1844），在拿破崙建立伊利里亚行省的时候流亡到哈布斯堡帝国。他拿起了赫尔德的理论，致力于古代斯洛维尼亚语的研究，翻译并注解斯洛维尼亚语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佛莱辛手稿》，从而发明了斯洛维尼亚语。该手稿也是歷史上第一个以拉丁字母书写的斯拉夫语言。

1915/4/30
南斯拉夫委员会发明「斯洛维尼亚民族」

一战期间成立于伦敦的「南斯拉夫委员会」发明了「斯洛维尼亚民族」的政治概念，并企图建立一个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及斯洛维尼亚等三种民族的「南斯拉夫民族国家」。

1918/12/1
第一南斯拉夫王国的建立

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旋即崩溃，为了填补此地的政治真空，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与塞尔维亚被合併为「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此王国建立在「三族共和」之上，

克罗埃西亚人、斯洛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是同一个「南斯拉夫民族」的三个不同宗族，是同一个民族的三种不同名字。然而南斯拉夫王国内的「斯洛维尼亚民族」其实只是被列强划进了南斯拉夫境内德语居民的一块政治上的护身符。

1945/11/29

斯洛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斯洛维尼亚大部分由纳粹德国、义大利王国及匈牙利所兼併。二战结束后，斯洛维尼亚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分加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为约瑟普．狄托推动的「六族共和」成员之一。

1991/6/25

现代斯洛维尼亚的独立与十日战争

南斯拉夫时期的斯洛维尼亚是六个加盟共和国当中最富裕的一个。南斯拉夫领导人狄托于1980年逝世后，斯洛维尼亚政府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于1990年通过公投，宣告独立，并建立「斯洛维尼亚共和国」。在脱离南斯拉夫联邦后，斯洛维尼亚遭到南斯拉夫联邦抵制，双方爆发为期十天、伤亡轻微的冲突，史称「十日战争」。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联邦正式承认斯洛维尼亚独立。

在南斯拉夫解体的时候，斯洛维尼亚的独立最为轻松。因为大塞尔维亚支持者最大的敌人是波士尼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而克罗埃西亚人和波士尼亚人为了争取独立，也没有理由反对斯洛维尼亚的独立。所以该国的独立基本上是水到渠成、没有流血，而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的独立还必须要打几场血战。斯洛维尼亚的歷史在这一阶段是非常平淡乏味的，它符合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歷史纪录读来平淡的国家是有福的」那种典范。

1.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德国思想家及民俗学家，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狂飙运动」（德语：Sturm und Drang）的思想基础。其思想受康德和哈曼影响甚深，反对纯粹理性，认为人与歷史的关系密不可分。其歷史哲学、美学概念对后世皆有深远影响，也是语言学研究的开创者。
2. 出自Friedrich August Hayek, “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6-3(1949), pp. 417-433.
3. 让．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近代法国思想家及法学教授，代表作《国家六论》主张主权乃「在臣民之上，不受法律节制的最高权力」，是兴起于十七世纪欧洲的「绝对君主制」的倡立者。
4. 例如乔达诺．皮耶莱奥尼（Giordano Pierleoni）于一一四四年建立一个仿效古罗马共和制度的罗马公社（Commune of Rome）组织，并唆使罗马市民叛乱，将教宗路爵二世（Pope Lucius II）赶出罗马。
5. 威廉．泰尔（William Tell）是起源于十四世纪的瑞士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是当地人民多次反抗贵族暴政，最终建立瑞士邦联的独立象徵。
6. 五港同盟（Cinque Ports），为英格兰岛南端多个沿海港口于中世纪早期结成的军事及商业联盟，起初的成员有：黑斯廷斯（Hastings）、新罗姆尼（New Romney）、海斯（Hythe）、多佛尔（Dover）、桑威治（Sandwich）。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为十二至十三世纪由德国北部沿海城市如吕贝克（Lübeck）、汉堡、科隆、不莱梅等结成的商业联盟，长期主导并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在十四至十五世纪期间达到颠峰，加盟成员达到一百六十个城市。这两组商业共同体虽附庸于英格兰王国及神圣罗马帝国，但在兴盛时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
7. 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France, 1165–1223），法国中世纪时期的着名君主，曾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统治期间致力于提高王权、促进商业以压制贵族势力，对外则透过灵活的外交手腕蚕食英国金雀花王朝位于法兰西的封建领地。
8. 全名为苏联国家计画委员会（The State Planning Committee），是苏联负责策画「五年经济计画」的最高政府部门。
9. 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 1119–1312）和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 1099–）皆为欧洲中世纪的武装修会，起源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员以西欧封建贵族为主，遵循罗马教皇命令而享有自外于封建法的特权，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一系列欧洲式封建政权。
10. 维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1606–1624）和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 1670–）皆为英国商人于十七世纪成立的商业自治团体，在英国国王的特许之下，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并发展跨洋贸易。
11. 绝对主权（Absolute Sovereignty），十六世纪由布丹所提出，强调国家主权不受法律所规范，对内得以完整行使统治权，对外则与他国平等相处，除了上帝及自然法之外，没有任何律条可伤害主权的最高性。
12. 公益同盟（League of the Public Weal），是法兰西封建贵族于一四六五年结成的军事同盟，发起者为夏洛莱伯爵「大胆查理」（Charles Bold），目的为反对法王路易十一世扩大国王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双方并于一四六五年五月爆发战役，最后以路易十一世签署《孔夫郎条约》（Treaty of Conflans）被迫让步而解散同盟。
13. 织田信长（1534–1582）与上杉谦信（1530–1578）皆为十六世纪日本战国时代的封建

领主。织田信长于一五七三年流放足利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引发尊崇幕府体制的上杉谦信不满。上杉谦信联合其他封建诸侯如毛利辉元、波多野秀治与石山本愿寺，组成第三次「信长包围网」同盟以对抗织田信长政权。

14. 典故出自于《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15. 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粤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俨然化省为国，与倭夷攻守同盟以倾中央。」

16. 法国的亚维侬（Avignon）于十四世纪的「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事件后，成为罗马教皇于封建法上的私人领地并享有特权，直到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被革命政府以国家名义收回。

1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等列强在「凡尔赛会议」中支持波兰独立，但需保障位于德国和波兰边境交界处、居民九成以上为德国人、原属于德国的「但泽市」（Danzig）自治权，并支持成立「但泽自由市」（Free City of Danzig）。

18. 奥兰群岛（Åland Islands）本为瑞典领土，于一九一七遭到芬兰军队占领。芬兰国会于一九二〇年通过的《奥兰自治法案》（the Act on the Autonomy of Åland），赋予奥兰群岛居民自治权，保障其政治中立、不设军事设施及免服芬兰兵役，并得到「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认可。当芬兰于一九九五年加入欧盟时，与欧盟签订奥兰议定书，再次保障奥兰群岛的自治及中立权利。

19. 阜姆（义大利语：Fiume）是位于亚得里亚海、以商业贸易为主的海港都市，最初于一七一九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允许下取得自治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城的归属问题在义大利和南斯拉夫王国的争夺下，成为国际重要事件。一九二〇年，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议下，义大利和南斯拉夫妥协，共同促成「阜姆自由邦」（Free State of Fiume）的成立。「阜姆自由邦」成立后政治动乱不断，遂于一九二四年遭到义大利和南斯拉夫瓜分。阜姆现在为克罗埃西亚所属的里耶卡城（克罗埃西亚语：Rijeka）。

20. 源自于英国中世纪时期的普通法惯例，于一五四二年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时期的上议院制定为正式的法律，适用于犯下叛国罪或特殊重罪的公民，可剥夺其法律权利及没收财产。其起诉流程与普通公共法案所规定的程序相同，即律师可听取被告人的陈述，被告人也可要求证人在两院（上议院及下议院）为其作证。採用这种议会审判形式最着名的案例是一六四一年对犯下叛国罪的斯特拉特福德伯爵温特沃思〔Wentworth, Earl of Strafford〕的审判，此审判方式自十八世纪以来不再被使用。

21.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代表其思想核心的三大着作被称为「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分别阐述他对知识、伦理及美学的观点，对后世哲学影响极为深远。

22. 瓦伦丁．沃德尼克（Valentin Vodnik, 1758–1819），斯洛维尼亚的诗人，是受西格蒙德·佐伊斯贊助的重要文人，活跃于启蒙时代后期。其作品形式简洁，内容和主题形式也贴合群众，表现浓厚的自由主义氛围及爱国情操；同时在新闻界也颇有影响力，创办了斯洛维尼亚的第一份报纸。

23. 阿尔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 1781–1831），德国民间传说的研究者、戏剧家、诗人和故事写作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团体「海德堡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出版的《少年魔法号角》，收录了农夫、牧人及游唱诗人歷代相传的民谣。

24. 约翰．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德国哲学家，是承继康德之后

德国唯心论的奠基者，同时亦是富有爱国主义的教育家。哲学上提倡「认识论」，并主张「绝对自我」的概念；教育上则提倡从教会手中抢回教育权，由国家控制。一八〇六年拿破崙占领柏林期间，费希特发表了《告德意志国民书》，激发了德国国家主义，被视为德国「国家主义之父」。

25. 例如歌德比较有名的一句话是：「普鲁士人天性残酷，文明之后则会更加凶勐。」（The Prussian is cruel by birth; civilization will make him ferocious.）
26. 出自德语"die Weltseele zu Pferde"，黑格尔在一八〇六年十月十三日的私人信件中，如此描述他见到拿破崙的激动心情。
27. 《发现人民、创造民族—从大众文化到民族国家》，原文见：https://www.lzjscript.com/archives/1550。
28. 物自体（德语：Das Ding an sich），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念。简单而言，物自体就是「事物自身」，然而基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个人经验的影响等等，对于物自身，却又没有办法彻底地了解。
29. 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苏格兰的哲学家、歷史学家。其代表作《人性论》驳斥了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因果关系只是人类习于思考的型态，但并不能说明两者间的关联；反对纯粹理性，主张感情（或说「同情」）亦是道德判断的重要依据，《英国史》则是其史学上的代表作品。
30. 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出生于爱尔兰的英裔哲学家，与休谟、洛克并列为英国经验主义三大代表人物，其代表作《视觉新论》主张「深度知觉」是透过视觉、印象、触觉和运动觉联合起来的结果，故深度知觉必须透过学习产生，其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体现了他对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怀疑，及对经验主义的奉行。
31. 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剧作家华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以日耳曼远古神话故事为主题创作的系列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第一部。
32. 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德国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一七六三年被任命为罗马城的文物总监，并对庞培古城展开挖掘工作，其代表着作为阐述古典美学价值及鑑赏方法的《古代希腊罗马美术史》。
33. 奥古斯特．施莱格尔（A. W. von Schlegel, 1767–1845），德国诗人、翻译家，致力于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成德文，也是欧洲第一位梵文教授；与兄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同为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
34. 哥廷根七君子事件（Göttingen Seven）是指七位于一八三七年抗议汉诺威国王废弃宪法的大学教授，分别是民俗和语言学家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歷史学家达尔曼（Friedrich Dahlmann）、法律学者威廉．阿尔布雷希特（Wilhelm Albrecht）、东方学家埃瓦尔德（Heinrich Ewald）、文学家格维努斯（Georg Gervinus）和物理学家威廉．韦伯（Wilhelm Weber），该七位学者联名签署公开信提出异议，结果全部遭到解职，引发了遍及全德的抗议浪潮。
35. 叶尔奈伊．科皮塔尔（Jernej Kopitar, 1780–1844），斯洛维尼亚的语言学家，致力于古代斯洛维尼亚语的研究，翻译并注解斯洛维尼亚语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佛莱辛手稿》（*Freising manuscripts*）。
36. 《奥地利—匈牙利折衷方案》（*Austro-Hungarian Compromise of 1867*），为奥地利帝国于义大利战争和普奥战争失利后，为避免帝国分裂而与匈牙利王国签订的政治法案。该方案不仅恢復了匈牙利王国的传统地位，也恢復一八四八年匈牙利议会提出的十二点原

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奥匈双元帝国」。

37. 指苏联末代主席及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鲍利斯．叶尔钦（Boris Yeltsin, 1831–2007）。叶尔钦是个充满争议的政治人物，西方国家大多数对其赞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俄罗斯左派、大多数俄罗斯民众，甚至一些前苏联异见人士则认为他是俄罗斯的民族罪人。
38. 哈布斯堡帝国的「铁环内阁」（Iron Ring, Taaffe’s cabinet），为奥匈帝国的爱德华．塔菲伯爵（Eduard Taaffe, 11th Viscount Taaffe）于一八六七到一八七九年所领导的保守派内阁，在其执政期间企图成立有别于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王国」，但遭到德国和捷克的自由主义者反对而失败，最终于一八七九年解散。
39. 泛日耳曼民族党（Pan–German Party），十九世纪下半叶于奥地利兴起的泛日耳曼主义政党，创建者为奥地利政治家乔治．里特．冯．舍纳尔（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 1842–1921），主张奥地利帝国及德意志帝国应该合併为一个所有日耳曼人的「大民族国家」。
40. 在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卡德摩斯（Cadmus）遵循神谕，前往希腊半岛中部的彼奥提亚（Boeotia）修建卡德摩亚堡。在建堡之前，他和巨龙交战，将其杀死后，遵循雅典娜的劝告，拔下巨龙的牙齿播入土地，之后生长出一些全副武装的武士「斯帕托斯」（Spartoi）。这些武士在自相残杀后只剩下五人，他们帮助卡德摩斯成功建立了卡德摩亚堡并成为底比斯（Thebes）城邦的始祖。
41. 「远古邪恶」为二〇一〇年代初起源于中国网路「豆瓣网」的知识分子沙龙，本书作者刘仲敬也是其中成员。
42. 指拿破崙战争期间的耶拿战役（Battle of Jena-Auerstedt, 1806）和奥斯特里茨战役（Battle of Austerlitz, 1805），拿破崙于这两场战役分别击败普鲁士军队及奥地利–俄罗斯联军，促使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拿破崙成为欧洲霸主。

从封建体系到民族国家

以中印边境冲突为例

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是中印的边境冲突[1]。在这次边境冲突中，双方都引用歷史依据来为自己的现实政治诉求提供帮助，但是一般的读者可能不能理解歷史依据的复杂性，因为不丹这个政治实体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民族国家是有重大差异的。任何语言本身都具有歧义性，也就是说，一个名词可以有狭义的解释，也可以有广义的解释，而汉语的模糊性更大，所以「国家」这个词可以解释成为一个拥有政治权利的政治实体，也可以解释成为一个NATION，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拥有主权、完整领土和明确边界的国家。按照前一种定义，不丹当然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政治实体；按照后一种定义，不丹其实不是一个NATION，不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民族国家。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冲突发生在西藏、不丹和锡金[2]三者的交界点上、但却是印度军队出现在这个地方。中国读者若按照近代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推广的那种歷史教育，很可能会以为是印度人侵略不丹，并将不丹当作自己的附庸国来对待，否则为什么发生冲突时，不是中国军队和不丹军队出现，却是印度军队和不丹军队同时出现？

回顾近代以前的人类歷史，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时间的政治制度是现在所谓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之下是没有民族国家和明确边界这些事情的。我们可以说，封建制度比起近代民族国家制度，其实更接近自发秩序，因此它的权利关系有更大的灵活性，权利安排也更加个人化；但在近代民族国家而言，各国拥有主权和明确的领土边境，在这条边境之内，主权国家的权利被认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离边界线一公分的地方，两者之间的权利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权利是按照成文法的方式规定的。国际法包括国际条约，国际条约也是成文的。国际条约当中通常包括两个邻国之间对两国边界的共识，边界这一边的土地比如说属于中国，另一边属于印度。哪怕是只差十公尺，中国的权利都是无可争议和绝对的；十公尺之外，印度的权利就是无可争议和绝对的。

但是这样的安排在西发利亚体系[3]之前的欧洲或全世界任何地方，

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封建主义的安排。封建主义的安排是个人化的私人权利，也就是说，私人契约取代公共领域。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公共领域当时尚未出现，所有的权利都是私人和私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例如，某某武士很能打，而某某学者的威望很高，那么他们之间可以达成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协定：需要打仗的时候，学者可以要求武士的保护；而武士需要让他的孩子受教育的时候，可以要求学者负责对他的孩子进行教育。那么这样一个协定，假如在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这样的公共权力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契约其实就是一个封建契约。比如说封建领主跟农民的契约就是，农民出一部分的粮食给封建领主，封建领主在农民遇上危险的时候对农民实施安全保障。封建领主跟教士的关系，就跟我刚刚说的跟学者的关系差不多。教士对封建领主提供合法性的支援、提供文化教育，而封建领主对教士提供武力的保护。

领主和领主之间也是多层次的。战斗力比较强的领主就可以有很多附庸，那些附庸也是小的领主。小的领主需要保护的时候，就要求助于比他更善战的、更大的领主。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单向的，甚至可能是循环的。也就是说，一个领主可以有很多个不同的保护人，不同的保护人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平行的、完全平等的，也许相互之间也有别的保护和附庸的协定。但是这无关紧要，他们之间产生作用的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一个契约。实际上可能出现这样的循环状态：张三是李四的领主，李四是王五的领主，但是王五同时又是张三的领主。这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但在封建体系之下是经常出现的。

十七世纪以前的不丹无疑就是这样一个领主政治实体。不丹国家体制的产生，跟十六、十七世纪之间藏传佛教和蒙古封建体系的成熟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它被捲入了这个封建体系当中。近代西藏和藏传佛教文化所笼罩的这个地区，包括今天印度的一部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这一系列小国和蒙古人统治的广大地区，它们不是像现代民族国家那样通过一个条约和谈判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长期的自发演变建立起来的。大体上就是说，不丹的封建领主一方面跟远及孟加拉的印度各领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宗藩关系，另一方面又跟达赖喇嘛属下的西藏各寺院、各领主以及负责保卫达赖喇嘛的蒙古封建领主有着各种各样的契约。在十七世纪达赖五世[4]当政、康熙皇帝当政的那个时期，不丹人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协定是：不丹人定期向达赖喇嘛交付一些亚热带产品，包括稻米在内，并取得了在西藏境内拥有一些封建庄园和封建领地的权利，同时

不丹本身的佛教僧侣也可以到西藏去朝圣，或者是学习藏传佛教的经典文献。

这一些条件都是私人性质的，并不会妨碍不丹本身跟锡金（当时称为哲孟雄[5]），或者达赖喇嘛的另一些封建附庸（比如说门巴人[6]）发生冲突、仲裁解决不了的时候要使用武力。从理论上讲，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宗教权威，像欧洲的罗马教廷一样，经常被他的各种藩属邀请出来调停他们之间的纠纷，包括领土纠纷；但在调停不下的时候，也可能武力解决。这时候，藏军甚至是蒙古军队或者满洲军队就会出现了。最先出现的是蒙古军队。在不丹人、门巴人和哲孟雄人发生的几次冲突（这些冲突包括现在发生冲突的那个地点，也就是春丕谷（Chumbi Valley），哲孟雄和不丹的交界地带）当中，双方在达赖喇嘛无法调停的时候，最后各方就兵戎相见。达赖喇嘛派来一支藏军和一些蒙古人的军队，而不丹人的领主则停止向达赖喇嘛提供稻米。这些冲突的性质都不严重，在十七世纪反反覆覆发生过很多次。解决以后，双方大体就恢復到原来的地位。

哲孟雄、尼泊尔（当时称为廓尔喀）和不丹都要向拉萨交纳贡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它们是西藏的藩属国。但是我们要注意，当时是远及孟加拉的穆斯林王公都在向达赖喇嘛交钱，而这些交的钱和物资或者土特产之类的东西在法律上的解释是很成问题的。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贡品，那就是证明这些封建王公是西藏的藩属，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施主对佛教寺院的一种施捨，若按照这种方式解释的话，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平等性质的。尽管他们给达赖喇嘛送礼，但是这只是说明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德高望重值得尊敬，并不能证明他们承认自己的领土是受制于达赖喇嘛的。甚至是在英国人占领了孟加拉以后，英国驻孟加拉的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也干过跟穆斯林王公一样的事情，他也派代表去过西藏，给过达赖喇嘛一些土特产[7]。如果西藏人的歷史解释方法像现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中国歷史的解释方法那样，那么西藏人就可以说「孟加拉自古以来都属于西藏，尼泊尔、哲孟雄和不丹自古以来都属于西藏」，但这其实是个建构方法的问题。

近代的民族国家在企图建立的过程中间，为了确定它自己对边界的所有权，通常都会把歷史上的封建关系解释成为自己的绝对统治权，但这一点通常得不到邻国之间的认可。最后，像欧洲，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也好，波兰的加利西亚（Galicia）边境和西里西亚

（Silesia）边境也好，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和外交才稳定下来，达成所有各方都能同意的解决方法。而不丹、锡金和西藏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亚洲歷史的发展比欧洲更晚。西发利亚体系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开始确定，到凡尔赛条约，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确立；而在亚洲，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引进。因此，西藏本身、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之间的封建权利，应该怎样转变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键就是，相邻的两个大国，印度和中国，自身的民族国家转型都是很成问题的。它们都继承过去英印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帝国结构，而帝国结构本身不是民族国家的结构，它包含着多重的宗藩关系。像印度，既有英国人的直辖领地，又有很多土邦，各土邦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它们彼此之间还有多重的宗藩关系，它们跟英国女王和英国驻德里的印度总督或副王之间的关系也是各有各的特殊条约，也就是高度个人化的条约。例如，孟加拉是英印帝国的属地，但是孟加拉同时又是不丹的藩属。不丹人在中国的清朝时期曾经一再对孟加拉发动战争，战争的结果一般是孟加拉人向不丹人送礼，换取不丹人结束战争；而同时，孟加拉人和不丹人都在给拉萨的达赖和班禅喇嘛送礼，有时还要求班禅喇嘛仲裁他们之间的纠纷。那么这就等于说，不丹也好，锡金也好，尼泊尔也好，孟加拉也好，它们都同时跟英国女王和印度皇帝有宗藩关系，同时又跟西藏的达赖喇嘛有宗藩关系，而西藏的达赖喇嘛又同时跟蒙古的从俺答汗[8]以来的各位可汗以及从康熙皇帝以后的各位满洲皇帝之间有着多重的宗藩关系。

这些关系都是可以有很大的随意解释的余地的，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佛教意义上的施主和僧侣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称臣和进贡的关系。那么这个边界怎么划呢？你可以说，不丹和孟加拉都是西藏的藩属，应该把西藏发明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然后把这些地方都发明成为西藏领土；也可以说，印度应该发明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印度继承英印帝国的所有条约权利，那么不丹也好，西藏也好，锡金也好，最后都要变成印度的领土。中国方面当然也可以——不是可以，而是已经根据歷史上的这些封建关系，宣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清帝国的领土，因此也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像春丕谷地这个地方，在封建时代是有多重归属关系的，哲孟雄的王公、不丹的王公、英印帝国的官员和西藏的僧侣在当地都是有庄园的。这些庄园，你可以把

它解释成为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当地这些官员和领主自己购买的私有财产，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封建主义之下的藩属关系。

同时，这些宗藩关系是相互缠绕的。像不丹人在跟尼泊尔人和孟加拉人发生纠纷的时候，他如果是不接受达赖喇嘛提出的仲裁，那么他就要面临封建制度之下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情况：他本身在达赖喇嘛的直辖领地——在拉萨附近也有很多封建庄园，如果他不服从达赖喇嘛的仲裁，达赖喇嘛实际上是可以根据领主的权利，没收不丹王公在锡金的庄园，作为惩罚不丹王公的手段。实际上，这种事情在英法百年战争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几次。当时，英格兰国王因为领有法国西南部地区加斯科涅（Gascony）的封建领地，所以是法兰西国王的藩属；但是英格兰国王在英格兰本地的领地并不是法兰西国王的藩属。同时，苏格兰的国王因为领有英格兰的某些封建领地，变成英格兰国王的藩属；而且苏格兰又通过外交关系，是法兰西国王的盟友。结果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发生外交纠纷的时候，法兰西国王可以通过没收英格兰国王在加斯科涅的领地，从而保护他在苏格兰的盟友，对英格兰施加压力——尽管苏格兰国王为了不放弃他在英格兰的领地，仍然要对英格兰国王效忠。

这样复杂的关系，比起现代民族国家那种两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从理论上讲都要派出级别相等的外交人员相互交涉的情况来说，要复杂而困难得多。所以，封建关系转化为现代民族关系，要把模糊不清、交错纵横的封建领地划分成为明确的边界，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过程。我们要先确定这个基本前提，然后才能理解，围绕着不丹和西藏的这一系列交涉，无法简单地像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耻教育[9]那样说成是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或者说是近代殖民主义之下中国的丧权辱国，或者说是印度人对不丹的侵略或者对中国的侵略，或者说是西方帝国主义恶意地企图通过西藏问题分裂中国的图谋。这些解释方法其实都是用事后的观念来套以前的事情。在达赖五世和不丹王公发生纠纷的时候，在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的时代，谁都没有领土国家的观念，谁都不认为边界一侧和边界另一侧有着天差地别的差别。不丹王公在他自己的直辖领地之内有西藏僧侣的避暑地和封建庄园，他在西藏境内也有自己的封建庄园。

而春丕谷地这个交错地带，你说它是英印帝国的领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英印帝国的一个避暑胜地和商埠要地，是英印帝国官员购置土地和财产的地方。它在英印帝国歷史上的重要性跟大吉岭

（Darjeeling）差不多，英印帝国没有必要放弃它继承下来的这些封建权利。同时，不丹本身也是英印帝国的一个藩属。它在相当于清朝中叶（也就是十八世纪中期）的时期发生封建纠纷的时候，不丹这一派要求班禅喇嘛出面干涉，而另一派要求英印帝国出面干涉。最后是，班禅喇嘛拒绝支持，而英印帝国出面干涉了。后来的不丹王室接受英印帝国的仲裁权，也跟英印帝国签署条约。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不丹跟西藏发生类似的封建纠纷（Civil conflict）的时候，英国人又跟不丹签署了《普纳卡条约》（*Treaty of Punakha*，1910），规定不丹的外交由英国人负责指导，不丹的安全也由英印帝国负责保护。也就是说，如果清帝国或者西藏人想要欺负不丹的时候，英印帝国有义务保护不丹。英印帝国撤退以后，印度变成了英印帝国在法律上的继承者。也就是说，印度实际上是继承了很多封建权利，其中包括它对锡金和不丹实施保护。锡金和不丹如果对外发生冲突的时候，印度军队有义务出兵。这就是这次印度出兵的法理依据。同时，它也在西藏本地继承英印帝国在西藏境内的一些通商权和庄园的保护权。

这样的权利，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宣称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容许自己境内有任何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理论是相矛盾的。但是这个宣称仅仅是宣称而已。例如在西藏边境一带，中国外交部所谓的「传统习惯线」，实际上不是一条简简单单的线，而是一个分层次的、像千层饼一样的网路结构。它涉及的东西不是一条边界，而是百纳被[10]式的无数条边界，把无数个小封建领地拆分开来。这些封建领地一般对西藏来说都有一定的进贡义务，但对印度也同样有一些进贡义务，但是这些进贡义务和封建权利的深浅程度是不一样的。锡金是比较弱的，它的依附性比较强，封建义务也比较多，尼泊尔和不丹则相对更大一些。所以，尼泊尔现在获得一种近乎是主权国家的权利，不丹仍然沿用英印帝国和不丹签署的那种保护性的、外交受印度指导的权利，而锡金就干脆被印度吞併，变成印度联邦当中的一个邦。

中国和印度之间达成过一系列相当于君子协定的外交斡旋，这些外交斡旋的性质类似于一九三〇年代，日本和俄国在满洲问题上达成的交换性协议：中国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而印度则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清末以来，大清帝国企图用民族国家的外交逻辑来解决内亚边疆问题的长期进程的一环，这不是个一刀切的过程。清帝国在早期跟英国人发生交涉的时候，并不能够明确区别像西藏这样的领

地和像缅甸这样的藩属国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清朝的主管官员经常是出于怕事或者省事的目的，对像拉达克（Ladakh）[11]或者是像尼泊尔之类的事务不加干涉。在尼泊尔跟英国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嘉庆皇帝和他的继承者都一直主张，夷人和夷人之间发生冲突，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多管闲事。把他们的事情放到我们自己的议事日程上面，劳师伤财，这对我们大清来说根本谈不上是有利。当地官员如果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拒绝尼泊尔要求清朝干预的图谋，是会得到皇帝奖赏的[12]。

这个态度真正发生改变，还是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一九五〇年庚子拳乱以后。甲午战争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清朝在朝鲜由明清时期延续下来的这种宗藩关系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交涉过程中出现严重问题，结果清朝、韩国和日本之间对过去的封建关系的解释发生了严重冲突，最后像欧洲一样，通过战争方式来进行解决。解决的结果是，朝鲜人由大清藩属的王国变成跟大清皇帝平起平坐的大韩帝国，由朝鲜国王改成大韩帝国的皇帝，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大清的外交部门感到自己在东方受到了损失，就企图在西方获得补偿，于是就企图在内亚方面收回它在东部沿海地带遭到的损失。所以从此以后，清朝的外交部门在跟西方外交部门发生交涉的时候，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策，而是尽可能地把歷史上的宗藩关系都解释成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个解释方法是它单方面的要求，英国方面的外交部门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仍然坚持，清朝和清朝的继承者在西藏方面只享有宗主国的权利，并不享有领土主权。宗主国的权利是一种非常松散的关系，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象徵性的。因此尽管双方都提出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权利诉求，实际上在真正要实施能够执行的外交方略的时候，必须得把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召集起来开会。例如像清朝末年的清英藏三方协商和中华民国初年的中英藏三方会议[13]，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歷史遗留问题。英国人的政策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搁置歷史遗留问题。无论西藏、不丹这些地方的法理地位是什么样的，他们希望原有各方实际上已经享受到的各种权利都沿袭不变，在各方都尊重原有权利的情况下，该做生意的继续做生意，该收地租的继续收地租。如果有任何一方想要变更原来封建时代的现状，那么大英帝国和英印帝国政府要求它首先跟英国人商量。不经英国人的同意，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单方面地改变现状。

而清朝自一九〇五年清末新政以后，开始企图把大清帝国解释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继承清朝的中华民国也企图继承清朝外交部门最后这段时间的权利诉求，因此对英国人这方面的要求采取不予承认的态度。之所以采取不予承认的态度，就是因为它希望采取改变现状的措施，改变现状则意味着对西南边疆的各封建领主、土司之类的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像赵尔丰把川军派到西藏，就是这一措施的具体体现，意图就是在武力威胁之下，强迫西藏的僧侣和封建领主承认他们跟大清皇帝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从属性的关系，因此西藏的外交和领土都应该由大清帝国代管。但是这些措施导致达赖喇嘛的出逃，使西藏问题更加难以解决[14]。辛亥革命以后，川军瓦解，四川宣布独立，川军急于回四川参加革命，结果导致了驻西藏的川军完全瓦解，残余的川军经过英属印度，从海道回国，而达赖喇嘛又从他在印度的避难所回到西藏。

之后，达赖喇嘛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就很像是甲午战争以后清朝跟日本的关系一样：清朝原本坚持封建主义的国际体系，但被日本人打败后，就开始效法日本，把内部的封建结构改组为近代民族国家，具体就是体现在对西藏和内亚其他各邦加强权力；西藏也是这样的，西藏最初跟清朝和英印帝国发生关系的时候，也是非常坚持自己那种中世纪的封建体系，不愿意接受近代民族国家的关系，但是自从被赵尔丰的川军打败后，他们才承认，原本那种封建体系过于松散，抵抗不了清朝方面的压力，于是达赖回国以后，就开始在西藏采取类似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清朝的清末改良主义运动的类似措施。这些措施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企图把封建主义重新解释为民族国家，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削弱封建领主的权力。

但是达赖在这方面的改革其实是不彻底的。一直到一九五二年，西藏都只有几千名军队，远远没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强大海陆军体系，也不及清末新政后袁世凯建立的北洋军那么强大，这是西藏在一九五二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谈判时，处于极端不利地位的一个根本原因。西藏缺乏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作为自己的谈判筹码。尽管英国人要求各方，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打算深入干涉西藏的局势。也就是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兵进驻西藏的时候，它不能指望英国人的军事援助，也不能指望大英帝国的继承者──印度的军事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能够对歷史上的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实施有效控制、而且声称自己是西藏主权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根本原

因。而印度的外交部门为了换取中国对锡金问题的承认，实际上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只是根据民主国家保护政治流亡者的公约，允许西藏流亡者在印度获得安全保障。但是这并不表明印度支持西藏流亡者，或承认「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主权国家，要求中国退出西藏」的诉求。这种诉求会使印度捲入把西藏从中国占领之下分割出来的军事义务，而这个义务是印度目前不愿意承担的。

但是春丕谷地的问题就不是这样了。春丕谷地是位于一个三角地带，位于锡金、不丹和西藏三者之间的三角地带。当地的文化无疑是受藏文化的深刻影响的，但是歷史上看，当地的封建领主一般来说是更多地承认英印帝国的封建权利，而英印帝国在当地实施有效治理和近代化建设的程度是远远超过西藏当局的。因此即使不丹人像尼泊尔人一样获得了完整的国家主权，可以主导自己的外交，它也非常不可能放弃这片对它来说相当重要，而且早在达赖五世时代，就已经被达赖承认是不丹享有的封建领地的地区。所以，印度目前代替不丹出头，并不是很多中国读者所设想的那样，是印度对不丹的侵略，假如不丹获得完整的国家主权以后，不丹的立场就会完全不一样。

实际上，不丹如果像尼泊尔一样获得了完整的国家主权，它很可能会採取比印度更加激进的边界政策。印度领土广大，对这块地方可能并不是很重视；而不丹的领土狭窄，这块地方对它的重要性比对印度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印度在其他地方──例如在中亚、东南亚也继承英印帝国的很多遗产，它为了在其他方面的利益，有可能把这块土地的利益当作可以交换的筹码，就像它拿锡金和西藏两个问题相互交换一样；但是对于不丹来说，它没有任何可以交换的筹码，所以它对这块地方的要求多半会更加强硬、更加不能妥协。类似的情况，你就可以从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的帕米尔边界问题看出。俄罗斯帝国和清朝之间长期以来在这些地方的领土纠纷，性质上很接近于春丕谷地的纠纷，但是俄罗斯帝国拥有广大的领土，有很多可交易的专案，所以它在这方面的立场是比较模煳的；苏联继承俄罗斯帝国以后，实际上像是印度继承大英帝国以后一样，是强化、而不是弱化它对这些地方的权利要求；而塔吉克斯坦在苏联解体、自己独立以后，它对这方面的权利要求又比过去的苏联更加强硬。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跟塔吉克斯坦进行权利交涉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起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面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时候做出更多的领土让步[15]。

弔诡的是，假如维吾尔人像塔吉克人从俄罗斯和苏联获得独立一样从大清帝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独立，那么塔吉克人可能会更吃亏，因为我们假设的这个维吾尔国家跟已经存在的塔吉克斯坦国家、假定可能存在的完整主权的不丹国家一样，它的领土更小一些，利益更单纯一些，更承受不起损失。一个假定的维吾尔国家很可能会觉得，帕米尔山谷对它的安全是非常有必要的，损失这块领土对它来说是承受不起的。但是，损失这块领土对于大清帝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承受得起的、也不在乎的。大清帝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利益不是在于在塔吉克斯坦边境多得或者少得一块领土，而是要防止维吾尔人和西藏人从大清帝国的歷史遗产中间独立出去。因此，如果塔吉克人和俄罗斯帝国或苏联愿意帮助大清帝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制维吾尔人的独立运动的话，实际上这些帝国继承人都会比较愿意在领土上做出让步。而维吾尔人如果获得独立，它在领土问题上就会寸步不让。

西藏方面也是这样。春丕谷地可以说是跟四川的利益毫无关系，跟广东的利益也毫无关系，但是对于西藏人的利益来说就关系很大。假如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它在春丕谷地是寸步不能让的，不仅它对春丕谷地有歷史权利，它对不丹和锡金本身也有歷史权利。它可以说，达赖喇嘛完全有权利要求直到孟加拉湾的领土主权，它容许不丹独立已经是大慈大悲，根本没有理由出让春丕谷地的封建权利。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防止西藏独立，会认为防止西藏独立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而在西藏的边境上多增一块领土或者少增一块领土是非常次要的利益。因此它很可能会认为，只要印度人或者不丹人愿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愿意帮助他们对流亡不丹和印度的西藏流亡者多压一把的话，它就很容易在边境问题上做出让步，愿意出让比西藏人本身愿意出让的更多的利益。由于这方面的弔诡因素，所以实际上，继承大清帝国疆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亚边疆问题上、在单纯的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程度，比起像塔吉克斯坦或者尼泊尔这样的比较接近于民族国家的小型国家来说的话，愿意做出的让步实际上是更多的。因此，印度外交部门实际上是完全可以通过牺牲西藏流亡者的利益，来换取它在边界上的更多的有利地位。

有很多中国国内的网民，或者说是比较狂热的、通常被称为「皇汉」的种族主义分子经常说，中国共产党是黄俄势力，并不真正代表中

国，诸如此类的，因此愿意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去讨好外国。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这个依据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有什么主观恶意，而是说，中国共产党既然已经继承了从大清帝国以来的这个帝国结构，它为了维持这个帝国结构，就必须做出相应的牺牲。其他人如果继承了相应的帝国遗产，也是必须做类似牺牲的。国民党在这方面并不例外。国民党最初也是极端反对大清帝国的这个歷史边疆的，它认为满洲蒙古都不是真正的中国，只有明朝留下的十八省才是这样的中国，它在建国过程中间曾经多次许诺，如果能够建立起山海关内的中华民国，它会很高兴地把满洲送给日本的；但是等到它最后北伐成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它就开始像过去的北洋政府一样，要求继承大清帝国的歷史边疆了[16]。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搆，它不仅在一九三六年明确支持朝鲜和台湾的独立，而且在它革命的过程当中曾经多次把西藏称为外国。像毛泽东在回忆长征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们拿了藏人的一些粮食，这是我们对外国人欠下的唯一债务」[17]。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国民党要求继承大清帝国歷史遗产的企图的，它在每一次西藏人和国民政府发生冲突的时候都通电支持西藏人。但是在它有希望打倒国民党以后，也就完全把过去自己曾经多次支持西藏独立和大清帝国遗产解散的歷史承诺抛在脑后，也拿起了国民政府过去的衣钵，要求大清帝国留下的所有领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跟苏联决裂以后，在继承共产国际的民族理论已经没有前途以后，它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北洋政府在一九二〇年代和国民政府在一九四〇年代的国家建构理想──所谓的建立一个由多民族复合的中华民族。

我们从歷史上看，这种民族建构方式实际上是跟斯托雷平时代的斯拉夫主义和恩维尔帕夏时代的奥斯曼主义非常相似的建构方式。这种建构方式在班纳迪克．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当中被称为「官方民族主义」[18]，但是它实际上不是「官方民族主义」，而是「帝国假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产生本身就是在各地方性族群解构帝国、瓦解帝国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官方民族主义」或者帝国民族主义（例如奥斯曼主义）的特点就是，要求把帝国边境之内的各个族群重新发明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这样的困难当然很大。波兰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建立，就是要把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所有讲波兰语的居民统一起来，瓦解这些帝国，建立一个以语言族群为基础的波兰民族国

家。

这样的民族国家的逻辑如果推行的话，那么歷史上继承下来的那些多元帝国，无论是神圣罗马帝国、大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是清帝国，都注定会解体，解体成为一系列类似波兰的民族国家。这个逻辑如果运用到奥斯曼帝国当中，那就是土耳其人、叙利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各自分别建国；运用到俄罗斯境内就是，不仅波兰人要建国，而且乌克兰人也要建国，甚至是大俄罗斯本部的像弗拉基米尔（Vladimir）或者诺夫哥罗德（Novgorod）这样的歷史邦国也可以解散俄罗斯帝国，把自己重新恢復为古代的多国体系；如果放在大清帝国的境内，那么不仅满洲、蒙古、突厥、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像波兰和乌克兰一样建国，就是大明朝的十八省，也完全可以像孔子时代那样建立诸夏的多国体系。实际上，这就是凯末尔主义[19]的路线。

这样建立多国体系的好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每一个小民族国家自身都能够变成像波兰和法国那样的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它加入欧洲的西发利亚体系是一点困难都没有的；但如果保留了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或者大清帝国这样的边疆，那你就没有办法加入欧洲国际体系了。一个俄罗斯或者一个奥斯曼的体量就相当于是整个欧洲联盟，如果它加入了整个欧洲联盟，那么欧洲联盟还能是欧洲么？但是相反，波兰人如果不强调自己斯拉夫人的出身，而强调自己的欧洲性，把波兰人发明成为一个欧洲民族国家，那它加入欧盟就没有任何困难了。同样，乌克兰人如果加入了普京的欧亚联盟[20]，它就没有希望加入欧盟了；如果脱离了普京的欧亚联盟，甚至让克里米亚或者东部这些讲俄语的地方独立，那么它将来像波兰一样加入欧盟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东亚的问题，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它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时间表，比起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晚了几十年甚至是一百多年，所以围绕着不丹和西藏边境这些领土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不是对应于现代波兰和乌克兰的冲突，而是对应于十九世纪末期神圣罗马帝国解体过程当中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边境的冲突。奥斯曼帝国自称是匈牙利王国的继承者，哈布斯堡帝国也自称是匈牙利王国的继承者，它们各自割取了旧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土地，而这些土地上的主要居民偏偏又是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这样做就是，两个超民族的大帝国之间的领土要求，匈牙利王国这个地方性邦国的领土要求，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这些没有自己民族国家的语言族群的建国要求，三方

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正是目前不丹边境发生的事情的实况。

尼泊尔和不丹都是像歷史上的匈牙利邦国那样，本身是地方性邦国而不是超级帝国，没有帝国的野心，但是它自身之内也有多族群，因此很难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同时它自身也受到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帝国继承人的保护、没有完整的外交权利的邦国；而西藏人、门巴人、廓尔喀人、泰米尔人这样的歷史族群，则变成没有国家的族群。泰米尔人和锡金人在印度的联邦制国家之内还可以部分地实现自己的民族要求，因为它虽然不是独立的国家、加泰隆尼亚那样的准国家或者是像香港和歷史上的佛兰德领地这样的部分主权实体，但是它至少是联邦制度之下的一个邦，可以独立地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可以满足自己部分的民族要求；而西藏呢，在中国的体制之内，连这样的部分的权利都得不到。从这些族群的观点来看，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跟过去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冲突一样，跟他们的利益是不相干的，而且都会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例如在边界划分的时候把同一个语言的族群一部分划分在中国、一部分划分在印度；而对于不丹这样的类似匈牙利王国的小邦来说的话，它自身是一个多族群的实体，所以它不可能建立像波兰或者罗马尼亚这样的近代民族国家，它的选择余地就仅仅是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帝国结构当中选择比较尊重它歷史权利的一方。

例如，匈牙利王国就肯定会选择哈布斯堡帝国，因为哈布斯堡帝国一方面是比较先进的欧洲人，另一方面对歷史上的封建权利比较尊重；而奥斯曼帝国则更有可能推行中央集权的改革，毁掉歷史上的封建权利。不丹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它是宁可选择英印帝国和印度联邦的，因为英印帝国和印度联邦对歷史上的封建权利的尊重性比较多，它们虽然也要对不丹实施保护的权利，不容许不丹跟印度或者英印帝国平起平坐，但是它对不丹的要求不多，不丹被它吞併的可能性也比较小；相比之下，中国对印度的要求就要苛刻得多，中国共产党政权比起承认诸多封建权利的英印帝国和保留了联邦制度的印度共和国来说的话，中央集权的程度是更高的，更不能容忍西藏原有的封建权利和西藏歷史文化的特殊性。所以不丹人在比较了一下西藏在中国的待遇和锡金在印度的待遇以后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不丹宁可维持跟印度的传统关系，也不愿意变成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然后失去印度的保护，面临着中国方面的压力。

当然，这只是歷史长期进程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巴尔干半岛的冲

突，跟现在西藏高原和不丹亚热带丛林之间的冲突在性质是一样的。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实际上所有的大帝国都解体了，所有像不丹和匈牙利王国这样的歷史性邦国也都瓦解了。东欧和巴尔干半岛都按照语言民族和小民族主义的原则重新划分了边界，所以现在欧盟才能够顺利扩展到东欧和巴尔干半岛。而俄罗斯和土耳其还处在这个过程的中间阶段，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界仍然划不清，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冲突仍然是如火如荼。库尔德人仍然像歷史上的波兰人一样，被分划在几国当中，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都继承了部分的帝国遗产，所以导致库尔德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今天普京的俄罗斯和埃尔多安的土耳其，等于是，跟过去斯托雷平的俄罗斯和恩维尔的土耳其相比，已经在帝国解体的过程中间走了一半。因此，它们的西部边境，像是面对欧洲这个方向的边境，例如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边境，已经没有问题了；只有在东部，面对亚洲的那个方向，帝国转化为民族国家的过程还没有走完，因此才会有现在的克里米亚纠纷，才会有中亚各国—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之间的纠纷。

而在最东方，就是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三角地带，也就是西方学者通常所谓的内亚地区，则是帝国遗产保留得最完整的地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国家建构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像日本或韩国那样的民主国家，都是在民族共同体的问题得以解决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你只要是继承了过去的帝国遗产，你的国内的族群结构如此复杂，就使你没有办法实现民主。所以，不丹在西藏边境的这些冲突现在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和印度双方在解决这个冲突的过程中间，都不会像是波兰这样的民族国家那样把划清边界、尽可能地使边界跟民族边界相一致看成是主要的目的，而是会尽可能地使边界不符合族群分布，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帝国遗产。如果实在是做不到，宁可保持现状和保持模糊，也不要让自己境内的各个亚国家实体产生独立的愿望、发明自己的「民族利益」。因此在这个基本盘之内，它们双方都会把维持帝国遗产当作自己主要的国家利益，把划清边界当作极其次要的利益。

因此可以断定，在短期之内的话，双方都不会採取太激进的措施，太激进的措施很容易使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相互勾连，导致帝国遗产的最终解体；但是如果从长时段来看，国家建构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迟早还会引起新的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和共产国际的继

承者，将来早晚都逃不了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苏联曾经面对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期望中国能够走向现代化、文明化、民主化道路的人士，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他们的诉求最终还是会无法实现的。

---

1. 二〇一七年中印边境冲突（2017 China India border standoff，2017年6月16日至8月28日），或称洞朗冲突（Doklam standoff），因边境主权归属问题，中国与印度双方军队，在中印及不丹三国边境交界处的洞朗地区进行长达二个月的军事对峙。
2. 锡金（Sikkim）位于印度边境，北接中国，东邻不丹，西面尼泊尔，曾为独立的世袭君主国，又称锡金王国，在一九七五年举行公民投票，通过废除君主制，并于同年加入印度，成为印度的第二十二个邦。
3. 西发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以结束一六一八年至一六四八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的西发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为基础，随着欧洲影响力而影响全世界的近代国际秩序体系，核心原则为承认交战各国主权存在及相互平等。
4. 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1617–1682），又称「伟大的五世」，在位期间结束西藏分裂局面，建立统一的政权，并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
5. 哲孟雄（Dremojong），锡金王国的藏语古称，意思为「稻米」或「米谷」。
6. 门巴人（Monpa people），居住于中印边界的少数民族，自十七世纪以来，门巴人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为主流宗教，与西藏拉萨政权缔结各种政治关系。
7. 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于一七七三年任英属印度总督时击败不丹后，隔年派遣乔治．柏格尔（George Bogle）率使团出使西藏商讨善后事宜，并进献水晶宝瓶等礼物。
8. 刘仲敬的相关评论如下：「蒙古可汗和西藏教宗一五七八在青海湖南岸的会谈酷似查理曼皇帝和利奥教皇的会见，奠定了近代蒙藏关系的基础。俺答汗尊格鲁派上师为达赖，达赖尊可汗为转轮王。蒙古人扮演了日耳曼蛮族的角色，以其武力保护教会。近代以来，俄罗斯人和满洲人加入了蒙古人的行列。」
9. 刘仲敬的相关评论如下：「近代所谓的殖民主义和国耻，意味着欧洲贵族接替内亚贵族，继续统治东亚的殖民地。而东亚作为殖民地的歷史，从殷商沿着太行山南下到洛阳开始，从鲜卑人、蒙古人、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南下以来，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始终是被殖民的地方。直到西方殖民者撤退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接替西方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的地位，东亚人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他们始终是被殖民者，只不过他们的殖民者换了人，从内亚换成东北亚人，然后又从东北亚人换成欧洲人和日本人，最后换成俄国人和共产国际。为什么蒙古人、满洲人和共产国际都需要大一统主义或者中华民族这个意识形态呢？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为外来殖民者统治东亚而准备的。」详见《满洲国：从高句丽、辽金、清帝国到二十世纪，一部歷史和民族发明》。
10. 用不同布块拼接、缝制而成的薄被。
11. 拉达克（Ladakh）位于喀什米尔山区东南部，现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带。
12. 在一八一四年英尼廓尔喀战争（Gorkha War）爆发后，尼泊尔向清廷求援遭拒，嘉庆帝下旨称：「披楞（英国）在廓尔喀西南，与唐古特（西藏）不通闻问，素无仇隙，岂有越境远来与唐古特构衅之理。自系廓尔喀与披楞连年争斗，求助天朝屡干驳饬，是以

妄言耸听，希图赏赐金银，遂其私愿。所言实不可信。瑚图礼（驻藏大臣）等缮檄驳斥，所办甚是。」

13. 即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会议（Simla conference）。
14. 一九〇六年，赵尔丰（1945–1911）任川滇边务大臣，于西藏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遭到强烈反弹及抵制，便以武力强行镇压。一九一〇年川军进入拉萨，于拉萨大昭寺枪杀僧众多人，当晚达赖喇嘛十三世出走印度。
15.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清国和中华民国均声称拥有帕米尔地区主权，但并未得到其他利害关系方尤其是俄、英两国认可。一八八四年俄清《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从乌孜别里山口往南，「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帕米尔高原大部分地区为归属待议区。一八九一年后，俄国实际控制这一地区。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继承此地区的领土主张。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分别于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二年签署《中塔国界协定》和《中塔国界补充协定》，并于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最终签订《中塔国界线勘界议定书》。依约，中国放弃二点八万平方公里，约占争议领土百分之九十六的比例，塔国则同意将萨雷阔勒岭以北一一五八平方公里土地划入中国，约占争议地区百分之四。
16. 据内田良平回忆，早在一八九八年，孙文就曾向其表示：「吾人之目的原在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孙文在辛亥革命前流亡日本时，亦多次阐明「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故日本亟应援助革命党」。一九一二年二月三日，已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文在与日本特使森恪的会谈中再次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但日本疏远余等，不相接近」，若日本向其「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太郎」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此后，孙又多次对桂太郎、上原勇作、河上清等人作出「日本真正理解中国，能协力建设新中国，即使将满洲等地提供给日本也没有关系」等内容的谈话，直到一九二〇年代容共联俄政策确定后才不再发表类似言论，参见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
17. 参见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行漫记》，第五篇〈长征〉，第四节〈过大草地〉。
18.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是欧洲各旧统治阶级无力抵挡民族主义浪潮，为避免被群众力量颠覆，干脆採用民族主义原则，并使之与旧的「王朝」原则结合的一种马基维利式策略。原本只在统治阶层间横向联姻，缺乏明确民族属性的欧洲各王室竞相「归化」民族，以此掌握对「民族想像」的诠释权，然后透过自上而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众效忠，巩固王朝权位。参见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19. 刘仲敬的相关评论如下：「而我提出的诸夏和诸亚这种观念，那就相当于是波兰民族帝国和大奥斯曼帝国统统解体，就是像毕苏斯基和凯末尔主张的那样，大俄罗斯帝国和大奥斯曼帝国统统解体，内部的各个文化共同体各自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20. 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亦称为欧亚联盟，是一个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五个前苏联成员国为加深经济、政治合作而组建的国际组织，由二〇一一年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提议建立。

刘仲敬．民族发明学讲稿

叛逆的巴尔干

从希腊主义的解体到斯拉夫主义的崩溃

作者　刘仲敬

总编辑　富察
责任编辑　穆通安、涂育诚
特约编辑　三马兄、xqmxqm、纽承豪
企划　蔡慧华
封面设计　黄子钦
排版　宸远彩艺
彩页地图绘制　青刊社地图工作室（黄清琦）
内页地图绘制　薛伟成（页五八、六六、一〇八、三五九）

社长　郭重兴
发行人兼出版总监　曾大福
出版发行　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8楼
电话　〇二～二二一八～一四一七
传真　〇二～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专线　〇八〇〇～二二一～〇二九
信箱　gusa0601@gmail.com
脸书　facebook.com/gusapublishing
部落格　gusapublishing.blogspot.com
法律顾问　华洋法律事务所／苏文生律师

出版日期　二〇二〇年十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欢迎团体订购，另有优惠。请电洽业务部︵02︶22181417分机1124、1135
◎本书言论内容，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团之立场或意见，文责由作者自行承担